

《心理操控：剑桥分析公司与破坏美国的阴谋》

版权所有 © 2019 Verben Limited保留所有权利。

由企鹅兰登书屋有限责任公司旗下印记兰登书屋在美国出版，纽约。

RANDOM HOUSE 和 HOUSE 标识是企鹅兰登书屋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商标。

精装版ISBN 9781984854636

国际版ISBN 9780593229149

电子版ISBN 9781984854643

randomhousebooks.com

书籍设计：Barbara M. Bachman，为电子版改编

封面设计：Greg Mollica

封面摄影：Emma Innocenti/Getty Images

v5.4

ep

On résiste à l' invasion des armées; on ne résiste pas à l' invasion des idées.

(人们能抵抗军队的入侵；却无法抵抗思想的入侵。)

—维克多·雨果

目录

封面

[标题页]

[版权页]

[题词]

[第1章：创世纪]

[第2章：失败的教训]

[第3章：我们穿普拉达对抗恐怖主义]

[第4章：来自美国的史蒂夫]

[第5章：剑桥分析]

[第6章：特洛伊木马]

[第7章：黑暗三元组]

[第8章：来自俄罗斯的点赞]

[第9章：危害民主的罪行]

[第10章：学徒]

[第11章：站出来]

[第12章：揭露真相]

[[尾声]]: [[关于监管]]: [[写给立法者的话]]

致谢

[鸣谢]

关于作者

第1章

创世纪

每走一步，我的新鞋都会磨到脚后跟。我紧握着一个深蓝色的文件夹，里面装满了用彩色标签分类整理的文件。对于自己身处何地感到敬畏，对即将前往的地方感到忐忑，我专注于倾听我们的脚步声。一位助手提醒我们要快速行走，这样就不会被人看见。我们走过身穿制服的警卫，进入中庭，然后转向走廊。助手推开一扇门，我们匆忙下楼梯，走进一条看起来与上一条完全相同的走廊——大理石地板、高高的天花板、木制门扇，偶尔还有美国国旗。我们一共七个人，脚步声在走廊里回响。我们越来越近了；然后我被发现了。一位国会议员看到我，向我挥手打招呼。又这么快就回来了？几名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走出来。他们注意到我的电光粉色头发，知道我是谁。

两名摄影师跑到我前面开始拍摄，一边倒退着走一边拍摄。人群聚拢过来，问题开始涌来——怀利先生，NBC有个问题！CNN有个问题！你为什么在这里？——我的一位律师提醒我要保持沉默。助手指向电梯，警告记者们保持距离，我们挤了进去。电梯门关闭时，摄像机还在咔嚓作响。

我被挤在电梯后面，周围都是穿西装的人。我们开始下降，深入地下。下降过程中每个人都保持沉默。我的脑海里充满了与律师们所做的所有准备工作——哪些美国法律被违反了、被谁违反了，作为访问美国的非公民我有哪些权利、没有哪些权利，如何冷静地回应指控，如果我之后被逮捕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

我们停了下来，电梯门滑开。这里除了另一扇门什么都没有，门上有一个大红色标志，用白色字母写着限制区域。禁止公众或媒体进入。我们位于华盛顿特区美国国会大厦地下三层。

门的另一边，地板铺着豪华的栗色地毯。身穿制服的警卫没收了我们的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将它们放在桌子后面编号的架子上，每人一个，并给我们每人一张编号票据。他们告诉我们，过了这一点只能携带铅笔和纸张。他们警告我们，在出去时，如果确定我们记录了任何敏感性质的内容，我们的文件可能会被没收。

两名警卫推开一扇巨大的钢门。其中一名手势示意我们通过，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进一条由荧光灯微弱照明的长走廊。墙壁镶嵌着深色木板，走廊两侧排列着长排立在支架上的美国国旗。这里闻起来像一座老建筑，陈腐发霉，还带着清洁剂的味道。警卫带领我们沿着走廊前行，左转并继续走向另一扇门。上方，一个木制印章上刻着一只巨鹰，爪子紧握着箭矢，俯视着我们。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的敏感分隔信息设施(SCIF)——举行机密国会简报的同一个房间。

在里面，被荧光灯的强光照射，我的眼睛需要时间适应。这个空间完全平淡无奇，有着空白的米色墙壁和一张会议桌，周围摆放着椅子。这可能是散布在华盛顿的众多平淡联邦大楼中任何一栋楼里的任何房间，但SCIF的寂静让我印象深刻。它是隔音的，由多层墙壁建造，使其不受监视。据说这种建筑结构是防爆的。这是一个安全空间，一个存放美国秘密的地方。

一旦我们就座，国会议员们开始鱼贯而入。助手们在每位委员会成员面前的桌子上放置装订好的活页夹——民主党排名成员、加利福尼亚州国会议员亚当·希夫(Adam Schiff)坐在我的正对面，在他左边坐着国会女议员特里·休厄尔(Terri Sewell)，埃里克·斯沃威尔(Eric Swalwell)和華金·卡斯特罗(Joaquin Castro)聚集在远端。我的身旁是我的律师们

和我的朋友沙米尔·桑尼(Shahmir Sanni)，他也是一名举报人。我们给共和党人几分钟时间让他们露面。他们从未出现。

现在是2018年6月，我在华盛顿向美国国会作证，内容涉及Cambridge Analytica——一家我曾经工作过的军事承包商和心理战公司，以及一个涉及Facebook、俄罗斯、维基解密、特朗普竞选团队和英国脱欧公投的复杂网络。作为前研究总监，我带来了证据，证明Facebook的数据是如何被该公司武器化的，以及他们构建的系统如何使数百万美国人容易受到敌对外国的宣传行动影响。希夫主导提问。作为前联邦检察官，他的询问路线尖锐而精确，毫不浪费时间直奔主题。

你和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合作过吗？*是的。*

Cambridge Analytica与潜在的俄罗斯特工有任何接触吗？*是的。*

你相信这些数据被用来影响美国选民选举美国总统吗？*是的。*

一个小时过去了，然后是两个小时，再然后是三个小时。我选择主动来到这里回答这些问题：一个自由派、同性恋的24岁加拿大人如何发现自己成为英国军事承包商的一部分，为美国另类右翼(alt-right)开发心理战工具。刚从大学毕业，我在伦敦一家名为SCL Group的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该公司为英国国防部和北约军队提供信息作战方面的专业知识。在西方军队努力解决如何应对网络激进化问题之后，该公司希望我帮助建立一个数据科学家团队，创建新工具来识别和对抗网络极端主义。这既迷人又充满挑战，同时令人兴奋。我们即将为英国、美国及其盟友的网络防御开辟新天地，用数据、算法和有针对性的网络叙事来对抗不断涌现的激进极端主义叛乱。但通过2014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一位亿万富翁收购了我们的项目，以便在美国建立他自己的激进叛乱。Cambridge Analytica，一家几乎没有人听说过的公司，一家将心理档案研究武器化的公司，成功地颠覆了世界。

在军队中，当武器落入坏人之手时，他们称之为反冲(blowback)。看起来这种反冲已经在白宫本身引爆了。我无法继续从事如此腐蚀我们社会的工作，所以我吹响了哨子，向当局举报了整件事，并与记者合作警告公众正在发生的事情。坐在这个小组面前，因为前一天跨大西洋飞行而感到时差反应，随着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我仍然忍不住感到紧张。但有几次，我试图解释公司运营的复杂性时，每个人都露出困惑的表情，所以我干脆拿出一个活页夹滑向国会议员们。管他呢，我想。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不如把我带来的所有东西都给他们。没有休息，我身后的门始终紧闭。我被锁在一个闷热、没有窗户的地下深室里，除了直视这些国会议员的眼睛外无处可看，因为他们都在试图弄清楚他们的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

...

在此之前三个月，2018年3月17日，《卫报》、《纽约时报》和英国第四频道新闻同时发布了为期一年的联合调查结果，这是由我决定揭露Cambridge Analytica和Facebook内部真相而引发的。我作为举报人的现身引发了历史上最大的数据犯罪调查。在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NCA)、军情五处(MI5，英国国内情报机构)、信息专员办公室、选举委员会和伦敦大都会警察局都参与其中。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司法部、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也加入了调查。

在第一个报道发布前的几周里，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的调查正在升温。2月，穆勒起诉了13名俄罗斯公民和3家俄罗斯公司，指控他们犯有两项单独的阴谋罪。一周后，前特朗普竞选经理保罗·马纳福特和他的副手里克·盖茨被起诉。3月16日，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解雇了FBI副局长安德鲁·麦凯布，距离他退休拿到养老金仅剩二十四小时多一点。人们迫切需要了解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没有人能够将这些线索串联起来。我提供的证据将剑桥分析公司与唐纳德·特朗普、Facebook、俄罗斯情报部门、国际黑客以及英国脱欧联系在一起。这些证据揭示了一个从事非法活动的不知名外国承包商，如何被获胜的特朗普和英国脱欧竞选活动所使用。我带来的电子邮件链、内部备忘录、发票、银行转账记录和项目文档证明，特朗普和英国脱欧部署了相同的策略，采用了相同的技术，由许多相同的人指导——这一切都笼罩在俄罗斯秘密参与的阴影之下。

报道发布两天后，英国议会主会议厅提出了一个紧急问题。在罕见的团结时刻，政府部长和资深反对党议员齐声谴责Facebook的疏忽，指责其未能阻止自己的平台成为选举中的敌对宣传网络，并讨论了这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影响。下一波报道聚焦于英国脱欧，公投的完整性受到质疑。我向执法部门提供的一系列文档显示，Vote Leave竞选活动使用秘密的剑桥分析子公司花费暗钱在Facebook和Google广告网络上传播虚假信息。这被英国选举委员会认定为非法行为，该计划最终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大且影响最深远的竞选资金法违规事件之一。英国首相办公室唐宁街10号陷入沟通危机，因为Vote Leave作弊的证据浮出水面。NCA和MI5后来收到了俄罗斯大使馆与公投期间支持脱欧竞选活动最大资助者直接关系的证据。一周后，Facebook股价暴跌18%，市值损失800亿美元。动荡还在继续，最终创下了美国企业史上单日股价损失最大的记录。

2018年3月27日，我被召集到议会进行现场公开听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会对此习以为常。我们涵盖了从剑桥分析公司依赖黑客和贿赂到Facebook数据泄露再到俄罗斯情报行动的所有内容。听证会后，FBI、司法部、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启动了调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都想与我谈话。几周内，欧盟和二十多个国家对Facebook、社交媒体和虚假信息展开了调查。

我向世界讲述了我的故事，现在每个屏幕都像镜子一样将它映射回给我。连续两周，我的生活一片混乱。一天从伦敦时间上午6点在英国早餐节目和欧洲网络上露面开始，接着在美国网络上接受采访直到午夜。记者到处跟着我。我开始收到威胁。出于对安全的担忧，我不得不雇佣保镖在公共活动中保护我。我的父母都是医生，由于记者们的疯狂提问和对病人的惊扰，他们不得不暂时关闭医疗诊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的生活变得几乎无法管理，但我知道我必须继续敲响警钟。

剑桥分析的故事展示了我们的身份和行为如何在高风险的数据交易中成为商品。控制信息流的公司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公司之一；他们秘密设计的算法正在以前无法想象的方式塑造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思想。无论你最关心什么问题——枪支暴力、移民、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你都无法逃脱硅谷，这个美国感知危机的新震中。我在剑桥分析的工作暴露了技术创新的阴暗面。我们创新了。另类右翼(alt-right)创新了。俄罗斯创新了。而Facebook，这个你分享派对邀请和婴儿照片的网站，允许这些创新被释放出来。

...

...

我怀疑如果我生在一个不同的身体里，我不会对技术产生兴趣，也不会最终进入剑桥分析公司。我选择计算机是因为对像我这样的孩子来说，没有太多其他选择。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海岸的温哥华岛长大，周围环绕着海洋、森林和农田。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是长子，后面有两个妹妹，杰米和劳伦。当我十一岁时，我开始注意到我的腿变得越来越僵硬。我跑得不如其他孩子快，走路开始变得奇怪，这当然让我成为霸凌者的目标。我被诊断出患有两

种相对罕见的疾病，症状包括严重的神经性疼痛、肌肉无力以及视力和听力损伤。到十二岁时我坐上了轮椅——正好赶上青春期的到来——在我剩余的求学时光里都使用着这把椅子。

当你坐轮椅时，人们对待你的方式会不同。有时你会感觉更像一个物体而不是一个人——你的出行方式成了人们理解和定义你的方式。你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接近建筑物和结构——我可以从哪些入口进去？如何在避开楼梯的同时到达目的地？你学会寻找其他人从未注意到的东西。

在我发现计算机实验室不久后，它成了学校里唯一一个我不感到疏离的房间。在外面，要么有霸凌者，要么有居高临下的工作人员。即使老师引导其他孩子与我互动，也总是出于义务，这比被忽视更令人恼火。相反，我会去计算机实验室。

我大约在十三岁时开始制作网页。我的第一个网站是一个Flash动画，内容是粉红豹被笨拙的克鲁梭探长追赶。不久之后，我看到了一个关于用JavaScript编程井字游戏的视频，觉得那是有史以来最酷的事情。这个游戏看起来很简单，直到你开始分解所有的逻辑。你不能让计算机随机选择一个格子，那样会很无聊。你必须用规则指导计算机，比如在与另一个X相邻的格子里放一个X——也就是说，除非该行或列中已经有一个O。那对角线的X呢——我们如何解释它们？

最终我串联起了数百行意大利面条式的代码。我仍然记得下棋然后看着我的小创作回应的感觉。我感觉像个魔法师。我练习咒语越多，我的魔法就能变得越强大。

在计算机实验室之外，学校仍然是一个关于我无法或不被允许做什么，以及我不能成为谁的教育。我的父母鼓励我继续尝试找到一个我能融入的地方，所以我十五岁时，我在2005年夏天在维多利亚的莱斯特·B·皮尔逊联合世界学院寄宿，这是一所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1950年代苏伊士危机期间构想出世界第一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加拿大总理命名的国际学校。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共度如此多的时光令人着迷，我第一次真正对课程和同伴们要说的话感兴趣。我与一位卢旺达大屠杀的幸存者成为朋友，在一个深夜我们在宿舍里聊天时，他告诉我他的家人是如何被杀害的，以及当他还是个孩子时独自一人走到乌干达难民营的经历。

但真正让我开始关注周围世界的是在一个晚上坐在餐厅里吃饭，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学生直接坐在以色列学生对面，激烈辩论他们家园的未来。我意识到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了解得多么少——但我想了解——所以我很快对政治产生了兴趣。接下来的学年，我开始逃课去参加与当地国会议员的市政厅活动。在学校，我很少与任何人交谈，但在这些活动中我感到可以自由表达自己。在教室里，你坐在后面，老师告诉你如何思考和思考什么。有课程，有思想的处方。但在市政厅里，我发现了相反的情况。当然，政治家站在前面，但坐在观众席上的人——我们——可以告诉他或她我们的想法。这种颠倒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每当国会议员宣布活动时，我就会出现，提问，甚至告诉他们我的想法。

找到自己的声音是一种解脱。像任何青少年一样，我在探索自己是谁，但对于一个同性恋且坐轮椅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当我开始参加这些公共论坛时，我开始意识到我所经历的许多事情不仅仅是个人问题——它们也是政治问题。*我的挑战是政治性的。我的生活是政治性的。我的存在本身就是政治性的。*所以我决定变得政治化。其中一位国会议员的顾问，一位名叫杰夫·西尔维斯特的前软件工程师，注意到了这个总是出现的直言不讳的孩子。他主动帮助我在正在寻找技术帮助的加拿大自由党(LPC)找到一个职位。很快就达成了协议：那个夏天结束时，我将开始我的第一份真正的工作，在渥太华国会担任政治助理。

我在2007年夏天待在蒙特利尔，经常出入法裔加拿大技术无政府主义者(techno-anarchists)聚集的hacker空间。他们通常聚集在改造过的工业建筑里，那里有混凝土地板和胶合板墙壁，房间里装饰着Apple II和Commodore 64等复古技术设备。那时，经过治疗，我已经可以不用轮椅慢慢走动了。（我的情况持续在好转，但作为举报人的经历考验了我的身体极限。就在第一篇剑桥分析公司的报道发表前，我癫痫发作并昏倒在南伦敦的人行道上，醒来时发现自己正在

伦敦大学学院医院，护士正将静脉注射针头刺入我的手臂，那种尖锐的疼痛让我清醒过来。）大多数hacker根本不在乎你长什么样或者走路是否奇怪。他们分享你对技艺的热爱，并希望帮助你变得更好。

我与hacking社区的短暂接触留下了永久的印象。你会了解到没有任何系统是绝对的。没有什么是不可穿透的，障碍就是挑战。Hacker哲学教会我，如果你改变对任何系统的视角——无论是计算机、网络，甚至是社会——你可能会发现缺陷和漏洞。作为一个坐轮椅的同性恋孩子，我很early就理解了权力系统。但作为一个hacker，我学会了每个系统都有等待被利用的弱点。

...

...

开始在加拿大议会工作后不久

就在我开始在加拿大议会工作后不久，自由党开始对南方发生的事情产生兴趣。当时，Facebook刚刚成为主流，Twitter刚刚开始获得势头；没有人知道如何使用社交媒体进行竞选活动，因为社交媒体还处于起步阶段。但美国总统政治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即将踩下油门。

当其他候选人还在摸索如何理解互联网时，巴拉克·奥巴马的团队建立了My.BarackObama.com网站，开始了一场草根革命。当其他网站（如希拉里·克林顿的网站）专注于投放标准政治广告时，奥巴马的网站以为草根组织提供平台来组织和执行选民动员活动为中心。他的网站激发了人们对这位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的兴奋情绪，他比对手更年轻、更精通技术。奥巴马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领导者应有的样子。在我成长过程中被不断告知自己的局限性之后，他在那句简单的是的，我们可以！中灌输的坚定乐观主义深深打动了我。奥巴马和他的团队正在改变政治，所以当我十八岁时，我是自由党派往美国观察他竞选活动不同方面并识别可以带回加拿大进步竞选活动的新策略的几个人之一。

起初，我走访了几个early primary州，从新罕布什尔州开始，在那里我花时间与选民交谈，近距离了解美国文化的真实面貌。这既有趣又开眼界；来自加拿大的我，对我们敏感性的差异感到震惊。第一次有美国人告诉我他坚决反对“社会化医疗”——也就是我在家乡几乎每个月都要使用的那种公共医疗保健时，我震惊于竟然有人会这样想。第一百次听到时，就没那么震惊了。

我喜欢四处走动和与人交谈，所以当需要将重点转向data小组时，我并不太兴奋。但随后我被介绍给奥巴马的全国targeting主管肯·斯特拉斯马(Ken Strasma)，他很快改变了我的想法。

奥巴马竞选活动中最吸引人的部分是其品牌推广和对YouTube等新媒体的使用。这是酷炫的东西，是之前没有人使用过的视觉策略，因为YouTube还很新。这就是我想看到的，直到肯让我停下来。忘掉视频吧，他告诉我。我需要深入了解竞选技术策略的核心。我们所做的一切，他说，都基于准确理解我们需要与谁交谈，以及关于哪些议题。

换句话说，奥巴马竞选活动的骨干是data。斯特拉斯马团队产出的最重要工作是他们用来分析和理解这些data的建模，这使他们能够将其转化为应用匹配——通过...人工智能确定现实世界的传播策略。等等——竞选活动用AI？这似乎非常未来主义，就像他们在建造一个能够吞噬大量选民信息，然后吐出targeting标准的机器人。这些信息随后一路传达到竞选活动的高层，用于确定奥巴马的关键信息和品牌推广。

处理所有这些data的基础设施来自一家当时名为选民激活网络公司(Voter Activation Network, Inc., VAN)的公司，由来自波士顿地区的一对出色的同性恋夫妇马克·沙利文(Mark Sullivan)和吉姆·圣乔治(Jim St. George)经营。到2008年竞选结束时，多亏了VAN，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拥有的选民data是2004年竞选后的十倍。这种data量以及组织和操作它们的工具，为民主党在推动选民投票方面提供了明显优势。

我对奥巴马竞选机器了解得越多，就越着迷。后来我得以向马克和吉姆提出所有想问的问题，因为他们似乎觉得这个年轻的加拿大人来到美国学习数据和政治很有趣。在我看到肯、马克和吉姆在做的事情之前，我从未想过使用数学和人工智能来推动政治竞选。事实上，当我第一次看到人们在奥巴马总部的电脑前排队时，我还在想，是信息和情感，而不是电脑和数字，创造了成功的竞选活动。但我了解到，正是那些数字——以及他们创建的预测算法——让奥巴马与之前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区别开来。

一旦我意识到奥巴马竞选团队如何有效地使用算法来传递信息，我就开始学习如何自己创建算法。我自学了如何使用MATLAB和SPSS等基础软件包，让我能够处理数据。我没有依赖教科书，而是从玩鸢尾花数据集开始——这是学

习统计学的经典数据集——并通过试错来学习。能够操作数据，包括使用鸢尾花的不同特征，如花瓣长度和颜色，来预测花的种类，绝对让人着迷。

一旦我理解了基础知识，我就从花瓣转向了人。VAN充满了关于年龄、性别、收入、种族、房屋所有权的信息——甚至包括杂志订阅和航空里程。有了正确的数据输入，你就可以开始预测人们是否会投票给民主党或共和党。你可以识别和分离出对他们来说可能最重要的问题。你可以开始制作更有可能影响他们观点的信息。

对我来说，这是理解选举的全新方式。数据是一股向善的力量，推动着这场变革的竞选活动。它被用来产生首次投票者，接触那些感到被排斥的人。我越深入其中，就越认为数据将是政治的救星。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加拿大，与自由党分享我从美国下一任总统那里学到的东西。

11月，奥巴马在与约翰·麦凯恩的竞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两个月后，在竞选团队的朋友们邀请我参加就职典礼后，我飞到华盛顿与民主党获胜者一起庆祝。（首先在门口出现了一点小插曲，工作人员对让不满21岁的我进入开放酒吧活动感到恐慌。）我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与詹妮弗·洛佩兹和马克·安东尼聊天，观看巴拉克和米歇尔·奥巴马作为第一夫妇的第一支舞。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现在有机会庆祝当合适的人懂得如何使用数据赢得现代选举时会发生什么。

...

...

但通过直接向特定选民传达特定信息

奥巴马竞选团队的微定向已经开始了美国公共话语私有化的进程。尽管直邮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竞选活动的一部分，但数据驱动的微定向允许竞选团队将无数细粒度的叙述与细粒度的选民群体匹配——你的邻居可能收到与你完全不同的信息，而你们双方都不会察觉。当竞选活动在私下进行时，可以避免辩论和公开的审查。美国民主的根基——公共广场，正在逐渐被在线广告网络所取代。没有任何审查，竞选信息甚至不再需要看起来像竞选信息。社交媒体创造了一个新环境，竞选活动现在可以出现，就像奥巴马竞选团队试点的那样，仿佛你的朋友在给你发信息，而你却没有意识到接触的来源或计算出的意图。竞选活动可以看起来像新闻网站、大学或公共机构。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我们被迫信任政治竞选活动要诚实，因为如果谎言被说出，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注意到。在私人广告网络内部，没有人会纠正记录。

在第一次奥巴马竞选活动之前的几年里，硅谷的董事会出现了一种新的积累逻辑：科技公司开始从他们绘制和组织信息的能力中赚钱。这个模式的核心是知识的根本不对称——机器对我们的行为了解很多，但我们对它们的了解很少。作为便利性的交换，这些公司为人们提供信息服务，以换取更多信息——数据。数据变得越来越有价值，Facebook平均从其1.7亿美国用户中每人赚取30美元。与此同时，我们已经相信了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想法。实际上，我们用我们的数据为一个提取人类注意力的商业模式付费。

更多数据带来更多利润，因此实施了设计模式来鼓励用户分享更多关于自己的信息。平台开始模仿赌场，采用无限滚动和针对大脑奖励系统的成瘾功能等创新。Gmail等服务开始以一种会让传统邮政快递员坐牢的方式检查我们的通信。实时地理跟踪，曾经是罪犯脚镯的专属功能，被添加到我们的手机中，过去被称为窃听的行为成为了无数应用程序的标准功能。

很快，我们开始毫不犹豫地分享个人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词汇的鼓励。实际上是私人拥有的监控网络被称为“社区”，这些网络用来盈利的人被称为“用户”，成瘾性设计被推广为“用户体验”或“参与度”。人们的身份开始通过他们的“数据尾气”或“数字面包屑”进行画像。数千年来，主导的经济模式一直专注于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将这些原材料转化为商品。棉花被纺成布料。铁矿石被冶炼成钢铁。森林被砍伐成木材。但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身份——转化为商品成为可能。人们被处理成数据。我们将成为这个新的数据工业综合体的原材料。

史蒂夫·班农是最早发现这一新现实政治潜力的人之一，他是右翼网站布莱巴特新闻相对不为人知的编辑，该网站的成立是为了根据安德鲁·布莱巴特的民族主义愿景重新塑造美国文化。班农将自己的使命视为不折不扣的文化战争，但当我第一次遇见他时，班农知道缺少了什么，他没有合适的武器。野战将军专注于火炮力量和制空权，而班农需要获得文化力量和信息优势——一个由数据驱动的武器库，适合在这个新战场上征服人心。新成立的剑桥分析公司成为了那个武器库。通过完善军事心理作战(PSYOPS)的技术，剑桥分析公司推动史蒂夫·班农的另类右翼叛乱进入鼎盛期。在这场新战争中，美国选民成为了困惑、操纵和欺骗的目标。真相被另类叙事和虚拟现实所取代。

剑桥分析公司首先在非洲和世界各地的热带岛屿试验这种新战争。该公司试验了大规模在线虚假信息、假新闻和大规模画像。它与俄罗斯特工合作，雇佣黑客入侵反对派候选人的电子邮件账户。很快，在远离西方媒体关注的地方完善了方法后，CA从在非洲煽动部族冲突转向在美国煽动部族冲突。似乎突然之间，美国爆发了一场起义，狂热地喊着MAGA!和建墙!总统辩论突然从政策立场转向关于什么是真新闻和什么是假新闻的荒谬争论。美国现在正生活在首次大规模部署心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后果中。

作为剑桥分析公司的创建者之一，我为所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我知道我有深刻的义务纠正我过去的错误。像技术界的许多人一样，我愚蠢地被Facebook”快速行动，打破常规”的呼吁的狂妄魅力所迷惑。我从未如此后悔过什么。我快速行动，我建造了具有巨大力量的东西，我从未完全理解我在破坏什么，直到为时已晚。

...

...

当我在2018年初夏的那一天前往国会大厦深处的安全设施时，我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感到麻木。共和党人已经在对我进行对立研究。Facebook正在使用公关公司诋毁其批评者，其律师威胁要因未指明的网络犯罪向FBI举报我。司法部现在由特朗普政府控制，该政府公然无视长期以来的法律惯例。我激怒了如此多的利益集团，以至于我的律师真正担心FBI可能在我完成后逮捕我。我的一位律师告诉我，最安全的做法是留在欧洲。

出于安全和法律原因，我不能直接引用我在华盛顿的证词。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带着两个大活页夹走进那个房间，每个活页夹都包含几百页文件。第一个活页夹包含电子邮件、备忘录和文件，显示了剑桥分析公司数据收集操作的范围。这些材料表明，该公司招募了黑客，雇佣了与俄罗斯情报部门有已知联系的人员，并在世界各地的选举中参与了贿赂、勒索和虚假信息活动。有律师的机密法律备忘录，警告史蒂夫·班农剑桥分析公司违反《外国代理人注册法》，以及一批文件，描述该公司如何利用Facebook访问超过八千七百万个私人账户，并使用这些数据努力压制非裔美国人的选票。

第二个文件夹更加敏感。它包含了数百页的电子邮件、财务文件，以及我当年早些时候在伦敦秘密获取的录音记录和短信记录的文本。这些文件是美国情报部门一直在寻找的，详细记录了俄罗斯驻伦敦大使馆与特朗普的联系人以及主要脱欧运动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份文件显示，英国主要的另类右翼(alt-right)人物在飞往会见特朗普竞选团队之前和之后都与俄罗斯大使馆有过会面，其中至少三人收到了在俄罗斯矿业公司获得优先投资机会的提议，潜在价值数百万美元。在这些通信中变得清晰的是，俄罗斯政府很早就识别出了英美另类右翼网络，并且可能培养了其中的人物成为接触特朗普的代理人。它显示了2016年各重大事件之间的联系：另类右翼的崛起、脱欧的意外通过，以及特朗普的当选。

四个小时过去了。五个小时。我正在深入描述Facebook在所发生事件中的作用和责任。

Cambridge Analytica使用的数据是否曾经落入潜在俄罗斯特工的手中？是的。

你是否相信2016年总统选举和脱欧运动期间，伦敦存在俄罗斯国家赞助活动的联系？是的。

Cambridge Analytica和WikiLeaks之间是否有过沟通？是的。

我终于看到委员会成员眼中闪现出理解的光芒。Facebook不再只是一家公司，我告诉他们。它是通往美国人民心灵的门户，而马克·扎克伯格为Cambridge Analytica、俄罗斯人以及天知道还有多少其他人敞开了那扇门。Facebook是一个垄断企业，但它的行为不仅仅是监管问题——它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Facebook享有的权力集中对美国民主构成了危险。

在多个司法管辖区、情报机构、立法听证会和警察当局之间进行着微妙的平衡，我已经提供了超过两百小时的宣誓证词，并移交了至少一万页的文件。我发现自己在世界各地旅行，从华盛顿到布鲁塞尔，帮助领导人们不仅了解Cambridge Analytica，还了解社交媒体对我们选举诚信构成的威胁。

然而，在我提供证词和证据的许多小时里，我意识到警察、立法者、监管者和媒体都很难弄清楚如何处理这些信息。因为犯罪发生在网上，而不是在任何物理位置，警察无法就谁拥有管辖权达成一致。因为故事涉及软件和算法，许多人困惑地举起了双手。有一次，当我正在配合的执法机构之一召唤我进行询问时，我不得不向那些据说是技术犯罪专家的特工解释一个基本的计算机科学概念。我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图表，他们没收了它。从技术上讲，这是证据。但他们开玩笑说他们需要它作为理解自己正在调查什么的小抄。哈哈，太有趣了，伙计们。

我们被社会化地信任我们的机构——我们的政府、我们的警察、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监管者。就好像我们假设某个人带着一个秘密专家团队坐在办公室里制定计划，如果那个计划不起作用，别担心，他还有B计划和C计划——负责的人会处理好的。但事实上，那个人并不存在。如果我们选择等待，没有人会来。

第2章

失败的教训

就在这之前的八年，我搬到了英国，我与Cambridge Analytica纠缠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在加拿大政界工作了几年，但讽刺的是，我搬到伦敦是为了逃避政治。2010年夏天，我搬进了泰晤士河南岸的一套公寓，靠近泰特现代美术馆，这座现代艺术博物馆坐落在巨大的老班克赛德发电站里。在渥太华待了几年后，我在21岁时决定离开政治，跨越大西洋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上法学院。不再从事政治工作，我摆脱了对政党的旧责任。不再重要我可能看到和谁在一起，我也不再需要注意自己说什么或考虑谁可能在听。我可以自由地结识新朋友，我很兴奋能为自己开始新的生活。

当我到达时还是夏天，拆完行李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去和日光浴者、游客以及年轻情侣们一起坐在海德公园里。我充分利用了伦敦，周五和周六晚上在肖尔迪奇和达尔斯顿度过，周日在伯勒市场度过，这是伦敦最古老的食品市场，挤在一个充满活力的户外大厅里，到处都是叫卖的商贩、游客和烹饪摊位的嘈杂声。我开始和同龄人交朋友，第一次感到年轻。

但在我到达几天后，仍然因为时差而感到模糊时，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这让我清楚地知道离开政治并不会那么容易。四个月前，一个名叫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的人成为了英国副首相。

1999年首次当选欧洲议会议员，他一路晋升，于2007年成为自由民主党领袖。那时自由民主党还是英国政治中激进的第三党——率先支持同性婚姻，也是唯一反对伊拉克战争并呼吁放弃英国核武器的政党。在2010年大选中，经过工党十多年疲惫的“第三条道路”之后，“克莱格热潮”席卷英国。在巅峰时期，克莱格的民调支持率与温斯顿·丘吉尔不相上下，并将自己定位为英国的巴拉克·奥巴马。选举后，他成为联合政府的一员，使保守党的戴维·卡梅伦成为首相。电话来自他的办公室：他们从自由主义政治的共同联系人那里听说了我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数据工作，想了解更多。

在约定时间，我到达了自由民主党总部(LDHQ)，当时仍位于威斯敏斯特考利街4号。距离威斯敏斯特宫仅几个街区，这座改建的新乔治亚风格宅邸装饰着深红色砖墙，两侧高大的石制烟囱相映成趣。对于这条狭小蜿蜒的街道来说，它显得相当庞大，所以我毫不费力就找到了。由于这里是女王陛下政府一个政党的办公室，大都会警察的武装部队在附近站岗，在这条小巷中来回巡逻。门铃响后，我推开沉重的木门，走到接待处，一名实习生迎接我并带我去开会。这里仍保留着庄园原有的吊灯、橡木镶板和壁炉，展现着昔日宏伟住宅的褪色优雅，这与这个曾经宏伟的政党倒是颇为相配。

他们都称之为考利街，这与我在加拿大或美国见过的任何地方都不同。我想知道在狭窄嘎吱作响的走廊里摇摆而过的党务工作人员如何能完成任何工作。旧卧室里塞满了办公桌，连接服务器的电缆用胶带贴在墙上和门框周围。在一个改建的壁橱里，一个显然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症的男人在地板上大声打鼾，但没人太在意。环顾四周，我觉得这个地方更像一个老男孩俱乐部，而不是执政党。我走上有着精雕细琢栏杆的大楼梯，被带进一个大会议室，这里曾经一定是主餐厅。等了几分钟后，一小群工作人员鱼贯而入。在例行的英式闲聊结束后，其中一人说：“那么告诉我们选民激活网络的情况吧。”

奥巴马2008年胜选后，世界各地的政党都开始对这种由全国目标数据库和大型数字化操作驱动的新式“美式竞选”产生兴趣。竞选背后是新兴的**微定向**实践，机器学习算法消化大量选民数据，将选民群体分为狭窄的细分市场，并预测哪些个人选民是选举中说服或动员的最佳目标。自由民主党想与我交谈，因为他们不确定是否能将这种新式竞选

方式转化到英国政治体系中。我与自由党合作的项目——建立与奥巴马竞选团队使用的同类选民定向系统——对他们如此有趣的原因是，这是美国以外首个此类规模的系统。而且加拿大像英国一样，使用相同的简单多数制”威斯敏斯特模式”选举制度，并拥有多样化的政党阵列。在这次谈话中，工作人员意识到，如果他们引进加拿大版本的技术，一半的本地化工作就已经完成了。会议结束时，在了解了该系统的功能后，他们几乎兴奋不已。离开后，我跑回学校赶上一场关于法定解释规则的讲座尾声，以为事情就此结束。

但自由民主党顾问第二天再次致电，询问我是否能回去向更大的群体讲述我的故事。我正在上课，所以最初没有接听，但在一个陌生号码的四次未接来电后，我走出去看看有什么如此紧急的事。那天下午有一个高级员工会议，他们问我是否能就微定向做一个即兴演讲。所以下课后，我背着装满教科书的背包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走向考利街。时间如此紧迫，我没时间换衣服，所以穿着Stüssy图案T恤和迷彩运动裤去见副首相的顾问们。

走进同一间会议室，这次我面对的是满屋的嗡嗡嘈杂声。没有任何提示，我就被引到了前面，所以，在为我略显荒谬的着装道歉后，我就开始即兴发挥。我告诉他们自由民主党如何能够使用微定向来克服作为一个小党派所面临的劣势。随着我继续讲下去，我情不自禁地变得更加激情澎湃。自从我离开LPC后，我就没有再谈论过这个话题，我的心情简直倾泻而出。我告诉他们我在奥巴马竞选团队中看到的一切，看到那么多人第一次投票是什么感觉，看到非裔美国人在充满希望的集会上是什么感觉。我告诉他们这不仅仅是关于数据；这是关于我们如何能够接触到那些对政治已经绝望的人们。这就是我们如何找到他们并激励他们参与投票的方式。但最重要的是，这是关于技术如何能够成为这个现在发现自己身处权力走廊的政党所部署的工具，来颠覆支撑着英国政治如此之多的根深蒂固的阶级制度。

几周后，自由民主党邀请我为他们工作，在英国实施一个选民定向项目。我刚开始在LSE攻读学位，作为一个21岁的学生，我终于在伦敦站稳了脚跟。我犹豫这是否真的是一个好主意，再次让自己分心于政治。但这是一个机会，可以采用同样的技术——同样的软件，本质上是同样的项目——并完成我在加拿大开始的工作。但真正把我拉进来的是我在考利街一间办公室墙上随意悬挂的东西。那是一张泛黄的旧卡片，边角略有卷曲，上面摘录了自由民主党宪法的一段话：任何人都不应被贫困、无知或盲从所奴役。

我说好的。

2008年总统大选之后，我回到渥太华，写了一份关于奥巴马竞选团队新技术策略的报告。结果反响平平。每个人都期待我告诉他们竞选活动的华丽品牌、图形和病毒式视频。相反，我写的是关系数据库、机器学习算法，以及这些东西如何通过软件和筹款系统相互连接。当我建议党投资于数据库时，人们认为我疯了。他们想要性感的答案——而不是这个。奥巴马是他们”模范”竞选活动的基准，他们被高颧骨和撅嘴所吸引，而不是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骨架和脊梁。

大多数竞选活动可以归结为两个核心操作：说服和投票率。投票率，或”GOTV”（让选民投票）范围，是那些可能支持候选人但并不总是投票的人。说服范围则相反，代表那些可能会投票但并不总是支持该党的人。那些极不可能投票或极不可能支持我们的人被归入排除范围，因为接触他们没有意义。那些既很可能支持候选人又很可能投票的选民——这些是”基础”选民，他们通常被排除在联系之外，但他们可能会被优先考虑用于志愿者或捐助者招募。找到合适的选民群体进行联系是游戏的名称。

在1990年代，美国选民通常使用地方或州办公室提供的数据进行定向，这些数据通常包含每个选民的党籍注册信息（如果他们有的话）和他们的投票历史（他们参与了哪些选举的投票）。然而，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并非所有州都提供这些信息，选民改变想法的频率比改变党籍注册的频率更高（或者不会注册党籍），而且这些信息无法告诉你真正激励选民的问题是什么。微定向所做的是找到额外的数据集，比如关于选民抵押贷款、订阅或汽车型号的商业数据，为每个选民提供更多背景信息。使用这些数据，连同民调和统计技术，可以对所有选民记录进行“评分”，产生更准确的信息。

奥巴马竞选团队所做的是将这种技术主流化，并将其置于竞选活动的核心。这很重要，因为竞选活动的有组织混乱通常不是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比如演讲或集会。相反，它是志愿者拉票员或通过直邮向全国各地个人选民进行的数百万次直接接触。虽然不如精心制作的演讲或令人惊叹的品牌那么性感，但正是这个看不见的机器提供了现代总统竞选活动的关键动力。当其他人都专注于竞选活动的公众形象时，战略家们专注于部署和扩展这个隐藏的机器。

最终，我们在反对党领袖办公室(我当时在议会工作)的一些人意识到，如果我们为领袖与选民和公民的互动创建一个议会版本的选民激活网络(Voter Activation Network)，我们就能向党展示它有多么有用。党不愿意为如此奢侈的新数据库买单，但我们意识到在领袖的官方议会预算中有空间。唯一的问题是这些技术上是公共资金，我们创建的任何试点数据库都不能用于政治目的。但我们并不太担心。议会版本将包含联系过领袖的选民和公民的记录，由于选民只是戴着不同帽子的公民，这将允许我们向党展示所有相同的功能，而无需他们花费任何费用。当然，在亲眼看到这样的系统后，加拿大自由党肯定会开始理解数据的潜力。我们询问Mark Sullivan和Jim St. George是否考虑过将VAN扩展到国际——加拿大。当时他们还没有在美国以外做过任何大项目，但他们很兴奋能与我们合作。在Sullivan和St. George的帮助下，我们能够在六个月内创建一个加拿大化的VAN基础设施。令党高兴的是，VAN甚至可以同时使用英语和法语。只有一个问题：系统中实际上没有数据来驱动。

计算机模型不是能够预测世界的神奇咒语——它们只有在有充足数据作为预测基础时才能做出预测。如果系统中没有数据，那么就不可能有模型或定向投放。这就像买了一辆赛车但省了汽油——无论汽车的工程多么精密，它就是启动不了。所以下一步是为VAN采购数据。但数据需要花钱，而且因为它将用于竞选活动，根据法律，必须由党来支付，而不是领袖的议会办公室。但党几乎立即表现出强烈的抵制，不愿意改变。我转向最初带我进入政界的议员Keith Martin。我还在上学时他给了我第一份实习工作，后来在加拿大议会给了我第一份真正的工作。Martin经常被称为加拿大政界的“独行侠”，他的办公室也配备了独行侠。对我来说，他非常合适。Martin接受过急诊医生训练，早期的医疗生涯在非洲冲突地区度过，治疗从地雷伤到营养不良的各种疾病。这家伙真的很酷，在从政之前过着令人惊叹的生活——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他的照片，穿着卡其色衬衫，看起来像印第安纳·琼斯，与豹子坐在一起。作为急诊医生，他被训练不要浪费时间，但在政界，你通过浪费时间来生存。有一次他对议会的机械化程序如此愤怒，以至于在辩论中途，他拿起了“权杖”——我们从英国继承的镀金中世纪武器，放在下议院的过道里。

2009年，Martin的高级顾问Jeff Silvester，一位将注意力转向政治的前软件工程师，是党内少数几个理解我想要做什么的人之一。他是我在议会期间的导师和支柱。我解释说，尽管党没有授权我推进数据定向投放项目，但我们需要这样做。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资金。在Martin的批准下，Jeff同意帮助我筹集资金，而不告诉党的全国办公室。我们开始举办秘密活动，我可以向潜在捐赠者解释，如果LPC有任何希望在21世纪保持竞争力，我们需要这个项目。我们低调地做这一切，说服当地人投钱，而党的工作人员没有关注我们。很快，我们筹集了几十万加元，足以启动这个项目。对全国办公室不满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党组织同意成为我们实验的试验品。

还不清楚这些是否会起作用。在美国只有两个主要政党，而在加拿大有五个。这意味着你预测的维度不再是二元的(民主党或共和党)，而是多元的(自由党、保守党、新民主党、绿党或魁北克集团)。有了更多选择，你就会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摇摆选民(例如，自由党-保守党 vs. 自由党-新民主党 vs. 自由党-绿党等)，他们可以在许多方向上转移支持。在加拿大和欧洲，消费者数据市场的发展也远不如美国，所以美国的许多标准数据集要么不可用，要么必须从许多来源拼凑在一起。最后，其他国家的政党通常有严格的捐赠者或支出上限。很多人怀疑微定向投放是否能在美国以外部署，但我还是想试试。

我联系了Ken Strasma——他在2008年负责奥巴马的定向投放操作，问他是否愿意帮助我们在加拿大建立一个项目。Strasma在华盛顿特区的团队随后构建了模型。温哥华的卑诗省办公室整合了有用的数据集，比如旧的民调和拉票数据，Strasma研究了如何处理多党政治的额外复杂性。全省的志愿者们要么被分配这些新的拉票名单进行试验，要么被分配作为对照组的旧名单。当结果出来时，卑诗省党派工作人员松了一口气。和许多竞选活动一样，该党使用说服性拉票来接触那些尚未决定支持哪个党派的选民。通过比较旧名单与新的微定向名单的成功转化率（即之前未决定的选民宣布支持你的党派），卑诗省的运作能够确定新的定向方法具有更高的转化率。这非常令人兴奋。我们证明了奥巴马在美国取得的成就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政治制度中都是可能的。但当渥太华的全国党部发现我们所做的事情时，他们反对这个全国性项目。他们想要像奥巴马那样竞选，但当向他们展示如何做时，他们却拒绝了。

我被政治吸引是因为它似乎是一种改变世界的方式，但在碰壁一年多之后，还有什么意义呢？然后出现了一次干预。在自由党内，许多秘书工作人员都来自一群年长的魁北克女士，她们存在的时间足够长，看到了政治如何能改变一个人。她们带我到渥太华河对岸的法语城镇加蒂诺吃午餐。点燃香烟后，她们用沙哑带口音的声音说：“听着，不要变成我们这样。”她们告诉我她们把生命献给了党，而党除了“腰围扩大和几次离婚”之外什么也没有给她们作为回报。“去吧，趁年轻，”她们说。“在它困住你之前赶紧离开这里。”我意识到她们是对的。年仅二十岁的我，已经是一个等待发生的中年危机。

我决定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学院，因为伦敦可能离渥太华足够远——跨越大西洋3300英里和五个时区。我后来了解到，加拿大的一些党派领导层有着矛盾的动机。该党仍然将许多广告、咨询和印刷合同授予由高级党员或其朋友拥有和经营的公司。一种新的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可能意味着党内的“朋友和家人”会失去机会。2011年，在我离开渥太华一年后，LPC在联邦选举中被加拿大保守党彻底击败，后者在其引进的共和党顾问的要求下投资了先进的数据系统。自由党有史以来第一次被降级到第三位，在议会中只有三十四席。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失败。

...

当我开始为伦敦的自由民主党工作时，每周只工作几个小时，在LSE上课期间。但几乎立刻我就意识到，与奥巴马竞选团队甚至LPC相比，自由民主党完全是一个一团糟的政党。办公室的运作更像一个陈旧的古董店，而不是政治机器的心脏。LDHQ的工作人员大多是穿着西装和凉鞋的络腮胡男人，他们花更多时间聊论旧时的辉格党，而不是做任何动员竞选的事情。我要求查看他们的数据系统，有人告诉我关于EARS的事，这代表选举代理人记录系统。“哇，好吧。这看起来...很老式，”我说。“这是八十年代制作的吗？”这就像要求图形演示却被展示那些老的Pong游戏之一。有人告诉我，其中一个系统是在越南战争期间设计的。

很快党内许多人都清楚VAN比任何其他可用系统都要优越，党最终批准了与VAN的合同来建立数据基础设施。但现在我们需要数据——运行法拉利的燃料。这是项目在加拿大出错的步骤，而在英国这个过程进行得同样不顺利。英国没有全国选举登记册——都由市政委员会处理——所以我们必须接触英国各地数百个不同的委员会来获取他们的选民数据。我会打电话给西萨默塞特的Agnes，她大概105岁了，可能从女性获得选举权以来就一直在管理选民名册，问她：“你有登记册的数字副本吗？”不，她会说，因为她按照一直以来的方式保存记录，在纸上，但我可以在当地市政厅的装订书中看到副本。有时地方官员同意给我们数据，有时不同意。有时是电子形式，有时是PDF文件，有时只是我们必须喂入光学扫描仪的大量纸张。Excel文件通常会在没有密码的情况下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因为为什么会有人想要窃取选民数据呢？

英国选举制度停留在1850年代，我很快发现，自由民主党的策略也是如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该党及其前身老自由党自二战以来一直处于连败状态。领导层已经失去了获胜的诀窍，完全沉迷于分发传单。这些传单被称为“焦点”，通常抱怨一些狭隘的“地方问题”，如道路坑洼或垃圾收集。自由民主党认为这是一种聪明的方式，可以将他们的信息“悄悄传递”到看起来像地方报纸的东西中。但自由民主党的廉价版《真理报》有一个问题：实际上没有人阅读

它。他们对选民的设想是那些周末翻看邮购目录和政治文献的人——政治工作人员往往在社交方面如此愚钝，他们忘记了普通人是有生活的。尽管是三大主要政党中最小的一个，自由民主党却拥有最多的志愿者，因为他们对于风雨无阻地往门缝里塞传单这件事绝对是狂热的。他们会在决定传单上应该说什么之前，先决定要分发多少传单。

在黑客世界中，“暴力破解”(brute force)一词指的是随机尝试每一个可能的选项，直到找到正确的那个。它不涉及策略——只是简单地将所有东西都扔到墙上，看看什么能粘住。这基本上就是自由民主党在做的事情，在没有针对特定选民的情况下，在传单上花费大量金钱。暴力破解是一种不成熟的黑客手段，效率低得可笑，但偶尔也会成功。肯定有更有效的赢得选举的方法。然而，当我试图提出替代方案，不再用他们配有MS Word剪贴画的中上阶层宣传品轰炸选民时，我会得到一堂关于“自由民主党如何获胜”的讲座，以及传说中的1990年伊斯特本补选——自1988年社会民主党-自由党合并以来第一位以自由民主党身份获胜的议员的意外胜利——据说他们在那里分发了大量传单。质疑伊斯特本就像异端邪说。边缘宗教要求一致性，自由民主党也不例外。该党是一个传单崇拜。

补选是不定期的特别选举，比如投票选出接替已故国会议员的选举。自由民主党对此痴迷不已。出于某种原因，每当该党赢得补选时，成员们就会表现得好像他们征服了英国，打出宣称“自由民主党在这里获胜！”的横幅。但作为我研究的一部分，我决定编目自1990年以来的每次选举和补选，发现该党输掉了其中的绝大多数。”但你们正在做的事情并不能帮助你们获胜。它帮助你们失败。这里是数据，“我告诉他们。”这些是事实。”

一些党的领导层听进去了，但大多数人只是看起来很恼火。他们有自己的小圈子，为党的忠实信徒充当“选举大师”，不太愿意一个新人大大咧咧地走进来告诉他们如何修复他们的系统。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与此同时，我开始摆弄我们能够从Experian等数据供应商收集到的选民数据。我试验了不同类型的沙盒模型，类似于我在加拿大所做的。然后奇怪的事情不断发生。无论我如何设计模型，我都无法构建一个能够可靠预测自由民主党选民的模型。我在为保守党或工党做这件事时没有任何困难。某个绿意盎然的乡村小镇的上流人士？保守党。住在曼彻斯特市政住宅区的？工党。但自由民主党是这些介于两者之间的怪人，拒绝任何简洁的描述。他们中的一些看起来像工党风格，一些看起来像保守党风格。唉，我遗漏了什么？我怀疑是否有潜在变量在起作用。在社会科学中，“潜在变量”(latent variable)是一个正在影响结果的元素，但你还没有观察到或测量到——一个隐藏的构造，它就飘浮在视线之外。那么这里的隐藏构造是什么？

一个问题是，在基本层面上，我无法想象自由民主党选民的样子。我可以想象保守党人，他们——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要么是上流、富有的《唐顿庄园》类型，要么是工人阶级、反移民类型。工党选民是北方人、工会成员、市政住宅区居民或公共部门类型。但自由民主党人是谁？如果我无法想象谁会与我们在那条道路上并肩作战，我就无法想象通往胜利的道路。

所以，在2011年春末，我开始在英国各地旅行寻找答案。几个月来，我会早上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上课，然后下午跳上火车前往一些名字可爱的地方，如斯肯索普、西布罗姆维奇和斯托-昂-沃尔德。我的意图是进行选民访谈和焦点小组，但不是通常那种。我不会问准备好的、有剧本的问题，而是进行非结构化对话，这样人们可以告诉我他们的生活和对他们重要的事情。我本可以直接跳到民调，但我意识到我问的任何问题都会被我这个提问者认为最相关的事情所偏见。当然，我会得到我添加到民调中的问题的答案，但如果它们是错误的问题呢？我去与人们交谈，因为我知道我已经被自己的经验所偏见和着色。我不知道住在纽卡斯尔市政住宅区的英国老年男子，或者布莱奇利的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的生活实际上是什么样的。我希望他们用自己的话语和自己的条件告诉我他们希望我了解的关于他们生活的事情。所以我请当地选区政党和民调公司帮助随机选择要交谈的人。

对于较小村庄的焦点小组，通常没有地址。我会出现，然后被告知：“我们在山上的小屋里开会。走过酒吧，穿过那些长着水仙花的田野，过一会儿你就会看到它。”随机的镇民会出现，也许当地酒保克莱夫或绅士农夫希林汉姆勋爵会闲逛过来。有时我会直接去村庄酒吧和那里的人聊天。英国人很古怪、微妙，而且聊天往往很有趣，焦点小组让我想起了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非常喜爱的市政厅会议。人们会交谈，我只是倾听并记录他们所说的话。

通过这许多次谈话，我独自旅行，因为党派对我在做什么并不太感兴趣，但我开始拼凑出自由民主党的随机性。很快变得明显的是，他们过着如此不同的生活。他们是诺福克戴着格子帽的农民。在肖尔迪奇搞艺术的潮人。在芒布尔斯或兰菲汉格尔-伊-克勒丁的威尔士老太太。索霍的同性恋者。十二年没梳过头发的剑桥教授。自由民主党选民是一个奇怪而折衷的混合体。

他们可能看起来都不同，但我注意到他们确实有一个共同特征。工党选民会说：“我是工党人。”保守党人会说：“我是托利党人。”但自由民主党人几乎从不说：“我是自由民主党人。”相反，他们会说：“我投票给自由民主党。”这是一个细微但最终重要的区别。我花了一些时间思考才想出这可能与该党的历史有关。该党在其现代形式中直到1988年才正式成立，是在两个较小政党合并之后，这意味着其现任选民中的许多人最初来自历史上的托利党或工党家庭。这意味着在他们生活中的某个时刻，他们必须做出积极决定，从旧党转向这个新党。对他们来说，支持自由民主党是一种行为，而不是一种身份。

...

...

把我吸引到伦敦的人之一

是马克·格特尔森，他很快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第一次见到格特尔森是在德克萨斯州的所有地方。2007年，当我刚刚在LPC起步时，他们派我去达拉斯的一个民主党活动做一些网络建设。我在一个巨大的舞厅里与数百人混在一起，对所有的斯泰森帽感到惊叹，这时我身后一个简洁的英国声音说：“你不是这里的人。”我转身看到一个家伙像柴郡猫一样咧着嘴笑，穿着森林绿色的裤子和花卉自由印花衬衫。在我漂白的铂金色头发（完全配有经典的2000年代中期刘海）和他华丽的着装方式之间，我们像两只蝴蝶在飞蛾大会上一样被吸引在一起。

格特尔森是伦敦波托贝罗路犹太古董商家庭的儿子，他优雅、古怪、令人愉快地做作，说话的方式让人想起演员斯蒂芬·弗莱。在另一个时代，他本来会是十八世纪伦敦沙龙里的花花公子。他是最高级别的博学者。在谈话中，他可以在不换气的情况下将1990年代初的嘻哈音乐和普法战争联系起来。那天晚上格特尔森和我很合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会在美国或英国的各种政治聚会上见到他。在我决定搬到英国后，我们立即开始一起出去玩，有时在他不知怎么变成了一个奇妙公寓的旧教堂地下改建的地窖里，到处散落着奇异的古董微缩模型和艺术品，在一种不知怎么就成功的混乱中。“我不搞极简主义，克里斯。我是极繁主义者，”当我看着他所有的物品时，他会这样说。

...

...

我在伦敦茁壮成长

并很快获得了广泛的朋友圈。虽然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法律并在议会工作，但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是一群俱乐部孩子、舞者、皇后、华丽的创意人员和来自中央圣马丁斯的设计学生，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设计和时装学校之一，培养了亚历山大·麦昆、约翰·加利亚诺和斯特拉·麦卡特尼等毕业生。格特尔森的不同之处在于，像我一样，他无缝地在所有这些不同的世界之间漂浮。当时，他在佩恩、舍恩和伯兰德伦敦办事处工作，这是著名的民主党民调公司，最著名的是曾经与克林顿夫妇有关联。他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可以和我一起参加议会露台馆被内阁部长包围的正式招待会，然后在当晚晚些时候和我一起化着妆、闪闪发光、戴着假发，在Sink the Pink魅力舞会上汹涌的皇后群中跳voguing舞的人。格特尔森很有磁性，我所有的朋友都崇拜他。他既温和又充满活力，像牧羊犬牧羊一样在夜晚照料twinks(年轻同性恋男子)。他们发现自己完全被他自发使用芭比娃娃和角色声音来解释为什么内维尔·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失败了而着迷——在凌晨4点，在一个震耳欲聋的家庭聚会的高峰期。

Gettleson也是少数几个理解我在数据方面所做工作的人之一。一天下午，当我抱怨在构建自由民主党投票行为模型时遇到的困难时，我告诉他我正在考虑向一些剑桥教授寻求帮助。他介绍我认识了Brent Clickard，他当时正在剑桥完成实验心理学博士学位，可能能够引荐我认识那里的一些教授。结果Clickard远不止是通往剑桥的桥梁。像Gettleson一样，他是个花花公子，那种穿粗花呢、胸前总是别着挺括佩斯利方巾的人。虽然他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富裕家庭，但他说话带着一种令人愉悦的、做作的大西洋口音，不知怎么学来的，仿佛他在扮演《卡萨布兰卡》中的角色。在决定移居英国之前，他曾是洛杉矶芭蕾舞团的舞者。

在几次酒后谈话中，Clickard建议我更深入地研究性格作为投票行为因素的作用。具体来说，他向我介绍了五因子人格模型，该模型将人格表示为五个量表上的一组评分：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和神经质。经过时间和测试，这五个特质的测量已被证明是人们生活许多方面的有力预测因子。例如，尽责性得分高的人更可能在学校表现出色。神经质得分较高的人更可能患抑郁症。艺术家和有创造力的人往往在开放性上得分很高。那些不太开放但更尽责的人往往是共和党人。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大五人格模型在预测选民行为方面可以是一个极其有用的工具。在政治话语中，你会发现许多用来描述候选人、政策或政党的短语都与人格相符。奥巴马以变革、希望和进步为竞选主题——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对新思想开放的平台。另一方面，共和党人往往关注稳定、独立和传统——实际上，这是一个尽责性的平台。

深夜在公寓里阅读时，我终于意识到了什么。也许自由民主党没有地理或人口基础；也许他们是心理基础的产物。我进行了一项试点研究，发现自由民主党选民在“开放性”上的得分往往高于工党或保守党选民，而在“宜人性”上的得分较低。我意识到这些自由民主党选民往往像我一样，开放、好奇、古怪、固执，有时还有点刻薄。这就是东伦敦的艺术家、剑桥的教授和诺福克的农民如何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围绕这个政党团结起来，尽管他们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五因子模型是破解自由民主党密码的关键——最终也提供了后来成为剑桥分析公司的核心理念。五因子模型帮助我以全新的方式理解人们。民调专家经常谈论单一的选民群体——女性选民、工人阶级选民、同性恋选民。尽管这些因素对人们的身份和经历确实很重要，但并不存在什么女性选民或拉丁裔选民或任何其他这些标签。想想看：如果你随机从街上抓一百个女性，她们会都是同一个人吗？一百个非裔美国人呢？他们都一样吗？我们真的可以说这些人仅仅因为他们的肤色和性别就是克隆人吗？他们都有不同的经历、奋斗和梦想。

探索身份和人格的细微差别开始帮助我理解为什么，尽管政治家们一直在做民调，他们似乎仍然严重脱离现实。这是因为他们的许多民调专家都脱离现实。民调公司影响政治家对选民身份构成的观念，这些观念通常被严重简化或完全错误。身份从来不是单一的东西；它由许多不同的方面组成。大多数人从来不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选民”，

更不用说围绕他们的世界观如何与税收政策相关来塑造身份了。当一个人去杂货店购物时，他们不太可能停下来，在一阵盲目的自我意识中放下购物，然后突然在商店中间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一个摇摆州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郊区女性。每当我做焦点小组时，人们往往会谈论他们是如何成长的，他们做什么，他们的家庭，他们喜欢什么音乐，他们的不满，以及他们的个性——那些你在初次约会时会谈论的事情。你能想象如果只允许你问标准的民调问题，盲目约会会有多糟糕吗？是的，确实如此。

...

2011年末，我向Nick Clegg的团队透露了一个消息，我认为该党正陷入深深的困境。我解释说，数据显示自由民主党选民是意识形态化的，他们固执，讨厌妥协。但当该党与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时，它已经成为这些特质的对立面。该党由不妥协的支持者组成，但它却在一个因妥协其原则而诞生的政府中运作。这种妥协背叛了自由民主党选民的理想，必然会把人们赶出该党。

我在议会一间古老的木质镶板委员会室里整理了幻灯片，向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做了演讲。他们被召集在一起听取我发现内容的中期更新，并对所有这些新技术发现的内容感到兴奋。但他们的笑容很快就消失了，因为这一切都非常悲观，详细描述了该党策略中的战术缺陷。我制作了一张幻灯片显示，工党和保守党都对投票人口有广泛的数据覆盖，意味着他们为每个选民记录了相当多的数据，而自由民主党的覆盖率不到2%。这份报告令人羞辱和尴尬，没有人想与之有任何关系——最终，也不想与我有何关系。在这里公平地说，我有时可能有点直率，并且有惹怒他人的倾向。我有点像Marmite，那种英国人涂在吐司上的咸味棕色酵母提取物。人们要么喜欢它，要么讨厌它，但没有人对Marmite漠不关心。足以说明，党内元老们不喜欢有个看起来像实习生的加拿大随机人员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告诉他们一切都做错了。

唯一倾听的自由民主党人是首席党鞭阿利斯泰尔·卡迈克尔。卡迈克尔是地道的苏格兰人，来自内赫布里底群岛最南端的艾拉岛。作为在学校说盖尔语长大的本土苏格兰人，卡迈克尔说话带着高地口音，混合着他早年作为王室检察官时学到的更加“标准”的爱丁堡口音。他健谈而热情，当我拜访他的办公室时，他总是邀请我和他一起从他储备充足的酒柜中品尝威士忌。作为政府党鞭，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策划者，他轻松的举止掩盖了对权力杠杆的深刻理解。他作为首席党鞭的职位意味着他见过和听过一切，所以我向他寻求建议，如何突破我在党内遇到的僵局。我总是觉得我可以对卡迈克尔坦率地说话，作为一个不怕说出自己想法的人，他尊重这一点。不幸的是，他试图说服党内工作人员注意我所说的话，但收效甚微。

所有这些都令人沮丧至极。我向他们展示数据，并辅以同行评议的文献。我向他们展示科学。而他们的回应是称我为悲观主义者、问题制造者、不是团队合作者。最后一根稻草是有人泄露了我的幻灯片，显然是想让我难堪。当一名记者赞同我的论点，指出自由民主党遭受“巨大的传单问题”并在数据收集和研究方面远远落后于保守党和工党时，这种做法适得其反。当你花费如此多时间研究选民并外出与他们见面时，你会越来越与他们产生联系。我觉得我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赢得选举；也是为了理解人们的真实生活。这是关于向掌权者表达和重申被贫困、无知或从众所困住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两年后，2014年，自由民主党失去了310个议会席位，在欧洲议会的12个席位中除了一个全部失去。致命一击随后在2015年5月到来，该党被彻底摧毁，在议会的57个席位中失去了49个。只有8名自由民主党议员获得连任，他们的整个议会党团舒适地坐进一辆马自达Bongo露营车。

第3章

我们穿着普拉达反恐

伦敦的梅费尔区是一个拥有特殊财富和权力的地方，带着毫不掩饰的帝国遗产。走在其古老的街道上，人们可以看到建筑物上点缀着数十块蓝色圆形牌匾，纪念曾经居住在这里的著名剧作家、作家、政治家和建筑师。坐落在梅费尔东南角，距离唐宁街10号不远的是圣詹姆斯广场，广场两旁排列着宏伟的乔治亚式老联排房屋。在广场北端坐落着查塔姆大厦，这里是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所在地。东端坐落着世界最大石油公司之一英国石油公司(BP)的总部，以及诺福克大厦，这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美国将军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和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办公室。几个私人俱乐部遍布广场，包括殖民时代的东印度俱乐部和陆海军俱乐部。广场中心是一个被装饰性铁栅栏围绕的小花园。站在公园中央的是威廉三世的骑马雕像，眺望着周围的建筑物。中心花园被灌木丛和整齐修剪的花坛环绕。圣詹姆斯广场是英国殖民主义全球统治地位的活生生的纪念碑。

在BP南边，广场东端，有一座建于1770年的数层高建筑。它由光滑的灰色砂岩建造，配有亚麻色砖块和一对石制爱奥尼亚柱支撑着入口。门外立着一个红色的皇家邮政邮筒。这里在2013年初是SCL集团的总部。该公司最初名为Strategic Communication Laboratories(战略传播实验室)，由奈杰尔·奥克斯领导，自1990年以来以各种形式存在。SCL获得了英国政府访问“机密”级信息的许可，其董事会包括撒切尔时代的前内阁部长和退休军事指挥官，以及教授和外国政治家。该公司主要为军方工作，在世界各地开展心理和影响操作，如在巴基斯坦的圣战者招募缓解、南苏丹的战斗人员解除武装和复员，以及在拉丁美洲的反毒品和反人口贩卖行动。

我在2013年春天听说了他们，那是我离开自由民主党几个月后，一位我保持联系的党派顾问打电话告诉我一个职位空缺。他说想到了我，因为这家公司正在寻找“数据人员参与某个涉及军方的行为研究项目”。我从未想过要从事国防项目，但在加拿大和英国的政党工作两次失败后，我准备尝试新的东西。

走进前门，我进入了一个有黑白格子大理石地板、水晶吊灯和奶油色墙壁上华丽石膏装饰的大厅。办公室保留了建筑的许多原始细节，几个房间围绕着大理石壁炉布置。地板铺着编织紧密的绿色地毯，带有小红白圆形装饰边。然后我被带到一个小房间，被告知等待一个叫亚历山大·尼克斯的人，他是SCL集团的董事之一。我记得那里异常炎热，仿佛暖气在晚春时节还开得很高。(我后来了解到这种高温是故意的——在会面前扰乱人们的一种方式。)我在那个闷热的小房间里坐了大约十分钟，直到一个男人进来。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他完美定制的萨维尔街西装，里面穿着绣有姓名首字母的衬衫。他的眼睛是蓝宝石色，与他苍白如纸的皮肤形成鲜明对比。

这是我与亚历山大·尼克斯初次见面的完美场景，他出生于英国上流社会，在伊顿公学接受教育，那是皇室送孩子就读的学校，校服至今仍包括硬领和燕尾服。大多数英国贵族都有一种装腔作势的气质，在这个传统中，尼克斯没有让人失望。他的口音极其纯正。他戴着黑框眼镜，蓬松的草莓金色头发有着刻意随意的小翻卷。他邀请我在成堆的文件和箱子中坐下——他告诉我这些是最近完成项目的残留物。他们计划很快搬到更大的办公室。

没过多久，尼克斯就开始描述SCL业务的来龙去脉。他让我签了一份保密协议，然后告诉我公司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为军事和情报机构服务，从事政府无法正式承担的项目。“我们在那里赢得民心...你知道，无论需要怎么做。”他指向一张看似非洲某国集会的框装照片。

当我询问详情时，他拿出了几份报告。当我翻阅这些报告时，他开始解释TAA，即目标受众分析(target audience analysis)。他说这是信息操作项目的第一步——分析和细分。但当我浏览这些报告时，我不敢相信方法论如此粗糙——而且我毫不掩饰地说了出来。

“这可以做得好得多，”我告诉他。我很快就会了解到，尼克斯在感受到对其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的挑战时，会在瞬间发脾气。现在，他只是有些恼怒。

“我们，”他说，“是做这件事最好的公司。”

“当然，”我说，“但你们在目标定位方面可以做得更好。看起来军队就是在从飞机上撒传单。如果军队有激光制导导弹，为什么你们在宣传上要这样做？”这是一个尖锐的回应——特别是在一次潜在的工作面试中——尼克斯被吓了一跳。他似乎在想，我才是负责说话的那个人。谈话突然结束，当我离开时，我想，真是巨大的时间浪费。

但事实并非如此。尼克斯很快就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再聊一些，解释我认为SCL做错了什么以及他们如何改进。

...

心理战的世界

心理战的世界，SCL是其中的一部分，自人类开始战争以来就一直存在。公元前六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人知道埃及人崇拜猫神巴斯特特，便在盾牌上画上猫的图像，这样埃及人就不愿意在战斗中瞄准他们。亚历山大大帝不是简单地摧毁和掠夺敌人的城市，而是使用积极的心理战术，留下军队传播希腊文化，并将被征服者同化到他的广阔帝国中。在中世纪，帖木儿和成吉思汗使用恐怖作为心理武器，斩首敌人并将他们的头颅插在长矛上游行示众。在俄国，恐怖伊凡通过在红场设置巨大的煎锅活活烤死敌人来威慑民众使其屈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完善了误导敌人的艺术，通过上演虚假入侵、使用假坦克，甚至在名为“肉馅行动”的绝妙计划中将虚假的作战计划放在一具打扮成死去士兵的尸体上。精心设计的信息使用——以及虚假信息——是在战场上获得战术优势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在设计信息武器时，考虑任何武器系统的基本方面是有帮助的：载荷、投送系统和瞄准系统。对于导弹来说，载荷是爆炸物，投送系统是火箭推进的弹体，瞄准系统是卫星或热寻的激光。对于信息武器，相同的组成部分都存在。但有一个关键区别：你所使用的力量是*非动能的*。换句话说，你不会炸毁东西。在信息战中，载荷通常是一个故事——一个用来欺骗将军的谣言或一个旨在安抚村庄的文化叙事。正如军方投资化学来指导炸弹制造一样，它也试图研究什么样的叙事会产生最大的影响。

历史上，由于在导弹、坦克、轰炸机、舰船和枪支方面的强大优势，美国领导人低估了信息作战的价值。美国曾进行过一些信息作战，但大多是传统的纸质传单散发方式。在朝鲜战争中，美军使用扩音器播放宣传，而飞机在敌方阵线上空撒播传单。在越南战争期间，专门的心理作战营计划了类似的宣传攻势，旨在赢得尽可能多的“民心”。但在无与伦比的国防预算支撑下，美军已经成为一群拥有玩具的男孩，力量放大是物理和动能的。

坦克和掩体破坏者对病毒式宣传和网络驱动的激进化无能为力。ISIS不仅发射导弹；它还发射叙事。俄国用“混合方法”攻击来补偿其老化的军事装备，从对目标人群的意识形态操纵开始。恐怖组织使用社交媒体招募新成员，然后这些成员使用枪支和炸弹来实现他们的目标。这些威胁并不因为是非常规的就不那么危险，西方国家在应对方面一直很困难。你无法向互联网发射导弹，而传统的美国军事文化，由喜欢发号施令和接受命令的异性恋白人男性主导，对可能引入更细致入微、技术增强的反击的那种不循规蹈矩的新兵充满敌意。

美国军方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试图应对这些恐怖和冲突的新现实。过去DARPA运行的项目——名称如*叙事网络和战略传播中的社交媒体*——的既定目标包括“尝试追踪思想和概念以分析模式和文化叙事”以及“开发定量分析工具来研究叙事及其在安全背景下对人类行为的影响”。美军还运行了一个名为*人类社会文化行为建模项目*的计划，旨在为“现场用户创建社会文化分析和预测工具”。换句话说，这些项目中许多的要点是获得对威胁的*完全信息不对称*——拥有如此多的数据，我们能够完全压倒和主导围绕我们目标的信息空间。这就是尼克斯瞄准的利润丰厚的利基市场，以为SCL赢得新合同。

...

尼克斯的提议

尼克斯最初向我提供了一份三个月的合同，实质上是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我甚至不打算创建工作描述，”他说。“因为，坦率地说，我不知道我会在里面写什么。”在经历了与自由党和自由民主党打交道的所有痛苦之后，被给予自由裁量权是极其诱人的。所以在2013年6月，我开始与SCL合作。

像大多数人一样，我从未太关注军事战略，除了偶尔午夜狂看历史频道。面对如此令人生畏的学习曲线，我需要快速了解公司当前的项目。问题是什么？没有人会回答我的问题。事实上，我的新同事们合上笔记本电脑的速度不能再快了。“你为什么需要知道？”他们会说，或者”我需要检查一下是否可以和你谈这个问题。“保密性将使我难以弄清楚如何做我应该做的任何事情。当我向尼克斯抱怨这个问题时，他夸张地翻了个白眼，只是把他办公室里一个柜子的钥匙递给了我。在里面我找到了旧报告的活页夹。

这些文件描述了SCL为其老客户承接的项目，包括英国国防部和美国政府。它在东欧为北约开展反俄罗斯宣传活动。其中一个项目是在拉丁美洲某国开展反毒品项目，军方客户传播虚假信息，以使当地古柯农民对抗毒贩。其他项目详细介绍了在墨西哥和肯尼亚的心理作战(PSYOPS)项目。正如尼克斯之前所说，这些都是政府机构不愿意正式承担的项目。相反，他们会雇佣承包商以”市场研究公司”或某种虚假商业掩护进入该地区。

有一份报告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描述了国防部一个项目，利用信息作战来影响巴基斯坦不同的目标群体。该报告收集了关于地区领导者和影响者的信息，并为每个目标受众提出了文化触点和可能的激励因素建议。但其方法论漏洞百出。SCL试图在一些地区使用现场调查员进行民调，但他们使用的农村地区地图不完整，而且对这些询问意见的新来者持怀疑态度的人们回应率很低。这产生的数据过于不完整或有偏见，无法可靠。国防部为此支付了一笔荒谬的巨额费用，而如果他们只是雇佣几个当地人进入村庄询问问题，他们会得到更好的信息。

第二个问题是军方选择传播宣传的方式。在一些项目中，他们制作了传单，然后在整个地区投放。又是该死的传单？英国军队就像自由民主党一样。而且，到底为什么，当全国各地都有不断扩展的移动电话网络时？确实，这些国家的连通性令人印象深刻，即使在冲突中也是如此。没有固定电话或广播电视的地区正在建设手机信号塔。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西方大国忽视这一发展。

我更想帮助尼克斯理解，如果你所做的只是从天空中倾倒信息，那么花哨的心理分析层就完全是浪费。我告诉他，如果SCL的项目专注于获取更准确的数据、构建算法、基于这些算法锁定特定人群，并使用传单或广播以外的不同媒体形式，那么效果会好得多。尼克斯若有所思地听着，他交叉的双手反复轻敲嘴唇，思考着我所说的话。

我也开始意识到为什么英美军队在赢得所谓的民心方面如此糟糕。这些关于人口的文化和态度信息是在孤立的环境中收集的，通常是在承包商主导的辅助项目中，这些项目直到主要目标设定后才整合到军事战略中——换句话说，当地人口的文化和经历对规划者来说是事后想法，被人员和装备所压倒。这需要改变。

...

当我思考DARPA及其英国对等机构国防科学技术实验室(DSTL)试图通过其新的社交网络和数字研究项目开发什么时，我的思绪游移到一个意外但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的地方：时尚。这两个领域并不像看起来那么不同。当一个社会突然转向极端主义时，其时尚也会如此。想想毛主义者、纳粹分子、三K党成员和圣战分子——他们都有什么共同点？一种外观。极端主义始于人们的外观和社会的感受。有时它创造出字面意义上的制服：橄榄色束腰外衣和带红

星的帽子、红色臂章、白色尖顶头罩、Polo衫和火把、MAGA帽子。这些制服反过来被纳入佩戴者的身份认同中，将他们的思维从*这是我所相信的*转变为*这就是我*。极端主义运动抓住美学，因为极端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关于改变社会美学的。很多时候，所承诺的大部分内容不在于任何有形的政策，而在于一个地方或文化的新外观和感觉。

当我十六岁时，有一天我把头发染成了桑葚紫色。选择这个颜色没有特别的原因，除了它很引人注目，我喜欢它。这也让我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因为违反了学校着装规定。我非但没有感到沮丧或害怕，反而完全自在。终于，我和校长讨论的不再是“残疾人accommodations”之类的事情。我被告知需要把头发改回“正常”颜色。我拒绝了。校长不高兴，关于我头发的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离开学校。当我还坐轮椅时，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适合性——适合通过门口、适合和同龄人相处、找到合身的衣服。计算机是一个爱好，但时尚成了另一个，原因不止一个。部分是为了感觉被包容。但也是为了被看见。当我坐在腰部高度，注意着同学们衣服上的纽扣、剪裁、褶皱、凸起和折叠时，我感觉对他们来说是隐形的。有了紫色头发，我被看见了。然后，当校长要求我恢复“正常”头发时，他是在命令我再次变得隐形。那时我明白了外观可以多么强大——和具有启发性。

当我与自由民主党一起使用五因子人格模型时，我开始更深入地思考作为一个构念的人格。我意识到，政治和时尚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之上，因为它们都基于人们如何看待自己与他人关系的细致入微的构念。时尚是洞察人格的理想窗口，因为选择穿什么（或不穿什么）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决定。所有文化中的人们都会选择如何装饰自己的身体，从平凡到奢华。我们都关心自己穿什么——即使是那个来自明尼苏达州、除了灰色T恤和牛仔裤什么都不穿的直男老头。他认为自己不在乎衣服的外观，直到你给他提供一件衣服或达希基长袍。

我清楚地记得在LSE与我的大学导师的最后一次会面，当时他问我接下来打算做什么。毫无疑问，他期望听到我会继续从事政治工作或申请一家高端的公司律师事务所。相反，我告诉他我要去时装学校。沉默。眉毛扬起，明显失望，他无意识地摇了摇头。*时尚？就是服装？你真的想学习服装？*但对我来说，时尚和政治在其核心都是关于文化和身份的循环。在我看来，它们本质上是同一现象的两种表现——这一信念将成为我们在Cambridge Analytica所创造事业的核心。

时尚在我的生活中一直发挥着作用，它确实是我变得更加自在的东西。当我离开学校搬到蒙特利尔时，我越来越多地离开轮椅，但那种不具吸引力或不被渴望的感觉仍然伴随着我。某个周末闲逛时，我发现自己在一家二手书店里，在一堆旧杂志中发现了一本已有九年历史的破旧《Dazed & Confused》杂志。那是1998年的一期，封面标题是FASHION ABLE?，展示了一个有两条假肢的模特。这期杂志由Alexander McQueen客座编辑，里面有看起来不同但美丽的身体的精彩照片。看完那期杂志后，我开始尝试服装并更多地外出。蒙特利尔是那种如果你允许的话会改变你的地方。我发现自己被变装酒吧所吸引，欣赏一种既能华丽奢华又能嘲弄和颠覆传统美丽、身体和性别观念的着装形式。变装颠覆了我的思维。它向我展示了如何不仅挑战这些社会规范，还要嘲笑它们，并按照自己的条件做自己想做的人。

我在伦敦的早年里，我的许多朋友都是伦敦艺术大学下属学院之一的中央圣马丁学院的时装学生。我开始在UAL当学生，最终在Carolyn Mair的指导下工作，她有认知心理学和机器学习的背景。Mair博士不是典型的时装教授，但这种匹配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也不是典型的时装学生。在我向她解释我想开始研究另一种“模型”——神经网络、计算机视觉和自编码器——之后，她说服大学的研究生研究委员会允许我开始机器学习而不是设计的博士学位。大约在这个时候，我也开始了在SCL集团的新工作，所以我的日子在时装模特和网络战争之间波动。我渴望深入我关于文化趋势的学术研究，所以我告诉Nix我不想全职为SCL工作，如果SCL想要我，他们必须接受我将与他们的项目并行继续我的博士学位。Nix同意了这种安排，SCL最终同意支付我的学费，这对我来说感觉像是天赐之物，因为作为国际学生，我必须支付最高的学费。

这两个领域很好地服务于彼此，因为理解文化能够让你解析极端主义运动的动态，比单纯地看他们声称的意识形态更有效。在SCL，我们会观看无数的激进圣战主义宣传视频，我们注意到，除了那些上新闻的暴力片段之外，他们的内容风格还有丰富且表达清晰的美学。酷车被展示出来。会有音乐。他们理想化的英雄有明确的男性化外观，一些

视频看起来几乎像真人秀节目的片段。讽刺的是，他们试图将他们落后的意识形态定位为现代或未来主义的东西，这种方式呼应了旧意大利未来主义者对明日法西斯主义的推广——它是通向现代性的最便捷的门径。这些电影传播着暴力和仇恨的怪诞崇拜，但除此之外，它们也构成了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他们的风格自我放纵且天真浪漫，几乎接近媚俗。即使是恐怖分子也有流行文化。

大约在这个时候，在2013年9月，我清楚地记得在想，*这有多酷？*我可以在文化领域工作，但不仅仅是为了某人的品牌营销活动。我可以在文化领域为我们民主的防卫而工作。军方只是使用不同的术语——*建模影响归因*或*观察到协同行动的目标档案*。但在时尚界，我们只是称之为*趋势*。协同着装。协同发标签。协同聆听。协同去听音乐会。文化时代精神本身就是人们*协同行动*。我确信，这些类型的趋势可以在数据中被识别出来。通过在线观察和画像，我们想尝试预测这些运动的采用生命周期、他们的早期采用者、他们的扩散率、他们的峰值。

在我加入SCL的前几周，我开始研究如何将传统的信息作战策略数字化和转型。这是当时公司最感兴趣的方向，因为公司意识到许多北约军队在这方面存在关键能力缺口，如果能开发出将宣传与广告技术相结合的新方法，就能填补这一缺口（并从中获利）。这涉及探索我们可以借鉴的研究，比如如何描绘这个新的数字领域，包括从clickstreams（点击流）获取新的信息来源，以及通过profiling（用户画像）和machine learning（机器学习）改进对目标受众的叙事targeting（定向投放）。将信息武器化存在明显的固有复杂性。枪支和炸弹无论对谁、在哪里都能杀死人——物理学定律是全球通用的。但信息武器必须根据多种因素进行定制：语言、文化、地理位置、历史、人口多样性。如果你正在构建一种用于规模化perspecticide（观念杀戮）的非动能武器——即主动解构和操纵大众认知——你首先必须深入理解是什么驱动着人们。

叛乱活动本质上是不对称的，少数人就能造成巨大影响。因此，在对手组织内部催化叛乱活动需要首先将资源集中在几个关键目标群体上。这需要通过良好的profiling（用户画像）来优化，识别那些既容易接受新思维方式、又有足够连接性将我们的反叙事注入其社交网络的人群类型。

最有效的perspecticide（观念杀戮）形式是首先改变自我概念。在这种情况下，操纵者试图从目标那里“窃取”自我概念，用自己的概念来替代。这通常始于试图压制对手的叙事，然后主导目标周围的信息环境。这往往涉及在几个月内逐步破坏所谓的心理resilience factors（韧性因素）。程序旨在目标中创造不现实的认知，导致混乱并损害自我效能感。目标被鼓励开始对微小或想象的事件进行catastrophizing（灾难化思维），反叙事试图消除意义，营造出令人困惑或毫无意义的事件印象。反叙事还试图培养不信任，以减少与可能阻碍目标演化的其他人的沟通。当你开始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被不公平地利用，或者当事件看起来毫无意义或目的时，保持对现有等级制度或群体的忠诚就变得更加困难。你变得不太愿意接受挫折、承担风险或遵守命令。

但仅仅削弱士气往往是不够的。最终目标是触发与冲动、不稳定或强迫行为相关的负面情绪和思维过程。这使目标从轻微或被动抵抗（如生产力下降、承担更少风险、传播谣言等）转向更具破坏性的行为领域（如争论、不服从、叛乱等）。例如，这种方法已在南美洲被采用，用于在毒品运营成员之间挑起不团结，增加信息泄露、叛逃或内部冲突的可能性，从而削弱供应链。最容易受影响的目标通常是那些表现出neurotic（神经质）或narcissistic（自恋）特征的人，因为他们往往对压力叙事的心理抵抗力较弱。这是因为neuroticism（神经质）可能使人更容易产生paranoid ideation（偏执想法），因为他们往往经历更多焦虑和冲动，更依赖直觉而非deliberative thinking（深思熟虑的思考）。narcissism（自恋）程度高的人容易受影响，因为他们更容易产生嫉妒和权利感，这些是违法和反等级制度行为的强大动机。这意味着这些目标更可能对骚扰、迫害、受害或不公平待遇产生夸大的怀疑。这是启动更大组织颠覆的“低垂的果实”。后来，这种学习成为Cambridge Analytica在美国催化alt-right（另类右翼）叛乱工作的基础之一。

让我们明确一点：这些行动不是某种治疗性咨询；它们是一种心理攻击形式。重要的是要记住，在军事背景下，目标的个人agency（能动性）或同意并不是考虑因素。目标就是敌人。军方的选择通常要么是派遣无人机去消灭敌人，

要么是干扰敌人的部队，让他们开始内斗或变得草率并犯下可利用的错误。如果你是军事指挥官或情报官员，心理操纵是“轻触式”方法。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军事和安全机构突然能够直接接触到世界各地犯罪和恐怖主义组织的守卫、职员、女友和跑腿人员的思想和生活。社交数据提供的是详细个人信息的轨迹，这些信息以前需要数月的仔细观察才能收集到。目标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创建档案，其中包含丰富的数据，可以加快心理学家对其性格的评估。这促使人们对可以通过机器学习算法自动化的心理画像进行大量研究。这些算法将允许机构通过自动化扩大网络范围，达到老式传单投放的规模，但具有定向消息的精确性。2011年，DARPA开始资助对社交媒体用户心理画像、反政府信息传播方式，甚至在线欺骗的研究。Facebook、Yahoo和IBM的工程师都参与了DARPA资助的研究项目，评估信息如何被消费和传播。俄罗斯和中国政府也启动了他们自己的社交媒体研究项目。

我在SCL的第一天，Nix问我是否听说过一家叫Palantir的公司。他是从一位关系异常广泛的SCL实习生Sophie Schmidt那里了解到的——她是Eric Schmidt的女儿，Eric Schmidt是亿万富翁，当时是Google的执行董事长。几个月前，当她即将结束实习时，她将Alexander介绍给了Palantir的一些高管。Palantir由Peter Thiel共同创立，他是硅谷知名的风险投资家，也是Facebook的独立董事。Palantir是一家大型风险投资资助的公司，为CIA、NSA（其任务是为国家安全目的分析信号情报和数据）以及GCHQ（英国的NSA对应机构）进行信息操作。Nix对此着迷。他希望SCL做Palantir正在做的事情。

在我最初的几个月里，我与剑桥的心理学家Brent Clickard以及他的朋友Tadas Jucikas一起在各个国家进行小型试点项目。我第一次见到Jucikas是在皇家汽车俱乐部，这是一个私人会员制机构，有酒吧、壁球场和台球室，上流社会在那里社交和做生意。它成立于1897年，当时开车是一项极其昂贵的爱好，至今仍保持着奢华优雅的氛围。当我走向有柱廊的俱乐部会所时，我看到Jucikas站在大厅里，旁边是一辆鲜红色的古董赛车，他的眼睛隐藏在玳瑁色太阳镜后面。他穿着一件剪裁精美的人字纹夹克，配有挺括的口袋巾。这一切都很夸张，但我很喜欢。

他带我进入俱乐部，我们喝了几杯boulevardiers，然后移步到阳台上抽雪茄。Jucikas在立陶宛农村长大，小时候看着苏联坦克驶过他的城镇。他显然很聪明。当我们坐在阳台上，品味雪茄并讨论人工智能和数据管道时，Jucikas打开一个公文包，拿出了他创建的图表。Clickard告诉过他一些项目的范围，所以Jucikas绘制了一个拟议的数据科学管道，说明如何摄取、清理、处理和部署来自人们在线档案的数据。他一直在做关于建模和预测*C. elegans*线虫行为的博士研究，他说他只是将线虫换成了人。Jucikas提议通过构建自动化数据收集工具来拉取各种数据，使用算法推算将不同数据源合并为每个个体的单一统一身份，然后使用深度学习神经网络来预测我们期望的行为。他说，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心理学家团队来创建改变行为所需的叙述，但他的管道作为定向系统的第一个草图。但我最喜欢的是他用颜色编码，使整个流程看起来像伦敦地铁图。在他解释的过程中，很明显他非常适合这份工作。

就这样，Clickard、Jucikas和我开始一起工作，我最终也说服了Mark Gettleson加入。突然间，我被一群衣着无可挑剔、聪明得惊人、奇特得不可思议的人包围了。而Nix是主谋，那个咧嘴笑着的、没有灵魂的推销员，他不理解我们在做什么，但毫不浪费时间地向任何他认为可能付费的人快速而努力地推销。他用傲慢的宣言和粗俗的性笑话统治着办公室。

SCL有一种“什么都可以”的氛围，这在我们都开始工作几个月后发生的一个时刻得到了完美的体现。通常我穿T恤和连帽衫，但有一天下午，我在参加完伦敦时装周活动后来到了办公室，穿着一件鲜艳的勃艮第色Prada夹克，配有高腰长裤和印有骷髅和玫瑰的奶油色Dr. Martens鞋子，风格像纹身闪现图案。Nix看了一眼说：“Chris，你穿的是什么鬼东西？”

Brent回答道：“我们穿着Prada打击恐怖主义。”

获取所需数据

获取构建朱西卡斯(Jucikas)设想的定向系统所需的数据并不容易，但由于发展中世界某些地区的历史偶然因素，这是可能的。尽管传统电信基础设施存在严重不足——主要源于腐败和殖民政府疏忽的遗留问题——世界上一些最贫穷的国家已经跨越了几代技术，在移动网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

例如，在肯尼亚，当地法律和习俗使一些人难以获得银行账户，这导致了一个系统：肯尼亚人用现金购买手机话费，然后可以将其作为一种数字货币进行交易。事实上，我们发现许多较贫穷国家的人们不信任银行——他们经历过经济危机、恶性通胀和银行倒闭——并使用同样的移动变通方法。这种设置意味着每个人都需要一部手机，而且需要运行良好，因此在原本贫困的国家，相对体面的移动基础设施得到了快速投资。

通过移动电话网络连接大量公民的一个意外后果是，每个人都可以被追踪、跟踪、分析和联系。ISIS、AQAP和博科圣地(Boko Haram)等圣战网络已经发现了这一点，利用轻松接触未来征服对象心灵的机会。这颠覆了战争规则。

接下来我们需要一个案例研究——一个可以扩展到国家层面的地点，向潜在军事客户展示我们的能力。拥有130万人口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完全符合要求。这是一个岛国，自成一体却拥有多元文化。那里有非裔加勒比人口、印度裔加勒比人口和少数白人，创造了有趣的文化张力可供探索。这是一个运行大规模实验的理想实验室。

特立尼达国家安全部想知道是否可能使用数据来识别更可能犯罪的特立尼达人——而且，除此之外，是否可能预测他们何时以及如何可能犯罪。SCL在加勒比海各个小国运营有着悠久历史，在帮助特定政治家上台后，该公司通常会通过政府合同收回投资。在SCL，我们开始将此称为《少数派报告》项目，取自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的故事（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改编为电影），其中未来的预犯罪部门在人们能够犯罪之前就逮捕他们。但事实是，特立尼达政府不仅仅对减少犯罪感兴趣。他们知道如果我们构建一个预测行为的工具，他们可以在选举中使用它。他们不仅仅关注未来的罪犯；他们还想锁定未来的政治支持者。

团队预期会有大量数据，因为特立尼达政府的高级联系人向SCL提供了未经编辑、去匿名化的人口普查数据——在发展中世界，隐私通常是富人才关心的问题。本质上，特立尼达政府一举侵犯了所有公民的隐私。

原始人口普查数据显然对项目有用，但这不是我们在发达国家可以期望获得的资源。SCL需要探索使用互联网收集相关数据，创建一个跨文化和跨国适用的工具。因此SCL的下一步是派人到加勒比电信公司，询问SCL是否可以实时接入他们的数据“水管”。令我惊讶的是，这是可能的。

与一组承包商合作，SCL能够接入电信数据流，选择一个IP地址，然后坐下来观看特立尼达的某个人在那一刻正在互联网上浏览什么。不出所料，大量是色情内容。人们浏览各种想象得到的内容，包括文化特定的“特立尼达色情”。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围着电脑坐着，看着某人在查找车前草食谱和观看色情内容之间切换，而尼克斯(Nix)在嘲笑他们。那是一种令人作呕的轻浮笑声，几乎幼稚。他查找了IP地址，然后打开谷歌地图卫星视图查看这个人居住的社区。

当尼克斯看着屏幕时，我开始观察他，他从嘲笑和剥削他人的机会中获得如此深刻、恶心的快感。这就是典型的尼克斯——或者如他那些傲慢的同伴所称的“伯特”(Bertie)。像许多伊顿公学毕业生一样，他擅长闲聊、调情和娱乐。SCL的董事们指派他领导公司在非洲、加勒比海和南亚被遗忘国家操纵选举的副业。与小国的内阁部长们在一起时，尼克斯完全如鱼得水。扮演英国绅士的角色，他会让这些政治家在伦敦这个旧帝国首都享受他们想要的一切——皇室和首相经常光顾的知名俱乐部、独家聚会的邀请，或者如果需要的话，优雅开放女性的私人陪伴。

尼克斯利用了帝国各国统治者的殖民恋物癖和不安全感。一旦获得他们的信任，他就会在寻求认可的部长们与女性之间牵线搭桥，以及在寻求利用腐败商业机会并不被注意地旅行的商人之间充当掮客。尼克斯了解到，主权是一种极其有价值的商品。即使是最小最不起眼的岛国也能提供两样具有特殊价值的东西：护照和税收豁免。他继承了数千万英镑，从来不需要工作。他本可以将自己的生活奉献给崇高的事业，或者只是安定下来过上休闲的生活，靠信托基金度日。但他却选择了SCL。尼克斯无法控制自己——他沉醉于权力。生得太晚而无法在旧大英帝国扮演殖民主人的角色，他将SCL视为现代等价物。正如尼克斯在我们的一次会议中所说，他得以“扮演白人”。“他们只是魔鬼”，他曾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对同事这样说，指的是巴巴多斯的黑人政治家。

我们在进行纯粹的间谍活动，在特立尼达领导人的掩护下。这感觉很奇怪——不真实——在一个遥远的小岛上观察人们在干什么，感觉更像是在玩电子游戏，而不是侵犯真实人们的私人生活。即使到今天，回想起来，特立尼达更像是一个梦，而不是我们真正做过的事情。

但我们确实做了。特立尼达项目是我第一次被卷入严重不道德的情况，坦率地说，它在我身上引发了一种否认状态。当我观看那些直播时，我不允许自己真正想象人类猎物，那些不知道自己的私人行为正在取悦半个世界之外邪恶观众的人们。特立尼达项目是我第一次尝到这种新一波数字殖民主义的滋味。我们带着先进的技术和道德上的漠视不请自来，并不比国王的军队好多少。只是这一次，与古代的征服者不同，我们完全是隐形的。

...

...

第55页

在我与尼克斯工作的最初几个月里，很明显他没有真正的商业道德——或者就此而言，个人道德。为了赢得一个项目，他似乎愿意不择手段，他会在办公室里炫耀这笔交易或那笔交易。他用性征服的术语描述一切：在谈判的早期阶段，双方在”互相摸索”或”伸进一根手指”。当交易达成时，他会惊呼：“现在我们在做爱！”

2013年8月，拉巴阿大屠杀后不久，埃及政府代表来到伦敦开会。这是社交媒体和移动应用上的即时消息在动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早期运动之一。我们遇到的埃及人有兴趣使用我们的信息项目来对抗他们所谓的”政治极端分子”。讨论了几种在运动内部制造混乱的情况，包括散布谣言通过移动消息传播，或者用植入的同谋激怒人群并逮捕抗议者。这不是我期望SCL承担的那种项目，我在道德上反对他们要求我们做的事情。正是在这里，我面对了反极端主义这一极其主观的含义。一方面挫败巴基斯坦等地的圣战组织，另一方面协助埃及专制和伊斯兰主义支持的政权建立自己的人民暴政，这似乎完全是虚伪的。但尼克斯不在乎。生意就是生意；他只想达成交易。

对我和SCL不断增长的心理学家和数据科学家团队来说，主要挑战在于极端主义本身的客观实质。成为极端分子意味着什么？极端主义到底是什么，你如何对其建模？这些都是主观定义，显然埃及政府有一个想法，而我们有另一个。但如果你想能够量化和预测一个特征，你必须能够创建它的定义。我们反复讨论，从理论角度讨论这个问题，但现实让人清醒：极端主义就是你想让它成为的任何东西。最终，SCL没有承担这个项目，所以我只是把我的担忧分化处理，继续工作。

第56页

我开始试图在办公室避开尼克斯——每个人都这样做，因为他的行为如此令人厌恶。他试图将我收于羽翼之下——按照他的形象重塑我——这是一个惨淡的失败。首先，我们的背景太不同了。即使我不觉得尼克斯的傲慢和势利令人厌恶，我也永远无法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受人尊敬的”伊顿公学毕业生，他不断的训斥——穿什么、怎么说话等等——只会让我更加自觉。我们偶尔会因为对好威士忌的共同喜爱而建立联系，但大多数时候我保持距离。

最让我投入的项目是那些在世界上做一些好事的项目，比如去激进化军方亲切地称为YUMs——年轻未婚男性(young unmarried males)——在中东的项目，以及根除圣战行为。我找到了留下来的理由，推理即使尼克斯显然是个恶棍，仍然有很多好人为SCL工作。我决定只要低着头继续工作。

2013年底，我被要求参加与一个非洲国家潜在客户的会议。我被告知这将是一个政治项目，涉及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之前针对选民。我对这个国家了解不多，但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移动网络或公共资源获得必要的信息，所以我说“当然可以。”我们在伦敦一家昂贵的餐厅与客户会面，客户原来是该国的卫生部长。

起初，讨论基本上按我预期的方式进行。我们谈论了客户需要什么服务以及SCL如何提供这些服务。然后话题转向项目如何获得资金，公司提出了一个建议：客户可以利用该国卫生部现有的数百万美元项目，SCL将悄悄作为分包商加入，动用项目预算进行政治研究。之后，另一名工作人员发了一封后续邮件：“更大调查的健康组成部分将作为选举活动的前奏，”并指出，“政治组成部分也已获得批准。”邮件继续解释说，卫生部调查将包括关于投票行为和对象政府支持度的问题。当然，将卫生部的纳税人资金用于政治活动是非法的。

会议期间我什么都没说，但之后我去见了Alexander。“这不可能是合法的，”我告诉他。他回答说，“你不能指望这些人做任何合法的事情。这是非洲。”

Nix非常善于让人怀疑自己，在我在SCL工作期间，我一直上他的当。其他时候，他就不那么有说服力了。有一次他带我到屋顶上，远高于我们在New Bond Street的新办公室，进行“男人之间的谈话”，他提议如果我帮助赢得一个项目，就给我一匹马。显然他有很多马。我说我不想要。“哦，对，”他说。“那给你一匹小马。”与他交谈后，我经常不确定自己应该有什么感受——是为他说的话感到被冒犯，还是为自己的天真感到尴尬。

我不敢相信非洲项目会按计划进行，但确实如此。SCL为分包合同制作了一份提案，并提交给卫生部审批。在许多个月的时间里，随着健康相关项目的进行，一些资金——数百万美元——实际上并没有用于卫生部项目。这些钱在部长的政治活动和SCL之间分配，SCL的那部分通过该国大使馆的外交邮袋到达，这样他们就可以绕过任何边境检查或申报。我很早就从项目中抽身了，认识到这在道德和法律上都是不可接受的。

我越深入SCL的项目，办公室文化似乎越让我的判断力变得模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适应他们的腐败和道德漠视。每个人都为我们的发现感到兴奋，但为了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我们愿意走多远？是否有人最终会说够了就是够了？我不知道，说实话，我不想考虑这个问题。就在那时，Nix给我发了一封邮件：“我想让你见见来自美国的Steve。”

第4章

来自美国的STEVE

我一定是打瞌睡了，因为列车员的广播吓了我一跳：“到剑桥的乘客请在此下车！”那是2013年10月，我早上5点就醒了，赶上从伦敦维多利亚车站出发的6:40班列车。Nix为了省五英镑给我订了早班车。我跳下座位，意外撞到了身边的老太太。她只是瞪着我，紧握着她的钱包，就像英国人常做的那样。我跑出去，回头说对不起时，绊倒了。

“小心间隙！”太迟了。

我站起来，才发现不知怎么弄丢了钱包，然后恐惧地看着火车慢慢驶出车站。唉。没有现金或卡片，我打电话给Nix，请他订一辆预付费出租车。“走路去，”他说。“你应该更小心点。”我太累了懒得争论，而且他显然心情不好，所以我按Nix说的做了——我走路，离开车站走进十月初清晨的薄雾和细雨中。剑桥刚刚开始苏醒。

在约会前还有几个小时要消磨，我漫步穿过Parker's Piece，一个小公共绿地，学生运动员在教堂尖塔透过树木的背景下开始晨练。从那里，我走过小镇蜿蜒的中世纪石街，经过小商店和英格兰第二古老大学（可追溯到1209年）的高墙。继续走到River Cam附近的Thompson's Lane后，我到达了小而明显昂贵的Varsity Hotel。

与军事承包商合作，我遇到了各种奇怪的人物，他们大多强烈要求“绝对保密”——在第一次会面前不知道一个人的完整身份一点也不奇怪。前一天，Nix看起来有点焦躁地走进办公室，直接走向我，双手放在我的桌子上，凑近我的脸。“我需要你明天在剑桥见一个人，”他说。“我搞不清楚他在想什么，但我觉得你可以。”

我问要见谁。

“我稍后会给你发邮件详情。”

在这种情况下，我从Nix那里得到的极其无用的指示只是去见“来自美国的Steve，”除了要求我“带上数据”之外没有其他细节。

我在酒店大堂独自坐了一个小时，然后给Nix发短信，要史蒂夫的电话号码。他看了短信但没有回复。又过了十五分钟，一个粗鲁的家伙走过来打量着我。

“你就是那个人吗？”他问。

“是的，就是我，”我回答。根据SCL通常的客户类型，我原本期待的是某种政府或机构人员。但我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邋遢的男人，穿着两件有领衬衫，好像他忘记脱掉一件就穿上了另一件。他没有刮胡子，头发油腻，身上有那种跨大西洋飞行后的污垢感。他的眼睛有鲜红色的斑点，与他皮肤上酒糟鼻的红血丝相呼应。总的来说，他给人的感觉介于二手车销售员和疯子之间。他看起来疲惫或茫然；我认为这只是时差反应。

电梯是经典的英式设计，几乎容不下两个人，这意味着我必须努力避免碰到这个家伙。我穿着单色调的Dries Van Noten——深海军蓝西装长裤配相配的外衬衫，混合起来像是斜裁的毛式连体服。

“你不是我想象的样子，”他半开玩笑地说。是的，你自己也不是什么美男子，亲爱的...

他住在顶层的套房里。除了装饰墙上大胆的壁纸，装饰风格简约现代，与下面中世纪城市的全景视野形成鲜明对比。没有行李箱显得很奇怪，但不值得深究。然后我犹豫了。哦，等等，我独自一人在豪华酒店房间里和某个老家伙在一起。我看了看那张大床，然后注意到床边桌子上有一小瓶护手霜。该死，该死，该死——Nix是在利用我做诱饵吗？

我紧握着包，希望里面的笔记本电脑足够重，能够造成有效的打击。就在那里，史蒂夫·班农走向床边的大沙发，邀请我坐下。让我极度松了一口气的是，他为自己拿了一把椅子，并问我要不要喝水。当他坐下时，他的肚子从腰带上溢出来。

“Nix告诉我你在研究文化变迁，”他说。“跟我说说这个。”

我告诉他我们在使用计算机量化文化趋势，并预测它们在极端主义风险地区将如何演变。“我们试图窥视文化的命运，”我说，试图提炼几十年的计算和社会理论。班农翻了个白眼。“是的，是的，是的。你可以省掉废话，告诉我你实际上在做什么。”

我们谈了四个小时——不仅谈论政治，还谈论时尚和文化、福柯、第三波女权主义者朱迪斯·巴特勒，以及分裂自我的本质。从表面上看，班农似乎完全可以预测——又一个老、直、白人男性——但他说话时带有某种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觉醒意识。事实上，我很快就认为他有点酷。当我们开始就测量文化交换想法时，我提议给他展示一些我们的数据。我打开了一个Tableau工作簿，调出了特立尼达的地图。我点击了一个按钮，一层霓虹黄色的点开始填充地图。“顺便说一下，那些是真实的人，”我说。“他们是我们有人口统计数据的人...性别、年龄、种族。”

我再次点击，更多的点出现了。“我们现在正在添加在线足迹——比如互联网浏览。”

我再次点击。“这里是有人口普查信息的记录...现在是社交媒体档案。”我继续添加层级，他凑了过来。地图越来越亮，小点群向外扩展，直到最后点击后，地图变得耀眼夺目，呈现多种颜色。他问是谁付费的，但我告诉他我不能说。当我开始概述DARPA资助的社交媒体网络研究类型时，他问是否可以在美国进行类似的研究。

“我看不出为什么不行，”我说。

...

...

史蒂夫·班农出生于1950年代初的弗吉尼亚州，来自一个工人阶级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他就读于天主教军事高中，毕业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城市事务学位，然后在海军服役，担任水面作战军官，之后在五角大楼撰写关于美国海军舰队全球状况的报告。在1980年代，他的生活转向学术方向——1983年从乔治城大学获得国家研究硕士学位，1985年从哈佛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在投资银行工作一段时间后，班农转向在好莱坞制作电影，担任执行制片人、导演和编剧。他参与了三十多部电影的制作，包括一部关于罗纳德·里根的纪录片。2005年，班农加入了总部位于香港的互联网游戏娱乐公司(IGE)，一年后他带来了6000万美元的投资，其中一半来自他的前雇主高盛。该公司最终更名为Affinity Media Holdings，班农继续帮助经营该公司直到2012年加入布莱巴特(Breitbart)。接下来，班农共同创立了政府问责研究所，该机构最终出版了布莱巴特新闻特约编辑彼得·施韦泽的《克林顿现金》一书。

2005年，右翼评论员安德鲁·布莱巴特创办了Breitbart.com，这是一个在线新闻聚合器，到2007年它已发展为布莱巴特新闻，发布原创内容。该网站运行在布莱巴特个人哲学的暗流之上，这被称为布莱巴特主义：政治源于文化，如果保守派想要成功地阻止美国的进步思想，他们首先必须挑战文化。因此，布莱巴特的创立不仅是作为媒体平台，也是扭转美国文化流向的工具。

当安德鲁·布莱巴特（Andrew Breitbart）（他曾将默瑟夫妇介绍给班农）于2012年突然去世后，班农接替了他的高级编辑职位，并承继了他的哲学理念。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他是布莱巴特网站的执行主席，来到剑桥寻找有前途的年轻保守派人士和候选人来充实他新设立的伦敦分部。正如我们后来在英国脱欧中了解到的，其逻辑是英国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标志。班农后来告诉我，赢得英国人，美国也就随之倒下，因为好莱坞的神话和比喻塑造了英国作为一个有教养、理性和优雅国家的形象。不过，他遇到了一个问题。尽管网站声势浩大，但却被定型为一个供那些无法获得性生活的年轻、异性恋白人男性聚集的地方。Gamergate是他们文化战争中最早、最公开的实例之一：当几名女性试图揭露游戏行业内严重的厌女症时，她们遭到了大规模的骚扰、人肉搜索和无数死亡威胁，这是一场针对那些将“女权主义意识形态”强加给游戏文化的“进步主义者”的大规模运动。

Gamergate并非由布莱巴特网站煽动，但这对班农来说是一个信号，他看到愤怒、孤独的白人男性在感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时能够被极度动员起来。班农意识到了培养这些性饥渴处男厌女症的力量。他们虚无主义的愤怒和关于“贝塔起义”的言论在互联网的隐秘角落里酝酿着。但培养一支“incel”（非自愿单身者）大军并不足以支撑他所幻想的运动。他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方法。

这是剑桥分析公司传奇中较为奇特的时刻之一——一次改变历史的随机飞机对话。在我见到班农的几个月前，两名共和党顾问马克·布洛克（Mark Block）和琳达·汉森（Linda Hansen）碰巧坐在一位前军官旁边，这位军官曾为一家在选举中使用“网络战”的公司做过分包商。布洛克在飞行中睡着了，但汉森和她的邻座开始聊天，那人告诉她SCL在信息战方面的项目。飞机降落后，汉森告诉布洛克他们需要联系尼克斯。布洛克曾是赫尔曼·凯恩（Herman Cain）的竞选经理，与共和党圈子的边缘分子联系密切。他认识班农，并立即明白SCL会引起他的兴趣。因此布洛克让班农与尼克斯建立了联系，我最终在这个酒店套房里遇到了这个后来策划了对美国民众心理进行大规模操控的人。

当我走进瓦尔西蒂酒店(Varsity Hotel)的大门时，尼克斯已经在纽约与班农见过几次面了。但当尼克斯试图解释我们的项目时，他遇到了一个问题——他实际上并不理解我们在做什么。面对班农时，他深陷陌生领域，班农更关心研究的细节而非研究人员的资历。在SCL内部，尼克斯通常被其他董事安排去处理他们“不太严肃”的客户。尼克斯在2007年他父亲（一位大股东）去世后在公司中变得更加活跃。他在曼彻斯特大学艺术史专业毕业时成绩平平，但相比画廊或图书馆，他更喜欢富有朋友和家人的各种企业。

班农对尼克斯来说不是典型的客户，尼克斯更习惯于与来自英国旧帝国发展中国家的部长或商人打交道。班农不需要热带国家的第二本护照。他不是伦敦寻找殖民角色扮演，也不在乎尼克斯如何发音或他定制西装的剪裁。班农想要真实的东西。对于一个习惯于用衣着暴露的乌克兰女性和醉醺醺的伊顿公学式闲聊来诱惑部长们的人来说，这是极度迷惑的。

最初，尼克斯建议班农在伦敦的帕尔摩尔街(Pall Mall)某处见面，这是一条两旁矗立着宏伟石建筑的街道。距离白金汉宫几个街区的帕尔摩尔街始于特拉法加广场，止于圣詹姆斯宫——这座十六世纪的宫殿是几位王室成员的住所。该地区是英国一些最独特的私人绅士俱乐部的所在地，那里黑色领结很常见，尼克斯与同龄人在奢华环境中社交，痛饮美酒。尼克斯原本设想在卡尔顿俱乐部(Carlton Club)的私人餐厅举行精心安排的晚宴，细致规划菜单和服务人员，却在最后一刻遭到拒绝。

尽管如此，尼克斯知道每个人，包括班农，都承受着未实现的秘密自我的渴望。他意识到这个美国人在英格兰古老的大学中悠闲度日是为了扮演一个角色——当班农照镜子时，他看到的是一位哲学家。为了赢得他，尼克斯需要帮

助他实现成为一个思考宏大思想的思想家的幻想。因此，我的”学术”氛围正好成了他引诱班农进行角色扮演所需要的。

如今班农（Bannon）已是名人，但我们在2013年秋天坐在那间酒店房间里时，我对这位来自美国的史蒂夫几乎一无所知。即便如此，我很快意识到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人。我们最终都涉足了政治，但我们共同的热情是文化——他的抱负在电影方面，我的在时尚领域。他沉迷于我对解构趋势的兴趣，并同意我们的许多社会规范都可以归结为美学。我们都看到了科技和在线空间中正在酝酿的东西。他谈论游戏玩家、表情包和MMORPG——像魔兽世界这样拥有大量玩家的在线游戏。他在句子中使用了”pwned”这个词，这是一个游戏表达，暗示对对手的支配或羞辱。我们在所有让我们显得古怪的事情上产生了共鸣。当我们坐在那里交谈时，我发现自己对他产生了意外的好感。他不是政治黑客，而是一个被允许自由发言的同道中人。

当班农说他有兴趣改变文化时，我问他如何定义文化。有一个长长的停顿。我告诉他，如果你不能定义某样东西，你就无法衡量它，如果你无法衡量它，你就无法知道你是否在改变它。

我没有深入理论，而是通过使用文化刻板印象给班农举了一个关于文化是什么的过度简化的例子。意大利人以比其他人更有激情和外向而闻名。（作为与一个意大利人约会过的人，我可以证明这种名声背后确实有一定道理。）虽然显然不是所有意大利人都大声且充满激情，但如果你访问意大利，你可能会发现比你访问德国或新加坡时更多在表现上外向的人。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规范——外向性或喧闹程度的钟形分布曲线上的峰值。也许意大利在这个尺度上的峰值比其他国家要高一点。

当我们描述文化时，我们使用个性的语言和词汇。我们用同样的词来描述个人和民族。一方面，我们不能在个体层面上刻板印象，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意大利文化可能比许多其他文化稍微更外向一些。

如果我们能够使用个人数据来衡量或推断个体的某些特征，然后使用这些相同的特征来描述一种文化，我们就可以绘制一个分布图，为那种文化创建一个近似的指标。这个框架使我们能够提出如何使用在社交媒体、点击流或数据供应商那里找到的个人数据来识别，例如，谁是最外向的意大利人，通过他们作为个体消费者和用户的行为模式。然后，如果有人想要改变文化使其稍微不那么外向，这些数据给了我们一个实际命名的意大利人名单，按他们的外向程度排序，我们可以随时跟踪和目标定位他们，试图削弱他们的外向性。换句话说，文化变革可以被认为是推动文化分布曲线上移动。数据允许我们做的是将那种文化分解为个体，他们成为该社会的可移动单位。

班农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但当我涉及一个让他感兴趣的主体时，他很安静甚至很恭敬。但他也急于回到应用上。要理解这如何可能成为一个实际的活动，想想公共卫生。当传染病威胁人群时，你首先给某些载体免疫——通常是婴儿和老人，因为他们最容易感染。然后是护士和医生、教师和公交车司机，因为他们最有可能通过广泛的社会互动传播传染病，即使他们自己不会屈服于疾病。同样类型的策略可以帮助你改变文化。例如，为了使人群对极端主义更有韧性，你首先要识别哪些人容易受到武器化信息的影响，确定使他们容易受到传染性叙述影响的特征，然后用免疫反叙述来目标定位他们，试图改变他们的行为。当然，理论上，同样的策略可以反向使用——来培养极端主义——但这是我甚至没有考虑过的事情。

...

黑客攻击的目标

黑客攻击的目标是在系统中找到薄弱点，然后利用那个漏洞。在心理战中，薄弱点是人们思维方式中的缺陷。如果你试图黑客攻击一个人的思维，你需要识别 *认知偏见(cognitive biases)*，然后利用它们。如果你走向街上的一个随机的人问：“你快乐吗？”她说是的几率很高。然而，如果你走向同一个人并首先问：“你在过去几年中体重增加了吗？”或“你高中的任何人比你更成功吗？”然后你问“你快乐吗？”——同一个人就不太倾向于回答是。关于她的个人情况或历史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改变。但她对自己生活的感知发生了变化。为什么？因为她脑海中的一条信息比其他信息被赋予了更多权重。

我们作为提问者所操纵的是她如何权衡那些信息，这反过来影响了她对那些信息的判断。我们偏向了她对自己生活的心理模型。那么哪个是真的？她快乐还是不快乐？答案取决于哪些信息被拉到她的脑海前端。在心理学中，这被称为启动(priming)。这本质上就是你如何武器化数据：你找出哪些显著信息要拉到前台来影响一个人的感受、她的信念以及她的行为方式。

除非某人的父母暗中是瓦肯人，否则地球上没有人是纯粹理性的思考者。我们都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这是我们思维中常见的错误，会产生对信息的有缺陷的主观解释。人们在处理信息时出现偏差是完全正常的——事实上，每个人都会这样——而且通常这些偏差在日常生活中是无害的。这些偏差在每个人身上都不是随机的。相反，它们是系统性错误，意味着它们在常见的非理性思维形式中创造出模式。事实上，心理学领域已经识别出数千种认知偏差。有些偏差是如此普遍且看似直观，以至于人们甚至很难意识到它们实际上是非理性的。

例如，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进行了一项研究，向参与者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假设你从英文文本中随机抽取一个单词。这个单词以*k*开头的可能性更大，还是*k*作为第三个字母的可能性更大？”大多数人回答前者，认为以*k*开头的单词（例如，*kitchen*, *kite*或*kilometer*）更可能出现。然而，相反的情况才是真实的，在典型的英文文本中，实际上遇到第三个字母是*k*的单词的可能性要高出两倍，比如*ask*, *like*, *make*, *joke*或*take*。他们对五个字母（*k*, *l*, *n*, *r*和*v*）进行了这样的测试。人们更容易通过首字母来想起单词，因为我们被教导按首字母组织（或按字母顺序排列）单词。然而，人们将这种回忆的便利性与频率或概率混淆，即使这与事实相去甚远。这种认知偏差被称为 *可得性启发式*，只是影响我们思维的众多偏差之一。这种偏差解释了为什么，例如，在新闻中看到更多暴力谋杀报道的人往往认为社会变得更加暴力，而实际上全球谋杀率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总体上一直在下降。

我一直在基于自己在政治、时尚，然后是信息战争方面的经历思考这些想法。例如，政治极端主义是一种与时尚有相似之处的文化活动：它们都基于文化信息如何在网络节点中传播。圣战主义的兴起和Crocs鞋的流行都可以被视为信息流的产物。当我开始为SCL的反极端主义工作研究文化信息时，我借鉴了与我在时尚预测中探索的相似概念、方法和工具——采用周期、扩散率、网络同质性等。这项工作完全是关于试图预测人们如何内化然后传播文化信息——无论是意味着加入死亡邪教还是选择衣柜。

班农立即理解了这一切，甚至告诉我他相信，就像我一样，政治和时尚本质上是同一现象的产物。显然，他以广泛而深入的方式对待情报收集，这不是我在政治中见过很多人做的事情。这就是让他如此强大的原因。他阅读关于交叉女权主义或身份流动性的内容，正如我后来了解到的，不是因为他对这些想法持开放态度，而是因为他想要颠覆它们——识别人们依附的东西，然后将其武器化。那天我不知道的是，班农想要打一场文化战争，所以他来找专门从事信息武器的人来帮助他建立他的武器库。

班农和我显然在同一个波长上，那天的谈话流畅自然，感觉就像我们在调情——但不是，因为那会很恶心。但在智力上，我们很匹配。我离开那次会议时感到振奋，并得到了一个花时间倾听的人的认可。当我第一次见到班农时，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甚至很好。我可以看出他喜欢学习新想法，并对它们的可能性感到兴奋。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个人既是文化专家又是技术书呆子。我意识到他有一点自由主义倾向，但我们没有谈论太多政治。

然后我想起我丢了钱包。我打电话给尼克斯告诉他一切进展如何——以及我需要一张新票。“克里斯，我很忙，你自己解决。”

...

班农对我们工作的兴趣

班农对我们工作的兴趣不仅仅是学术性的；他对SCL有重大想法。他告诉尼克斯，有一位主要的右翼捐赠者可能会被说服对公司进行投资。罗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对于一个亿万富翁来说是不寻常的。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获得了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然后在IBM做了二十多年的螺丝钉。1993年，他加入了一家名为Renaissance Technologies的对冲基金，在那里他使用数据科学和算法来指导他的投资——并因此赚了愚蠢数量的钱。默瑟不是那些疯狂买卖企业的投机商类型。他是一个极其内向的工程师，将他的技术技能非常具体地应用于赚钱的艺术和科学。

多年来，Mercer已向保守派竞选活动捐赠了数百万美元。他还创立了由当时39岁的女儿Rebekah经营的Mercer家族基金会，该基金会最初支持研究和其他慈善事业，但后来也开始向政治参与的非营利组织捐款。他的财富和影响力使他与科氏兄弟和Sheldon Adelson一起跻身共和党捐赠者的殿堂。Mercer可能愿意投资SCL的消息让Nix垂涎三尺。Mercer的形象是一个颠覆金融部门的人。Renaissance是业内表现最好的对冲基金之一——Mercer通过摒弃传统的金融背景，转而雇用物理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来构建公司的算法来建立这家公司。但Mercer似乎希望我们尝试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盈利颠覆版本。通过为一个国家的每个公民建立档案，推断他们的个性和独特行为，并将这些档案放入该社会的*in silico*模拟中（在计算机内创建的模拟），我们将构建人工社会的第一个原型。如果我们能够在具有与他们所代表的真实人群相同特征的人工代理模拟中操作经济或文化，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出迄今为止想象的最强大的市场情报工具。通过添加量化的文化信号，我们正在接近类似于“文化金融”的新领域。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做对了，我们可以运行整个社会不同未来的模拟。忘记做空公司吧；想想整个经济体。

事实证明，Mercer心中所想的超越了经济范畴，但当时我们的重点是展示SCL的能力。经过一番深思熟虑，Bannon决定我们应该在弗吉尼亚州进行概念验证，这感觉像是美国的一个很好的缩影。它有点北方特色，也有点南方特色。它有山区和沿海地区、军事城镇、富裕的华盛顿特区郊区、农村地区和农场，以及富人和穷人、黑人和白人的横截面。弗吉尼亚实验将标志着我们第一次在美国使用数据。正如我在LPC和自由民主党所做的那样，我们从定性研究开始——与当地人员进行非结构化的、开放式的对话。SCL团队中没有人是美国人，我们对弗吉尼亚一无所知，对我来说它就像加纳一样陌生。显而易见的第一步是访问该州并与人们交谈，了解他们如何看待世界以及什么对他们重要。在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环境中向我们介绍自己之前，我们无法产生问题。一旦我们更好地了解了弗吉尼亚人关心什么以及他们如何处理事情，我们就可以为定量研究构建具体问题。政治和文化如此交织在一起，以至于通常不能在不在研究另一个的情况下研究其中一个。

因此，我与Mark Gettleton、Brent Clickard和其他几个人一起飞往美国，于2013年10月抵达弗吉尼亚，就在那里举行全州选举前不久。我们在焦点小组中听到的一件事是对共和党州长候选人、前州检察长Ken Cuccinelli的担忧。他是一个超右翼类型，曾倡导推翻同性恋权利和打击环境保护的举措。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有一个庞大的福音派基督徒选民群体，如果Cuccinelli要获胜，他们需要他们。但是，正如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的那样，他如此努力地争取他们的选票，结果矫枉过正了。

Cuccinelli的举措之一是向联邦法院请愿，要求推翻其对弗吉尼亚州“违反自然罪”法律的裁决。该法规最初于1950年通过，并于2013年被美国第四巡回上诉法院正式推翻（鉴于2003年美国最高法院将成年人之间同意的性活动非刑事化的决定），从技术上讲，该法规将口交和肛交定为非法。Cuccinelli辩称，需要该法律来打击恋童癖。在纸面上，他让我想起了我们在非洲部分地区遇到的疯狂政客，痴迷于同性恋者和他们卧室里的罪恶。但社会极端分子和怪人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即使在平淡无奇的美国也是如此。

我们焦点小组中的人——特别是异性恋、热血的美国男性——不断说他们认为这有多奇怪。禁止同性恋的东西，当然可以，但为什么要禁止所有非生殖性行为？为什么Cuccinelli如此反对口交？让我们现实一点——这不是有点奇怪

吗？这些家伙不断谈论他们不喜欢想到Cuccinelli和口交，谁能责怪他们呢？我们不断听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决定尝试一个实验。

在人格五因子模型中，保守派往往表现出两个特征的组合：较低的开放性和较高的责任心。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共和党人不太可能寻求新奇事物或表达对新体验的好奇心（隐性同性恋者是明显的例外）。同时，他们偏爱结构和秩序，不喜欢意外。民主党人更开放，但往往责任心较差。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政治辩论经常围绕行为和个人责任的焦点。

我们的定性研究告诉我们，除了许多其他事情外，弗吉尼亚共和党人对Cuccinelli对口交的痴迷感到厌恶。心理测量测试也告诉我们，共和党人不喜欢不可预测性。我们能否利用这两个观察结果创建一个策略来改变对Cuccinelli的舆论导向？

这就是Gettleson天才之处的体现。他特别着迷于阿尔法男性选民以及Cuccinelli在这群人中遇到的困境，但他也知道在信息传达方面需要巧妙地把握平衡。所以他专注于怪异因素。人们感到反感是因为他们认为Cuccinelli表现得很怪异。如果他的信息传达承认这一点会怎样？我们决定测试一个简单的信息：“你可能不同意，但至少你知道我的立场。”这样，即使人们认为他的立场很疯狂，至少他可以把它转化为一种可预测和有序的疯狂。

我们召集了焦点小组、在线调研小组和数字广告测试来尝试这个口号，结果它的表现超过了我们尝试的所有其他信息——尽管它本质上毫无意义。这是一个重大发现：我们能够通过调整候选人的信息来匹配选民的心理测量测试结果，从而影响选民的观点。由于如此多的共和党人表现出这些性格特征，这种框架设计——*我就是我，你知道我的立场*——可能对其他共和党人同样有效。这一策略在那些责任心得分较高但对Cuccinelli不确定的人群中表现更好。对他们来说，这将Cuccinelli塑造为“你了解的魔鬼”，并将他突出的“怪癖”定位为至少是可靠的怪癖。

事实证明，共和党人可以接受一个疯狂透顶的候选人，只要这是一致的疯狂。这一发现后来几乎影响了Cambridge Analytica的所有工作。从那里开始，当然，候选人吹嘘他可以站在第五大道中央射杀某人而不失去支持，这只是一小步之遥。

...

...

在我们的实验过程中，我们收集了大量关于弗吉尼亚州民众的个人信息。获取这些信息很容易——我们只是通过数据经纪商购买访问权限，如Experian、Acxiom，以及拥有福音派教会、媒体公司等专业名单的利基公司。甚至一些州政府也会向你出售狩猎、钓鱼或枪支许可证持有者的名单。州政府部门关心或甚至询问这些关于其公民的数据去向了吗？没有。我们可能是诈骗犯或外国间谍，他们也不会有任何线索。

大多数人知道Experian是一家消费者信用报告公司。这就是它的起源，基于各种金融因素为人们计算信用分数。该公司会从广泛的来源收集信息——航空会员、媒体公司、慈善机构，甚至游乐园。它还从政府机构收集信息，如DMV、钓鱼和狩猎许可，以及枪支许可。随着编制这些详细档案，公司意识到可以利用它们进行营销赚取额外收入。

在1990年代，政治策略师开始购买个人信息用于竞选活动。想想看：如果你知道一个人开什么样的汽车或卡车，他们是否狩猎，向什么慈善机构捐款，订阅什么杂志，你就可以开始形成对那个人的印象。许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

有一个形象。而他们的形象被这个数据快照捕捉到了。然后你可以基于这些信息锁定潜在选民。

我们还获得了人口普查数据。与隐私控制较少严格的发展中国家不同，美国政府不会提供特定个人的原始数据，但你可以获得县或社区级别的犯罪、肥胖症以及糖尿病和哮喘等疾病的信息。一个普查区块通常包含600到3000人，这意味着通过结合多个数据源，我们可以建立模型来推断个人的这些属性。例如，通过参考糖尿病的风险或保护因素，如年龄、种族、位置、收入、对健康食品的兴趣、餐厅偏好、健身房会员资格和过去使用减肥产品的情况（所有这些在大多数美国消费者档案中都可获得），我们可以将这些数据与某个地区糖尿病率的聚合统计数据相匹配。然后我们可以为给定社区中的每个人创建一个分数，衡量他们患有糖尿病等健康问题的可能性——即使人口普查或消费者档案本身从未直接提供这些数据。

Gettleson和我花了几个小时探索随机和奇怪的属性组合。是否有人拥有枪支许可证但也属于ACLU？是否有人拥有交响乐团的季票和终身NRA会员资格？同性恋共和党人真的存在吗？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想知道是否有反同性恋教會的捐助者也在有机食品店购物。我们对试点项目获得的消费者数据集进行了搜索，发现了少数几个数据显示他们两样都做的人。

我立即想见见这些神话般的生物中的一个，部分是因为我好奇，但也因为我想确保我们的数据是准确的。我们提取了出现的姓名，然后将它们发送到呼叫中心，代理人致电每个人询问他们是否愿意与研究人员会面回答一些问题。大多数人拒绝了，但有一位女士同意了——我迫不及待地想见她。她的消费习惯似乎非常分散——一个Whole Foods购物者，对瑜伽感兴趣，但也是反同性恋教會的成员和右翼慈善机构的捐助者——这让我怀疑要么我们的数据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要么这个人美国最迷人的人物之一。

那位女士的数据引导我来到费尔法克斯县郊区一栋普通的错层式房屋。有那么一瞬间，我犹豫了。“唉，这会不会很尴尬？”但我已经走了这么远，所以我走到门前按响了门铃。我听到头顶上传来风铃声。然后一个活泼的金发女郎开了门，头发做过造型，几乎朝我扑了过来。“嘿！嘿！快进来！”当我们进入房子时，我注意到她确实穿着Lululemon瑜伽裤。她带我进了客厅，房间里有熏香的味道，既有佛陀雕像又有象头印度教神甘尼什的雕像。然后我看到墙上挂着一个十字架。这一切都相当夸张。

当她给我提供一杯自制康普茶时，我接受了。在厨房里，她打开一个装着某种东西的大罐子，将一种极其成熟且略微凝固的液体倒进杯子里。

“这真的很有益生菌。”

“是的，我看得出来，”我回答道，看着杯子里漂浮的块状物。

当我们开始交谈时，她用新时代术语谈论试图“调整她的正能量”，毫无疑问是受到她书架上迪帕克·乔普拉的启发。但当我们开始谈论道德时，她突然转向火与硫磺式的福音派观点——特别是关于同性恋者，她知道他们会直接下地狱（没有双关的意思）。然而，即使她表达这种信念的方式也很奇怪：她说同性恋就像你能量中的一个阻塞——一个有罪的阻塞。她向我传教了两个小时，我坐在那里记笔记，仿佛我们是某种混乱治疗会议的参与者。

我从那次相遇中带着各种想法离开。我觉得我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因为见鬼，一个民调专家该如何分类这个女人？这让我确信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精力来理解人口统计学背后的细微差别。我曾经遇到过灵长类动物学家简·古道尔(Jane Goodall)，她说的话一直让我印象深刻。在一次招待会上交谈时，我问她为什么要在野外而不是在受控实验室里研究灵长类动物。很简单，她说：因为它们不生活在实验室里。人类也不是。如果我们要真正理解人们，我们必须始终记住他们生活在数据集之外。

很容易被你感兴趣的事情所吸引，这真是令人惊讶。我们是一家英国军事承包商，致力于重大想法，拥有一个不断壮大的团队，主要由同性恋和主要是自由派的数据科学家和社会研究者组成。那么我们为什么开始与这个由对冲基

金经理、计算机科学家和一个经营小众右翼网站的人组成的折衷混合体合作呢？因为这个想法太棒了。有了研究像文化这样抽象和流动事物的自由权，我们可能正在开拓一个研究社会的新领域。如果我们能把社会放进计算机里，我们就能开始量化一切，将贫困和种族暴力等问题封装在计算机中；我们能模拟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像那个女人没有看到她的偶像之间的矛盾一样，我还没有看到我正在做的事情中的矛盾。

第5章

剑桥分析

在2013年秋季的家访和焦点小组过程中，我们发现弗吉尼亚州包含了美国生活的典型横截面。我们从费尔法克斯穿过该州中部，然后前往诺福克和弗吉尼亚海滩，在当地酒吧和夫妻店餐厅停留，我们既欢迎氛围也欢迎食物。确实，你可以从人们吃喝谈话的方式中学到很多。甜茶和某些食物在我们发现它们的文化意义后成为了我们的特殊痴迷。如果美国南部传统上以旧梅森-迪克逊线为界，这条线标志着奴隶主和自由州之间的边界，那么一个不同的分界线切割了当代弗吉尼亚，北部的餐厅提供不加糖的茶，南部的餐厅提供甜茶。当地人告诉我们，“真正的南方”就从这里开始——从甜茶线开始，不仅在梅森-迪克逊线以南，还在里士满以南更远的地方。

我最喜欢的活动是观察和倾听那些同意让我们与他们共度时光的美国人。我会坐在沙发上偷听人们谈论他们的一天，或者他们在收音机上听到的内容，或者办公室政治。我会观察人们看福克斯新闻，注意他们会变得多么愤怒（因为我来自一个没有福克斯新闻的国家，这是最有趣的事情之一）。这是一种奇怪的表演，因为他们会坐下来等待——并且期待——被那天“精英们”对他们做的任何事情所侮辱。他们会打开福克斯，他们的愤怒变得显而易见。有时我似乎在目睹一次治疗会议，就像人们在令人沮丧的一周后在愤怒房间里砸东西一样。这与我通常习惯看到的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我的朋友们碰巧偶然看到福克斯新闻时。我清楚地记得阿利斯泰尔·卡迈克尔(Alistair Carmichael)曾经把一个大喊大叫、满脸通红的福克斯新闻记者称为“被打的屁股”。

一对夫妇告诉我，他们欠下数千美元的保险免赔额，有时因为当月要修车而不得不减少处方药的购买。他们同意接受采访是因为获得的100美元能帮助他们支付下个月的费用。但他们将保险费用归咎于谁呢？不是雇主糟糕的健康保险计划或缺乏体面的薪水——他们责怪奥巴马医改。他们真诚地认为奥巴马医改的推出只是为了帮助更多无证工人来到美国，这是自由派社会工程的宏大计划，目的是通过更多倾向民主党的拉丁裔选民让民主党继续掌权，在他们看来这使得保险和医院变得更加昂贵。

人们在福克斯新闻的愤怒房间里度过一小时后会感觉更好——他们可以发泄压力，之后工作或家庭中的问题就成了别人的错。这意味着他们的困难可以完全外化，避免面对也许雇主根本不在乎他们、不愿给他们生活工资的严酷现实。承认也许他们正被每天见面的人利用，而不是奥巴马医改和“非法移民”这些无形敌人，这太痛苦了。

这是我接触福克斯新闻时间最长的一次，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网络如何将人们的身份认同塑造成可以武器化的东西。福克斯用夸张的叙述煽动愤怒，因为愤怒会破坏寻求、合理化和权衡信息的能力。这导致了一种叫做情感启发式(affect heuristic)的心理偏差，人们使用受情绪显著影响的心理捷径。这与人们在愤怒中说出后来后悔的话是同样的偏差——在情绪激动时，他们实际上是在用不同的方式思考。

当观众放松警惕时，福克斯告诉他们，他们是“普通美国人”群体的一部分。这种身份认同被反复强调，这就是为什么主持人有如此多“我们”的表述以及与观众的直接交流。观众被提醒，如果你真的是“普通美国人”，这就是你——即“我们”——的思考方式。这为身份动机推理(identity-motivated reasoning)做了准备，这种偏差本质上使人们基于信息如何服务于建立或威胁群体身份来接受或拒绝信息，而不是基于内容的优劣。这种动机推理使得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可以观看完全相同的新闻播报却得出相反的结论。但我开始理解福克斯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将一种身份移植到观众的头脑中，然后他们开始将关于想法的辩论解释为对他们身份的攻击。这反过来触发了反抗效应(reactance effect)，替代观点实际上加强了观众对原始信念的坚持，因为他们感受到对个人自由的威胁。民主党人越是批评福克斯的诱饵，观众的观点就越根深蒂固，他们就越愤怒。例如，这就是观众如何拒绝对唐纳德·特朗普说种

族主义言论的批评：他们将批评内化为对自己身份的攻击，而不是对候选人的攻击。这产生了一种阴险的效应，辩论越多，观众就越根深蒂固。

在进行这项研究时，我也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社会和经济上被剥夺的白人。很明显，支撑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的部分原因是一种受到威胁的感觉，这种感觉通过来自福克斯新闻等来源持续而显著的“警告”得到强化。我注意到美国有线新闻频道专题政治辩论的一个问题是在标记选民群体时缺乏细致入微的区分。白人选民、拉丁裔选民、女性选民、郊区选民等，都经常被讨论为单一维度和整体性的群体，而实际上许多选民身份的显著方面并不真正反映民调专家、分析师或顾问用来描述他们的标签。这反过来又疏远了某些人。例如，如果你是住在拖车里的白人男性，当你看到电视上的人坚持说白人在这个国家享有超级特权时，你可能会愤怒。如果你从小使用户外厕所长大，你可能对关于跨性别者是否应该能够使用他们选择的厕所的大讨论没有太多容忍度。如果你是中下阶层，你看到黑人领取福利，如果你生活在一个不断削减你的支持的州，你的态度是“那我的福利呢？”“这并不奇怪。这不是为了这些观点辩护，但如果我们想理解它们，我们必须对其他观点保持开放，即使是丑陋的观点。

作为我们对美国文化早期探索的一部分，我们研究了两个我们认为可能在这种社会不和中发挥作用的领域。首先，我们研究了一种社会身份威胁感是否在助长这些观点。第二个领域相关但略有不同。人们普遍存在的一个逻辑谬误是将世界视为赢家和输家的零和游戏。这种有缺陷的逻辑延伸为一种认知，即对其他群体的关注最终将意味着对像他们这样的人关注的减少。无论哪种方式，少数群体似乎都是“威胁”——身份威胁或资源威胁。基于这种潜在威胁感的假设，我们想看看是否能够缓解其中一些情绪，我们通过试图减少威胁感来做到这一点。在一项研究中，我们会要求人们想象他们是无敌的超级英雄，不会受到伤害或被杀死。然后我们询问他们对那些他们通常认为具有威胁性的人群——同性恋者、移民、其他种族的人——的看法，发现他们对这些“威胁性”刺激的反应更加温和。如果你是无敌的，没有什么能威胁到你，甚至同性恋者也不能。这对我 and 团队来说很有趣，因为我们正在揭示缓解种族紧张关系潜在因素的可能方法。通过每次实验，我们更多地了解了如何根据人们最内在的特质来操纵结果。

我们在弗吉尼亚的工作产生了有希望的结果。我们证明了个性特征和政治结果之间存在关系，我们不仅可以预测某些行为，还可以通过构建与心理测量档案相对应的信息语言来改变态度。我们知道，尽管我们在这个小型试点沙盒中使用的数据集相当不错，但它们对于辨别个性和身份的所有细微差别仍然严重不足。为了真正在电子空间中重建社会，我们需要找到更完整的数据——更多的数据。但这是一个将来要解决的问题。

Nix给了我们一周的时间来写一份通常需要两个月才能完成的报告。他急于让事情开始进行，因为他知道stakes(风险)有多大。Bannon告诉他Mercer可能会投资高达2000万美元。对于像SCL这样年预算在700万到1000万美元范围内的利基公司来说，这将是一笔改变游戏规则的资金。

在熬夜工作并在周末加班后，我们在接下来的周一将报告发送给了Bannon，他立即理解了我们能够完成的可能性。他完全支持。事实上，他在阅读报告后打电话给SCL办公室，几乎有些兴奋。“这太棒了，伙计们，”他不停地说。

现在我们只需要说服Robert Mercer。

...

...

在这之后的几周，2013年11月下旬的一个晚上，Nix在家里给我打电话。“收拾行李，”他说。“你明天要飞往纽约。”他、Tadas Jucikas和我要向Robert Mercer和他的女儿Rebekah展示我们的发现。

Nix一大早就飞走了，但由于某种原因，他为Jucikas和我预订了晚一点的航班。我们下午四点左右在JFK降落，会议安排在五点开始。当我们在美国海关排队时，我的电话响了。是Nix。“你们他妈的在哪里？”他要求道。

“我们刚下飞机，”我告诉他。

“好吧，你们迟到了，”他厉声说道。“你们最好赶紧到这里来。”

“我不能挥手让自己通过护照管制！”我恼怒地说。当我们在电话中争吵时，队伍中的其他人转过头来。我们继续争论，直到一名海关官员对我大喊让我挂断电话。这还没完。Nix反复给我打电话——当我们上车时，当我们到达酒店时，以及当我换衣服去参加会议时。这是典型的Nix，计划不周，却期待我来解决一切。恼怒之下，我决定将手机调到静音并慢慢准备，主要就是为了让他烦恼。Jucikas和我乘出租车去参加会议，会议在Upper West Side的Rebekah Mercer的公寓举行。Rebekah和她的丈夫，一位名叫Sylvain Mirochnikoff的法国金融家，在Trump Place的Heritage购买了六套公寓，将它们合并成一个巨大的十七间卧室的家。这个地方占据了二十三、二十四和二十五层的大部分，可以俯瞰哈德逊河上下游的壮观景色，点缀着纽约的所有灯光。

但它也很俗气，因为Rebekah用随意的工艺美术装饰来装饰它：陶瓷小雕像、抱枕、节日装饰。在客厅里，她有一架华丽的大钢琴，钢琴上放着一堆小装饰品和装框的家庭照片。

Rebekah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她在斯坦福大学学习生物学和数学，并获得了运筹学和工程经济系统的硕士学位。然后她跟随父亲在Renaissance Technologies从事交易工作，但在开始在家教育孩子时离开了。2006年，她和她的姐妹们在曼哈顿买了一家面包店，所以她的生活主要围绕孩子和巧克力块饼干。她有一种超级活泼的气质，就像某种右翼啦啦队长。因为她有很多钱可以捐赠，所以她在GOP圈子里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与更加愤世嫉俗的共和党操作员不同，她拥有Mark Block所说的“TB”——她是这些保守主义十字军的真正信徒。

我走进客厅，看到Rebekah和Nix坐在双人沙发上。他们俩正在聊天和大笑，Nix在展现他的魅力。房间里挤满了人——Bob Mercer、Bannon、Block、几个来自支持脱欧的右翼英国独立党(UKIP)的老人，还有一群穿西装的人，我猜他们是律师或公司顾问。其他几个Mercer家族成员也在场，包括Bob的妻子Diana，他们的女儿Jennifer，以及几个孙辈。这是一个家庭聚会。

Mercer与他的女儿们形成了鲜明对比，她们浮华而健谈。他很少看任何人，大多数时候只是听着。他穿着一套朴素的灰色西装，尽管我们是在他女儿家吃晚餐。大部分谈话都由他的女儿们或随从来进行。他令人敬畏，极其严肃，几乎完全不说话。当他开口时，语调平淡。他只问与我们工作中非常技术性方面相关的问题，总是要我给出具体的统计数据。

当时机到来时，Nix站起来简短地介绍了SCL的资历，我们为军方所做的工作，以及公司通常如何不接受私人客户，但Mercer的坚持追求让他屈服了(这是谎言)。我不得不克制住翻白眼的冲动。Nix然后介绍了我，开始完全错误地描述这个项目。他显然没有读过那份长报告，所以就开始编造发现。我知道Mercer会看穿他的胡说八道，所以我打断了他，描述我们在弗吉尼亚所做的工作。Nix瞪着我，坐在Rebekah旁边。在讨论项目时，我添加了一些更生动的细节来吸引Mercer家族。当我提到Kombucha Lady，将她描述为一个热爱瑜伽和有机食品的福音派基督徒时，Rebekah脱口而出：“那就是我！终于有人理解我们了！”

我还谈到了SCL在其他地区的项目——中东、北非、加勒比地区。当我谈到特立尼达项目时，我能看到Bannon在点头，当我描述在硅片中复制社会的想法时。这也引起了Bob Mercer的注意，因为作为工程师，他对这部分特别感兴趣。在我加入SCL后，我意识到DARPA资助的信息传播研发项目实际上就是另一种名义下的文化趋势预测。收集社交媒体数据以通过算法分析用户画像只是开始。一旦推断出他们的行为属性，就可以运行模拟来映射他们如何在规模上相互交流和互动。这让我想起了1990年代社会学一个小众领域“人工社会”的实验，该领域涉及粗糙的多智能体

系统尝试在硅片中”培育”社会。我能记起作为青少年时阅读Isaac Asimov的《基地》系列，其中科学家使用关于社会的大数据集创建了”心理史学”领域，这使他们不仅能预测未来，还能控制未来。

Mercer让他的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的人参与了SCL的原始范围界定，鉴于Nix如此专注于金钱，而对冲基金是这个项目早期阶段的一部分，每个人都认为这将成为一个商业企业。粗略地说，如果我们能复制每个人的数据画像并在计算机中复制社会——就像《模拟人生》游戏但使用真实人们的数据——我们就能模拟和预测社会和市场会发生什么。这似乎是Mercer的目标。如果我们创建了这个人工社会，我们认为我们将站在创造世界上最强大的市场情报工具之一的门槛上。我们将进入一个新领域——对冲基金的文化金融和趋势预测。

计算机工程师出身的社会工程师Mercer想要重构社会并优化其人民。他的爱好之一是制作模型火车套装，我感觉他认为他可以，实际上，让我们为他建造一个模型社会供他摆弄，直到它完美为止。通过量化人类行为和文化互动的许多内在方面，Mercer最终意识到他可以拥有信息战的Uber。就像Uber用一个单一应用程序摧毁了百年出租车行业一样，他的企业即将对民主制度做同样的事情。

Bannon的目标根本不同。他不是传统的共和党人。事实上，他憎恨Mitt Romney风格的共和党人，因为他认为他们代表了空虚的资本主义。他厌恶Ayn Rand，因为她将人们物化为商品。他会谈论经济如何需要更高的目标，有时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与其说是出于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为了表达观点——马克思谈论人类实现目标。他声称相信dharma，这是印度教和佛教的一个信条，与宇宙秩序和适当、和谐的生活方式有关。他觉得自己的使命是找到美国的目标。在他看来，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从金融危机和对机构信任的衰落中看到了几个信号，预示着地平线上即将到来的大清算。Bannon的追求具有准宗教性质，他承担了救世主的角色。

因此，与默瑟一样，班农憎恨”大政府”，但他有自己的理由——因为他看到行政国家正在取代传统和文化所扮演的角色。对他来说，欧盟是主要的罪魁祸首，一个极端地取代传统的无菌官僚机构——使欧洲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经济市场。在班农看来，西方世界似乎正在通过抛弃其文化传统而迷失方向，转向毫无意义的消费主义和一个面目模糊的国家。对班农来说，这是一场全面的文化战争。作为自立的先知，班农想要一个窥视我们社会未来的工具。通过班农所说的Facebook上帝视角——对每一个公民的洞察，他可以努力为每个美国人找到法则(dharma)。以这种方式，我们的研究对他来说几乎变成了精神层面的追求。

尼克斯、班农和默瑟都对帕兰提尔公司着迷，这是彼得·蒂尔的数据挖掘公司，其名字来源于J.R.R.托尔金《指环王》中的水晶球或全视之眼。当时，在我看来，这些人想要通过投资SCL来创建他们自己的私人帕兰提尔。想象一下像默瑟这样的投资者的可能性：预测人们将购买和不购买什么的未来，以便赚更多钱。如果你能看到崩盘的到来，你就拥有了社会的全视之球：你可能在一夜之间赚取数十亿美元。

当我结束时，丽贝卡邀请大家进入餐厅。厨房工作人员端出了配有精致装饰的菲力牛排，但是，知道我不吃肉，丽贝卡让厨师为我准备了一道特别的菜肴。结果是烤奶酪三明治——我想至少她是用心了。她伸手到我的盘子里拿了一个，咬了一口后，满足地叹了一口气。“实际上我只是要了这些，因为我想要一个，”她坦白道。

“你知道，”她说，“我很高兴像你这样的人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需要更多你们这种人。”

“哦，你是什么意思？”我天真地问道。当然，我完全知道她的意思，但我希望她大声说出来。

“同性恋者——顺便说一下，我爱他们！”

我思考着她是如何在心理上平衡既爱同性恋者又支持压迫他们的事业这一矛盾的。但话说回来，我参加过许多晚餐，人们在撕咬牛排时谈论他们多么热爱动物。

丽贝卡想要吸引更多LGBT人群加入共和党队伍，认为这会加强该党。然后她说她喜欢我的夹克，建议我们某天一起去购物。丽贝卡如此笨拙，又被尼克斯如此巧妙地操纵，我几乎为她感到难过。但还没到那个程度。

在用餐结束时，鲍勃要求除了尼克斯、丽贝卡和律师之外的所有人都离开。他已经决定投资——大约1500万到2000万美元的自己的钱。“我们将创建一个真正的帕兰提尔，”尼克斯说。“我们将能够真正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

...

...

获得高达2000万美元资金后

获得高达2000万美元资金后，尼克斯心情极佳。我们会面后的那个晚上，他带着尤契卡斯和我到十一麦迪逊公园享用了一顿奢华晚餐，这是一家拥有拱形天花板的米其林星级餐厅。他夸张地翻阅着酒单，然后指示服务员给我们拿来拉菲·罗斯柴尔德庄园酒——一瓶2000美元的酒。

“想要什么就点什么，”他大手一挥说道。这是一个愉快的惊喜，因为尽管很富有，尼克斯很小气，甚至会抱怨最小的开支，比如办公用品。他曾经因为有人买了“太多”荧光笔而拒绝了一份费用报销，说：“你不需要超过一支。”但在这个晚上，他点了似乎几十道菜，一场亚瑟王式的盛宴。他沉浸在自己的辉煌中。

服务员端来了酒，他刚给我们倒满酒杯，尼克斯就在谈话中挥舞手臂，把酒瓶从桌子上撞掉了。价值数百美元的酒滴四处飞溅，在服务员甚至还没有机会拿下手臂上的毛巾清理之前，尼克斯就喊道：“再给我们拿一瓶！”我一定是张大嘴巴看着他，因为他眨了眨眼说：“当你有2000万美元时，这真的不重要，不是吗？”

这个夜晚变成了一场彻底的狂欢。不知怎的，几个穿着紧身裙的女人出现了，显然让其他用餐者感到震惊。“克里斯，你想要一个吗？”他问我，直到我提醒他我不喜欢女人，好像需要提醒一样，他脱口而出：“哦，你想让我给你找个男孩吗？”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但尼克斯只是继续说话。然后他告诉我一个关于他在伊顿公学时光的故事，以及贵族男孩们显然为了娱乐而做的事情。整个场面极其令人羞愧，而且不断恶化。

在某个时刻，餐厅的管理层必须想办法处理我们。我们的账单现在已经达到数万美元，所以他们不能在我们付款前就把我们赶出去。尤契卡斯和尼克斯已经太醉了，不在乎，但我坐在那里看着每个人都在看我们。然后，在明显是协调好的行动中，十几个服务员突然在房间里散开，对其他餐桌的客人低声耳语。所有客人同时从餐桌前起身，走进相邻的餐厅，而服务员们拿起吃了一半的主菜和酒瓶，巧妙地重新安置每个人，远离我们造成的骚乱。

我开始觉得那天晚上有些阴暗的预兆。我后来了解到，混乱和破坏是班农激励意识形态的核心原则。在催化美国dharmic重新平衡之前，他的运动首先需要在整个社会中灌输混乱，这样新的秩序才能出现。他热衷于阅读一位计算机科学家和业余哲学家的作品，此人自称Mencius Moldbug，是另类右翼的英雄，他写长篇大论的文章攻击民主制度和现代社会秩序的几乎所有方面。Moldbug关于“真相”的观点影响了班农和剑桥分析后来的发展。Moldbug写道：“胡说八道比真相更能有效地组织群众”，班农接受了这个观点。“任何人都可以相信真相，”Moldbug写道，“它起到政治制服的作用。如果你有制服，你就有军队。”

默瑟的投资被用来资助SCL的一个分支机构，班农将其命名为剑桥分析。我只能想象，如果鲍勃和丽贝卡·默瑟看到他们的投资所带来的那种脉动的享乐主义狂欢，他们会怎么想。另一方面，史蒂夫·班农可能会喜欢这样。

...

...

那是2014年春天，晚上十点，距离纽约的那次晚餐几个月后，当我们在田纳西州乡村快速穿行时，一阵突如其来的冷风清醒了我的头脑和肺部。连续吸烟的司机马克·布洛克把车内搞得烟雾缭绕，迫使我们打开车窗。我和格特尔森坐在后座。尼古丁的云雾逸散到黑暗中，我们沿着荒凉的道路行驶，被漆黑的森林包围。我重新回到美国，为剑桥

分析建立试点项目，布洛克是我的向导。作为SCL向班农介绍的人，布洛克对这个项目的潜力感到兴奋，虽然他无法帮助建立我们的模型，但他对美国了如指掌。

“我在后面放了一些啤酒，”布洛克说，“来一瓶吧。”我想，为什么不呢？啤酒和谈话开始流淌。布洛克是我遇到过的更有趣的另类右翼人物之一——既是一个超级友好的中西部人，有着温暖的笑容，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共和党操作员，在尼克松时代就开始崭露头角。

“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尼克松是我们最好的总统之一，”他突然说道。

“好的，我听着——为什么？”

“因为他搞垮了老鼠。”

“等等——什么？”

“民主党人。他搞垮了很多民主党人，”他笑着说，“那时候你可以为所欲为。”

“哦哦哦，对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公司叫Block RF。”

布洛克曾经因为在一名法官的连任竞选中涉嫌阴暗交易而被威斯康星州选举委员会禁止在该州开展竞选活动，不过后来通过布洛克自愿支付15,000美元罚款而得到解决，且没有承认任何不当行为。在他担任科赫兄弟的“美国繁荣”501(c)(4)“社会福利”组织负责人的那些年里，他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右翼组织网络，被一个监督组织称为“Blocktopus”。对他来说，政治不是关于理念或政策——那些都是给像丽贝卡·默瑟这样的真正信徒准备的废话。对他来说，政治是游击战，他可以在其中扮演切·格瓦拉。

布洛克的另一个杰作是赫尔曼·凯恩意外精彩的“吸烟广告”。作为凯恩2012年竞选总统时的幕僚长，布洛克出现在一个竞选广告中，他主要就是在闲聊，镜头紧紧对准他的脸。他灰色的胡须凌乱地遮住紫色的嘴唇，被香烟熏黑了。

“我真的相信赫尔曼·凯恩会把‘团结’重新带回美利坚合众国，”他说着，强调性地摇着头。广告结尾时，他凝视着镜头，漫不经心地吸着香烟，在克里斯塔·布兰奇的歌曲《我是美国！》的背景音乐中，从容地吐着烟。这几乎令人震惊，因为FCC早在1971年就禁止了电视和广播中的香烟广告。但这是布洛克的个人风格，他向政治正确竖中指的方式。

我喜欢和布洛克待在一起——他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家伙，总是会问你过得怎么样，不过我也知道在竞选中他不会犹豫地坑你。我们谈得越多，我越觉得他并不真正相信另类右翼所代表的那些仇恨观念——他只是拥抱了反叛的美学。他陶醉于自己在共和党内部这个小圈子里永恒反叛者的角色，我们因为共同享受挑战建制派而建立了联系。

这就是我们如何开始为剑桥分析工作的，这个改变历史的项目将推动英国脱欧、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以及个人隐私的死亡：在美国各地烟雾缭绕地行进。

...

在2014年初，CA首批派往美国进行焦点小组研究的人员都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而且没有一个是美国人。这是有意为之的。美国人往往认为自己的国家与众不同，但我们希望像研究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来研究美国，使用相同的语言和社会学方法。以这种方式探索美国非常有趣，而且因为我本人不是美国人，我觉得自己更能够突破美国文化中不被质疑的假设，注意到美国人自己看不到的东西。当涉及到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时，美国人会谈论”部落”、“政权”、“激进化”、“宗教极端分子”、“民族冲突”、“当地迷信”或”仪式”。人类学是针对其他人的，不是美国人。美国据说是这个”山上闪亮的城市”，这是罗纳德·里根从《山上宝训》的圣经故事中改编而来的著名说法。

但当我看到福音传道者预言末日和对不信者的灾祸时，当我观看韦斯特博罗浸信会教堂的示威活动时，当我在枪支展上看到身穿比基尼的女士携带半自动武器时，当我听到白人谈论”黑人暴徒”和”福利女王”时，我看到的是一个深陷民族冲突、宗教激进化和沸腾的武装叛乱中的国家。美国沉迷于自己的自我概念，它想要与众不同。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就像任何其他国家一样。

美国有些地方感觉就像我去过的任何地方一样陌生。就在默瑟家族决定投资SCL之前，尼克斯、朱奇卡斯和我在弗吉尼亚州农村地区会见了可能的支持者。一辆车载着我们从华盛顿特区出发，穿过富裕的郊区，最后沿着一条深入森林的长路行驶。最终，我们来到了一个有农舍的小空地，距离任何其他文明迹象都有数英里。开车的那个人什么也没说，我们的手机也没有信号了，感觉就像恐怖电影的开场场景。

在农舍里，我们被带到一个没有窗户的会议室，天花板上有高科技屏幕。然后一群NRA(全国步枪协会)活动人士走了进来，就像发条一样，每个人都拿出一把枪放在桌子上。我唯一见过类似情况的地方是在波斯尼亚——但至少波斯尼亚人会把他们的枪整齐地放在架子上。这就像黑手党电影中的场景，或者阿富汗军阀的会议。我什么也没说，因为当一群人把枪放在桌子上时，你真的不能说：“抱歉，这些枪有点咄咄逼人，让我感到不舒服。”

美国有自己的起源神话，自己的极端主义团体。在SCL，我不幸地观看了无数由ISIS和无能的非洲军阀候选人传播的宣传视频。圣战教派成员迷恋他们的枪支的方式与NRA成员迷恋他们的枪支的方式没有什么不同。我知道，如果我们要真正研究美国，我们需要像研究部落冲突一样来做——通过绘制这个国家的仪式、迷信、神话和民族紧张关系的地图。

盖特尔森是我们派出的最富有成效的研究人员之一。在2014年春夏期间，他走遍了美国各地，召集焦点小组，与人们交谈，然后将报告发送回伦敦。然后我们会生成理论和假设，在我们的定量研究中进行测试。盖特尔森是一个极其

迷人和机智的英国人，所以他很容易让人们开口说话。他很快观察到美国人与他们日常政治之间的脱节。例如，人们不断主动谈论国会任期限制这个看似模糊的问题。他们会一遍又一遍地说，华盛顿的大问题是政客们在职时间太长，被特殊利益集团收买了。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焦点小组中，几个人使用了“抽干沼泽”这个短语，所以他也把这个包含在发送回去的笔记中。CA后来使用对目标选民的在线小组的多变量测试来研究这个短语，看看它是否与选民产生共鸣。

在六周的时间里，盖特尔森访问了路易斯安那州、北卡罗来纳州、俄勒冈州和阿肯色州。在每个州，布洛克都为他联系了会开车载他四处并帮助处理后勤工作的人。我要求他专注于交叉性——特别是寻找通常被归为一类但具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所以他会召集一个焦点小组，比如说，拉丁裔共和党人、拉丁裔民主党人和拉丁裔独立人士。就像在弗吉尼亚州一样，我们使用了一家市场研究公司来寻找参与者。

结果令人大开眼界，即使对于已经在美国度过了很多时间的人来说也是如此。盖特尔森从路上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实地报告描述了一个接近神经衰弱的国家。

在新奥尔良，在一个西班牙裔独立人士的焦点小组中，他遇到了一个铁杆保守派，他宣称：“我不注册为共和党人，因为我是一个真正的保守派。我可能有一个拉丁裔名字，但我和任何人一样都是美国人！”在桌子的另一端是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秘鲁人，她戴着头巾来参加会议。

当谈话转向枪支时，她告诉那个男人，如果NRA由一个长得像她这样的人领导，他可能会改变对NRA的看法。他的回答很简单：“我就会再去买一把枪。”后来，这位女士离开小组去找一个空房间祈祷，让这位保守的超人目瞪口呆：*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个。我对此有问题，但我不能告诉一个人他们不能祈祷。*

宗教和枪支远非 Gettleson 在路易斯安那州遇到的唯一敏感议题，该州因其极其多样的族裔多样性而成为研究的沃土。移民问题也引发了激烈辩论，其中不少几乎升级为肢体冲突。

一个名叫 Lloyd 的男子，说着 Gettleson 几乎无法理解的卡津口音，在发泄对其教区学校不再教授其母语法语的愤怒时，表达得清晰明了。他对自己的孙女被剥夺学习卡津祖先“文化和传统”机会而感到愤怒。

不到十五分钟，同一个人就开始抱怨拉丁裔，说他们即使在美国也不停止说西班牙语。不知为何，小组中没有人看到这种脱节——Lloyd 可以抱怨西班牙人说西班牙语，但自己却说着令人费解的半法语并为失去自己的传统而哀叹。

种族和族裔引发了其他几个丑陋时刻。在一次焦点小组中，在听到对奥巴马总统的一连串抱怨后，Gettleson 问道：“有人对总统不感到失望吗？”房间里一片寂静，只有一个年轻人打破沉默，他此前表现得极其礼貌和谦恭。

“我不感到失望，”他说。

“为什么？”

“嗯，他是第一位黑人总统，所以我没有期待什么。”

在那个房间里，没人感到意外，但其他焦点小组似乎戳破了党派泡沫。尽管如此，全面的争论并非常态；大多数参与者都努力避免冲突，即使他们明显不同意彼此观点。一个例外发生在阿肯色州史密斯堡，当一张奥巴马的照片促使一位穿着考究的女士说“我去车里拿我的枪”时。一个年轻男子厉声回应：“你他妈的怎么敢！那是我们的总统。连开玩笑都不行。”

在 Gettleson 看来，这位女士百万年来从未考虑过她对总统的看法可能会受到挑战。

美国对枪支的热爱反复出现，甚至在像俄勒冈州波特兰这样的自由派堡垒也是如此，那里一个有纹身的潮人可能会在表达她的进步主义愿望清单时暂停，大声担心奥巴马政府决心夺取她的武器。在为俄勒冈焦点小组买食物时，Gettleson 难以置信地看着司机在跑进 Subway 拿三明治前将他的手枪留在驾驶座上。“我以前从未见过手枪，” Gettleson 后来告诉我。“我在想，车没锁——如果有人看到枪，伸手拿走怎么办？我应该把它收起来吗？似乎有一种枪套——我应该把它放进去吗？如果我意外开火怎么办？我生命中的两分钟，我就坐在那里盯着这把枪，仿佛它是车里的炸弹。”

Cambridge Analytica 接触的许多俄勒冈人都痴迷于大政府和”大环保”。其中一人是俄勒冈州共和党主席 Art Robinson，他多次竞选美国众议院失败并未阻止 Mercer 夫妇支持他的政治抱负。我去位于俄勒冈州 Cave Junction 深林中的他家拜访，发现他即使按另类右翼标准也显得精神错乱。

Robinson 是一位曾与诺贝尔奖得主 Linus Pauling 共事的生物化学家，在实验室外有两个兴趣：管风琴和尿液。他从世界各地的教堂和大教堂中抢救报废的十九世纪管风琴，花费数小时拆解和重新组装它们。

Robinson 还收集数千人的尿液，努力发现疾病和长寿的奥秘。在他的妻子 Laurelee 因未被发现的疾病在43岁时突然去世后，他开始专注于健康和衰老。在他创立并设在家中的俄勒冈科学医学研究所，他通过巨大的光谱仪分析尿液以确定其化学成分。动物——有些死的，有些活的——无处不在。猫、狗、绵羊和马在院子里游荡，而室内，斑马皮和鹿头、水牛头悬挂在墙上。蜘蛛占据了椽子，整个地方散发着未洗动物的气味。那里有几架从旧教堂和大教堂抢救来的完整组装的管风琴。

Robinson 似乎已经失控。他坚持认为气候变化是骗局，认为低剂量的电离辐射对人有益，并警告化学尾迹正在毒害人口。想象一下几年后当他被考虑担任特朗普总统的科学顾问时我的反应。

...

有两种类型的亿万富翁

有两种类型的亿万富翁：那些永远赚不够钱的人和那些在赚够多辈子花费的钱后，将注意力转向改变世界的人。Mercer 属于后者。尽管 Cambridge Analytica 是作为企业创建的，我后来了解到它从未打算赚钱。该公司的唯一目的是蚕食共和党并重塑美国文化。当 CA 成立时，民主党在有效使用数据方面远远领先于共和党。多年来，他们在 VAN 中维护着一个中央数据系统，全国任何民主党竞选活动都可以利用。共和党没有可比较的系统。CA 将缩小这一差距。

默瑟把赢得选举视为一个社会工程问题。“修复社会”的方法是通过创建模拟：如果我们能在计算机内量化社会，优化该系统，然后在计算机外复制这种优化，我们就能按照他的形象重塑美国。除了技术和更宏大的文化战略之外，投资CA是一个巧妙的政治举动。当时，我被告知，因为他支持的是一家私人公司而不是政治行动委员会(PAC)，默瑟不必将他的支持报告为政治捐款。他将获得两全其美的效果：CA将致力于影响选举，但不受管辖美国选举的任何竞选资金限制。他的巨大足迹将保持隐藏。

为建立这个新实体而选择的结构极其复杂，甚至让参与项目的员工感到困惑，他们从不确定自己到底为谁工作。SCL 集团将保持作为一家在特拉华州注册的新美国子公司 Cambridge Analytica 的“母公司”。通过1500万美元的主要投资，默瑟获得了 Cambridge Analytica 90% 的所有权，SCL 获得10%。这种设置是为了让CA能够作为美国公司在美国运营，同时保持SCL的国防部门为“英国”公司。因此，SCL不必向英国国防部或其他政府客户通报新的所有权和默瑟的参与。然而，这家子公司被赋予了SCL工作的知识产权(IP)，创造了一种奇异的情况，即子公司实际上拥有其“母公司”的核心资产。SCL和 Cambridge Analytica 随后签署了排他性协议，Cambridge Analytica 将把所有合同转移给 SCL，SCL 的人员将代表 Cambridge Analytica 进行实际交付和工作。然后，为了允许SCL员工使用它最初给予 Cambridge Analytica 的知识产权，该知识产权又被许可回SCL。

尼克斯最初解释说，这种迷宫般的设置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雷达下运作。默瑟在金融行业的竞争对手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如果他们知道他收购了一家心理战公司，行业中的其他人可能会弄清楚他的下一步行动——开发复杂的趋势预测工具——或者挖走关键员工。我们知道班农想与 Breitbart 合作一个项目，但这原本应该是一个满足他个人迷恋的副业项目。当然，这都是胡说八道，他们想建立一个政治武器库。我甚至不确定默瑟一开始是否知道 Cambridge Analytica 的工具会有多有效。他就像任何初创公司的投资者——向有想法的聪明、有创造力的人投钱，希望它能变成有价值的东西。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的故事是，谁成为了 Cambridge Analytica 最初的虚假信息目标。回到班农和我第一次见面时，他拒绝去 Pall Mall 的私人俱乐部，更喜欢在剑桥见面。尼克斯注意到了这一点，意识到他拉拢客户的常规方式——用高档俱乐部、昂贵的葡萄酒和粗雪茄来打动他们——对班农不起作用，班农认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完全适合剑桥的哥特式大厅和广阔的绿地。所以尼克斯，就像某种神话中的变形者变身来引诱猎物一样，立即决定迎合这一点。

他告诉班农，虽然SCL在伦敦有办公室，但我们主要驻扎在剑桥，因为我们与大学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这完全是谎言，是临时编造的。但对尼克斯来说，真理就是他在那一刻认为真实的任何东西。一旦他说我们有剑桥办公室，他就开始一直提到它，敦促班农顺便过来看看。

“亚历山大，我们没有剑桥办公室，”我对他的疯狂感到恼火，“你他妈在说什么？”

“哦，是的，我们有，只是目前还没有开放，”他说。

在班农下次访问英国前几天，尼克斯让伦敦办公室的员工在剑桥设立了一个假办公室，配备了租来的家具和电脑。在班农预定到达的那天，他说：“好的，各位，我们今天在剑桥办公室工作！”然后我们都收拾东西去那里工作。尼克斯还雇佣了一些临时工和几个穿着暴露的年轻女性来为班农的访问充当这个所谓办公室的员工。

整件事感觉很荒谬。格特尔森和我互相发信息，分享关于波将金村的链接——1783年凯瑟琳大帝访问时，在旧沙俄建立的假俄国城镇来取悦她。我们将这个办公室称为波将金基地，并无情地嘲笑尼克斯想出这样一个愚蠢的想法。但当我和班农在假办公室里走动时——在我在剑桥酒店第一次见到他两个月后——我能看到他眼中的光芒。他相信了，并且非常享受每一刻。幸运的是，他从未注意到一些电脑实际上没有插电，或者一些雇来的女孩不会说英语。

每次班农来访时，尼克斯都会设立波将金基地。班农从未察觉到它是假的。或者如果他察觉到了，他也不介意。它符合愿景。当需要为默瑟家族资助的新实体命名时，班农选择了Cambridge Analytica——因为那是我们的基地所在，他说。所以Cambridge Analytica的第一个目标是班农本人。波将金基地完美地概括了Cambridge Analytica的核心和灵魂，它完善了向人们展示他们想看到的東西的艺术，无论真实与否，以塑造他们的行为——这一策略如此有效，即使像史蒂夫·班农这样的人也能被像亚历山大·尼克斯这样的人愚弄。

第六章

特洛伊木马

“你知道DARPA为他们的一些工作提供资金，”布伦特·克里卡德在从伦敦到剑桥的火车上告诉我。“如果你想扩大你的团队，这些人就是你需要的。”作为SCL的一名心理学家，他往返于公司和剑桥大学心理学实验室的学术工作之间。和我一样，克里卡德也对我们研究可能产生的成果着迷，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乐意为公司提供接触世界顶尖研究心理学家的机会。剑桥大学心理学系在使用社交媒体数据进行心理画像方面取得了几项突破，这反过来引起了政府研究机构的兴趣。剑桥分析公司最终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其命名的大学发表的学术研究。

剑桥分析公司是一家获取大量数据并用其设计和传递有针对性内容的公司，能够大规模地改变公众舆论。然而，如果没有获得目标人群的心理画像，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而事实证明，通过Facebook的宽松监管许可程序，这出人意料地容易获得。这个故事始于我在SCL的早期，在他们创建剑桥分析公司作为美国品牌分支之前。布伦特·克里卡德带我参观了剑桥大学的心理测量中心。读过他和中心同事的许多论文后，我对他们将机器学习与心理测量测试相结合的新颖策略很感兴趣。看起来他们研究的问题与我们在SCL的几乎相同，尽管目的略有不同——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使用社交数据推断个人心理倾向的研究发表在一些心理学顶级学术期刊上，如《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心理科学》和《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等。证据很明确：社交媒体用户的点赞、状态更新、群组、关注和点击模式都是离散的线索，当汇总在一起时能够准确揭示一个人的人格画像。Facebook经常支持这种对其用户的心理研究，并为学术研究人员提供访问其用户私人数据的特权。2012年，Facebook申请了一项美国专利，名为“从社交网络系统通信和特征确定用户人格特征”。Facebook的专利申请解释说，它对心理画像感兴趣是因为“推断的人格特征与用户档案相关联存储，可用于定向、排名、选择产品版本和各种其他目的”。因此，虽然DARPA对心理画像在军事信息作战中的应用感兴趣，但Facebook对使用它来增加在线广告销售感兴趣。

当我们接近唐宁站点大楼时，我看到了一块写着“心理学实验室”的小牌匾。里面空气沉闷，装饰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就没有更新过。我们走上几层楼梯，然后到达狭窄走廊尽头的最后一间办公室，克里卡德在那里向我介绍了亚历山大·科根博士，他是剑桥大学专门研究心理特征计算建模的教授。科根是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男人，穿着和他的举止一样笨拙。他站在房间中央，带着讨好的笑容，房间里堆满了论文和他在香港学习期间的各种装饰品。

起初，我对科根的背景一无所知，因为他说英语时带着完美的美国口音，尽管有夸张的韵律。我后来了解到，他出生在苏联末期的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童年的一部分在莫斯科度过。苏联解体后不久的1991年，他的家人移居美国，在那里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然后在香港完成心理学博士学位，之后加入剑桥大学教师队伍。

克里卡德向我介绍科根，因为他知道科根在剑桥实验室的工作对SCL可能极其有用。但是，了解尼克斯偏好的聚会场所风格，克里卡德决定介绍应该在小食和葡萄酒中进行。尼克斯很挑剔，他可能因为不喜欢某人的领带或餐厅选择而完全否定这个人。所以我们都在克里卡德预订的国王十字车站旁大北方酒店楼上酒吧的桌位会面。科根当天来伦敦拜访，在返回剑桥之前抽时间告诉我们他的工作。尼克斯在晚上外出时喝太多酒很常见，但我从未见过他被除了自己声音之外的其他声音所陶醉。话题是社交媒体。

“Facebook比你生活中的任何其他人都更了解你，甚至比你的妻子还了解，”科根告诉我们。

尼克斯从恍惚中回过神来，回到他平常令人尴尬的自我。“有时候最好妻子不知道某些细节，”他开玩笑说，吸饮着酒。“我为什么需要或想要一台电脑来提醒我——或她？”

“你可能不想要，”教授回答，“但广告商想要。”

当科根在洗手间时，尼克斯嘟囔着说：“他很有趣，但对我来说他听起来不像剑桥人。”尼克斯继续喝着酒。

“因为他不是来自剑桥的，亚历山大。天哪...他只是在那里教书！”

Clickard翻了翻白眼。Nix分散了对更紧迫问题的注意力。公司研究了Kogan的研究后，Nix急于让他投入工作。SCL刚刚获得了Mercer的资助，正在建立一个新的美国实体。但在Nix让Kogan接触他在新重点项目之前，他必须先在他在加勒比海地区证明自己。当时是2014年初，Kogan正在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一个心理画像项目，该项目由俄罗斯政府通过公共研究资助提供资金。Kogan为圣彼得堡的一个团队提供建议，该团队收集大量社交媒体档案数据，并用它来分析网络trolling行为。鉴于这项俄罗斯社交媒体研究专注于适应不良和反社会特征，SCL认为它可以应用于特立尼达项目，因为那里的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有兴趣尝试对特立尼达公民犯罪倾向进行预测建模。

在一封给特立尼达安全部及其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通过[数据]拦截进行犯罪心理画像”的邮件中，一名SCL工作人员说：“我们可能想要纳入或了解更多关于Alex Kogan为俄罗斯人所做的有趣工作，看看它如何/是否适用。”

Kogan最终签约协助SCL的特立尼达项目，他就如何建模一组心理构念提供建议，过往研究已确定这些构念与反社会或偏差行为相关。Kogan希望获得数据以换取帮助规划项目，他开始与SCL讨论访问其130万特立尼达人数据集用于自己的研究。我喜欢Kogan的一点是，他想要快速工作并完成任务，这在习惯了学术生活缓慢节奏的教授中并不常见。他给人的印象是诚实、有野心、坦率，尽管在对想法和智识雄心的兴奋中显得有点天真。

我在开始时与Kogan相处得很好。他与我共同对新兴的计算心理学和计算社会学领域感兴趣。我们会花几个小时讨论行为模拟的前景，当我们讨论SCL时，他明显很兴奋。同时，Kogan有点奇怪，我注意到他的同事在他不在时会对他刻薄的话。但这并不困扰我。如果有什么的话，这让我更能理解他——毕竟，我自己也承受过很多刻薄的评论。此外，在SCL工作你必须有点怪异。

当Kogan在2014年1月加入特立尼达倡议时，我们刚刚与Bannon启动美国项目的早期试验阶段。基于我们的定性研究，我们有一些想要测试的理论，但可用数据不足以进行心理画像。消费者信息——来自航空会员、媒体公司和大卖场等来源——没有产生足够强的信号来预测我们正在探索的心理属性。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例如在沃尔玛购物并不能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推断人口统计或财务属性，但不能推断个性——例如，外向者和内向者都在沃尔玛购物。我们需要的数据集不仅要覆盖美国人口的很大比例，还要包含与心理属性显著相关的数据。我们怀疑需要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其他项目中使用过的那种社交数据，比如点击流或在人口普查记录中观察到的变量类型，Kogan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Kogan从特立尼达开始，但他对SCL在美国的工作更感兴趣。他告诉我，如果他被纳入美国工作，我们可以与他在心理测量中心的团队合作，填补变量和数据类别的空白，以创建更可靠的模型。他开始要求访问我们的一些数据集，看看训练集中可能缺少什么，训练集是用来“训练”模型识别模式的样本数据集。但这并不完全是问题所在。Clickard告诉他，我们已经做了初步建模，有了训练集，但我们需要大规模的数据。我们找不到包含我们知道有助于预测心理特征且覆盖广泛人群的变量的数据集。这正在成为一个主要障碍。Kogan说他可以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只要他也能将数据用于自己的研究。当他说如果他被纳入美国项目，我们可以在剑桥大学建立第一个全球计算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时，我立即支持。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面临的挑战之一是相对缺乏数值数据，因为测

量和量化整个社会的抽象文化或社会动态极其困难。除非你能将每个人的虚拟克隆投入计算机并观察他们的动态。感觉就像我们掌握着解锁研究社会新方式的钥匙。我怎么能拒绝呢？

2014年春天，Kogan将我介绍给心理测量中心的其他几位教授。David Stillwell博士和Michal Kosinski博士正在处理他们从Facebook合法获取的大规模数据集。他们是社交媒体心理画像(social-media-enabled psychological profiling)领域的先驱。2007年，Stillwell建立了一个名为myPersonality的应用程序，为加入该应用的用户提供个性画像。在给用户结果后，该应用会收集用户档案并存储以供研究使用。

这些教授关于Facebook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于2012年，很快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在Kogan介绍我们认识后，Kosinski和Stillwell告诉我他们在多年研究中获得的庞大Facebook数据集。他们说，美国军方研究机构DARPA是他们研究的资助方之一，这使他们非常适合与军事承包商合作。Stillwell在我们的交流中通常比较沉默，但Kosinski显然很有野心，倾向于推动Stillwell继续对话。Kosinski知道这些数据可能极其有价值，但他需要Stillwell同意任何数据传输。

“你们是怎么获得这些数据的？”我问道。

他们告诉我，基本上Facebook就这样让他们获取数据，通过教授们创建的应用程序。Facebook希望人们在其平台上进行研究。它对用户了解得越多，就越能将他们货币化。当他们解释如何收集数据时，很明显Facebook的权限和控制非常宽松。当一个人使用他们的应用时，Stillwell和Kosinski不仅能获得该用户的Facebook数据，还能获得其所有朋友的数据。Facebook不要求应用程序获得明确同意来收集应用用户朋友的数据，因为它认为成为Facebook用户就足以同意获取他们的数据——即使朋友们根本不知道应用程序正在收集他们的私人数据。普通Facebook用户大约有150到300个朋友。我想到了Bannon和Mercer，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喜欢这个想法——而Nix会因为他们喜欢而感到高兴。

“让我搞清楚，”我说，“如果我创建一个Facebook应用，有一千人使用它，我会得到...大约15万个档案？真的吗？Facebook真的让你这样做？”

没错，他们说。如果有几百万人下载这个应用，我们就能获得3亿个档案，减去重复的共同朋友。这将是一个惊人庞大的数据集。到那时为止，我处理过的最大数据集是Trinidad，我认为已经相当大了，有100万人的档案。但这个数据集完全是另一个级别。在其他国家，我们必须获得特殊访问权限或花费数月时间抓取和收集数量级更小的人群数据。

“那你们如何让人们下载这个应用？”我问。

“我们付钱给他们。”

“多少钱？”

“一美元。有时候两美元。”

现在，记住，我们公司口袋里有潜在的2000万美元等待投资。这些教授刚刚告诉我，我可以用...大约100万美元获得数千万Facebook档案。这是显而易见的选择。

我问Stillwell是否可以在他们的数据上运行一些测试。我想看看是否能复制我们在Trinidad的结果，在那里我们可以访问类似类型的互联网浏览数据。如果Facebook档案证明如我希望的那样有价值，我们不仅能够满足Robert Mercer创造强大工具的愿望——更酷的是我们可以将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主流化：计算心理学(computational psychology)。我们站在行为模拟新科学的前沿，对这一前景我充满兴奋。

Facebook于2004年推出，作为连接大学生和同龄人的平台。几年内，该网站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交网络——一个几乎每个人，甚至你的父母，都分享照片、发布无害状态更新和组织聚会的地方。在Facebook上，你可以”点赞”——品牌或话题页面，以及朋友的帖子。点赞的目的是让用户有机会策划自己的形象并关注来自他们喜爱的品牌、乐队或名人的更新。

Facebook认为这种点赞和分享现象是它所称的”社区”的基础。当然，它也认为这是其收入模式的基础，广告商可以使用Facebook数据优化他们的定向投放。该网站还推出了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允许用户在Facebook上加入应用程序，然后摄取他们的档案数据以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

在2010年代初期，研究人员迅速意识到整个人群正在一个地方组织关于自己的数据。Facebook页面包含了在家庭环境中”自然”行为的数据，没有研究人员的指纹印记。每次滚动都被追踪，每个动作都被追踪，每个点赞都被追踪。这一切都在那里——细微差别、兴趣、厌恶——而且都是可量化的。这意味着来自Facebook的数据具有越来越多的生态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因为它不是由研究人员的问题引发的，而研究问题不可避免地会注入某种偏见。换句话说，传统上在人类学或社会学中使用的被动定性观察的许多好处可以保持，但由于许多社会和文化互动现在都被数字数据捕获，我们可以增加在定量研究中实现的可推广性的好处。此前，人们获得此类数据的唯一方法是从银行或电话公司获得，而这些机构受到严格监管以防止获取此类私人信息。但与银行或电信公司不同，社交媒体在获取极其精细的个人数据方面几乎没有法律管制。

尽管许多用户倾向于区分线上发生的事情和现实生活(IRL)中发生的事情，但他们使用社交媒体产生的数据——从对节目季终大结局发表反应到为周六夜晚外出的照片点赞——都是从互联网之外的生活中产生的。换句话说，Facebook数据就是现实生活数据。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在手机和互联网上生活，这种情况只会增加。这意味着，对于分析师来说，通常不需要提问：你只需创建算法来在用户自然产生的数据中找到离散模式。一旦你这样做了，系统本身就可以揭示数据中你原本永远不会注意到的模式。

Facebook用户在一个地方以单一数据形式策划自己。我们不需要连接一百万个数据集；我们不必做复杂的数学计算来填补缺失的数据。信息已经就位，因为每个人都在网站上提供他们的实时自传。如果你要从头创建一个观察和研究人们的系统，你很难做得比Facebook更好。

事实上，Youyou、Kosinski和Stillwell在201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使用Facebook点赞，计算机模型在预测人类行为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有了十个点赞，该模型预测一个人行为的准确度超过了他们的同事之一。有了150个点赞，比家庭成员更准确。有了300个点赞，该模型比他们自己的配偶更了解这个人。这部分是因为朋友、同事、配偶和父母通常只看到你生活的一部分，你的行为会因为那种关系的背景而有所调节。你的父母可能永远不会看到你在凌晨3点的狂欢派对上服用两片MDMA后能有多疯狂，你的朋友可能永远不会看到你在办公室与老板相处时多么保守和恭敬。他们都对你是谁有着略微不同的印象。但Facebook窥视你的关系，在你的手机中跟踪你，并追踪你在互联网上点击和购买的内容。这就是网站数据如何比朋友或家人的判断更能反映你”真正是谁”。在某些方面，计算机模型可以比他们

自己更了解一个人的习惯——这一发现促使研究人员添加了一个警告。他们写道：“计算机在人格判断方面超越人类，在心理评估、营销和隐私领域带来了重大机遇和挑战。”

有了足够的Facebook数据访问权限，终于有可能首次尝试在计算机中模拟社会。其含义令人震惊：理论上，你可以模拟一个未来社会来创造种族紧张或财富差距等问题，并观察它们如何发展。然后你可以回溯并改变输入，以找出如何缓解这些问题。换句话说，你实际上可以开始为现实世界的问题建模解决方案，但是在计算机内部。对我来说，这整个社会即游戏的想法超级史诗。我痴迷于Kogan向我建议的研究所想法，并变得极其渴望以某种方式实现它。这不仅仅是我们的个人痴迷；各地的教授都变得同样热情。在哈佛会议后，Kogan给我发邮件谈论他们的反馈，说：“关键词是改变游戏规则和革命性的社会科学。”起初，似乎Stillwell和Kosinski也很兴奋。然后Kogan无意中向他们透露CA有2000万美元的预算。所有的学术友谊立即停止了。

Kosinski给Kogan发了一封邮件，说他们想要50万美元的预付款，外加使用他们Facebook数据所有“版权”的50%。我们甚至还没有在实地试验中证明这个方案能够大规模运作，他们就已经要求巨额资金。Nix让我拒绝这个要求，这让Kogan恐慌，担心项目还没开始就要破产。所以在我们拒绝Kosinski的现金要求后的第二天，Kogan说他可以按照原来的条件自己完成——他会帮我们获取数据，CA按成本价支付，他可以将数据用于自己的研究。Kogan说他可以访问更多具有Facebook朋友收集权限的应用，可以使用这些应用。我立即保持警惕，认为Kogan可能只是打算暗中使用Stillwell和Kosinski的应用。但Kogan坚持告诉我他建立了自己的应用。“好吧，”我说。“证明给我看。给我一份数据转储。”为了确保这些不是从其他应用中提取的，我们给了Kogan 1万美元来试运行他的新应用和新数据集。他同意了，而且没有要求任何个人报酬，只要他能保留一份数据副本。

虽然他当时从未告诉过我，但Kosinski后来说他打算将Facebook数据许可的资金捐给剑桥大学。然而，剑桥大学也强烈否认参与任何Facebook数据项目，所以不清楚大学是否知道这种潜在的财务安排，或者如果提供资金是否会接受。

接下来的一周，Kogan向SCL发送了数万个Facebook档案，我们做了一些测试来确保数据如我们所希望的一样有价值。结果甚至更好。它包含了数万用户的完整档案——姓名、性别、年龄、位置、状态更新、点赞、朋友——一切。Kogan说他的Facebook应用甚至可以提取私人消息。“好的，”我告诉他。“我们开始吧。”

...

...

当我开始与Kogan合作时

当我开始与Kogan合作时，我们渴望建立一个研究所来存储我们收集的Facebook、点击流和消费者数据，供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数据科学家——任何感兴趣的学者使用。令我在UAL的时尚教授们高兴的是，Kogan甚至让我添加了几个服装风格和美学项目，我可以用于博士研究测试。我们计划去世界各地不同的大学，继续建立数据集，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在社会科学中建模。在哈佛医学院的一些教授建议我们可以访问数百万患者基因档案后，连我都对这个想法如何发展感到惊讶。Kogan告诉我，想象一下一个将人的实时数字行为与他们基因数据库链接起来的数据库的力量。Kogan很兴奋——有了基因数据，我们可以进行强大的实验来解开先天与后天的辩论。我们知道我们正处于重大突破的边缘。

我们通过一个名为Amazon MTurk的微任务网站获得了第一批数据。最初，Amazon建立MTurk作为支持图像识别项目的内部工具。因为公司需要训练算法识别照片，第一步是让人类手动标记它们，这样AI就有一套正确识别的照片来学习。Amazon提供每个标签一便士的报酬，数千人注册来做这项工作。

看到商机后，Amazon在2005年将MTurk作为产品推出，称其为“人工人工智能”。现在其他公司可以付费访问那些在业余时间愿意做微任务的人——比如输入收据扫描件或识别照片——以获得少量报酬。这是人类在做机器的工作，甚至MTurk这个名字也体现了这一点。MTurk是“机械土耳其人”的缩写，这是一个18世纪会下棋的“机器”，曾让观众惊叹，但实际上是一个小人藏在盒子里，通过特制的杠杆操纵棋子。

心理学家和大学研究人员很快发现MTurk是利用大量人群填写性格测试的绝佳方式。研究人员不必费力寻找愿意参加调查的本科生(这从来都无法提供真正有代表性的样本)，他们可以从世界各地吸引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会邀请MTurk成员参加一分钟的测试，支付小额费用。测试结束时，会有一个付款代码，参与者可以在他们的Amazon页面输入，Amazon会将付款转入该人的账户。

Kogan的应用与MTurk协同工作：一个人同意参加测试以换取小额付款。但为了获得报酬，他们必须在Facebook上下载Kogan的应用并输入一个特殊代码。该应用会将调查的所有回答放入一个表格中。然后它会提取用户的所有Facebook数据并放入第二个表格。然后它会提取该人所有Facebook朋友的所有数据并放入另一个表格。

用户需要填写大量的心理测量量表，但总是从一个经过同行评审和国际验证的人格测量工具开始，称为IPIP NEO-PI，它包含数百个项目，如“我与他人保持距离”、“我喜欢听到新想法”和“我不经思考就行动”。当这些回答与Facebook点赞结合时，就可以做出可靠的推断。例如，外向的人更可能喜欢电子音乐，开放性得分更高的人更可能喜欢奇幻电影，而更神经质的人会点赞“我讨厌父母看我的手机”这样的页面。但我们可以推断的不仅仅是人格特征。也许并不意外，在Facebook上喜欢布兰妮·斯皮尔斯、MAC化妆品或Lady Gaga的美国男性更可能是同性恋。尽管单独看每个点赞几乎总是太弱而无法独立预测任何事情，但当这些点赞与数百个其他点赞以及其他选民和消费者数据结合时，就可以做出强有力的预测。一旦分析算法得到训练和验证，它就会被应用到Facebook好友数据库中。虽然我们没有任何好友档案的调查数据，但我们可以访问他们的点赞页面，这意味着算法可以摄取数据并推断如果他们参加调查会如何回答每个问题。

随着项目在夏季的发展，探索了更多的构念(constructs)，Kogan的建议开始与Bannon想要的完全吻合。Kogan概述说我们应该开始检查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公平心态(对他人公平还是怀疑)，以及一个称为“轰动和极端兴趣”的构念，这在法医心理学中越来越多地用于理解偏差行为。这包括“军国主义”(枪支和射击、武术、弩、刀具)、“暴力神秘主义”(毒品、黑魔法、异教)、“智力活动”(唱歌和制作音乐、国外旅行、环境)、“神秘轻信”(超自然现象、飞碟)

和”健康兴趣”（露营、园艺、徒步）。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对星座的信仰”五点量表，办公室里的几个同性恋开玩笑说我们应该把它拆分成”占星兼容性”功能并链接到同性恋约会应用Grindr。

使用Kogan的应用程序，我们不仅获得了训练集，使我们能够创建真正好的算法——因为数据如此丰富、密集和有意义——我们还获得了数百个额外好友档案的额外好处。每次应用安装只需1到2美元。我们完成第一轮收集时还有剩余资金。在管理中，他们总是说运行任何项目都有一个黄金法则：你可以让项目完成得便宜、快速或良好。但问题是你只能选择两个，因为你永远不可能三者兼得。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这个法则完全被打破——因为Kogan创建的Facebook应用程序比我能想象的任何东西都更快、更好、更便宜。

...

...

发布计划定于2014年6月

我记得那时很热：尽管夏天即将到来，Nix仍然关闭空调以降低办公室账单。我们花了几周时间校准一切，确保应用程序正常工作，能够提取正确的数据，并且在将数据注入内部数据库时一切匹配。平均而言，一个人的回答会产生其他三百人的记录。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会有，比如说，几百个我们可以分析的点赞。我们需要组织和跟踪所有这些点赞。在整个Facebook上有多少可能的项目、照片、链接和页面可以点赞？数万亿个。例如，俄克拉荷马州某个随机乐队的Facebook页面在全国可能只有二十八个点赞，但它仍然在特征集中算作自己的点赞。如此规模和复杂性的项目可能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我们花了大量时间测试扩展时处理数据集的最佳方式。一旦我们确信一切都正常工作，就是启动项目的时候了。我们向账户投入100,000美元，开始通过MTurk招募人员，然后等待。

我们站在电脑旁，Kogan在剑桥。Kogan启动了应用程序，有人说“耶”。就这样，我们上线了。

起初，这是历史上最平淡无奇的项目启动。什么都没发生。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过去了，人们开始焦虑地走来走去。“这到底是什么鬼？”Nix吼道。“我们为什么站在这里？”但我知道人们需要一些时间在MTurk上看到调查，填写它，然后安装应用程序获得报酬。在Nix开始抱怨不久后，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命中。

然后洪水来了。我们得到了第一条记录，然后是两条，然后是二十条，然后是一百条，然后是一千条——全部在几秒钟内。Jucikas为记录计数器添加了随机的哔哔声，主要是因为他知道Nix对愚蠢的声音效果有偏好，他发现用花哨的技术陈词滥调给Nix留下深刻印象是多么容易。当数字疯狂增长时，Jucikas的电脑开始发出哔哔声的声音。随着好友档案被添加到数据库中，零的增量不断累积，以指数级速度扩展表格。这对每个人来说都令人兴奋，但对我们中的数据科学家来说，这就像注射了纯肾上腺素。

Jucikas，我们那位潇洒的首席技术官，抓起了一瓶香槟。他总是充满欢声笑语，是聚会的焦点，他确保我们办公室里随时都有一箱香槟来应对这样的场合。他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衰落时期的农场里极度贫困地长大，多年来他将自己重塑为剑桥精英，一个花花公子，他的座右铭似乎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因为明天你可能就会死去。对于Jucikas来说，一切都是极端和过分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为办公室买了一把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古董军刀，现在他打算使用它。为什么要用正常的方式开香槟，当你可以用军刀的时候？

他抓起一瓶Perrier-Jouët Belle Epoque（他的最爱），松开固定软木塞的铁丝笼，将瓶子倾斜，优雅地用军刀沿着瓶身滑下。整个瓶颈干净利落地断开，香槟喷涌而出。我们倒满酒杯，为我们的成功干杯，享受着那晚我们将要喝掉的许多瓶中的第一瓶。Jucikas继续解释说，用军刀开香槟不是关于蛮力；而是关于研究瓶子并用优雅的精确定击中 weakest 的点。正确完成时，这需要很少的压力——你本质上是让瓶子自己破开。你破解了瓶子的设计缺陷。

...

...

当Mercer首次进行投资时，我们以为我们有几年时间来让项目完全运行。但Bannon立即否定了这个想法。“九月份准备好，”他说。当我建议那太快了时，他说，“我不在乎。我们刚刚给了你们数百万，那就是你们的截止日期。想办法解决。”2014年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他希望他现在开始称为Ripon项目——以威斯康星州共和党成立的小镇命名

——能够启动运行。我们中的许多人对Bannon翻白眼，在投资后他变得越来越奇怪。但我们以为我们只需要迎合他的小众政治痴迷，就能实现我们在科学领域创造革命性成果的潜力。我们不断告诉自己，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合理性。

他开始更频繁地前往伦敦，检查我们的进展。其中一次访问恰好是在我们推出应用程序后不久。我们都再次进入了董事会议室，房间前面有巨大的屏幕。Jucikas做了一个简短的演示，然后转向Bannon。

“给我一个名字。”

Bannon看起来有些困惑，给出了一个名字。

“好的。现在给我一个州。”

“我不知道，”他说。“内布拉斯加州。”

Jucikas输入了一个查询，一个链接列表弹出。他点击了在内布拉斯加州众多同名人员中的一个——关于她的一切都在屏幕上显示出来。这是她的照片，这是她工作的地方，这是她的房子。这些是她的孩子，这是他们上学的地方，这是她开的车。她在2012年投票给Mitt Romney，她喜欢Katy Perry，她开奥迪，她有点平庸……等等等等。我们了解关于她的一切——对于许多记录，信息是实时更新的，所以如果她在Facebook上发帖，我们可以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

不仅我们拥有她所有的Facebook数据，我们还将其与我们购买的所有商业和州政府部门数据进行合并。以及从美国人口普查中得出的推算数据。我们有关于她抵押贷款申请的数据，我们知道她赚多少钱，她是否拥有枪支。我们有来自她航空里程计划的信息，所以我们知道她飞行的频率。我们可以看到她是否已婚（她没有）。我们对她的身体健康有所了解。我们有她房子的卫星照片，很容易从Google Earth获得。我们在我们的计算机中重新创建了她的生活。她毫不知情。

“再给我一个，”Jucikas说。他又做了一次。再一次。到第三个档案时，Nix——一直几乎没有注意——突然坐得很直。

“等等，”他说，他的眼睛在黑框眼镜后面睁大。“我们有多少这样的档案？”

“什么鬼？”Bannon插话，对Nix对项目的不参与表现出恼怒的表情。

“我们现在有数千万个，”Jucikas说。“按照这个速度，如果有足够的资金，我们可以在年底达到2亿个。”

“我们真的了解这些人的一切吗？”Nix问。

“是的，”我告诉他。“这就是重点所在。”

灵光一现：这是Nix第一次真正理解我们在做什么。他对“数据”和“算法”之类的东西本来毫无兴趣，但在屏幕上看到真实的人，了解关于他们的一切，抓住了他的想象力。

“我们有他们的电话号码吗？”Nix问。我告诉他我们有。然后，在他偶尔会有的那些奇怪天才时刻之一，他伸手拿起扬声器电话并要了号码。当Jucikas把号码告诉他时，他拨了号码。

响了几声后，有人接听了。我们听到一个女人说“你好？”然后Nix用他最优雅的口音说，“你好，女士。非常抱歉打扰您，但我从剑桥大学打来电话。我们正在进行一项调查。我可以和Jenny Smith女士通话吗？”那个女人确认她就是Jenny，Nix开始根据我们从她的数据中了解的信息向她提问。

“Smith女士，我想知道，您对电视剧《权力的游戏》有什么看法？”Jenny对此赞不绝口——就像她在Facebook上一样。“您在上次选举中投票给Mitt Romney了吗？”Jenny确认她投了。Nix问她的孩子们是否在某某小学上学，Jenny也确认了。当我看向Bannon时，他脸上露出了巨大的笑容。

在Nix与Jenny通完电话后，Bannon说：“让我也来试一个！”我们围坐在房间里，每个人都轮流试了一遍。想到这些人正坐在爱荷华州、俄克拉荷马州或印第安纳州的厨房里，与一群在伦敦的家伙们通话，而我们正在查看他们居住地的卫星图片、家庭照片以及所有个人信息，这种感觉很超现实。回想起来，Bannon——当时还完全默默无闻，距离他作为唐纳德·特朗普顾问而声名狼藉还有一年多时间——坐在我们办公室里给随机的美国人打电话询问个人问题，这简直疯狂。而人们却非常乐意回答他的问题。

我们做到了。我们在计算机中重构了数千万美国人的数据，还有可能获得数亿人的更多数据。这是一个史诗性的时刻。我为我们创造了如此强大的东西而感到自豪。我确信这将是人们几十年来都会谈论的事情。

第七章

黑暗三角

到2014年8月，也就是我们推出应用程序仅两个月后，Cambridge Analytica已经收集了超过8700万用户的完整Facebook账户，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他们很快就用完了MTurk用户列表，不得不聘请另一家公司——Qualtrics，一个位于犹他州的调查平台。几乎立即，CA就成为了他们的顶级客户之一，并开始收到一袋袋印有Qualtrics品牌的小礼品。Jucikas会穿着一件印有“我♥QUALTRICS”的T恤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外面套着他那完美剪裁的萨维尔街西装，每个人都觉得这既有趣又荒谬。CA会收到来自普罗沃的发票，每次为他们“Facebook数据收集项目”中的两万新用户付费。

CA一开始收集这些Facebook数据，Palantir的高管们就开始进行询问。当他们发现团队收集了多少数据——以及Facebook竟然让CA这样做时，他们的兴趣显然被激起了。CA会见的高管们想知道这个项目是如何运作的，很快他们就接触我们的团队，希望自己也能获得这些数据的访问权限。

Palantir仍在为NSA和GCHQ工作。那里的员工告诉CA，与Cambridge Analytica合作可能会开启一个有趣的法律漏洞。在2014年夏天于Palantir英国总部苏荷广场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指出，政府安全机构以及像Palantir这样的承包商无法合法地大规模收集美国公民的个人数据，但是——关键来了——民调公司、社交网络和私人公司却可以。尽管禁止直接监视美国人，但我被告知，美国情报机构仍然能够利用美国个人或公司“自由提供”的美国公民信息。听到这话后，Nix身体前倾说道：“所以你的意思是美国民调公司……像我们这样的。”他咧嘴笑了。我以为没人真的在认真考虑这件事，但我很快意识到我低估了每个人对获取这些数据的兴趣。

Palantir的一些员工意识到，Facebook有潜力成为NSA可以想象的最好的隐蔽监视工具——也就是说，如果这些数据是由另一个实体“自由提供”的话。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对话都是推测性的，不清楚Palantir本身是否真的了解这些讨论的具体内容，或者该公司是否收到了任何CA数据。员工向Nix建议，如果Cambridge Analytica给他们提供收集到的数据访问权限，那么至少在理论上，他们可以合法地将其传递给NSA。在这种情况下，Nix告诉我，我们迫切需要“为了我们民主的防卫”与Palantir的员工达成安排。但当然，这并不是Nix向他们提供数亿美国公民私人数据完全访问权限的真正原因。正如他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所透露的，Nix的梦想是成为“宣传界的Palantir”。

Palantir的一名首席数据科学家开始定期前往Cambridge Analytica办公室，与数据科学团队合作构建用户画像模型。他偶尔会有同事陪同，但整个安排对CA的其他团队——也许包括Palantir本身——都是保密的。我无法推测原因，但Palantir员工获得了Cambridge Analytica数据库登录权限和带有相当明显假名的邮箱，比如“Freddie Mac博士”（以在2008年住房危机中被联邦政府救助的抵押贷款公司命名）。我确实知道，在Palantir数据科学家开始构建他们自己的Facebook数据收集应用程序和爬虫后，Nix要求他们在下班后继续工作，开发能够复制Kogan所获得的Facebook数据的应用程序——而不需要Kogan。不再仅仅是Facebook应用程序被使用。Cambridge Analytica开始测试看起来无害的浏览器扩展程序，如计算器和日历，这些程序可以访问用户的Facebook会话cookie，进而允许公司以目标用户身份登录Facebook来收集其数据以及其朋友的数据。这些扩展程序都被提交到几个流行网络浏览器的独立审查流程中——并获得了批准。

目前还不清楚这些Palantir高管是“正式”还是“非正式”访问CA的，Palantir后来声称只是一名员工以“个人身份”在CA工作。坦白说，在这一点上我真的不知道该相信谁或什么。正如他在非洲项目中经常对承包商做的那样，Nix会带着装满美元现金的袋子到办公室，用现金支付承包商。当承包商工作时，Nix会坐在桌前翻动着绿色钞票，将它们数成小堆，每堆价值数千美元。有时承包商每周会收到数万美元。

多年前，Nix被英国外国情报部门军情六处(MI6)拒绝了。他经常拿这件事开玩笑，说这是因为他不够乏味，无法融入人群，但这次拒绝显然刺痛了他。现在他几乎不在乎谁能接触到CA的数据；他会向任何人展示，只是为了听到别人说他有多了不起。

...

...

到2014年春末，Mercer的投资引发了一轮心理学家、数据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招聘热潮。Nix引入了一个新的管理团队来组织快速增长的研究业务。虽然我仍然是名义上的研究总监，但新的运营经理现在被赋予了对这个快速增长项目的直接监督和规划控制权。新项目似乎每天都在涌现，有时不清楚项目是如何或为什么被批准进入实地阶段的。我向Nix抱怨说我已经搞不清楚谁在做什么，但他没有看到问题所在。Nix根本看不到威望和金钱之外的东西。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会很感激被给予更少的责任和工作，但仍然被允许保留他们的头衔。

在这一点上，我确实开始对一切感到奇怪，但每当我与公司里的其他人交谈时，我们都设法让彼此冷静下来，并将一切合理化。Nix会谈论一些可疑的事情，但那就是他的性格，没有人认真对待他。在Mercer安插了Bannon之后，我忽视或解释掉了一些事情，事后看来，这些都是明显的危险信号。Bannon有他的“小众”政治兴趣，但Mercer似乎是一个太严肃的人物，不会沉溺于Bannon的低俗政治闹剧。我们的工作有可能使Mercer的金融利益受益，这作为他为什么会在如此高度投机的事情上花费所有这些钱的解释，更有意义。Mercer在公司获得任何数据或在美国构建任何软件之前，就给了CA数千万美元。从任何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一项高风险的种子资本投资。但CA也知道Mercer既不愚蠢也不鲁莽，他会仔细计算风险。当时，团队中的许多人简单地认为，为了证明在我们的想法上承担如此高的财务风险是合理的，Mercer必须预期这项研究有机会在他的对冲基金中赚大钱。换句话说，公司不是为了建立另类右翼叛乱而存在的，它是为了帮助Mercer赚钱而存在的，Nix对金钱的明显热爱强化了每个人的假设。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些都没有发生。除了说我当时比自己想象的更天真之外，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尽管就我的年龄而言我有很多经验，但我只有二十四岁，显然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当我加入SCL时，我是为了帮助公司探索反激进化等领域，以帮助英国、美国及其盟友抵御网络上出现的新威胁。我开始习惯这个工作领域的不寻常环境，这使许多对普通观察者来说很奇怪的事情正常化了。信息操作不是你平均的朝九晚五办公室工作，你遇到的人或情况都有点奇怪。每当有人询问在遥远国家进行秘密项目的伦理问题时，他们会因为对世界其他地方“真正的运作方式”的天真而被嘲笑。

这是我第一次被允许在没有琐碎内部政治约束或人们仅仅因为从未尝试过就排斥想法的情况下探索想法。尽管Nix是个混蛋，但他确实给了我很多尝试新想法的自由度。Kogan加入后，剑桥大学的教授们不断对该项目在推进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可能具有的突破性潜力大加赞赏，这让我感觉自己在执行一项使命。如果哈佛或斯坦福等大学的同事们也对我们的工作感兴趣，我认为我们肯定掌握了什么。Kogan提出的研究所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想法，我看到为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解锁这些数据如何能为如此多的领域贡献如此多的价值。虽然这听起来可能很老套，但我真的觉得我在做一些重要的事情——不仅仅是为了Mercer或公司，而是为了科学。然而，我让这种感觉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以至于允许自己为不可原谅的事情找借口。我告诉自己，真正了解社会包括深入研究关于我们阴暗面的不舒服问题。如果我们不探索种族偏见、威权主义或厌女症，我们怎么能理解它们呢？我没有意识到的是探索某事和实际创造它之间的微妙界限。

班农已经控制了这家公司，他是一个雄心勃勃且出人意料地老练的文化战士。他认为民主党的身份政治，专注于种族或族裔选民群体，实际上不如共和党的身份政治强大，共和党人经常坚持认为美国身份超越了肤色、宗教偏好或

性别。住在拖车公园里的白人男性不会认为自己是特权阶层的一员，尽管其他人可能仅仅因为他是白人就这样看待他。每个人的内心都包含着多重身份。而班农的新工作就是要弄清楚如何相应地针对人们进行定位。

我告诉班农，CA注意到的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有多少美国人感到压抑——不仅仅是同性恋者。这首先在焦点小组中出现，后来通过在线小组进行的定量研究得到证实。异性恋白人男性，特别是年龄较大的男性，在成长过程中拥有一套价值观，这套价值观赋予了他们某些社会特权。异性恋白人男性不必在女性或有色人种面前节制自己的言论，因为随意的种族主义和厌女症是被正常化的行为。随着美国社会规范的演变，这些特权开始被侵蚀，许多这样的男性第一次经历了对其行为的挑战。在工作场所，与女秘书“随意调情”现在会危及你的工作，谈论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暴徒”可能会让你被同龄人排斥。这些遭遇对他们作为“普通男人”的身份认同往往是不舒服和威胁性的。

那些不习惯节制自己冲动、肢体语言和言论的男性开始怨恨他们所认为的不公平的心理和情感劳动，这种劳动需要他们改变并不断纠正自己在公共场合的表现方式。我发现有趣的是，这些愤怒的异性恋男性群体中出现的话语与同性恋社区的解放话语是多么相似。这些男性开始体验到柜子的负担，他们不喜欢为了在社会中“通过”而必须改变自己感觉中的自我的感觉。尽管同性恋者的隐瞒和种族主义者、厌女症者的隐瞒有着非常不同的原因，但这些异性恋白人男性在自己的内心中仍然感受到了一种主观的压迫体验。他们准备走出柜子，回到美国对他们来说曾经伟大的时代。

“想想看，”我对班农说。“Tea Party集会上的信息与Gay Pride游行上的信息是一样的：不要践踏我！让我做我自己！”愤怒的保守派感觉他们不能再做“真正的男人”了，因为女性不会和那些表现得像几千年来男性一直表现的那样的男性约会。他们必须隐藏真实的自我来取悦社会——他们对此很愤怒。在他们看来，女权主义把“真正的男人”锁在了柜子里。这是羞辱性的，班农知道没有什么力量比被羞辱的男人更强大。这是一种他渴望探索（和利用）的心理状态。

在Cambridge Analytica成立时刚刚兴起的incel社区，就是他心中想到的那种群体。Incels，或“非自愿独身者”，是那些感到被社会——特别是女性——忽视和责备的男性，这个社会不再重视普通男性。作为男权运动的一个分支，incel社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推动的，这种不平等剥夺了年轻的千禧一代男性获得其父辈曾经拥有的那种高薪工作的机会。这种经济剥夺与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中男性越来越难以达到的身体形象标准相结合（没有像女性那样得到对男性身体问题或性别压力的同等公众认知），以及在越来越多地由快速浏览照片左滑或右滑定义的约会场景中对外貌越来越重要的重视。随着女性在经济上变得更加独立，她们可以对伴侣更加挑剔。缺乏好看的外表和体面的薪水，“普通男性”面临着不断被浪漫拒绝的残酷现实。

这些男性中的一些人开始在4chan等论坛上聚集，这个论坛发展成为一个memes、奇怪的幻想粉丝群、小众色情、流行文化以及在日益原子化社会中受挫青年的反文化反应的资料库。在2010年代初期，那些接受孤独生活的年轻男性开始进行虚无主义讨论。一套新的词汇出现来描述他们的处境，包括“betas”（低等男性）、“alphas”（优等男性）、“vocels”（自愿独身者）、MGTOW（Men Going Their Own Way，远离女性的男性）、“incels”（非自愿独身者）和“robots”（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incels）。

尽管作为异性恋白人男性被赋予了特权，这些群体缺乏身份认同、方向和自我价值感，抓住任何能灌输归属感和团结感的东西。将自己定义为社会的“beta”男性，许多incels会谈论接受“黑药丸”——这是与他们认为的关于性和浪漫吸引力的某些固有真理的清算时刻。论坛会包括诸如“自杀燃料”之类的话题，这些是他们日常生活中被拒绝的例子，加强了他们的绝望和丑陋感。对许多incels来说，这种愤怒的绝望已经演变成极端的厌女症。

黑药丸理论(black pill)的教条是悲观而僵化的，声称只有外貌对女性重要，而某些特征，包括种族，构成了性吸引力的等级制度。Incels会分享图表和观察结果，表明白人男性具有天生优势，因为所有种族的女性都会接受白人伴侣，而亚洲男性则处于强烈的劣势地位。肥胖、贫穷、年老、残疾或有色人种都是美国最不受欢迎的群体成员。非白人incels会使用“JBW”——“只要是白人”——这样的术语来试图解释或减轻他们认为的天生种族劣势。令人惊讶的

是，他们公开承认白人特权，但incel话语会将这种特权框定为白人男性天生种族优越性的一部分，至少在性选择的背景下是如此。

持续的笑话和梗图会被分享，内容是关于抵抗他们的终身刑罚，发动Beta叛乱或Beta起义，为beta男争取性的重新分配。但这种奇怪幽默背后潜藏着被拒绝生活的愤怒。在浏览这些受害者叙述时，我的思绪回到了极端圣战主义者招募媒体的叙述，同样天真地浪漫化被压迫的男性打破空虚社会的枷锁，将自己转变为光荣的反叛英雄。同样，这些incels变态地被社会“赢家”所吸引，比如唐纳德·特朗普和米洛·亮诺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在他们扭曲的观点中，这些人代表了同样残暴对待他们的超竞争alpha男性的缩影，来领导这场冲锋。这些愤怒的年轻人中有许多准备将社会烧成灰烬。班农试图通过布赖特巴特新闻网为他们提供出口，但他的野心并不止于此。他将这些年轻人视为他未来叛乱中的早期新兵。

当剑桥分析公司于2014年夏天成立时，班农的目标是通过改变文化来改变政治；Facebook数据、算法和叙述是他的武器。首先，我们使用焦点小组和定性观察来解读特定人群的认知，了解人们关心什么——任期限制、深层政府(deep state)、抽干沼泽、枪支，以及阻止移民的墙的概念，这些都在2014年进行了探索，比特朗普竞选活动早了几年。然后我们提出了如何影响观点的假设。CA通过在线小组或实验对目标群体测试这些假设，看看它们是否按照团队基于数据的预期表现。我们还获取了Facebook个人资料，寻找模式以构建神经网络算法，帮助我们做出预测。

少数人表现出自恋(极端自我中心)、马基雅维利主义(ruthless self-interest)和精神病态(情感冷漠)的特征。与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的大五人格特征——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和神经质——作为正常心理学的一部分不同，这些“黑暗三联征”(dark triad)特征是适应不良的，意味着表现出这些特征的人通常更容易出现反社会行为，包括犯罪行为。从CA收集的数据中，团队能够识别出表现出神经质和黑暗三联征特征的人，以及那些比普通公民更容易冲动愤怒或阴谋思维的人。剑桥分析公司会针对他们，通过Facebook群组、广告或文章引入叙述，该公司从内部测试中知道这些内容可能会激怒具有这些特征的极少数人群。CA想要挑衅人们，让他们参与进来。

剑桥分析公司这样做是因为当时Facebook算法的一个特定功能。当有人关注沃尔玛或某个黄金时段情景喜剧等通用品牌页面时，他的新闻推送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但点赞极端群体，如骄傲男孩(Proud Boys)或Incel解放军(Incel Liberation Army)，会将用户标记为与其他人不同，推荐引擎会优先考虑这些主题进行个性化。这意味着网站的算法会开始向用户推送类似的故事和页面——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增加参与度。对Facebook来说，不断上升的参与度是唯一重要的指标，因为更多的参与度意味着更多的屏幕时间来接触广告。

这是硅谷备受赞誉的“用户参与度”指标的阴暗面。通过如此重视更高的参与度，社交媒体往往会寄生于我们大脑的适应性机制。事实上，社交媒体上最吸引人的内容往往是可怕或令人愤怒的。根据进化心理学家的说法，为了在前现代时代生存，人类对潜在威胁发展出了不成比例的注意力。我们本能地更多关注地上腐烂尸体的血腥和恐怖，而不是惊叹于上方美丽的天空，原因是前者帮助我们生存。换句话说，我们进化出了对潜在威胁的敏锐关注。你无法从可怕视频中移开视线是有充分理由的：你是人类。

社交媒体平台还使用激活我们大脑中“游戏循环”和“变量强化时间表”的设计。这些是频繁但不规律奖励的模式，会产生期待感，但最终奖励太过不可预测和短暂，无法围绕其进行规划。这建立了一个不确定性、期待和反馈的自我强化循环。老虎机的随机性阻止玩家制定策略或计划，所以获得奖励的唯一方法就是继续游戏。奖励被设计得刚好足够频繁，在连败后重新吸引你并让你继续下去。在赌博中，赌场从玩家游戏的次数中赚钱。在社交媒体上，平台从用户点击的次数中赚钱。这就是为什么新闻流有无限滚动的原因——用户无休止地滑动寻找更多内容与赌徒一遍又一遍地拉老虎机杠杆之间几乎没有区别。

...

2014年夏天，剑桥分析开始在Facebook和其他平台上开发虚假页面，这些页面看起来像真正的论坛、群组 and 新闻来源。这是剑桥分析的母公司SCL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反叛乱行动中使用的极其常见的策略。目前尚不清楚公司内部究竟是谁下达了建立这些虚假信息操作的最终命令，但对于许多在世界各地项目上工作多年的老员工来说，这一切似乎都不寻常。他们只是以对待巴基斯坦或也门人口的完全相同方式来对待美国人口，为美国或英国客户执行项目。该公司在地方层面做到了这一点，创建了具有模糊名称的右翼页面，如史密斯县爱国者或我爱我的国家。由于Facebook推荐算法的工作方式，这些页面会出现在已经喜欢类似内容的人的动态中。当用户加入CA的虚假群组时，它会发布进一步激怒和煽动他们的视频和文章。对话会在群组页面上激烈进行，人们会对某些事情是多么糟糕或不公平表示同情。CA打破了社会障碍，培养了跨群体的关系。与此同时，它一直在测试和完善信息，以实现最大参与度。

现在CA拥有了(1)自我认同为极端群体一部分，(2)是受众，(3)可以用数据操纵的用户。关于剑桥分析的许多报道给人的印象是每个人都被锁定了。实际上，被锁定的人并不多。CA不需要创建大的目标群体，因为大多数选举都是零和游戏：如果你比其他人多得到一票，你就赢得了选举。剑桥分析只需要感染一小部分人群，然后它就可以观察叙述的传播。

一旦一个群体达到一定数量的成员，CA就会设立一个实体活动。CA团队会选择小场所——咖啡店或酒吧——让人群感觉更大。假设你在Facebook上有一千人的群组，这在Facebook术语中是适中的。即使只有一小部分人出现，那仍然是几十个人。四十人的群体在当地咖啡店是一个巨大的人群。人们会出现并发现愤怒和偏执的团契。这自然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巨大运动的一部分，并允许他们进一步滋养彼此的偏执和阴谋恐惧。有时剑桥分析的工作人员会充当“同伙”——这是军队常用来激起目标群体焦虑的策略。但大多数时候，这些情况会自然展开。受邀者是根据他们的特征选择的，所以剑桥分析大致知道他们会如何彼此反应。会议在美国各县举行，从早期的共和党初选州开始，人们会对他们所看到的“我们对他们”越来越激动。从他们深夜独自坐在卧室里点击链接的数字幻想开始，正在成为他们的新现实。叙述就在他们面前，与他们交谈，活生生的现实。无论它是否真实不再重要；感觉真实就足够了。

剑桥分析最终成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其他国家使用的策略的数字化、规模化和自动化版本。当我刚开始在SCL工作时，该公司一直在一个南美国家进行反毒品项目。该策略部分是识别目标，从内部破坏毒品组织。该公司首先要做的是找到最容易摘到的果实，意思是其心理学家认为更可能变得更加不大理和偏执的人。然后该公司会向他们提出想法：“老板们在偷你的钱”或“他们会让你背黑锅”。目标是让他们反对组织，有时，如果一个人听到某件事足够多次，他们就会开始相信它。

一旦这些最初的个人充分接触到这些新的叙述，就是让他们相互见面的时候了，这样他们就可以形成一个可以组织起来的群体。他们会分享谣言，让彼此陷入更深的偏执狂。这时你引入下一层：那些对谣言的初始抵抗力开始减弱的人。这就是你如何逐渐从内部破坏一个组织的稳定。CA想要对美国做同样的事情，使用社交媒体作为先锋。一旦基于县的群体开始自我组织，你就将他们介绍给邻近县的类似群体。然后你再次这样做。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已经创建了一个由神经质、阴谋论公民组成的全州运动。另类右翼。

内部测试还显示，CA试行的数字和社交广告内容在获得在线参与度方面是有效的。那些在网上被测试广告定向的人，他们的社交档案与他们的投票记录相匹配，所以公司知道他们的姓名和“现实世界”身份。然后公司开始使用这些广告的参与率数据来探索对选民投票率的潜在影响。一份内部备忘录强调了一项涉及在前两次选举中没有投票的注册选民的实验结果。CA估计，如果只有25%的不经常投票但开始点击这些新CA内容的选民最终出来投票，他们可以在几个关键州将共和党的全州投票率提高约1%，这通常是激烈竞选中的胜负差距。史蒂夫·班农很喜欢这个。但他希望CA走得更远——也更黑暗。他想测试美国心理的可塑性。他敦促我们在研究中包含实际上带有种族偏见的问题，看看我们能将人们推到多远。公司开始测试关于黑人的问题——例如，他们是否有能力在没有白人帮助的情况下在美国取得成功，或者他们是否在基因上注定要失败。班农认为民权运动限制了美国的“自由思考”。他决心通过揭示他所认为的关于种族的禁忌真相来解放人们。

班农怀疑有大批美国人因为害怕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而感到沉默。Cambridge Analytica的发现证实了他的怀疑：美国充满了因害怕社会排斥而保持沉默的种族主义者。但班农不仅仅专注于他新兴的另类右翼运动；他也想到了民主党人。

虽然“典型的民主党人”在支持少数族裔方面说得很好听，但班农发现了一种潜在的家长式作风，这背叛了他们声称的觉醒。他觉得这个党充满了“豪华轿车自由主义者”——这个词在1969年纽约市长竞选中被创造出来，并立即被民粹主义者抓住来贬低做好事 of 的民主党人。这些是支持校车接送但把自己孩子送到以白人为主的私立学校的白人民主党人，或者声称关心内城但住在封闭社区的人。“民主党总是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黑人，”班农在一次电话中说。“他们把他们放在住房项目里...给他们福利...平权行动...派白人孩子去非洲分发食物。但民主党总是害怕问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些人需要这么多照顾？”

他的意思是白人民主党人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暴露了他们对少数族裔的偏见。他认为，尽管这些民主党人认为他们喜欢非裔美国人，但他们并不尊重非裔美国人，许多民主政策源于一种隐含的承认，即那些人无法自助。演讲撰稿人迈克尔·格森在1999年为当时的总统候选人乔治·W·布什创造了一个完美概括这一想法的短语：“低期望的软性偏见”。根据这一论点，民主党人是扶持者，是不良行为和糟糕测试结果的推动者，因为他们实际上并不相信少数族裔学生能够像非少数族裔同龄人一样表现出色。

班农对这一想法有更严厉、更激进的看法：他认为民主党人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利用美国少数族裔。他确信民权运动后出现的社会契约——民主党人从非裔美国人的选票中受益以换取政府援助——并非出于任何道德觉悟，而是出于精明的算计。在他的框架中，民主党人为这种社会契约的不便真相进行辩护的唯一方式是通过政治正确。当“理性主义者”谈论这种“种族现实”时，民主党人让他们承受社会羞耻。

“种族现实主义”是对古老的套路和理论的最新包装，这些理论认为某些族群在基因上优于其他族群。例如，种族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黑人在标准化测试中得分较低，不是因为测试有偏向性，也不是因为黑人必须克服的长期压迫和偏见历史，而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比美国白人智力低下。这是一个伪科学概念，被白人至上主义者所接受，源于几个世纪以来的“科学种族主义”，这种观念是人类历史上诸多灾难的基础，包括奴隶制、种族隔离和大屠杀。由班农和Breitbart领导的另类右翼将种族现实主义采纳为基石哲学。

如果班农要在解放他的“自由思想家”的探索中取得成功，他需要一种方法来让人们免受政治正确性的影响。剑桥分析开始研究的不仅仅是公开的种族主义，还有种族主义的许多其他表现形式。当我们思考种族主义时，我们经常

想到的是公开的仇恨。但种族主义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持续存在。种族主义可能是回避性的，即一个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避免某个种族群体（例如，封闭式社区、性和浪漫关系的回避等），种族主义也可能是象征性的，即一个人对某个种族群体持有负面评价（例如，刻板印象、双重标准等）。然而，由于“种族主义”这个标签在现代美国可能带有如此强烈的社会污名，我们发现白人经常忽视或低估他们内化的偏见，并对任何暗示他们持有此类信念的推论反应强烈。

这就是所谓的“白人脆弱性”：北美社会的白人享受着与种族劣势隔绝的环境，这培养了白人对种族舒适的期望，同时降低了他们承受种族压力的能力。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白人脆弱性阻止人们面对他们潜在的偏见。这种认知失调也意味着受试者经常会放大他们表达对少数群体积极态度的回应，以满足他们“不是种族主义者”的自我概念。例如，当向他们展示一系列带有照片的假想传记时，一些在先前隐性种族偏见测试中得分较高的受访者会给少数群体传记的评分高于相同的白人传记。看到了吗？我给黑人打了更高的分，因为我不是种族主义者。

这种认知失调创造了一个机会：许多受访者对自己种族主义的反应不是出于对他们可能如何助长结构性压迫的担忧，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社会地位。对班农来说，这足以让他相信他关于民主党人的理论是正确的——他们只是对少数群体说空话，但内心深处他们和美国其他任何人一样种族主义。区别在于谁生活在什么“现实”中。

...

班农设想了一个工具来帮助白人种族主义者克服这一切，成为解放的“自由思想家”。2005年，当班农开始在总部位于香港的游戏公司IGE工作时，该公司雇佣了一个由低薪中国游戏玩家组成的工厂来玩魔兽世界以赢得游戏中的物品。IGE不是通过游戏界面进行交易或出售（这是被允许的），而是将这些数字资产出售给西方玩家以获取利润。这种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被其他玩家视为作弊，随后该公司面临民事诉讼和网上抵制。这可能是班农早期接触网络社区愤怒的经历；据报道，一些评论是“反华的恶毒言论”。班农成为Reddit和4chan的常规读者，开始看到人们在网上匿名时流露出的隐藏愤怒。对他来说，他们揭示了真实的自己，不受“政治正确性”的过滤，而这种政治正确性阻止他们在公共场合说出这些“真相”。正是通过阅读这些论坛的过程，班农意识到他可以利用它们以及它们匿名的怨恨和骚扰群体。

这在2014年夏末的玩家门事件后尤其如此，就在班农被介绍给SCL之前不久。在许多方面，玩家门为班农的另类右翼运动创造了一个概念框架，因为他知道存在一个由数百万激烈愤怒的年轻男性组成的潜流。网络钓鱼和网络霸凌成为另类右翼的关键工具。但班农走得更深，让剑桥分析扩大和部署了许多家庭虐待者和霸凌者用来削弱受害者压力恢复力的相同策略。班农将CA转变为自动霸凌和规模化心理虐待的工具。该公司通过识别一系列认知偏见开始了这一旅程，它假设这些偏见会与潜在的种族偏见相互作用。在许多实验过程中，我们调制了一系列心理工具，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博客、群组 and 论坛系统地部署。

班农对我们团队的第一个要求是研究谁感到受到政治正确性的压迫。剑桥分析发现，由于人们经常高估别人对他们的关注程度，突出社交不适情况是引发目标群体偏见的有效启动方式，比如因为读错外国名字而惹上麻烦的时候。该公司测试的最有效信息之一是让受试者“想象一个你无法念出任何人名字的美国”。受试者会看到一系列不常见的名字，然后被问及，“这个名字有多难念？你能回想起有人因为念错种族名字而被嘲笑的时候吗？有些人是否利用政治正确性让别人感到愚蠢或获得优势？”

人们对“自由派”正在寻求新方式来嘲笑和羞辱他们的观念反应强烈，同时也对政治正确性是一种迫害手段的想法反应激烈。Cambridge Analytica的一个有效技术是向受试者展示嘲笑像他们一样的白人的博客，比如沃尔玛人群。班农多年来一直在观察4chan和Reddit等地方的在线社区，他知道愤怒的年轻白人男性亚群体多么频繁地分享“自由派

精英”嘲笑”普通”美国人的内容。一直以来都有出版物戏仿飞越州的”乡巴佬”，但社交媒体代表了一个非凡的机会，让”普通”美国人的鼻子撞上沿海精英的势力。

Cambridge Analytica开始使用这些内容来触及关于种族竞争注意力和资源的隐含信念——种族关系是一个零和游戏。他们拿得越多，你拥有的就越少，而且他们使用政治正确性，所以你无法发声反对。将政治正确性框定为身份威胁在人们身上催化了一种”回旋镖”效应，反叙述实际上会加强而不是削弱先前的偏见或信念。这意味着当目标看到包含对候选人或名人种族主义言论批评的片段时，这种暴露会进一步巩固目标的种族化观点，而不是让他们质疑这些信念。通过这种方式，如果你能在暴露于反叙述之前通过身份的视角框定种族化观点，那么反叙述就会被解释为对身份的攻击。对班农如此有用的是，它实际上让目标群体对批评种族民族主义的反叙述产生了免疫力。它创造了一个邪恶的强化循环，其中群体在受到批评时会加强他们的种族化观点。这可能部分是因为当我们处理强烈持有的信念时最高度激活的大脑区域与我们思考自己是谁和我们的身份时涉及的区域相同。后来，当唐纳德·特朗普因种族主义或厌女症言论在媒体上受到激烈批评时，这些批评可能产生了类似的效果，对特朗普的批评加强了支持者的决心，他们会将批评内化为对其身份的威胁。

通过以这种方式让人们愤怒，CA遵循了相当广泛的研究语料库，显示愤怒会干扰信息寻求。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可能在愤怒中”匆忙下结论”，即使后来他们后悔自己的决定。在一个实验中，CA会向在线小组的人们展示关于无争议事物的简单条形图图片（例如，手机使用率或某种汽车类型的销售），大多数人能够正确阅读图表。然而，受访者不知道的是，这些图表背后的数据实际上来自政治争议话题，如收入不平等、气候变化或枪支暴力死亡。当相同图表的标签后来被切换到它们实际的争议话题时，被身份威胁激怒的受访者更可能误读他们之前理解的重新标记的图表。

CA观察到的是，当受访者愤怒时，他们对完整和理性解释的需求也显著降低。特别是，愤怒让人们处于一种更加不加区别地惩罚的心理框架中，特别是对外群体。他们也会低估负面结果的风险。这使CA发现，即使与中国或墨西哥的假设贸易战意味着美国就业和利润的损失，如果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使用贸易战来惩罚移民群体和城市自由派，被愤怒驱动的人们会容忍那种国内经济损失。

班农确信，如果你向人们展示政治正确性”真正意味着什么”，他们会醒悟到真相。所以Cambridge Analytica开始询问受试者，他们的女儿嫁给墨西哥移民的想法是否让他们感到不舒服。对于否认这种想法让他们不舒服的受试者，然后会有一个提示：“你感觉你必须那样说吗？”受试者会被允许改变他们的答案，许多人确实改变了。在收集Facebook数据后，CA开始探索通过提取白人男性女儿的照片来进一步推进这一点的方法，以便将它们与黑人男性的照片配对——向白人男性展示政治正确性”真正看起来像什么”。

Cambridge Analytica的研究小组还发现目标态度与称为公正世界假设(JWH)的心理效应之间存在关系。这是一种认知偏见，一些人依赖于公平世界的假设：世界是一个公平的地方，坏事”有原因地发生”或将被宇宙中某种”道德平衡”所抵消。我们发现表现出JWH偏见的人，例如，在性侵犯的假设情景中更倾向于指责受害者。如果世界是公平的，那么随机的坏事不应该发生在无辜的人身上，因此受害者的行为中必须有过错。找到指责受害者的方法对一些人来说在心理上是预防性的，因为它帮助他们应对由不可控制的环境威胁引起的焦虑，同时保持一种安慰性的观点，即世界对他们仍然是公平的。

剑桥分析发现JWH与许多态度相关，但它与种族偏见有着特殊的关系。表现出JWH的人更容易同意这样的观点：少数族裔应该为种族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承担责任。换句话说，黑人有这么长时间来为自己取得成就，但他们却没有可以展示的。也许认为少数族裔无法创造自己的成功并不是种族主义的，研究对象被告知——也许这只是现实主义的。

CA随后发现，对于那些特别持有福音派世界观的人来说，“公正世界”的存在是因为上帝会奖励那些遵循他的规则的人获得成功。换句话说，过着美好生活的人不会患上既往疾病，他们会在生活中取得成功，即使他们是黑人。剑

桥分析开始向这些群体提供具有扩展宗教意义的叙述。“上帝是公平和公正的，对吧？富人受到上帝的祝福是有原因的，对吧？因为他是公平的。如果少数族裔抱怨得到的较少，也许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是公平的。或者你敢质疑上帝吗？”

这给了CA一种方式来培养对“他者”更严厉的观点。如果世界是公平的，由公正的上帝统治，那么难民受苦是有原因的。随着时间推移，研究对象会越来越忽视美国法律下有效难民申请的例子，转而关注申请人应该如何以及为什么受到惩罚。在某些情况下，难民申请越有力，反应越严厉。目标人群越来越不关心假设的难民，而更关心维持其世界观的一致性。如果你强烈投入于世界是公正的这一观念，相反的证据会让人感到深深的威胁。

对于班农的自由思想家来说，种族现实不仅正在成为他们的现实，也正在成为上帝的现实——这种联系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奴隶第一次被带到美国时起，传教士就从《以弗所书》中引用来为这种做法辩护，引用“仆人，要顺服你们的主人”这一句话作为拥有奴隶是神圣的证据。在十九世纪初，圣公会主教斯蒂芬·埃利奥特暗示那些希望结束奴隶制的人表现得不敬神。他写道，他们应该“考虑是否通过干预这一制度，他们可能没有在阻止和妨碍一项明显是天意的工作”，因为数百万“半野蛮人”已经“学会了通往天堂的道路，并且...通过非洲奴隶制的方式认识了他们的救世主！”“在内战后的南方，各州颁布了”黑人法典”，限制了黑人公民新获得的自由。在孟菲斯和新奥尔良等城市，白人政治家和市政官员利用恐惧贩卖来挑起血腥骚乱，夺去了数十名黑人的生命。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颁布的吉姆·克劳法确保在未来几十年里，种族在公共场所保持隔离。人头税使南方许多黑人几乎无法投票。而在内战后几乎消失的三K党在二十世纪初重新兴起，部分原因是将自己包装为全国爱国组织。

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投票权法案》代表了美国黑人权利的巨大飞跃。这些全面的法律通过确保投票权、强制公共设施种族融合、建立平等就业机会和联邦项目非歧视政策，承诺纠正多年来对黑人社区犯下的许多错误。它们也开启了无耻煽动白人恐惧政治的新篇章。

在1960年代末，理查德·尼克松的“南方策略”煽动种族恐惧和紧张关系，以将白人选民的忠诚从民主党转向共和党。尼克松在1968年总统竞选中以“州权”和“法律与秩序”双重支柱为基础——这两者都是明显的、种族编码的狗哨(dog whistles)。在1980年的竞选中，罗纳德·里根反复提及“福利女王”——一个据说能够靠政府援助购买凯迪拉克的黑人女性。1988年，乔治·H·W·布什的竞选团队播放了臭名昭著的威利·霍顿广告，用疯狂头发的黑人罪犯横行的景象恐吓白人选民。

Steve Bannon 旨在确认美国心理中最丑陋的偏见，并说服那些拥有这些偏见的人，让他们相信自己是受害者，相信他们被迫压抑真实感受太久了。在美国灵魂深处潜藏着一种爆炸性的紧张关系。Bannon 早就感觉到了这一点，现在他有数据来证明这一点。Bannon 深信，历史将证明他是对的，而正确的工具将加速他的预言实现。年轻人由于臃肿的国家和腐败的金融体系而缺乏机会，他们已经准备好反叛了。他们只是还不知道而已。Bannon 希望他们理解自己在他的革命预言中的作用——他们将引领历史的世代“转折”，成为在“大解体”之后重新描绘一个充满意义和目标的新社会的“艺术家”。他说，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都是艺术家：Franco 和 Hitler 是画家，而 Stalin、Mao 和 bin Laden 都是诗人。他明白运动会为社会采用新的美学。Bannon 问为什么独裁者总是首先囚禁诗人和艺术家。因为他们自己往往也是艺术家。对 Bannon 来说，这场运动已经准备好成为他的伟大表演。这是通过实现他最喜欢的书籍叙述来实现他的预言，比如《第四次转折》，该书预测即将到来的危机，随后被遗忘的一代将起义反叛，或者《圣徒营地》，其中西方文明在移民入侵者大篷车的重压下崩溃。

但 Bannon 需要一支军队来释放混乱。对他来说，这是一场叛乱，为了激发完全的忠诚和完全的参与，他准备使用任何有效的叙述。对 Bannon 来说，利用认知偏见只是将他的目标从他们在空洞无意义的社会中成长所承受的“条件反射”中“去程序化”的手段。Bannon 希望他的目标“发现自己”并“成为他们真正的自己”。但 2014 年在 Cambridge Analytica 创建的工具并不是关于自我实现的；它们被用来强化人们内心深处的恶魔，以建立 Bannon 所谓的他的“运动”。通过针对具有特定心理脆弱性的人群，该公司将他们受害化，使他们加入一个不过是由假先知领导的邪教，在这个邪教中，理性和事实对其新信徒几乎没有影响，因为他们现在在数字上与不便的叙述隔离开来。

在我与 Bannon 进行的最后一次讨论中，他告诉我，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你必须打破一切”。这就是他想要做的——瓦解”建制派”。Bannon 指责”大政府”和”大资本主义”压制了人类体验中必不可少的随机性。他想将人们从为他们做选择从而从他们生活中剥夺目标的控制性行政国家中解放出来。他想带来混乱来结束行政国家内确定性的暴政。Steve Bannon 不希望，也不会容忍国家决定美国的命运。

第8章

来自俄罗斯的点赞

忠实于其在外国信息操作中的起源，几乎每天都有新角色到达 Cambridge Analytica 的伦敦办公室。该公司成为外国政客、代理人、安全机构和商人及其衣着暴露的私人秘书的旋转门。很明显，这些人中的许多都是想要影响外国政府的俄罗斯寡头的同伙，但他们对外国政治的兴趣很少是意识形态的。相反，他们通常要么寻求帮助将资金藏在某个谨慎的地方，要么取回存放在世界某个冻结账户中的资金。工作人员被告知只要忽略这些人的来来往往，不要问太多问题，但工作人员会在内部聊天记录中开玩笑，特别是来访的俄罗斯人通常是我们遇到的更古怪的客户类型。当公司对这些潜在客户进行内部研究时，我们会通过小道消息听到这些有权势的人的有趣爱好或奇异的性冒险。我确实承认，我对公司与可疑客户的会面视而不见。我知道如果我问太多 Nix 不喜欢的问题，只会给我带来麻烦。但当时，在 2014 年春天，就在任何俄罗斯虚假信息活动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的两年前，除了公司参与的典型的基本阴暗行径之外，这些俄罗斯人本身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也就是说，除了一个让 CA 高管们既非常兴奋又异常回避的潜在客户。

2014 年春天，俄罗斯大型石油公司 Lukoil 联系了 Cambridge Analytica 并开始提问。起初，Nix 处理了对话，但很快石油高管们想要他无法提供的答案。他向 Lukoil CEO Vagit Alekperov 发送了我写的关于 Cambridge Analytica 在美国的数据定向项目的白皮书，之后 Lukoil 要求会面。Nix 说我应该一起去。“他们理解选举背景下的行为微定向（根据你的优秀文档/白皮书），但他们未能在选民和他们的消费者之间建立联系，”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

好吧，我也未能建立这种联系。卢克石油是全球经济的主要力量——普京寡头政治中最大的私人公司——但我看不出俄罗斯石油公司与 CA 在美国的工作之间有明显联系。而尼克斯也帮不上忙。“哦，你知道这些事情是怎样的，”他告诉我。“你只要稍微撩起裙子，他们就会给你钱。”换句话说，他对细节不感兴趣。如果卢克石油想为我们的数据付费，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他们用这些数据做什么？

在卢克石油首次接触后不久，一份关于 CA 内部能力的 2014 年备忘录被起草并发送给尼克斯。这份简报用委婉的术语讨论了该公司理论上能够建立的能力，如果有项目需要特殊情报服务或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大规模虚假信息操作的话。（由于备忘录是内部文件，它提到了 SCL；剑桥分析只是面向美国客户的品牌门面，完全由 SCL 人员组成。）

“SCL 保留了一些来自以色列、美国、英国、西班牙和俄罗斯的退休情报和安全机构官员，每个人都具有丰富的技术和分析经验，”备忘录写道。“我们的经验表明，在许多情况下，利用社交媒体或‘外国’出版物来‘曝光’对手往往比使用可能有偏见的当地媒体渠道更有效。”备忘录讨论了使用“情报网络”“渗透”反对派竞选活动以获取“有害信息”，并创建大规模的“Facebook 和 Twitter 账户网络以建立可信度和培养粉丝”。对于 SCL 的许多客户来说，这是标准报价——私人间谍活动、陷阱、贿赂、敲诈、渗透、美人计，以及通过社交媒体虚假账户传播虚假信息。只要价格合适，SCL 愿意不惜一切代价赢得选举。现在，拥有更广泛的数据集和 AI 能力，以及数百万投资，新成立的剑桥分析正在寻求进一步发展。

卢克石油的高管们来到伦敦，尼克斯为会议准备了一套幻灯片演示。我靠在椅子上，好奇地想发现他到底在推销什么。前几张幻灯片概述了 SCL 在尼日利亚的一个项目，旨在破坏选民对公民机构的信心。标题为“选举：免疫接种”的材料描述了如何传播谣言和虚假信息来影响选举结果。尼克斯播放了情绪激动的选民相信即将到来的尼日利亚选举会被操纵的视频。

“我们让他们这样想的，”他高兴地说。

下一组幻灯片描述了SCL如何在尼日利亚操纵选举，包括选民说他们对暴力和动乱谣言担忧的视频。“我们也让他们这样想的，”尼克斯说。

我静静地看着这些俄罗斯高管做笔记，若无其事地点头，仿佛他们看到的一切都是完全例行的。接下来，尼克斯向他们展示了关于我们数据资产的幻灯片。但我们在俄罗斯或卢克石油主要经营的独联体市场没有数据资产，我们最大的数据集覆盖美国。然后他开始谈论微目标定位和AI，以及剑桥分析如何处理我们拥有的数据。

我仍然感到困惑。在演示结束时，高管们问我的想法，我支支吾吾地说：“嗯，我们在许多地方都有多样化的经验和数据...那么你们为什么对这一切感兴趣？”

其中一人回答说他们仍在摸索，我们应该继续告诉他们更多关于CA拥有什么数据和能力。但我是那个需要答案的人。为什么一家在美国几乎没有业务的俄罗斯石油公司想要获得我们的美国数据资产？如果这是一个商业项目，为什么亚历山大向他们展示关于非洲虚假信息的幻灯片？

但向公司客户展示的不仅仅是内部数据资产。该公司急于向潜在客户炫耀它对美国内部军事行动了解多少。在另一次会议中，公司不知何故获得了由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的美国空军目标中心创建的内部幻灯片，向一些潜在客户概述了美国如何已经“将社会文化行为因素纳入作战规划”，以获得“武器化目标”的能力，并对美国对手放大非动能力量。尼克斯对他的计划保持神秘。这让我觉得不符合他的性格——我见过他多少次谈论公司贿赂部长或设置美人计？但他不能——或不愿意——解释我们为什么继续与这个“客户”沟通。在讨论过程中，他不断告诉他们：“我们已经有人在实地了。”

在第一轮卢克石油公司会议的几个月前，Cambridge Analytica 联系了一个名叫山姆·帕滕(Sam Patten)的人，他作为一名职业政治顾问在世界各地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1990年代，帕滕在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行业工作，之后转入东欧政治领域。当CA雇用他时，他刚刚完成了为乌克兰亲俄政党工作的项目。当时，他与一个名叫康斯坦丁·基利姆尼克(Konstantin Kilimnik)的人合作，后者是俄罗斯总参谋部情报总局(GRU)的前军官。尽管帕滕否认他向俄罗斯合作伙伴提供了任何数据，但后来透露，曾担任唐纳德·特朗普竞选经理数月的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确实在另一个案例中向基利姆尼克传递了选民投票数据。帕滕和基利姆尼克在2000年代初在莫斯科相遇，后来在乌克兰为保罗·马纳福特的咨询公司工作。在帕滕被CA招募后不久，两人成为了正式的商业伙伴。

帕滕是在阴暗的国际影响力行动世界中游刃有余的完美人选。他在加入Cambridge Analytica的共和党人中也有很好的人脉关系，所以他最初被分配到美国工作。帕滕的任务是管理美国研究行动的后勤工作，包括焦点小组和数据收集，以及撰写一些民调问题。2014年春天，他开始在俄勒冈州工作，接手了格特尔森(Gettleson)的一些项目，对美国公民进行社会和态度研究。

很快，奇怪的问题开始出现在我们的研究中。有一天我在伦敦办公室检查实地报告时，注意到一个涉及在美国进行俄罗斯导向信息测试的项目。美国业务增长迅速，引入了几个新人来管理激增的任务，所以很难跟踪每个研究流程。我以为可能有人开始探索美国人对国际话题的看法。但当我搜索我们的问题和数据存储库时，我只能找到正在收集的关于俄罗斯的数据。我们在俄勒冈州的团队开始询问人们：“俄罗斯有权拥有克里米亚吗？”和“你对弗拉基米尔·普京作为领导人有什么看法？”“焦点小组主持人传播着普京的各种照片，询问人们指出他在哪里看起来最

强势。我开始观看一些焦点小组的录像——它们很奇怪。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照片和俄罗斯叙事被投射在墙上，采访者询问美国选民群体看到一个强势领导人时的感受。

有趣的是，尽管俄罗斯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的手，但普京因其作为领导人的强势而受到钦佩。

“他有权保护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国家做他认为最好的事情，”一名参与者说道，其他人点头表示同意。另一个人告诉我们，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墨西哥，但与奥巴马不同，普京正在采取行动。当我独自坐在现在漆黑的办公室里，观看美国人讨论普京对克里米亚主张的奇异片段时，我想要答案。格特尔森当时在美国。当他接电话时，我问他是否能告诉我是谁授权了关于普京的研究流程。他毫无头绪。“它就这样出现了，”他说，“所以我以为有人批准了。”

帕滕对东欧政治的兴趣在我脑海中闪过，但我没有多想。2014年8月，一名Palantir员工向数据科学团队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附带一篇关于俄罗斯人窃取数百万互联网浏览记录的文章链接。“说到获取数据！”他们开玩笑说。两分钟后，我们的一名工程师回应道：“我们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也许他在开玩笑，也许不是，但该公司已经为其项目签约了前俄罗斯情报官员，正如给尼克斯(Nix)的备忘录所强调的。

自2014年5月以来担任项目首席心理学家的科根(Kogan)正在往返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他对自己在俄罗斯的项目不够坦诚，但我知道他在进行社交媒体用户的心理测量分析。科根在俄罗斯进行的研究专注于识别有心理障碍的人，并探索他们在社交网络上进行网络骚扰行为的潜力。他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研究由俄罗斯政府研究资助，研究了黑暗三合会人格特质与参与网络霸凌、网络骚扰和网络跟踪之间的联系。该研究还探索了Facebook上的政治主题，发现精神病态得分高的人最有可能发布关于专制政治问题的内容。科根与临床和计算心理学家合作，根据他的俄罗斯研究团队的一份研究简报，“通过特殊的网络应用程序”处理”来自俄罗斯和美国Facebook用户的数据”。到夏末，科根在俄罗斯就社交媒体分析的潜在政治应用发表演讲。我记得他向我提到他在圣彼得堡的工作与Cambridge Analytica的工作之间存在”重叠”，但这可能只是巧合。我个人的看法，也是我向国会表达的观点，是科根并非恶意，只是粗心和天真。客观地说，数据的安全性很差。

即使在科根(Kogan)加入之前，CA的母公司SCL就已经在网上传播宣传方面拥有丰富经验，但科根的研究非常适合针对具有威权主义人格特征的选民，识别能够激活他们支持的叙事。科根加入Cambridge Analytica项目后，CA的内部心理学团队开始复制他在俄罗斯的一些研究：分析那些神经质程度高和具有黑暗三联征特征的人。这些目标更加冲动，更容易接受阴谋论思维，通过适当的推动，他们可能被诱导产生极端思想或行为。

...

...

毒性领导者造就毒性企业

毒性领导者才能创造毒性企业，我认为Cambridge Analytica反映了尼克斯(Nix)的性格。除了他明显喜欢恐吓之外，尼克斯还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天赋，能够准确找到他的恶意能造成最大伤害的地方。例如，他不会停止叫我“瘸子”或“痉挛症患者”，因为他知道这会让我感到虚弱。但他知道这只会让我为他更加努力地工作。尽管我憎恨他，但出于某种原因，我决心要证明他是错的。持续的虐待伴随着一个解释：只有“真相”才能激励某人达到尼克斯的标准。他还以贬低员工为乐，像某种暴躁的龙卷风一样冲过办公室，一路抛出侮辱。

有一次我们以为尼克斯要伤害某人了。我甚至记不起这次是什么激怒了他，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暴跳如雷，把一个实习生桌子上的所有东西都推到了地上。尼克斯在尖叫，身体凑得很近，以至于小水滴溅到了实习生的脸颊上。塔达斯·尤奇卡斯(Tadas Jucikas)是我们中最高大的一个，他站起来走了过去。“亚历山大，听起来你需要喝一杯，”他说。“不如和我一起去俱乐部吧。”尼克斯离开后，实习生只是坐在那里，呼吸急促，直到另一位同事建议他当天下班回家。在尼克斯回来之前，我们都清理了他造成的混乱，而他回来时心情愉快得多，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有时他会在发脾气后责怪受害者。“你总是让我大喊大叫，”他会说，好像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声音一样。最让我不安的是，当他否认发脾气时，我仍然在承受后果的影响。被直截了当地告知让你沮丧的事情从未发生过，这是相当有力的；最终你开始担心自己是否疯了。“你需要成长，不要那么敏感，”尼克斯会说。“如果你继续告诉我我发脾气了，我就无法信任你。”

我们有一次巨大的爆发，最终产生了短期和长期后果。当Cambridge Analytica正式成立时，我一直拒绝签署合同。签署合同可能会给我股份，但我对公司的长期承诺感到紧张。我脑海深处有个声音警告我不要这样做。

这种拖延让尼克斯暴怒。最后他爆发了，把我锁在房间里，对我大喊大叫和痛骂。当这没有产生预期结果时，他掀翻了我旁边的椅子。他一打开门，我就冲出办公室，两周没有回来。我们都知道他比我更需要我，因为我是唯一能够建造他向默瑟夫妇(Mercers)承诺的东西的人。但他仍然太顽固和傲慢，不愿告诉我他很抱歉，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后，他让尤奇卡斯向我转达道歉。我不情愿地回到工作岗位，但我仍然拒绝签署合同。

CA的客户名单最终发展成美国右翼的名人录。特朗普和克鲁兹的竞选活动各自向该公司支付了超过500万美元。密苏里州的罗伊·布伦特(Roy Blunt)和阿肯色州的汤姆·科顿(Tom Cotton)的美国参议院竞选活动成为客户。当然，还有俄勒冈州共和党人阿特·罗宾逊(Art Robinson)失败的众议院竞选，他收集尿液和教堂风琴。2014年秋天，杰布·布什(Jeb Bush)拜访了办公室。尽管从默瑟那里收到了数百万美元，尼克斯从未费心学习太多美国政治，所以他请格特森(Gettleson)加入他。布什独自前来，首先告诉尼克斯，如果他决定竞选总统，他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条件进行，而不必“讨好”党内的“疯子”。

“当然，当然，”尼克斯回答，表示他打算在整个会议中虚张声势和胡扯。会议结束后，他对签约另一个大美国客户的可能性如此兴奋，坚持立即致电默瑟夫妇报告好消息，显然忘记了默瑟夫妇曾无数次告诉他们支持泰德·克鲁兹(Ted Cruz)。尼克斯把丽贝卡·默瑟(Rebekah Mercer)的电话开到扬声器，这样每个人都能听到她对他刚刚进行的这场令人惊叹的会议的反应。

“我们刚刚让杰布·布什州长来了办公室，他想与我们合作。你觉得怎么样？”他自豪地说。停顿一下后，丽贝卡平淡地回答：“好吧，我希望你清楚地告诉他，那永远不会发生。”然后她挂断了电话。残酷。

不仅仅是总统候选人寻求CA的帮助。对于福音派领袖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尼克斯在帕尔购物街(Pall Mall)的牛津剑桥俱乐部的宏伟餐厅安排了一次午餐。里德花了两个小时描述他的目标，概述CA如何能够帮助在一个为同性婚姻和其他文化问题而斗争的美国重新灌输道德。尼克斯离开会议时有点醉了。回到办公室后，他以典型的令人愤慨的方式向所有人宣布：“好吧，如果我见过壁橱里的同性恋的话，那就是他了。”

我在SCL和Cambridge Analytica工作的大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感觉不真实，部分原因是我遇到的许多人看起来几乎像漫画人物。这份工作变成了一种智力冒险，就像玩一个难度不断升级的电子游戏。如果我这样做会发生什么？我能让这个角色从蓝色变成红色，或者从红色变成蓝色吗？坐在办公室里，盯着屏幕，很容易陷入更深、更黑暗的地方，忽视我实际参与的事情。

但最终，我无法忽视摆在眼前的事实。奇怪的PACs开始出现。未来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的超级PAC向Cambridge Analytica支付了超过100万美元，用于探索如何增强美国年轻人的军国主义倾向。博尔顿担心千禧一代是“道德薄弱”的一代，不愿意与伊朗或其他“邪恶”国家开战。

Nix希望我们开始为美国的任何客户研究使用化名，并声明该研究是为剑桥大学进行的。我试图在一封给员工的邮件中阻止这种做法：“你们不能对人撒谎，”我写道，引用了可能的法律后果。这个警告被忽视了。

此时，我越来越感觉自己是某个我不理解、无法控制的事情的一部分，而这个事情在其核心是极其令人厌恶的。但我也感到迷失和被困。我开始整夜在深夜俱乐部或狂欢派对中狂欢。有几次，我晚上离开办公室，整夜外出，最后没有睡觉就直接回来了。我在伦敦的朋友们注意到我不再是原来的自己。Gettleson最终对我说：“你看起来不太好，Chris。你还好吗？”我不好；我很沮丧。有些日子我想对Nix大喊大叫，但有什么东西阻止了我。我会外出，有时独自一人，响亮的音乐和与其他舞者身体的持续接触让我感觉自己仍然在这里，这不是什么梦。如果音乐足够响亮，你可以对着世界尖叫，没有人会注意到。

我们在Cambridge Analytica的工作

我们在Cambridge Analytica的工作似乎每天都变得更加邪恶。一个项目在CA的通信中被描述为针对非裔美国人的“选民疏离”（即选民压制）倡议。共和党客户担心不断增长的少数族裔选票，特别是相对于他们日益老龄化的白人基础，正在寻找混淆、削弱动机和剥夺有色人种权力的方法。当我发现CA正在开始一个选民压制项目时，这真的触动了我。我想起了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竞选时我参加集会的所有时光，我开始问自己，*我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我告诉一位新经理，无论客户想要什么，从事以选民压制为目标的项目可能是非法的。我再次被忽视了。我打电话给公司在纽约的美国律师，留言请他们回电，但他们从未回电。

2014年7月

2014年7月，我收到了一份发送给Bannon、Rebekah Mercer和Nix的机密备忘录副本，该备忘录来自Rudy Giuliani的律师事务所Bracewell & Giuliani。Cambridge Analytica就外国对竞选活动影响的美国法律寻求建议。备忘录概述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并明确强调：外国公民严格禁止在地方、州或联邦层面管理或影响美国竞选活动或PAC。备忘录建议Nix立即回避Cambridge Analytica的实质性管理工作，直到可以探索“漏洞”。Bracewell & Giuliani备忘录建议通过美国公民“过滤”CA外国公民的工作。阅读备忘录后，我把Nix拉到会议室，敦促他听从警告。

相反，Cambridge Analytica开始要求外国员工在飞往美国之前签署弃权书，接受任何违反选举法的责任。他们没有被告知Giuliani律师事务所的建议。这让我愤怒了。我对Nix发泄了情绪。

“如果他们被起诉怎么办，Alexander？”我喊道。“那将是你的责任。”

“了解规则是他们的责任，不是我的，”他回答。“他们是成年人。他们可以为自己做决定。”

但我担心的是他的决定，我并不孤单。在向我介绍一些新项目时，心理学团队的一位同事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即这项研究如何被用来放大而不是缓解Cambridge Analytica所关注人群中的种族主义。“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继续进行这项研究，”他说。

最初，种族是公司开始探索的众多话题之一。这本身并不罕见，因为种族冲突在美国文化和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项目中的心理学家最初假设这项研究将被用于获取关于人群偏见的被动信息，甚至可能有助于减少其影响。但是，由于缺乏学术研究必需的传统伦理审查，从未考虑过这项研究如何被滥用——没有人想过这可能会出什么问题。

我知道班农会滔滔不绝地抱怨美国变化太快，他那种即将爆发大冲突的预言式观念，或者他对印度教达摩的误读，这近乎一种恋物式的东方主义。但我们CA研究团队中的许多人都把他当作只是我们在这个奇异工作世界中必须安抚的又一个古怪人物而不予理会。许多CA员工都有在世界各地更极端环境下从事SCL信息作战项目的经验，相比之下班农显得相当温和。

但随着默瑟投资后CA的快速发展，我没有完全理解我们参与的种族项目的规模。尼克斯和班农雇用的新管理者开始把我排除在会议之外，我不再自动收到项目规划会议的邀请。我以为这又是尼克斯的权力游戏，所以我只是感到恼火而不是怀疑。但团队中的一位心理学家开始找我展示一些新的种族项目。他给我看了在美国实地调研的研究问题主文档，当我开始阅读时，我的心沉了下去。我们在测试如何利用认知偏见作为改变人们对种族外群体看法的入口。我们使用的问题和图像明显是为了在我们的受试者中引发种族主义而设计的。当我观看一个野外实验参与者的视频时，他被CA研究员的引导性询问激怒，陷入愤怒的痉挛中，种族主义侮辱从他嘴里飞出，我开始直面我正在帮助建造的东西。

在我们对美国的入侵中，我们故意激活人们最恶劣的一面，从偏执狂到种族主义。我立即想知道这是否就是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观察他的研究对象时的感受。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服务那些价值观与我完全对立的人。班农和默瑟很乐意雇用他们试图压迫的那些人——酷儿、移民、女性、犹太人、穆斯林和有色人种——这样他们就可以武器化我们的见解和经历来推进这些事业。我不再在一家与激进极端分子作斗争的公司工作，那些极端分子束缚女性、残酷对待非信徒、折磨同性恋者；我现在为想要在美国和欧洲建造他们自己的反乌托邦的极端分子工作。尼克斯知道这一

点，甚至不在乎。为了敲定另一笔交易的廉价刺激，他开始招待偏执者和恐同者，期望他的员工不仅要视而不见，还要我们背叛我们自己的人民。

最终，我们正在创造一台机器，用仇恨和邪教式的偏执狂污染美国，我再也无法忽视这一切的不道德和非法性。我不想成为一个合作者。

然后，在2014年8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一名资深SCL员工，尼克斯的长期朋友和知己，从非洲回来时患了严重的疟疾。他走进办公室时眼睛红肿，大汗淋漓，说话含糊不清，胡言乱语。尼克斯因为他迟到而对他大喊大叫后，我们其他人催促他去医院。但在他能在医院接受治疗之前，他倒下了，从一段楼梯上摔下来，头部重重地撞在混凝土上。他陷入昏迷。他的大脑肿胀，部分头骨被切除。他的医生担心他的认知功能可能永远无法恢复。

尼克斯从医院探望回来后，他向人力资源部询问责任保险的指导，以及他必须继续为他忠诚的朋友支付多长时间，这个朋友仍在昏迷中，缺失部分头骨。这似乎极其冷酷无情。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尼克斯是个怪物。更糟糕的是，我知道他并不孤单。

班农也是个怪物。如果我继续留下来，我担心很快我也会变成一个怪物。

几个月前我还在享受的社会和文化研究已经催生了这个东西——它很可怕。很难解释当时的氛围是什么样的，但就好像每个人都脱离了我们所做事物的现实。但我已经从恍惚中清醒过来，现在正在观看一个令人厌恶的想法变成现实。我的头脑清醒了，尼克斯邪恶梦想的现实后果开始困扰我。深夜里，无法入睡，我会盯着天花板，我的思绪在痛苦和困惑之间停滞。一天晚上，我在凌晨3点给在加拿大的父母打电话寻求建议。“读懂征象，”他们说。“如果你无法入睡——如果你在各个时间恐慌地打电话寻找答案——那么你知道你应该做什么。”

我告诉尼克斯我要离开。我想尽快远离他的精神病式愿景——以及班农的愿景。否则我有感染同样的心理和精神疾病的风险。

尼克斯通过诉诸我的忠诚感来反击。他让我觉得如果我抛弃公司的朋友们，我就是个坏人。是我招募人们来为班农的项目工作的。他们信任我，我不想背叛他们。

“克里斯，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和尼克斯待在这里，”马克·格特尔特森说，他加入公司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和我一起工作。“如果你走，我也走。”

我不喜欢抛弃朋友和同事的想法，但我讨厌剑桥分析变成的样子以及它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我告诉尼克斯我们可以讨论如何让我逐步退出，但我绝对要离开。他做了自然而然的事——他带我去吃午餐。

餐厅在绿园，离白金汉宫不远。我们一坐下，尼克斯就说：“好吧。我早就料到我们最终会有这次谈话。你想要多少钱？”

我告诉他这不是钱的问题。

“来吧，”他说。“我经营这家公司已经够久了，知道这始终都是关于钱的问题。”

他提到，尽管他给我的薪水很少，但我从未像一些同事那样要求加薪，这是事实：我的薪水是办公室里最低的之一，大约是其他人的一半，而Project Ripon的新员工拿到的薪水是我的三到四倍。当我摇头时，Nix说：“好吧。我就把你的薪水翻倍。这样应该够了。”

“Alexander，”我说，“这不是我在玩什么游戏。我要离开。我不想再在这里工作了。不管这是什么，我都受够了。”我的语调变得沉重，他似乎终于意识到我是认真的，因为接着他向我倾身说道：“但是Chris，这是你的孩

子。我了解你。你不会把你的孩子遗弃在街头，对吧？”他一定感觉到了突破口，因为他抓住这个想法继续发挥。

“它刚刚出生。你不想看着它长大吗？想知道它会上什么学校吗？我们能否让它进入伊顿公学？想看看它在生活中会有什么成就吗？”

他似乎对这个隐喻的修辞感到满意，但我丝毫不为所动。我告诉他，我感觉自己更像是一个精子捐献者而不是父亲，没有力量阻止孩子成长为一个可恶的小孩。Nix迅速转向，建议我们建立一个Cambridge Analytica”时尚部门”。

“天哪，Alexander。你是认真的吗？心理战，茶党运动...还有该死的时尚趋势？不，Alexander。这太荒谬了。”

最后，他生气了。“你最终会成为第五个甲壳虫乐队成员，”他说。

第五只甲虫？我想。这是某种埃及寓言吗？和圣甲虫有关的什么东西？他到底在说什么？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他说的是那个在我出生三十年前就成立的乐队。

即使在我妥协，同意留到十一月初的中期选举之后，Nix仍然坚持认为我犯了一个错误。

“Chris，你甚至不理解你在这里创造的东西有多巨大，”他说。“只有当我们所有人都坐在白宫里时——除了你之外的每一个人——你才会明白。”

真的吗？即使对Nix来说，这也太夸张了。他告诉我，我本可以在西翼拥有一个名牌。我太愚蠢了，没有意识到自己放弃了什么。

“如果你离开，那就完了，”他说。“不要再回来。”

在Bannon接管并释放混乱之后，我又待了不到一年。但回头看，我很难理解自己怎么能待那么久。每一天，我都忽视、无视或为警告信号找借口。拥有如此多的智力自由，世界顶尖大学的学者告诉我我们正处于”革命性”社会科学的边缘，我变得贪婪，忽视了我们所做事情的黑暗面。我的许多朋友也是如此。我试图说服Kogan也离开，即使他承认这个项目可能成为一个道德泥潭，但在我离开后他决定继续与Cambridge Analytica合作。当我发现Kogan要留下时，我拒绝帮助他为其项目获取更多数据集，因为我担心我为他获得的任何新数据最终可能落入Nix、Bannon和Mercer手中。在我看来本应成为一个学术机构的东西，正在成为Cambridge Analytica不断扩张的合作伙伴网络中的又一个参与者。当我拒绝继续帮助Kogan时，他要求我删除从他那里收到的任何数据，我照做了。但这对我个人来说代价巨大，因为Kogan专门在调查中添加了时尚和音乐问题，这样我就可以将调查回复纳入我关于趋势预测的博士论文中。随着我学术工作基础的消失，我知道我必须放弃博士学位，这已经成为支撑我继续下去的唯一动力。但最让我困扰的是我如何让Nix控制了我。我让他挖掘我的每一个不安全感 and 脆弱性，然后，为了服务于他，我挖掘了一个国家的不安全感和脆弱性。我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我将永远带着耻辱生活。

...

...

就在我离开Cambridge Analytica之前

就在我离开Cambridge Analytica之前，该公司正在计划在尼日利亚进行更多选举工作。正如Nix在向卢克石油公司展示谣言活动时所解释的，这个非洲国家是熟悉的领域。Cambridge Analytica知道许多外国利益集团都插手非洲选举，这使得任何人都不太可能关心该公司在做什么——毕竟这是非洲。在1960年代去殖民化的狂潮之后，许多西方大国仍然觉得有权干预他们的前非洲殖民地；唯一的区别是现在需要一定程度的谨慎。欧洲是建立在非洲的石油、橡胶、矿物和劳动力之上的，前殖民地政治独立的单纯事实并不会改变这一点。

通过尼日利亚项目，Cambridge Analytica让自己更深入地陷入了心理虐待实验。在Cambridge Analytica设立营地的同一家酒店，以色列、俄罗斯、英国和法国的“公民参与”项目在遮羞布般的掩护故事后运作。所有人共同的不言而喻的信念是：如果那些选举是非洲的，外国干预选举就无关紧要。

该公司名义上在支持古德勒克·乔纳森(Goodluck Jonathan)，他正在竞选连任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是一名基督徒，他的对手是温和穆斯林穆哈马杜·布哈里(Muhammadu Buhari)。剑桥分析公司被一群尼日利亚亿万富翁雇佣，他们担心如果布哈里赢得选举，他会撤销他们的石油和矿物勘探权，这将严重损害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按照惯例，剑桥分析公司的焦点不是如何推广古德勒克·乔纳森的候选资格，而是如何摧毁布哈里的。这些亿万富翁并不真正在乎谁获胜，只要胜利者清楚地了解他们的能力以及他们愿意做什么。12月，剑桥分析公司雇佣了一位名叫布列塔尼·凯泽(Brittany Kaiser)的女性担任“业务发展总监”。凯泽拥有尼克斯垂涎的那种背景。在他们的第一次会面中，尼克斯对凯泽调情，对她说：“让我把你灌醉，然后偷走你所有的秘密。”她在芝加哥郊外的富裕地区长大，就读于马萨诸塞州的菲利普斯学院(Phillips Academy)，这是一所私立精英学校（两位布什总统的母校）。她曾在爱丁堡大学就读，之后参与了利比亚的项目。在那里，她遇到了一位名叫约翰·琼斯(John Jones)的律师，他不仅代表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卡扎菲(Saif Qaddafi)，还代表维基解密的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琼斯是英国律师协会的一位受人尊敬的成员。凯泽开始为他做咨询工作，因此结识了阿桑奇。她在2014年底开始在剑桥分析公司工作，正好是我离开的时候。

剑桥分析公司制定了一个双管齐下的方法来影响尼日利亚选举。首先，他们会寻找对布哈里不利的信息——*kompromat*（黑材料）。其次，他们会制作一段旨在恐吓人们不投票给他的视频。凯泽前往以色列，据她说，在那里通过联系人被介绍给了一些顾问。根据我看到的关于尼日利亚项目的内部通信，剑桥分析公司还雇佣了来自多个国家的前情报人员。不确定剑桥分析公司是否有人故意采购黑客服务，但很清楚的是，关于政治对手的高度敏感材料——可能是被黑客攻击或盗取的——最终落入了该公司手中。通过获取反对派电子邮件账户、数据库甚至私人医疗记录的访问权限，该公司发现布哈里很可能患有癌症，这在当时并非公开信息。使用被黑客攻击的材料并非尼日利亚独有，剑桥分析公司还获取了加勒比海岛国圣基茨和尼维斯反对派领导人的*kompromat*。

黑客攻击私人医疗信息和电子邮件已经够令人不安的了，但剑桥分析公司制作的宣传视频更加恶劣。这些广告被投放在包括谷歌在内的主流网络上，针对尼日利亚倾向于支持布哈里的地区。一个尼日利亚人在浏览新闻时会遇到一个看起来普通的点击诱饵广告——一个八卦标题或一张性感女性的照片。当这个人点击链接时，他或她会被带到一个空白屏幕，中间有一个视频框。

这些视频很短——刚过一分钟——通常以旁白开始。“2015年2月15日即将来到尼日利亚，”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黑暗。可怕。非常不确定。”“如果像布哈里承诺的那样实施伊斯兰教法，尼日利亚会是什么样子？”根据视频，答案是最令人毛骨悚然、最可怕的大屠杀。突然，视频切换到一个场景，一个男人正在用一把钝刀缓慢地来回锯着另一个男人的喉咙。当血液从受害者的脖子喷出时，他被扔进沟渠等死。他周围的土地被染成红色。在另一个

场景中，一群男人绑住了一个女人，然后将汽油泼在她身上并点火，她在痛苦中尖叫。这些不是演员——这是真实的酷刑和谋杀镜头。

在我辞职后，许多人离开了CA，他们的理由是，如果连我这个知道所有秘密的人都觉得这家公司太可疑了，那么它就是太可疑了，句号。尼日利亚项目创下了新的低点，引发了另一轮离职潮。到2015年3月，我关心的每个人——朱西卡斯(Jucikas)、克利卡德(Clickard)、格特尔森(Gettleson)和其他几个人——都离开了剑桥分析公司。但许多其他人找到了留下的理由。凯泽一直待到2018年，在我向媒体和当局提供的证据让该公司陷入困境后才公开站出来。她后来声称不知道CA在雇佣黑客，向英国议会调查委员会表示，她只是认为他们擅长“情报收集”和使用“不同类型的数据软件来追踪银行账户之间的转账……我真的不知道那是如何运作的。”

...

...

回顾我在剑桥分析公司的时光

当我回顾在剑桥分析公司的时光时，有些事情比当时更有意义了，当时我已经习惯了那个地方的怪异。总有一些奇怪的人来来往往——穿着深色西装的可疑人物；戴着餐盘大小的超大军帽的非洲领导人；班农——所以如果每个不寻常的事件都让你困扰，你就不会待很久。

我现在知道卢克石油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苏联克格勃的继承者——有正式的合作协议。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后来告诉我，卢克石油经常充当FSB的幌子，代表其进行情报收集。卢克石油的高管也曾被发现在其他国家进行影响力行动，包括捷克共和国。2015年，乌克兰安全部门指控卢克石油资助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亲俄叛乱活动。“我只有一个与政治相关的任务，就是帮助国家和公司，”卢克石油首席执行官瓦吉特·阿列克佩罗夫谈到他在地缘政治中的角色时说道。

实际上，这很可能是他们对SCL感兴趣的主要原因。SCL在东欧有着悠久的历史，2014年它正在讨论另一个关于反俄宣传的北约项目。SCL此前曾在波罗的海国家的竞选活动中工作，将政治问题归咎于俄国人。“本质上，俄国人被指责为失业和其他影响经济的问题，”一份关于该项目的旧报告说道。但除了这些之外，正当卢克石油在顿涅茨克资助亲俄叛乱活动时，SCL的国防部门开始进行反制工作，“收集人口数据，进行分析，并为乌克兰政府提供数据驱动的策略，以追求夺回顿涅茨克控制权的目标。”这个项目旨在“削弱和瓦解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DPR）”，这将使该公司成为俄罗斯情报收集的重要目标，而俄罗斯情报机构已知通过卢克石油在欧洲开展活动。

实际上，当尼克斯和我与这些“卢克石油高管”会面时，我们几乎肯定是在与俄罗斯情报人员交谈。他们很可能想了解更多关于这家也为北约部队工作的公司的信息。这也很可能是他们如此想了解我们美国数据的原因，尼克斯可能给他们留下了一个可以被奉承到说出几乎任何话的人的印象。完全有可能尼克斯不知道他在与谁交谈，就像我当时也不知道一样。让这些接触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他们不需要黑客攻击剑桥分析来获取Facebook数据。尼克斯已经告诉他们可以从哪里获取：在俄罗斯，通过科根。

这并不是说科根甚至会知道这件事，但获取Facebook数据就像在他前往俄罗斯讲学期间对他的电脑进行键盘记录一样简单。2018年，在英国当局查封剑桥分析的服务器后，信息专员办公室随后声明“与调查相关的一些系统是从解析到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地区的IP地址访问的。”

总结我任期最后几个月发生的事情令人大开眼界。我们的研究中充斥着关于普京和俄罗斯的问题。拥有Facebook数据访问权限的首席心理学家同时也在为圣彼得堡的一个俄罗斯资助项目工作，用俄语进行演示并描述剑桥分析构建美国选民心理档案数据库的努力。我们有Palantir的高管进出办公室。我们有一家与FSB有关联的俄罗斯大公司在探查我们美国数据资产的信息。我们有尼克斯向俄国人展示我们在传播假新闻和谣言方面有多擅长。然后还有概述剑桥分析如何与前俄罗斯情报官员合作开发新黑客能力的内部备忘录。

在史蒂夫·班农成为副总裁后的一年里，剑桥分析开始部署一些策略，这些策略诡异地预示了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即将发生的事情。为了获取对手的电子邮件，剑桥分析利用了黑客，根据内部文件，其中一些可能是俄国人。CA获得的黑客邮件随后被用来破坏他们的对手，包括协调努力泄露关于对手候选人健康状况的谣言。这些被盗的*kompromat*（妥协材料）随后与针对社交媒体网络的广泛在线虚假信息相结合。事件的重叠可能完全是巧合，但许多参与尼日利亚项目的人员也参与了CA的美国业务。尼日利亚项目一年后，布里特妮·凯泽被任命为脱欧运动Leave.EU的运营总监，萨姆·帕滕后来与保罗·马纳福特在特朗普竞选活动中合作。2018年，帕滕被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起诉，后来承认未能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罪名。他的商业伙伴基利姆尼克也被起诉，但通过留在俄罗斯避

免了起诉。直到后来，在帕滕被揭露与疑似俄罗斯情报人员有关联后，我才再次对那些关于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克里米亚的奇怪研究项目产生疑问。

Patten 还在俄勒冈州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大量关于对俄罗斯外交政策和普京领导力态度的调查。俄罗斯为什么会关心俄勒冈人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看法？因为一旦 CA 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进行建模，数据库就能识别出持有亲俄观点的美国人群体。俄罗斯政府有自己的国内宣传渠道，但其全球战略之一是在其他国家培养亲俄资产。如果你有兴趣通过数字方式传播你的叙述，拥有一份更可能支持你国家世界观的目标人员名单会很有帮助。利用互联网向当地民众传播俄罗斯宣传是绕过所有西方“国家安全”概念的巧妙方式。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公民拥有言论自由权——包括同意敌对国家宣传的权利。这种权利就像网上宣传的神奇防护罩。美国情报机构无法阻止美国公民自由表达政治言论，即使这些言论是由俄罗斯行动培养的。情报机构只能采取预防性行动，阻止武器化叙述进入美国社交网络。

俄罗斯一直轻视美国的言论自由方式以及整体的民主制度。当俄罗斯领导人看到美国群众运动和抗议的历史时，他们看到的只是混乱和社会动荡。当他们看到美国法院援引民权允许同性婚姻时，他们认为西方的堕落正在让美国走向虚弱和道德沦丧。对莫斯科来说，民权和第一修正案是美国政治制度最明显的弱点。因此俄罗斯国家试图利用这个弱点——黑掉美国民主。他们认为这会奏效，因为美国民主本质上是一个有缺陷的系统。俄罗斯人创造了他们社会混乱的自我实现预言，方法是针对和驯化具有相似世界观的美国公民的宣传，然后这些人会点击、点赞和分享。这些叙述通过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系统传播，美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它们。Facebook 也没有。

Cambridge Analytica 是否参与了俄罗斯在美国的虚假信息活动？没有人能确定，也没有单一的“确凿证据”证明 Cambridge Analytica 是罪魁祸首，并得到了俄罗斯的协助和教唆。但我一直讨厌“确凿证据”这个表达，因为对于真正的调查员来说它毫无意义。相反，调查员会收集小片段的信息——指纹、唾液样本、轮胎痕迹、一根头发。在这个案例中，Sam Patten 在乌克兰亲俄活动工作后为 CA 工作；CA 测试了美国人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态度；SCL 为北约工作使其成为俄罗斯情报目标；Brittany Kaiser 曾为朱利安·阿桑奇的法律团队担任顾问；为 CA 收集 Facebook 数据的首席心理学家曾前往俄罗斯就社交媒体档案分析发表演讲，其中一场演讲的标题是“新的沟通方法作为有效的政治工具”；CA 系统被解析到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 IP 地址访问；备忘录提到了前俄罗斯安全部门；我们看到 Alexander Nix 向卢克石油公司介绍 Cambridge Analytica 的美国数据集和虚假信息能力。

当我与 Nix 共进午餐告诉他我要辞职时，他很清楚自己认为事情会如何发展。“下次你见到我时，”他说，“我会在白宫。而你将一无所有。”事实证明，他说得并不太离谱。当我再次见到 Alexander Nix 时，距离我告诉他我要辞职已经过去了近四年，他在英国议会回答关于他在议会调查中撒谎的问题。他的声誉在我眼前被撕得粉碎，但很有特色的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也许他只是不在乎。当他看到我坐在旁听席时，他只是眨了眨眼。

第9章

对民主的犯罪

2016年1月，我决定接受加拿大议会自由党团研究局(LRB)的咨询工作。贾斯汀·特鲁多刚刚在2015年10月联邦选举中领导自由党取得巨大胜利后组建了新政府。特鲁多竞选纲领的一个要点是恢复被前保守党政府废除的人口普查，并通过更多数据驱动的政策制定重新振兴加拿大社会项目。在他获胜后不久，我的一些前自由党同事问我是否有兴趣为特鲁多的新研究和洞察团队工作，重点关注技术和创新。

在经历了几年极其令人沮丧的时光——先是在英国联合政府中与自由民主党合作，然后是在 Cambridge Analytica——我迫切希望找到一些我知道能为世界贡献好事的工作。这意味着我必须回到加拿大，但我协商了一个安排，除了重要会议外，我不必待在渥太华。离开加拿大超过五年后，我在这个国家没有那么多朋友，但我正从所发生的一切创伤中恢复，所以我认为回家后的一些平静休息时间会帮助我康复。

当我第一次抵达渥太华参加初步会议和入职培训时，我的脑海中涌现出年轻时在议会工作、试图建立VAN系统的回忆。这个地方曾是我为反对党领袖工作时的成长冒险舞台，现在我回到这里是为了结束我十几岁时开始的人生篇章。渥太华还是我多年前离开时的那个沉闷城市，但从伦敦回来后，它显得更加单调乏味。以真正的加拿大风格，渥太华就像是更加平淡的华盛顿特区版本——首都城市中的健怡可乐。

政府政治研究部门的总部位于皇后街131号，和渥太华的其他地方一样平淡无奇，给人一种介于空间站和炼狱之间的感觉。在大楼无窗的走廊和未装饰的米色房间中穿行时，我沉浸在这种官僚主义美学中，偶尔路过带有蓝色 ENGLISH/FRANÇAIS 小标志的接待台，提醒路人在加拿大我们也说法语。我的工作描述预示着稳定的无聊——基本的技术设置、民调建议、社交媒体监控、一些简单的机器学习工作和创新政策研究。没什么壮观的，讽刺的是，也没有什么真正创新的东西产生，但我对此没有意见，因为我没有义务真的留在渥太华。我可以迅速逃离渥太华的LRB办公室，在加拿大各地从事项目工作，这样能保持我的理智。

与此同时，在英国，保守党首相戴维·卡梅伦宣布就国家未来举行公投——是否继续作为欧盟成员国，还是选择独立发展。自从英国1972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EEC)以来，欧洲怀疑论者一直在鼓动退出。最初，左翼主导了这一运动，许多工党政治家和工会成员都认为集团式协定会损害他们的社会主义梦想。但大多数同胞欢迎这一安排。1975年举行的公投询问英国公众是否希望留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结果67%的人投票支持。

到欧洲经济共同体成为欧盟时，左右两翼在成员资格的好处上基本达成一致。但在1990年代初，右翼的英国独立党(UKIP)从对欧洲优先事项日益增长的抵制中崛起。1997年，前大宗商品交易员和UKIP创始成员奈杰尔·法拉奇推翻了党的领导人。法拉奇于2006年成为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UKIP开始在工人阶级白人中煽动激烈的反移民情绪，并在富裕的白人社区中利用对英国帝国过去的怀旧情绪。世界已被9·11袭击、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以及布什和布莱尔时代的冲突所改变。随着黑人和棕色人种难民的命运发展成欧洲危机，卡梅伦为了安抚民族主义情绪以保留右翼选民而采取行动。保守党制定了公投计划，将在2017年底前举行。日期定为2016年6月23日。

...

英国公投主要由公共资金支持

英国选举委员会指定投票问题双方各一个竞选团体成为官方竞选活动后，各方都会获得相等数额的公共资金。英国选举法还设定了严格的支出限制，平等适用于双方，以确保一方不会因为拥有更多资金而获得不公平优势。实际上，这些是英国选举的奥运反兴奋剂规则等价物，确保公平竞争。拥有更多资源意味着能够用自己的信息接触到不成比例的选民数量，因此对资源进行监管以维持公平选举。其他团体仍被允许参与竞选，但他们不会获得公共资金，也不能在不向官方限额申报支出的情况下协调他们的竞选活动。

政治家和竞选者必须在2016年4月13日之前赢得脱欧或留欧官方竞选的指定。Vote Leave和Leave.EU是主要的脱欧竞选活动之一。Britain Stronger in Europe从一开始就是留欧的官方竞选活动，还有“科学家支持欧盟”和“保守党支持留欧”等专门倡议也在为留在联盟而竞选。Vote Leave主要由保守党人组成，还有少数欧洲怀疑论的进步人士。另一个支持脱欧的竞选活动Leave.EU几乎完全专注于移民问题，其许多竞选者兜售种族主义比喻和极右翼谈话要点，以激怒公众。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目标和意识形态策略，根据英国法律，他们不能以任何形式合作。最终，Vote Leave和Britain Stronger in Europe获得了选举委员会的官方竞选地位。但两个主要的脱欧团体设置自己去按不同的按钮来吸引潜在支持者——这一策略在产生选票方面极其有效。

受过大学教育的城市居民，习惯于与移民一起生活并在受益于移民技术劳动力的企业中工作，他们拒绝右翼的恐吓宣传，普遍支持留欧。收入较低的英国人以及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或老工业中心地带的人更可能支持脱欧。国家主权一直是英国身份认同的核心部分，脱欧阵营论证说欧盟成员资格正在削弱这种主权。留欧支持者则反驳说现状在经济、贸易和国家安全方面带来了好处。

脱欧投票运动在公众面前由该运动的首席发言人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领导，他是一个傲慢的人，曾任伦敦市长，一直是保守党的宠儿，在保守党选民中拥有最高的支持率之一，还有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他可以说是约翰逊的对立面。戈夫缺乏约翰逊的傲慢，更加谨慎，是英国自由市场型自由主义者的宠儿。他们的口号“脱欧投票，夺回控制权”被留欧阵营嘲笑，但这实际上并不是关于欧盟本身。它意在吸引那些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在自己控制之中的选民——他们缺乏工作前景或教育机会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比任何人都更容易受到经济不景气和英国社会系统性忽视他们的影响。脱欧投票运动由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威斯敏斯特最臭名昭著的政治策略师之一，以及马修·埃利奥特(Matthew Elliott)——英国几个右翼游说团体的创始人，于2015年共同创立。脱欧投票办公室的一些人在政治观点上存在分歧，但他们在卡明斯的幕后领导下团结一致。

当脱欧投票运动在威斯敏斯特塔七楼运作时，该楼位于泰晤士河畔，直接对着议会，而Leave.EU则设在一百多英里外的布里斯托尔的莱桑德大厦(Lysander House)，俯瞰着繁忙的环形交叉路口。该组织与埃尔登保险公司(Eldon Insurance)共享办公楼，这家公司由百万富翁阿伦·班克斯(Arron Banks)经营，他恰好也是Leave.EU的联合创始人和主要资助者。该运动于2015年夏天启动，并在当年10月与剑桥分析公司合作。疑欧派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一位著名的右翼政治家，成为Leave.EU的代表人物。在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将班克斯和法拉奇介绍给美国亿万富翁罗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后，剑桥分析公司签约加入脱欧运动，为Leave.EU提供其算法和数字定向服务。宣布布列塔尼·凯撒(Brittany Kaiser)将成为Leave.EU的新运营总监，凯撒和班克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共同启动了Leave.EU。

在返回加拿大前不久，我与在英国政治期间结识的一些人喝了酒。其中一位是时任内政大臣特蕾莎·梅(Theresa May)的特别顾问，一位名叫斯蒂芬·帕金森(Stephen Parkinson)的同性恋保守党人。他是保守党人，但我在政治生涯中学到的一点是，与自己党派之外的人交朋友通常更容易，因为他们不会直接竞争你的工作，也不太可能试图在个人层

面上搞垮你。帕金森告诉我他刚刚从内政部请假去为脱欧投票工作——一个新创建的脱欧运动组织。我对帕金森参与其中并不感到惊讶，我告诉他我知道其他一些可能有兴趣加入他的运动的人。

其中一位是布莱顿大学的年轻学生达伦·格里姆斯(Darren Grimes)。我最初通过自由民主党认识了格里姆斯，但当该党在2015年选举惨败后的内部领导竞选中开始崩溃时，他变得幻想破灭了。当格里姆斯决定离开自由民主党时，他要求我将他介绍给保守党，所以我将他介绍给了帕金森。你可能从未听说过格里姆斯，但他后来意外地成为脱欧投票运动在脱欧公投中获胜的核心人物。

在我离开伦敦之前，帕金森和我见了几次面，因为他想听听我对数据分析的看法。他当时没有说明这一点，但他知道剑桥分析公司，并意识到这种定向工具对脱欧运动将有多么宝贵。他说他想把我介绍给某个人。“他的名字是多姆·卡明斯(Dom Cummings)。”我听到这个名字时畏缩了一下。

多姆·卡明斯——不是色情片名字，尽管这会是个不错的名字——在联合政府的教育部以马基雅维利式的操作者和非常难相处的人物而闻名。时任首相卡梅伦后来暗示卡明斯是一个“职业精神病患者”。与他的恶名相符，卡明斯后来成为了英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竞选资金违法法案的幕后策划者，使用在剑桥分析公司开发的一些技术将脱欧投票倾向于脱欧。但我直到为时已晚才了解到这些：当时，他只是一个粗鲁、野心勃勃的保守党工作人员，喜欢激怒英国政治体系中的每一个人。

帕金森、卡明斯和我一起坐在Vote Leave未来总部的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讨论选民定位。整个楼层都在装修，到处都是塑料布，但坐在阿尔伯特河岸，可以看到泰晤士河对岸威斯敏斯特宫的壮观景色。我对卡明斯的第一印象是他看起来很狼狈，就像刚从泰坦尼克号沉没后爬上救生艇一样。卡明斯的脑袋很大，头发总是乱蓬蓬的，稀疏的发丝胡乱地横在他秃顶的头顶上。他看起来有点茫然，或者有点迷糊，就像要么被困在解谜中，要么刚抽完一根超大的大麻烟——我从来搞不清楚到底是哪种情况。

值得称赞的是，卡明斯是我在英国政治这个平庸的奥吉亚斯牛圈中遇到的少数聪明人之一。我喜欢与卡明斯会面的原因是，我们没有谈论政治人士通常痴迷的话题。卡明斯明白，更多人忙于看卡戴珊或Pornhub，而不是关注BBC《新闻之夜》的当日政治丑闻。相反，卡明斯想谈论身份认同、心理学、历史，当然还有人工智能。然后他提到了文艺复兴科技，这是罗伯特·默瑟创立的对冲基金。卡明斯显然研究过剑桥分析，他问了很多关于这家公司如何运作的问题。他有兴趣创建他所谓的“政治界的Palantir”——听到尼克斯经常使用这个词后，我对这个术语感到战栗。我只是翻了个白眼，心想，又来了。

Vote Leave甚至还没有选民登记册，所以我告诉卡明斯，我极度怀疑他能开发出接近剑桥分析使用的数据集。我继续告诉他，史蒂夫·班农与奈杰尔·法拉奇关系密切，所以剑桥分析很可能已经在与他们的脱欧竞争对手Leave.EU合作了。会议后不久，Leave.EU正式宣布与剑桥分析的合作关系，显然破坏了卡明斯的计划。会议结束后，帕金森邀请盖特森和我来为Vote Leave工作。由于我已经接受了为贾斯汀·特鲁多工作的项目，我拒绝了。但盖特森在最初考虑和我一起去加拿大后，决定留在伦敦为Vote Leave工作，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搬到新国家这样的人生重大变化。出于礼貌，我还是给卡明斯发了一封邮件，概述了他如何可能尝试进行几千份选民调查的试点，但我估计在公投异常紧张的时间框架内，这大概就是他们能完成的全部——嗯，至少是他们能合法完成的全部。

就在我前往渥太华之前，我在伦敦的另一位朋友沙米尔·桑尼问我能否帮他找个实习机会。我们最初是在伦敦的夜生活中认识的，并通过Facebook保持联系，经常交流对政治、时尚、艺术、帅哥和文化的想法和观点。桑尼刚刚大学毕业，对政治感兴趣，但他没有人脉，需要介绍。我问他想加入哪里，但他说党派不重要；他最感兴趣的是获得经验。当我向留欧和脱欧阵营的联系人询问实习机会时，只有一个人回应：斯蒂芬·帕金森。帕金森问我想介绍谁，所以我给他发了桑尼的Instagram个人资料。帕金森显然被桑尼精心策划的照片迷住了，只回了两个词：“YES PLEASE!!!!”就这样，桑尼——后来成为两名脱欧举荐人之一——加入了Vote Leave阵营。

支持脱欧的领导人知道，仅仅对传统的右翼脱欧支持者讲话是赢不了投票的，所以Vote Leave优先考虑吸引更多元化的支持联盟。在英国政治中，公投运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倾向于努力做到尽可能跨党派，因为投票的是议题，而不是政党。公投结束后没有人“赢得权力”；只有理念获胜，而当时的政府可以选择是否实施结果。卡明斯和帕金森明白，脱欧胜利的关键是识别工党和自由民主党选民，以及那些通常不投票的人，并说服他们投票脱欧或保持中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支持脱欧的一方极其渴望招募自由民主党人、绿党、工党、LGBTQ群体、移民——尽可能多的传统非保守党选民。桑尼是帮助完成这一使命的完美人选。

支持脱欧最具说服力的进步主义论点之一相当简单。它认为欧盟倾向于偏袒欧洲——即白人——移民，而不是来自英联邦国家的移民，后者主要是有色人种。根据欧盟规则，来自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和奥地利等国家的移民无需签证即可在英国工作和生活。但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或牙买加等国的移民则需要经过严格筛查和困难的移民程序。然而，数百年来，英国主要通过使用整个英联邦有色人种的劳动力建立了其庞大的帝国，征服他们的土地，掠夺他们的资源，让他们在本土苦苦挣扎，而英国的伟大城市却在从海外创造的财富中蓬勃发展。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当英国的自由受到其他欧洲国家威胁时，英联邦公民被召集起来为英国而战。很少有（如果有的话）重要的战争电影被制作来纪念他们的牺牲，但许多英国的伟大胜利实际上是用来自印度、加勒比海和非洲的英联邦士兵的鲜血换来的。然后，几十年后，当欧洲看起来比刚从殖民统治中新兴的国家更有经济前景时，英国背叛了这些国家，关闭了边界，并对英联邦公民实施了严格的新移民规则。与此同时，英国开始对欧洲公民开放几乎不受限制的移民，而这些公民绝大多数是白人。

正是出于这种深深的不公平感，许多有色人种——像萨尼的朋友和家人这样来自巴基斯坦的人——对欧盟没有任何好感：他们知道不得不忍受卡夫卡式移民系统的感受，这个系统要求他们证明自己的每一分价值。他们知道生活在一个曾经剥削他们祖先来建设自己但现在却派遣内政部卡车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社区的街区游荡的国家是什么感受，这些卡车上写着警告：非法居留？回家或面临逮捕。发送HOME到78070。与此同时，一个德国人或意大利人，他们的祖父很可能曾经对英国召集参战的印度和尼日利亚军队进行过致命瞄准，却可以毫无疑问地进入英国，然后忙着申请工作。

当留欧运动高举其“支持移民”的信息来为欧盟辩护时，许多有色人种看到的是这一信息本身潜在的白人性质——它实际上意味着某些移民的权利。对于像萨尼这样的人来说，脱欧是一个关于边缘化和英国未解决的殖民主义遗产的故事——试图纠正拒绝移民和有色人种进入这个掠夺了他们数个世纪的国家的错误。正是通过识别这种沸腾的怨恨，支持脱欧的运动成功地在移民社区的某些部分和想要他们都“回家”的沙文主义脱欧派队伍之间建立了一种反直觉的联盟。

...

...

帕金森给了萨尼一个无薪实习职位

他在2016年春天作为志愿者开始工作。由于外展团队如此之小，他的职责迅速增加。他的大部分工作都专注于少数族裔和酷儿社区。他会访问贫困社区，询问居民他们计划如何投票以及为什么。

在萨尼在办公室的第一天，他注意到一个穿着绿色西装外套和粉色裤子的花花公子：马克·格特尔森，身着全套同性恋装扮。萨尼和格特尔森立即开始开玩笑说自己是这片保守白人男性海洋中的异类。格特尔森在2016年春天作为顾问加入了脱欧投票运动，以他的机智、智慧和对英国自由派的直觉理解给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立即开始为几个外展团体建立网站，其中许多都是他自己品牌化和命名的——绿叶(Green Leaves)、骄傲出柜(Out and Proud)等等。当我从自民党认识的二十二岁时装学生达伦·格赖姆斯加入团队时，他和格特尔森开始构思脱欧投票运动的进步派分支，名为BeLeave。

那时我在加拿大，但我们都通过Facebook保持联系。在为BeLeave设计品牌的过程中，格赖姆斯通过Messenger向我发送了他的创意表。尽管我忙于在渥太华为新自由党政府建立项目，但在他在自民党遭遇困难时期后，我想帮他一把。他面临的挑战之一是选择正确的颜色。脱欧投票运动的官方颜色是红色，所以他们需要不同的颜色。我说：“为什么不使用年度潘通色彩？”——2016年恰好是宁静蓝(Serenity blue)和玫瑰石英粉(Rose Quartz pink)。达伦做了一个模型，我回复说：“看起来如此同性恋和千禧一代。一点也不法西斯。”

BeLeave试图通过关注诸如移民待遇平等、结束他们所谓的欧盟和非欧盟公民之间的“护照歧视”、保护主义欧盟政策对非洲农民的不公平影响以及环境保护等问题来吸引支持脱欧选票中较温和的一面。在帕金森要求萨尼将注意力从少数族裔外展转向BeLeave后，他和格赖姆斯——一对二十出头的实习生——基本上运营着这个倡议，偶尔从脱欧投票运动的高级员工那里获得意见。由于强硬的反移民选票已经稳操胜券，脱欧派只需要确保一小部分更有自由思想倾向的选民就能获胜。数据是针对这些选民的关键。

不过，Vote Leave 没有它所需要的数据，而唯一能够提供这些数据的公司 Cambridge Analytica 也不是一个选择，因为它已经在与 Leave.EU 合作。如果 Vote Leave 与 Cambridge Analytica 合作，就会违反限制竞选活动之间协调的法律。我后来了解到，他们所做的是雇佣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起源与我在 SCL 早期的日子有交集，那时我刚开始组建技术团队。

这要追溯到2013年8月，当时我正在寻找能够帮助我的人。我回想起在LPC的时光以及Jeff Silvester的指导，他在我还在学校时就对我产生了兴趣。Silvester是一名受过训练的计算机工程师，在他开始倡导LPC新数据策略之前，就已经对企业数据系统有了深入的理解。他是个大个子，留着胡子——让我想起了《公园与游憩》中的Ron Swanson——Silvester总是体贴周到，但他也有着在政界摸爬滚打多年的人特有的干涩和愤世嫉俗的幽默感。他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外，周末时他会作为当地童子军队长帮助指导年轻人。我作为实习生与Silvester合作的头几个月，主要是帮助他处理难民和政治庇护申请的案件工作，他向我展示了如何真正改变人们的生活。他是我认识的最正直的人之一。

加入SCL后不久，我写信给Silvester，描述了这家公司的投资组合——不仅有为北约开展的心理战项目，还有在非洲抗击艾滋病的工作。他很快回复说：“你们需要一个加拿大办事处！”当特立尼达项目出现时，他如愿以偿了。SCL需要有人帮助构建和管理数据基础设施，而Silvester正好有合适的背景。Silvester挖来了另一位加拿大政治操盘手Zack Massingham，他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政治激烈环境的老手，来领导这家新公司的项目管理工作，他将这家公司称为AIQ。该公司在加拿大注册，法定名称为AggregateIQ，但它签署了一份知识产权协议，将其工作成果的权利

授予 SCL。SCL 以及后来的 Cambridge Analytica 经常利用以不同名称注册的离岸公司网络。与避税计划采用的策略类似，这个遍布全球的公司网络帮助 Cambridge Analytica 绕过选举或数据隐私监管机构的审查。

AIQ 的总部位于温哥华岛维多利亚市潘多拉大道上的一座砖砌建筑内，距离海边只有一个街区。SCL 和 CA 员工喜欢到这个办公室参观——与伦敦的狂热节奏相比，这里风景优美、微风习习、气氛轻松。随着 AIQ 的发展，该公司招募了一支出色且多元化的工程师团队来从事 SCL 项目。

AIQ 与 SCL 的特立尼达合同包括构建 Facebook 数据采集、点击流数据、ISP 日志以及 IP 和用户代理与家庭地址对账的基础设施，这将有助于去匿名化互联网浏览数据。随着 SCL 发展成为 Cambridge Analytica，AIQ 成为后端技术工程团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旦决定 CA 的模型必须加载到能够启动社交和数字广告定向的平台中，AIQ 就被指派构建 Ripon，这是 CA 的广告定向平台。在 Kogan 收集 Facebook 数据后，数据被传递给 AIQ 加载到 Ripon 平台中，该平台允许用户根据数百种不同的心理测量和行为因素对选民群体进行细分。在 2016 年美国初选期间，AIQ 工作人员会南下德克萨斯州，为参议员 Ted Cruz 的竞选活动构建基础设施。

当 Brittany Kaiser 和 Sam Patten 加入 Cambridge Analytica 并接管尼日利亚项目时，AIQ 被引入来分发 CA 的选民压制和恐吓宣传。在上传了女性被活活烧死和男性割喉时被自己的鲜血呛住的视频后，AIQ 试图根据 CA 提供给他们的地区和选民档案来定向投放这些内容。2015 年，当我发现 Silvester 正在从事这个项目时，感觉真的很奇怪：我曾经的导师根本不是那种会轻率传播酷刑受害者视频的人。几年后，我会与 Silvester 见面并询问他关于尼日利亚的事情。除了不自在的笑声外，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恨。不知何故，他已经与他的公司作为 Cambridge Analytica 承包商向世界散布的混乱达成了和解。

...

...

2016年6月16日下午，一位名叫乔·考克斯(Jo Cox)的支持留欧的工党议员正走向西约克郡伯斯托尔小镇的图书馆。她正前往她的“双周”接诊”，这是英国的一个传统，议员们定期主持与选民的公开会议，帮助选民处理案件工作或提出问题。但当考克斯距离图书馆门口只有几步之遥时，一个戴着棒球帽的男子向她走来，举起一把锯短的霰弹枪，大喊“英国优先！”，然后近距离射击了她。这名男子随后将41岁的考克斯拖到两辆停放的汽车之间，开始刺杀她，对试图阻止他的震惊旁观者挥舞着刀子。他在整个攻击过程中继续大喊“英国优先！这是为了英国！”，攻击最终结束时，他重新装弹并朝考克斯的头部开枪。考克斯是两个幼童的母亲，倒在人行道上奄奄一息。

乔·考克斯的遇刺在英国引起了真正的震惊波澜，在英国，枪支暴力远不如美国常见。议员同僚们聚集在议会广场举行守夜活动，哀悼者留下的鲜花形成了临时纪念地。很快就发现凶手是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和纳粹同情者，这只是加剧了脱欧派和留欧派支持者之间的情绪紧张。为了平息风暴，也是为了向考克斯致敬，脱欧和留欧阵营同意停止所有竞选活动三天，这在距离投票仅剩一周的情况下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然而，AIQ暗中继续为脱欧投票部署数字广告，知道英国媒体无法分辨他们是否继续在广告。看起来，在尼日利亚传播人们被折磨和杀害的视频之后，在公众为一名被谋杀的议员哀悼期间进行一些额外的数字竞选活动对他们来说并不过分。

此时，英国的政治气候已经变得极其恶毒。威胁被发送给留欧和脱欧支持的议员（主要是留欧一方），基于种族的暴力事件不成比例地增加，社交媒体每天都在爆炸。没有人再对英国政治中发生的事情保持被动或漠不关心的态度。人们觉醒了，人们愤怒了。非常愤怒。

这段时间脱欧一方的许多信息都针对“大都市精英”，正如政治家们所称的那样，以及有色人种和欧洲移民。脱欧投票推卸责任，但很明显他们把种族挑衅留给了Leave.EU，后者欣然（并自豪地）接受了这个事业。在乔·考克斯被谋杀的几天前，Leave.EU的法拉奇揭开了一张竞选海报，显示一队棕色皮肤的移民在“临界点”字样下面。这一举动被比作1930年代显示成队犹太人涌入欧洲的纳粹宣传。

当我坐在加拿大观看这场戏剧展开时，我告诉自己脱欧投票与Leave.EU不同，因为我的许多朋友都在为脱欧投票工作。法拉奇的竞选活动是使用剑桥分析的种族主义者，我想。脱欧投票不可能迎合那种言论。我错了。

到竞选的最后几周，脱欧投票已经花费了其分配的700万英镑中的几乎全部。英国法律禁止它接受更多资金或与其他竞选活动合作，但卡明斯想继续花钱并决定找到另一种方式。AIQ一直在接收脱欧投票广告支出的大部分，卡明斯对AIQ数字定向能力的力量印象极其深刻。AIQ能够定向、参与并激怒特定选民。AIQ的许多目标是不经常投票的选民，所以即使公共民调显示留欧领先，这意味着AIQ正在接触传统竞选活动和民调公司系统性排除的选民的新利基。但AIQ意识到，如果要维持其势头，它需要比脱欧投票法律上被允许花费的更多资金——而且需要快速获得。所以注意力转向了BeLeave项目。直到那时，BeLeave一直是由脱欧投票办公室的几个实习生运营的完全有机的操作。没有付

费广告，所有创意内容都由萨尼和格赖姆斯在业余时间开发。脱欧投票会为某些事情提供指导和资金，但只有很少的金额——这里100英镑，那里100英镑。

大约在同一时间，帕金森开始邀请萨尼在他家里加班到很晚，因为他知道萨尼住在英国伯明翰，两人开始了一段关系。对于22岁且尚未向家人出柜的萨尼来说，这一切都很新鲜和令人困惑。他不知道如何处理现在与老板的这种亲密情况。但他对从一位在英国政府最高层工作的高级政治顾问那里获得如此多的关注和指导感到敬畏。帕金森会带萨尼出去，告诉他对他的工作多么满意，如果他继续保持下去，可能会有未来的职业前景。萨尼同意保守这段恋情的秘密。

选民们也注意到了BeLeave的工作。萨尼和格赖姆斯创作的一些内容传播开来，甚至超过了脱欧投票的付费广告。BeLeave的图形专注于进步问题，如“卫生棉条税”，论证如果英国人脱离欧盟，他们就不需要其他27个成员国同意来取消这个明显是厌女症的税收。似乎BeLeave的进步、觉醒和以社会正义为导向的欧洲怀疑主义品牌有一个明确的市场。在6月23日公投前几周，脱欧投票外联负责人克里奥·沃森为格赖姆斯和萨尼安排了与潜在捐赠者的会面。这对搭档在脱欧投票总部会见了捐赠者，并提出了一个概述他们帖子效果的提案——他们的有机外联在某些情况下超过了脱欧投票付费广告的影响。

Grimes曾向我发送了这份演示文稿，询问我如何优化Facebook在线定向投放以及他们的预算应该是多少。我回复了他，就他们应该使用什么指标以及如何进行推销提供了指导。这是一份不错的演示文稿，但捐赠者最终决定不投入任何资金。在捐赠者撤资后，Vote Leave的一位高级董事找到了这两名年轻实习生，告诉他们已经找到了为BeLeave筹集资金的新方法——但他们必须先签署一些文件。在与Vote Leave的律师会面后，Sanni和Grimes被指示成立一个独立的竞选团队，开设银行账户，并起草正式章程。Vote Leave的律师起草了新竞选团队的章程细则，并交给实习生们文件签署。Sanni和Grimes没有意识到的是，由于BeLeave与Vote Leave合作得如此密切，BeLeave继续花费更多资金是不合法的。通过声称BeLeave竞选团队是独立的并可以花费自己的预算，Vote Leave让这些年轻实习生承担了这个“独立”竞选团队任何非法竞选支出的风险。但两名实习生并未被告知任何这些情况，他们继续像以前一样，在Vote Leave总部工作，参加Vote Leave活动，并帮助散发传单。

下周，Grimes和Sanni被告知Vote Leave承诺给他们的资金终于要到位了——而且数额将超过他们的要求。事实上，这将会比他们要求的多出数十万英镑。Vote Leave开始组织向BeLeave转账70万英镑，这将是Vote Leave整个竞选活动中最大的一笔支出。但Grimes和Sanni必须先同意一个条件。Vote Leave面临的问题是，如果这两人作为“独立”竞选团队收到这笔钱，他们在法律上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花费这笔钱。因此Vote Leave告诉两名实习生，他们永远不会在新银行账户中看到任何资金。相反，Vote Leave会直接将资金转给AIQ，而Grimes和Sanni只需要在一套AIQ发票上签字。失望的Sanni询问是否至少可以用这些资金支付他的差旅和餐费（他是财务主管和秘书），但他的Vote Leave主管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Grimes和Sanni完全不知道他们刚刚同意的做法是完全非法的。他们信任Vote Leave的律师和顾问，这些人一直告诉他们一切都井然有序。

这种欺骗更加恶劣的是，Vote Leave的律师将这些实习生的姓名写在BeLeave文件上，使Grimes个人承担最终到来的法律后果责任。这在英国竞选活动中一些较为肮脏的流派中并不罕见，特别是在保守党中，他们多次被发现使用这种策略：不想承担违反选举法个人风险的高级竞选顾问会找到经验不足的人，通常是热心的年轻志愿者，并提名他们为竞选团队的“代理人”，这使得该人在法律上对竞选活动负责。这样，如果不当行为被发现，就有了替罪羊，而真正的肇事者可以全身而退，继续享受他们接近权力的地位，而将被背叛的志愿者和破碎的生活抛在身后。

...

...

终于，公投日到来了

6月23日，暴雨继续猛烈冲击英格兰南部，匆忙投票的伦敦人最终面临可怕的延误，由于洪水，火车站关闭，地铁在晚上停运。包括Grimes和Sanni在内的大部分Vote Leave团队成员，这一天都在前往关键的脱欧选区进行选民动员。Dover是英国通过海路和铁路进入欧洲的门户，也是英国人进入英吉利海峡前的最后一站。志愿者们在Dover的大雨倾盆中挨家挨户敲门，花费了许多小时。右翼小报《太阳报》头版有一个醒目而熟悉的标题：BELEAVE IN BRITAIN。

直到投票当晚，我才知道AIQ参与了脱欧竞选活动，当时Parkinson给我发了一张他与Massingham在Vote Leave总部的合影——他们在雾气蒙蒙的窗户前咧嘴笑着，议会大厦的轮廓在他们身后若隐若现。奇怪的是，尽管自从我回到加拿大后见过Silvester几次并与其交谈，但他从未提及AIQ与脱欧竞选活动的联系。在支出报告公布后，透露AIQ获得了Vote Leave预算的40%——以及来自其他支持脱欧竞选团队（包括BeLeave）的数十万英镑。

现在我明白了，这就是Cummings如何绕过Cambridge Analytica已经与Leave.EU合作这一事实的方法——他只是使用了CA的一个子公司，总部设在不同的国家，名称无人知晓。AIQ拥有Cambridge Analytica的基础设施，处理其所有数据，并能执行所有相同的功能，但没有Cambridge Analytica的标签。（Vote Leave否认其能够访问Cambridge Analytica的Facebook数据。）没有人想告诉我，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离开Cambridge Analytica时关系如此糟糕，其他许多人也是如此。Silvester和Massingham选择保持沉默，因为这是他们在政治领域最大的工作。Silvester很乐意谈论他们在非洲或加勒比海所做的可疑工作，但不愿谈论脱欧。

作为一个曾经参与过定向竞选活动的人，我知道媒体谈论的大部分内容并不是个人和团体在公投期间实际看到的内容。几乎瞬间，我意识到英国正在发生一些极其邪恶的事情。即便如此，72%的选民投了票。几个小时内，投票结果难分伯仲，但最终，脱欧以51.89%的得票率获胜。当时我并不知道，脱欧阵营已任命托马斯·博尔威克(Thomas Borwick)担任竞选活动的首席技术官。在加入脱欧阵营之前，博尔威克曾与亚历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和SCL公司合作，在加勒比海各岛国开展了多个数据收集项目。（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博尔威克参与了SCL在该地区的任何非法工作。）公投后，博尔威克透露，脱欧阵营和AIQ在公投前几周内共同传播了100多个不同的广告，向目标选民发送了1,433条不同的信息。卡明斯(Cummings)后来透露，这些广告被观看了超过1.69亿次，但只针对几百万选民中的一小部分，这导致他们的新闻推送被脱欧阵营的信息所主导。

英国人民成为了AIQ部署的大规模信息操作的目标，留欧阵营的问题在于他们完全没有理解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正如剑桥分析公司所发现的，激发愤怒和愤慨减少了对完整理性解释的需要，并会让选民进入一种更加不加区别的惩罚性心态。CA发现，这种愤怒不仅让目标选民对经济将受到损害的观念免疫，而且一些人甚至会支持经济受损，如果这意味着大都市自由派或移民等外群体也会在此过程中受苦——实际上，他们的投票被用作一种惩罚形式。

这种方法被证明对留欧阵营的“恐惧计划”信息传递是有效的，该计划试图让选民关注退出欧盟的潜在灾难性经济风险。简而言之，让愤怒的人感到恐惧要困难得多。由愤怒产生的“情感偏见”调节人们对负面结果的估计，这就是为什么愤怒的人更倾向于从事风险行为——无论他们是在投票还是在酒吧打架，情况都是如此。如果你曾经参与过酒吧斗殴，你就知道让你的对手三思而后行的最糟糕的方式就是对他大喊威胁。这只会激怒他。

留欧阵营对经济的关注也忽略了停下来问问人们首先认为经济是什么。剑桥分析公司发现，非城市地区或较低社会经济阶层的许多人经常将“经济”的概念外化为只有富人和大都市人参与的东西。“经济”不是他们在当地商店的工作；那是银行家做的事情。这也使得某些群体对经济风险甚至贸易战感到安心，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混乱将被

释放到那些在”经济”中工作的人身上。他们听到的经济论证越有力，就越确信他们”实际上”听到的是一个胆怯的精英阶层担心失去财富的恐惧。这让他们感到强大，这将成为他们想要行使的力量。

脱欧获胜后，一阵震惊和惊愕席卷了英国和世界。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在唐宁街10号前发表了沉重的声明，表示他将在10月前辞去首相职务。欧元和英镑都大幅贬值，全球股市暴跌。一份请愿书开始流传，要求举行第二次公投，在选举后72小时内，超过350万人签署了这份请愿书。在美国，反应主要是惊讶和困惑。当评论员试图分析脱欧对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时，奥巴马总统采取了保持冷静并继续前进的方法，向所有人保证”有一件事不会改变，那就是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

当时的共和党推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恰好在苏格兰，正在访问他的特朗普滕贝里高尔夫度假村。他称脱欧胜利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说选民夺回了他们的国家。

“人们想要夺回他们的国家，他们想要独立，”特朗普说。“人们很愤怒，全世界都是如此...他们对边界感到愤怒，他们对人们涌入国家并接管感到愤怒，没有人甚至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对很多很多事情感到愤怒。”

世界还不知道，但脱欧是一个犯罪现场。英国是班农(Bannon)多年前启动的一项行动的第一个受害者。脱欧运动中所谓的”爱国者”，他们大声呼吁从毫无面目的欧盟手中拯救英国法律和主权，决定通过嘲弄这些法律来赢得投票。为此，他们在外国司法管辖区部署了与剑桥分析公司相关的公司网络，远离负责保护我们民主制度完整性的机构的监督。这预示了美国即将发生的事情，在脱欧惨败期间出现了一个清晰的模式，以前不为人知的外国实体开始通过部署来源不明的大型数据集对国内选举施加影响。由于社交媒体公司没有对在其平台上传播的广告活动进行任何检查，没有人站岗阻止寻求播撒混乱和破坏我们民主制度的敌对实体。

第10章

学徒

“我不打算撒谎，这绝对是我处理过的最奇怪的案件之一，”我的律师说道，当时我们坐在她位于伦敦的办公室里，阅读剑桥分析公司于2015年6月发出的一份起诉前通知书，信中错误地声称我试图建立一家竞争对手公司，以帮助新兴的特朗普总统竞选活动。唐纳德·特朗普在几个月前首次进入我的生活，那是2015年春天，马克·布洛克给我打电话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令人耳目一新，与我在剑桥分析公司所做的工作相去甚远。正如布洛克所解释的，特朗普集团需要市场研究方面的帮助，要么是为了特朗普的真人秀节目《学徒》，要么是为了他的赌场。布洛克还联系了仍在伦敦的朱西卡斯和盖特尔森。我们三人进行了交谈，并同意与特朗普高管会面。

在与特朗普集团的通话中，我们听说了《学徒》收视率下降的情况，以及越来越少的人入住特朗普酒店和在赌场赌博。随着在线赌博的出现，以及对唐纳德·特朗普作为一个性感、精明亿万富翁公众形象的完全依赖，他的团队似乎开始意识到，过时的赌场系统和一个老化的、橙色污渍的C级名人并不能为潜在的新客户营造“性感和有趣”的感觉。特朗普品牌正在走下坡路，公司需要想办法给它一个提升。

这个项目令人沮丧地模糊不清，高管们甚至不确定我们做什么或如何能帮助他们，我开始怀疑特朗普高管们只是在寻求免费建议。当他们提议大约一个月后开会时，我拒绝了，满足于让朱西卡斯和盖特尔森从特朗普大厦回来汇报。会议在特朗普大厦的一家餐厅举行，对话从通话中断的那个模糊地方继续。我们能否使用数据来提升特朗普及其产品的形象——复兴特朗普品牌？如果可以，这样一个项目的目标是谁？

当盖特尔森打电话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时，他在笑。“你不会相信这个，”他说。“特朗普计划竞选总统。”会议包括科里·莱万多夫斯基，他自称为特朗普的竞选经理，向盖特尔森和朱西卡斯保证特朗普确实认真考虑竞选总统。他邀请我们参与竞选活动——这是我出于几个原因不想参与的提议。第一：这是一个政治竞选活动，而我已经辞去了剑桥分析公司的职务，离开伦敦就是为了远离政治。第二：特朗普似乎是一个完全荒谬的个人，作为候选人可能会失败。第三：他作为共和党人竞选，而我已经完成了为右翼政治家做肮脏工作。为真人秀节目探索如何提高收视率是一回事；帮助共和党人竞选总统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盖特尔森同意了——朱西卡斯，很快就会成为共和党竞选活动的顾问，不太同意——我们认为特朗普的副情节已经结束了。

但几周后，在2015年6月5日，我们得知剑桥分析公司正在起诉盖特尔森、朱西卡斯和我。他们声称我们违反了与公司签署的保密协议中的非招揽条款。据诉讼称，我们招揽了剑桥分析公司的一个客户：唐纳德·特朗普。通知我们诉讼的信件给了我们两周时间回应，所以尽管这个案件显然是虚假的，我决定聘请律师让它尽快消失。在我们的第一次会面中，律师们感到困惑。想象一下这次对话有多奇怪，在剑桥分析公司或史蒂夫·班农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之前很久：“所以有这个心理战公司，”我告诉他们。“它被美国的这个共和党亿万富翁收购了。在我辞职后，我被邀请与唐纳德·特朗普交谈——就是《学徒》里的那个人？显然，他要竞选总统，而且他秘密地是他们的客户。所以现在他们在起诉我...”

到现在，剑桥分析公司已经像疾病一样在共和党内传播，为众议院和参议院竞选中的重要候选人提供建议，并代表右翼利益集团开展研究文化现象的项目，比如美国青年中的军国主义。表面上看，剑桥分析公司非常成功。但在幕后，该公司正在搞砸整个共和党——特别是默瑟家族。对我来说，诉讼中的真正启示是，剑桥分析公司与特朗普有

联系，作为一个账外客户，同时该公司还在为默瑟家族首选的总统候选人泰德·克鲁兹工作。班农不仅与默瑟家族有不同的议程，他也没有兴趣支持他鄙视的克鲁兹。

在我向律师解释说我没有为特朗普工作后，他们基本上说：“好吧，别担心。公司经常发送这些信件作为严厉警告，但通常什么也不会发生。这可能是他们主管的不安全感。我们可以处理这个。”

但这不会便宜。确实，Cambridge Analytica明确表示他们打算继续纠缠我，让我付出金钱和内心平静的代价，直到我屈服。我提出签署一份文件，说我永远不会再为共和党工作，但Cambridge Analytica不要这个。他们要我永远不再处理数据，这当然是一个不可能的要求。我们来回回，持续了数月之久。整件事变得越来越离奇。在法律纠纷过程中，我发现在Gettleson和我离开公司后，CA编造了两个虚假的员工角色——“Chris Young”和“Mark Nettles”——他们继续在网站上和与客户打交道时使用这些身份。最终我同意签署一份保密契约，这本质上是一份超级保密协议，声明我永远不会讨论我在Cambridge Analytica所见所做的事情。我不知道的是，我未来作为举报人的第一个陷阱已经设下了。

...

...

当我搬回加拿大为特鲁多的研究团队工作时

我的日子主要涉及电话会议和会面，在很大程度上我欢迎这种稳定和温暖的环境，这里没有敌意，特别是老板不会一心想要在心理上虐待他的员工。

2016年3月，一位加拿大政府高级官员打电话给我，要求一份略微超出我工作范围的简报。他想了解美国共和党初选的情况，当时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具体来说，他想知道为什么唐纳德·特朗普在民调中飙升。3月1日，特朗普在超级星期二的十一个州中的七个州赢得了共和党初选，成千上万的尖叫支持者挤满了他在全国各地的集会。特朗普行为越是离谱，他的民调数字似乎就越高：在3月3日的总统辩论中，他与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就所有事情中最奇怪的——他的阴茎大小——发生争执，特朗普吹嘘说：“我保证没有问题。”两周后，特朗普在一天内赢得了六个州和地区中的四个——卢比奥退出了竞选。特鲁多的人还不担心——但他们很好奇，因为这个电视真人秀明星转身候选人在他们看来既荒谬又奇怪。他为什么做得这么好？美国人在想什么？像许多加拿大同胞一样，他们得意地摇头看着他们落后的邻居。

加拿大人很难理解民粹主义，因为与美国或英国不同，它从未有过任何鲁珀特·默多克拥有的媒体。加拿大没有福克斯新闻或《太阳报》。由于其更谨慎的银行系统，该国没有经历房地产危机或金融崩溃。与OECD其他国家不同，加拿大是一个例外，爱国主义和对移民的支持实际上彼此正相关。所以我发现自己一遍又一遍地向困惑的加拿大人重复同样的对话，他们根本无法理解脱欧或特朗普是如何可能的。

皮埃尔·特鲁多，加拿大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的总理，曾经说过与美国如此接近就像”与大象同床共枕”。无论这头野兽多么友好和脾气温和...人们都会受到每一次抽搐和咕噜声的影响。“即使特朗普不会获胜——当时很少有人认为他会——他在贸易上的立场已经在制造涟漪。特朗普讨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并在在与加拿大贸易关系至关重要的州激起美国选民的情绪。担心的不是特朗普会获胜，而是他持续的时间越长，他的反NAFTA言论可能越会影响这些州的州长和立法选举，这反过来会改变关于贸易的全国对话。

Cambridge Analytica传奇尚未深入公众意识，但在我的加拿大同事中，我为该公司所做的工作最终被传递给某些美国政治竞选活动并不是秘密。随着特朗普继续取得进展，他们的好奇心增长了。我描述了Cambridge Analytica的选民操纵策略——公司如何识别和针对具有神经质或阴谋论倾向的人，然后传播旨在加深和突出这些特征的宣传。我解释了Cambridge Analytica如何在从Facebook获得人们的数据后，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比他们自己的配偶更好地预测他们的行为，以及公司如何使用这些信息实际上在共和党内部激化人们。

所以虽然很明显特朗普触动了一定比例美国选民的神经，Cambridge Analytica在幕后工作，将他的竞选活动提升到另一个层次。他们针对的很多人是那些通常不投票给共和党或根本不投票的人。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扩大选民基础，同时他们致力于压制选民。特别是，他们专注于使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社区失去参与度。他们这样做的方式之一是兜售左翼社会正义言论，将希拉里·克林顿描绘成白人至上主义的传播者——而他们自己却为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工作。目标是让来自更左翼意识形态的所有人口统计学群体的人投票给第三方候选人，比如吉尔·斯坦。

我开始关注候选人特朗普是在剑桥分析公司起诉我的时候，因为那时我才得知该公司正在为他工作。起初，他的竞选活动一团糟。但随后他开始重复诸如”建造边境墙”和”清理华盛顿沼泽”这样的短语，他在民调中开始上升。我致电格特森说：“嗯，这听起来非常熟悉，不是吗？”——因为这些正是CA测试过并包含在发送给班农的报告中的确切短语，而这远在特朗普宣布参选之前。这意味着，在2016年整个春季，当剑桥分析公司据说在为泰德·克鲁兹工作时，其研究成果似乎正在（眨眼暗示！）传达给唐纳德·特朗普。

随着初选的继续，特朗普获胜的机会显然在增加，渥太华人们的态度开始从”他疯了，哈哈”转变为”他疯了……而且他可能会成为我们隔壁那头大象的总统。”

...

...

随着脱欧逼近，特朗普势头渐长，我意识到是时候发声了。我决定联系几个在硅谷工作的朋友。其中一个——我称她为”希拉”——认识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的某个人，这是由科技奇才马克·安德森共同创立的风险投资公司。在九十年代早期，安德森与埃里克·比纳一起创建了Mosaic网络浏览器，永远改变了人们使用互联网的方式。Mosaic后来变成了网景，在1995年的IPO中成为最早的互联网超级成功案例之一。从那时起，安德森通过投资Skype、Twitter、Groupon、Zynga……以及Facebook等公司赚了数亿美元。他还担任Facebook的董事会成员。

2016年春，我飞到旧金山，开始向相关方面汇报我在剑桥分析公司看到的情况。希拉在门洛帕克沙山路的安德森霍洛维茨办公室安排了一次会面。从外面看，这栋建筑像是稍微高档一些的郊区牙医诊所，但里面，相当平淡的大厅通往悬挂着极其昂贵艺术品的墙壁。我在会议室与安德森的工会会面，告诉他们关于剑桥分析公司、它盗用的数百万Facebook档案，以及它恶意使用这些档案干预选举的方式。

“伙计们，你们为一个主要股东和董事会成员工作，”我说。“Facebook需要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告诉我调查此事。这是否真的发生了，我不得而知。

既然Facebook董事会成员现在显然在处理此事，我去了旧金山教会区的一个聚会，预计一位Facebook副总裁会在客人中。结果证明，聚会中满是Facebook员工。装扮是标准的硅谷风格——修身灰色T恤——很难在谈话中不听到生酮断食饮食的进展报告、喝Soylent代餐，以及为什么食物正在变得”被高估”。作为来自剑桥分析公司的家伙被介绍后，我迅速成为关注的焦点，因为他们都听过很多关于这家公司的传言。当时，他们似乎都知道剑桥分析公司，我后来发现早在2015年9月，Facebook员工就内部讨论过剑桥分析公司，并要求调查该公司可能的数据”抓取”行为。员工们在2015年12月重申了调查请求，后来在对Facebook提起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投诉中被引用，将该公司描述为”一家可疑的（至少可以这么说）数据建模公司，已经深入渗透我们的市场。”“但当我回答他们的问题时，显然民主面临的威胁并不像剑桥分析公司成功实施的机制那样引起他们的兴趣。即使是Facebook副总裁似乎也大多不为所动。如果我对剑桥分析公司有意见，他说，那我应该创建一个竞争公司——通过开发Lyft来回应宣传界的Uber。这个建议在我看来是变态的——更不用说不负责任——来自一家完全有能力采取有意义行动的公司的公司的高管。但我很快意识到，这就是硅谷的运作方式。对任何问题的反应，即使是像威胁我们选举完整性这样严重的问题，也不是”我们如何解决它？”“而是”我们如何将其货币化？”“他们无法看到商业机会之外的东西。我浪费了时间。我后来参与的美国监管调查最终确定至少有三十名Facebook员工知道剑桥分析公司——但在我举报使这个故事公开之前，该公司没有建立任何程序向监管机构报告此事。

后来，我被安德森霍洛维茨的员工邀请到一个名为”未来世界”的私人Facebook聊天群，硅谷主要公司的高管们在那里讨论科技行业面临的问题，包括我提出的问题。安德森也开始与硅谷其他高管讨论他们的平台可能被滥用的问题。他邀请其他几位硅谷知名人士到他家参加一个晚餐小组，他们开始称之为”军政府”——指代夺取权力后统治国家的威权集团。

“如果我们的通信被政府注意到，”一个小组成员给安德森发邮件说，“那肯定很讽刺，”因为”他们的算法被我们讽刺性地使用’军政府’这个词触发了。”

2016年初夏，俄罗斯叙事开始浮现。6月中旬，Guccifer 2.0泄露了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窃取的文件。一周后，就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前三天，维基解密发布了数千封被盗邮件，在伯尼·桑德斯、希拉里·克林顿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黛比·瓦瑟曼·舒尔茨之间制造了裂痕，舒尔茨几乎立即辞职。当然，尼克斯最终在丽贝卡·默瑟的授意下开始四处打听克林顿的邮件，最终向维基解密提供剑桥分析公司的服务，帮助传播被黑客攻击的材料。我从一位仍在该公司工作的前同事那里得知了这件事，他认为一切都失控了。

当民主党人试图让他们的大会重回正轨时，唐纳德·特朗普向该党投掷了另一枚隐喻手榴弹。在7月2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他随意地邀请俄罗斯继续干预竞选活动。“俄罗斯，如果你在听，”他夸夸其谈道，“我希望你们能够找到那三万封丢失的邮件”——这是指克林顿认为是个人邮件并删除的邮件，而不是将它们交给调查她使用私人邮件服务器的调查人员。

整个夏天到秋天，特朗普和普京互相赞美，我开始回想在剑桥分析公司注意到的奇怪的俄罗斯关联。科根与圣彼得堡的联系。与卢克石油公司高管的会面。萨姆·帕顿夸耀与俄罗斯政府合作。剑桥分析公司的内部备忘录暗示俄罗斯情报部门。莫名其妙地插入我们研究中的普京问题。甚至布列塔尼·凯泽与朱利安·阿桑奇和维基解密的明显联系。当时，我认为这些都是奇怪的事件，彼此之间都是偶然的。但现在它们开始看起来像是更重要的东西。

特朗普在7月19日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成为共和党候选人。如果我的直觉是正确的，剑桥分析公司不仅在使用我参与开发的数据工具来操纵美国选民支持他，它还可能在有意或无意中与俄罗斯人合作影响选举。现在我在剑桥分析公司外部观察，就好像我有X光视觉一样。我知道这家公司愿意探索的深度，以及其核心的道德空虚。我感到恶心。我知道我必须告诉某人——拉响警报。

我联系了特鲁多政府的某个人——我称他为“艾伦”——告诉他我的担忧。我开始描述俄罗斯、维基解密和剑桥分析公司之间的所有联系。我告诉他，我开始相信剑桥分析公司是俄罗斯故事的一部分，并建议我们与美国政府的某个人分享详细信息。

我们不想越界，我们想保持对美国选举的尊重。我们担心，尽管我们只想警告美国潜在的安全威胁，特别是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但站出来可能被误解为外国行为者试图干预选举——我们绝对不是这样。我们确定了一个替代计划——前往伯克利参加一个专注于数据和民主的会议，在那里我们可以与我们知道会在那里的几位白宫官员进行谨慎的交谈。

我与之广泛讨论这一切的另一个人是肯·斯特拉斯马，奥巴马的前定向主管。我曾在纽约与斯特拉斯马会面，告诉他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定向。由于他的公司刚刚为伯尼·桑德斯的2016年竞选活动提供了微定向服务，自然他很感兴趣。

在克林顿在7月下旬获得提名后，斯特拉斯马给我打电话说：“既然我们输了，我要看看能否与希拉里的数据团队交谈。”他问我是否有兴趣与他们会面，概述我对特朗普竞选活动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怀疑。当然，我告诉他。不幸的是，我们从未能够与克林顿团队联系上。

8月，我与贾斯汀·特鲁多办公室的一些顾问前往伯克利参加会议。我们只会在那里呆几天，所以我请硅谷的另一个朋友——我称她为“凯拉尼”——帮助我们安排会议。最重要的一个将是与白宫工作人员的会议。

我知道与白宫官员的会议会很短，这意味着我们只有一次机会来表达我们的观点。由于我的听众很可能不熟悉剑桥分析公司，很有可能他们不会理解我们在说什么，会错过其重要性。所以我请凯拉尼找一个谨慎的环境，在那里我们可以建立基地并计划我们的会议。

“你想要多谨慎？”她回答。“我可以给你找一个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方。”

“有点不必要，但好吧，”我笑着说。她给了我们一个地址。

第二天下午，我们开车到GPS指向的地方，结果是一个造船厂的中央。凯拉尼在等待。她带领我们经过一个仓库，沿着码头走。事情变得奇怪，当我们不得不绕过巨大的海豹时，它们变得更加奇怪。经过它们，我们遇到了一艘135英尺的挪威渡轮，部分地方生锈——它绝对不会通过检查。这艘曾经白色的船已经变成灰色，整个底部粘着藤壶。有人扔下一个梯子，让我们爬上这艘在水中摇摆晃动的船。

Kehlani找到了能想象到的最安全的环境：一艘黑客船。这艘停泊在旧金山附近的船只只是几名程序员的家，他们从事初创企业和其他不确定的技术活动。我们没有问。考虑到当时发生的一切，这一切都感觉非常合适。我们在整个行程中都把这艘船为基地。

第二天到达会议现场时，我们为非正式会面做了安排。特别是艾伦，他急切地希望我们强调，我们是以个人身份进行这次对话，而不是作为特鲁多的代表。这次会议将介绍不代表政府的加拿大政府雇员与不代表白宫的白宫工作人员见面。话题是美国大选以及共和党在剑桥分析公司方面发生的事情，包括其庞大的监控数据库及其与外国情报机构的潜在关系。

白宫小组中有人问我们是否可以到外面谈话，因为他们整天都被困在会议中。就这样，我们最终出现了一个相当奇怪的场面：一群高级政府顾问围坐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园附近的野餐桌旁，谈论剑桥分析公司和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选举的事情——与此同时，吸大麻、背着背包的学生从旁边走过。

我开门见山，警告美国人剑桥分析公司可能参与俄罗斯干预。“我们知道特朗普竞选团队中有与外国情报部门有联系的个人，”我说。“他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社交媒体数据库，正在针对美国选民进行部署。”

我详细说明了剑桥分析公司与俄罗斯的联系，并描述了尼克斯向卢克石油公司(Lukoil)做的演示。我告诉他们该公司破坏人们对选举过程信心的工作。

他们的回复是……漠不关心。一位美国人说他们做不了什么，因为害怕被指控利用联邦政府的权重来影响投票。（我清楚地记得“移动刻度盘”这个短语。）奥巴马团队似乎极其担心不要玷污他们认为几乎确定的克林顿胜利。现在看来很荒谬，但当时，传言是在他不可避免的失败后，特朗普打算推出特朗普电视台作为福克斯新闻的竞争对手。他也被期望声称选举被操纵了——深层政府影响了它，或者克林顿作弊了，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担心特朗普会利用任何不正常现象来质疑选举的合法性，奥巴马政府希望确保不给他任何具体的抱怨理由。

当白宫人员告诉我特朗普电视台的事情时，这说得通。我想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毕竟，这是发生在他们的国家，不是我的。我们都握了手，各自离开。这种回应并不是独有的。2016年初，Facebook高级管理层已经识别出俄罗斯黑客为寻找与总统竞选相关的个人而探测了该平台，但选择不警告公众或当局，因为这会给公司带来声誉问题。（Facebook首次公开概述俄罗斯在其平台上的信息操作的程度是在2017年9月，比它首次识别这个问题晚了一年多，比开始调查所谓的在其网站上传播的虚假信息“五级警报火灾”晚了七个月。）最终，在民主党对威胁的漠不关心和硅谷无法理解如何在不创造另一个“X的优步”的情况下解决问题之间，我警告美国人的努力毫无结果。当

你试图拉响警报而人们不断告诉你”不要担心”或”不要摇摆不定”时，你开始怀疑也许你反应过度了。我不在克林顿竞选团队或白宫。我只是加拿大的一个人，对着风呐喊。

当然，不好笑的结尾是，在克林顿和奥巴马团队极其不愿”干预”选举之后，FBI局长詹姆斯·科米会昂首阔步地走进来，通过他在最后时刻重新开启克林顿邮件调查的决定把一切都炸得天翻地覆。那时，回到加拿大，我觉得我在看着一个自毁的朋友最终倒下。你只能站在那里恐惧地想，*我试图告诉过你！*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朋友不只是烧毁自己的房子。他在烧毁整个社区。

...

八月下旬，参议员哈里·里德公开敦促FBI调查俄罗斯对选举的干预。但当时，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这场竞赛是克林顿的天下。与此同时，剑桥分析公司正式宣布与特朗普竞选团队合作。这让渥太华紧张不安，因为我已经明确表达了剑桥分析公司数据的力量和影响范围。该公司代表特朗普的工作已经足够令人担忧，但当你把俄罗斯联系加入等式时，整个情况似乎非常令人警觉。

特朗普获胜的可能性是特鲁多办公室的话题，尽管它仍然主要是一个笑料。在从不可想象到不可思议到可怕的量表上，它到底有多不可想象？我们有一次会议，几个人在取笑特朗普。天哪，这些美国人！他们每次都超越自己！每个人都笑了。嗯，几乎每个人。我没有笑，因为我理解大规模心理战的力量。

德国人有一个表达叫做*Mauer im Kopf*，大致翻译为“心中的围墙”。1990年东西德统一后，两个德国之间的法律边界被取消了。检查站消失了，铁丝网被撕掉了，柏林墙最终被推倒了。但即使在统一十五年后，许多德国人仍然高估了东西德城市之间的距离。似乎存在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心理距离，这种距离背叛了国家的地理，在人们的心中创造了一个虚拟的边界。尽管那堵混凝土和钢铁的墙早已倒塌，但它的阴影仍然存在，深深烙印在德国人民的心理中。当这个新候选人横空出世，要求美国建造围墙时，我知道这不是字面上的要求。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似乎不知道如何应对如此荒谬的竞选纲领。但与这匹新的黑马不同，他们无法洞察美国人民心中发生的事情。他们看不到那些人要求的不仅仅是一堵物理围墙。这不是要建造一堵字面意义上的墙——围墙这个想法本身就足以开始实现班农的目标。他们要求的是创造美国自己的*Mauer im Kopf*。

Alan也没有笑。在一次会议上他说：“我真的认为特朗普能赢。”人们看着他翻白眼，有人说：“得了吧。”然后他看着我，我说：“是的，我也认为他能赢。”那一刻我真正领悟到，令我极度恐惧的是，我帮助构建的工具可能在让唐纳德·特朗普成为美国下一任总统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几周后，Facebook的一封信寄到了我父母家。Facebook如何得到他们的地址，我完全不知道。我母亲把信转给了我。这封信是由Facebook雇佣的律师事务所Perkins Coie发出的，这正是克林顿竞选团队用来资助对后来成为特朗普-俄罗斯档案的私人调查的同一家事务所。Facebook的律师试图确认Cambridge Analytica获得的数据仅用于学术目的，并且已被删除。现在Cambridge Analytica正式为特朗普竞选工作，Facebook显然认为让数百万用户的个人资料被劫掠用于政治获利会是糟糕的形象，更不用说Cambridge Analytica令人震惊的商业利益了。这封信没有提及使用公司数据来颠覆世界。当然，这封信是荒谬的，是一个微弱的姿态，因为Facebook已经给了Cambridge Analytica使用的数据采集应用明确许可，可以将数据用于非学术目的——这是我在与Kogan合作时专门向公司提出的请求。Facebook假装的愤慨反应让我更加困惑，因为在2015年11月前后，Facebook雇佣了Kogan的商业伙伴Joseph Chancellor担任“定量研究员”。据Kogan说，Facebook决定雇佣Chancellor是在公司被告知个性分析项目之后。后来，当这个故事公开时，Facebook扮演了震惊受害者的角色。但它没有说清楚的是，它满足于雇佣一个实际上与Kogan合作过的人。然而，Facebook后来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之前做的工作与他在Facebook的工作没有关系。”

当然，Cambridge Analytica不可能删除Facebook数据。但我一年多前就离开了这家公司，被他们起诉过，绝对不想代表他们发言。我回复说我不再拥有有问题的数据，但我不知道数据在哪里，还有谁得到了数据，或者Cambridge Analytica在用它做什么——Facebook也不知道。但我非常偏执于以任何方式与Cambridge Analytica联系，所以我没有从

加拿大议会的发件邮件中寄出这封信，而是走到市中心去邮寄。我不希望Cambridge Analytica的污点沾染我为特鲁多工作的任何地方。

2016年9月22日，参议员黛安·范斯坦和众议员亚当·希夫发表声明说俄罗斯试图破坏选举。在9月26日的第一次总统辩论中，希拉里·克林顿敲响了警钟。“我知道唐纳德非常赞扬弗拉基米尔·普京，”她说。普京”释放了网络攻击者入侵政府文件，入侵个人文件，入侵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我们最近了解到这是他们试图制造破坏和收集信息的首选方法之一。”

“我不认为有人知道是俄罗斯侵入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特朗普回应道。“她在说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也许是。我的意思是，可能是俄罗斯，但也可能是中国，也可能是很多其他人。也可能是某个坐在床上体重四百磅的人，好吗？”

10月7日，在川普说”grab ’em by the pussy”的*Access Hollywood*录音带公开后不到一小时，维基解密开始发布从克林顿竞选主席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账户中黑客窃取电子邮件。他们会持续发布邮件，一点一点地，直到选举日，对民主党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围绕克林顿对华尔街演讲的细节等其他披露内容爆发了丑闻，另类右翼(alt-right)的极端边缘分子利用这些邮件煽动荒谬的理论，声称克林顿竞选团队在最高层参与了一个从华盛顿特区比萨店经营的儿童性交易集团。我的思绪不断回到Cambridge Analytica、俄罗斯政府和阿桑奇之间的联系。Cambridge Analytica似乎在这次竞选的每一个肮脏部分都插了一脚。

...

...

在选举之夜，我在温哥华的一个观看聚会上。我们在一个巨大的屏幕上看CNN，在较小的屏幕上看其他新闻频道，同时我还在和来自设得兰群岛的议员阿利斯泰尔·卡迈克尔(Alistair Carmichael)通电话，我在伦敦期间与他关系密切。当数字对克林顿越来越不利时，我实时获得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反应。CNN宣布川普获胜的那一刻，整个房间陷入了震惊的沉默。

我的手机开始嗡嗡作响，收到了知道我Cambridge Analytica工作的人发来的短信。希拉里·克林顿胜利派对上一些困惑的支持者开始将愤怒指向我。我不记得许多具体内容，只记得一种压倒性的愤怒和绝望的语调。不过有一条评论我确实记得，因为它深深刺痛了我。一个我友好相处的民主党人写道：“这对你来说可能只是一场游戏。但我们必须是必须承受后果的人。”

那天晚上和第二天，特鲁多的顾问们陷入了恐慌，因为他们以为了解的南方邻国的一切突然改变了。川普会取消NAFTA吗？会有暴乱吗？川普是俄罗斯的间谍——一个真正的满洲候选人吗？人们迫切需要答案，因为我是唯一了解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的人，他现在处于极其重要的权力位置，他们不断询问我会发生什么。他们希望得到如何处理这些新的另类右翼顾问的建议，他们很快就要在具有重大国家（和国际）重要性的问题上与这些人谈判。我能想到的只是：天哪。三年前我在剑桥一家酒店房间里遇到的那个人现在可以接触到美国未来总统了。

选举后第二天卡迈克尔给我打电话时，听到他平静的苏格兰口音是一种解脱。“让我们仔细考虑一下你要做什么，”他说。多年来，我向卡迈克尔坦白了关于Cambridge Analytica的一切，他是世界上我完全信任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足够了解我，知道在川普和班农在一次受污染的选举后掌权时，我不太可能袖手旁观。赌注已经成倍上升。这个荒谬的真人秀明星不再只是一个无耻的煽动者。他将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

整个11月和12月，我思考着我可能会说什么，以及我可能会对谁说。川普的当选仍然不像是真的，因为奥巴马仍然是总统。就好像整个世界都在屏住呼吸，等着看1月20日之后会发生什么。

选举前，民主党的朋友们提出帮我弄到克林顿就职舞会的门票。但我没有飞到华盛顿与欣喜若狂的民主党人聚会，而是在CNN上观看了出席人数稀少的川普就职典礼。就在那里我看到了几乎难以置信的东西。他们就在那里：班农，看起来像一个被风吹乱的小妖精。凯莉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我通过默瑟家族认识的，穿着完整的独立战争cosplay服装。丽贝卡·默瑟(Rebekah Mercer)，穿着毛皮内衬的大衣和好莱坞明星太阳镜。然后我想起了几年前尼克斯(Nix)在我告诉他我要退出Cambridge Analytica的餐厅里对我说的话。“只有当我们都坐在白宫里时，你才会理解，”他说过。“我们每个人，除了你。”好吧，尼克斯不在华盛顿，但其他人确实在那里。

那年1月，班农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现在卡迈克尔让我”小心”的警告似乎更加贴切，因为班农掌握着整个美国情报和安全机构的杠杆。如果我通过举报或其他挑衅激怒了班农，他有能力毁掉我的生活。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班农处于可以帮助安排Cambridge Analytica获得美国政府合同的位置。Cambridge Analytica的母公司SCL Group已经在为美国国务院的项目工作。这意味着CA可以访问美国政府的数据，反之亦然。令我恐惧的是，我意识到班农可能正在创建他自己的私人情报机构。而且他是为一个不信任CIA、FBI或NSA的政府这样做的。感觉就像我生活在噩梦中。更糟糕的是，感觉就像理查德·尼克松的美梦。想象一下如果尼克松能够访问每个美国公民的那种亲密、细粒度的数据。他不仅会搞砸老鼠，他会搞砸整部宪法。

政府机构通常需要搜查令才能收集人们的私人数据。但由于Cambridge Analytica是一家私人公司，它不受这种权力制衡的约束。我开始回想与Palantir员工的会议，以及为什么他们中的一些人对Cambridge Analytica如此兴奋。美国没有隐私法来阻止Cambridge Analytica收集尽可能多的Facebook数据。我意识到，一个私有化的情报单位将允许班农绕过美国人从联邦情报机构获得的有限保护。我想到深层国家不仅仅是另一个右翼叙事；这是班农的自我实现预言。他想要成为深层国家。

第11章

公开曝光

特朗普就职两个月后，2017年3月28日早上，我从又一个熬夜工作准备简报的夜晚中醒来，略感昏沉。那时刚过早上六点。当我穿着内衣站着等咖啡煮好时，我打开Facebook，看到一条来自名为“Claire Morrison”账户的私信。我点击了个人资料，没有头像。

嗨，Christopher，希望你介意我联系你。我其实是一名记者...叫做Carole Cadwalladr。我一直在尝试与Cambridge Analytica/SCL的前员工交谈，试图更准确地了解公司的运作方式等等，你被人形容为这个操作的智囊...

这一定是Cambridge Analytica，我想。又来了。我就是知道这一定是Cambridge Analytica在搞我的心理。从来没有记者联系过我，我所有的警告都被忽视了，这正是尼克斯会拉的那种把戏。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个账户背后是谁的情况下，我不想与这个无面孔的“Claire Morrison”有任何瓜葛。所以我回复说我需要证明她真的是卫报记者。

同一天，Cadwalladr从她的卫报邮箱给我发了一条长消息，关于Vote Leave、BeLeave、Darren Grimes、Mark Gettleson，以及这些竞选活动中的一切似乎都通过加拿大的这家小公司AggregateIQ进行路由。她被告知我认识相关的人员和公司。Cadwalladr写道，她一直在调查AIQ和英国脱欧，2017年初的一个晚上，一个消息来源给了她一个奇怪的线索。AIQ在官方费用申报单上列出的电话号码出现在SCL网站的存档版本上，作为“SCL加拿大”的电话号码。当时，关于SCL的公开信息几乎没有，除了Cadwalladr找到的2005年Slate杂志关于该公司的一篇文章，标题为“你无法处理真相：心理作战宣传走向主流”。文章开头描述了一个场景，“一家神秘的媒体公司介入，帮助策划一场复杂的大规模欺骗活动”。

随着Cadwalladr不断拉扯这个越来越奇怪故事的线索，她在伦敦找到了一位愿意交谈的前SCL员工。消息来源坚持他们必须在谨慎的地方见面，她必须对一切保密。消息来源担心如果公司发现他们两人在交谈会怎么办。Cadwalladr听着消息来源告诉她一些关于SCL在非洲、亚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所做事情的疯狂故事——美人计、贿赂、间谍活动、黑客、酒店房间里的离奇死亡。消息来源告诉她要找一个叫Christopher Wylie的人，因为他是将AIQ招募到Cambridge Analytica宇宙中的人。在审视所有这些人员和实体之间的复杂关系——Vote Leave、AIQ、Cambridge Analytica、史蒂夫·班农、默瑟家族、俄罗斯和特朗普竞选团队——Cadwalladr看到我正处于所有这些关系的中心。似乎到处都出现，对她来说我看起来像2016年的Zelig。

起初，我不想与Cadwalladr交谈。我对成为某个大型卫报曝光报道的中心没有兴趣。我筋疲力尽，一次次被伤害，我希望能够把Cambridge Analytica的痛苦经历留在过去。除此之外，Cambridge Analytica不再只是一家公司。我的前老板史蒂夫·班农现在坐在白宫，并且是地球上最强大国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我见过像爱德华·斯诺登和切尔西·曼宁这样的举报者在面对美国政府的全力打击时的遭遇。改变英国脱欧投票或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已经太晚了。我曾试图警告人们，但似乎没有人关心。为什么他们现在会关心呢？

但Cadwalladr关心。当我读到她已经发表的内容时，我可以看出她正在追踪Cambridge Analytica和AIQ，但还没有破解他们的不当行为实际有多深。犹豫了几天后，我回邮件同意交谈，但严格保持不公开记录。到了我们通话的时间，我的心跳加速。我完全预期这将是一次不愉快的对话，她会提出指控，心不在焉地听我的回应，之后她会写她想写的任何内容。

相反，我听到一个女人说：“哦，是Chris吗？哦，你好！”我听到背景中有狗叫声，她说：“不好意思，我刚带我的狗散步回来，正在泡茶。”我开始想说什么，但我听到她对她的狗发出哄声。我原本打算和Carole聊大约二十分钟，但四小时后我们仍在通话。当时伦敦一定已经过了午夜，但对话就是不停地进行下去。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与任何人谈论所发生事情的全貌。她问我，什么是Cambridge Analytica？

“这是Steve Bannon的心理洗脑工具，”我直率地告诉她。

即使是像Cadwalladr这样消息灵通的记者，起初也很难理解Cambridge Analytica叙事的所有层面和联系。SCL是Cambridge Analytica的一部分，还是相反？AIQ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即使她掌握了基本细节，仍有太多内容需要分享。我告诉她关于心理测量profiling、信息战和人工智能。我解释了Bannon的角色，以及我们如何使用Cambridge Analytica构建心理战工具来打他的文化战争。我告诉她关于加纳、特立尼达、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以及塑造Cambridge Analytica数据定向武器库的实验。最终她开始理解这家公司邪恶的范围。

以”英国脱欧大劫案：我们的民主如何被劫持”为标题，第一篇文章于2017年5月7日发表。它引起了轰动，成为《卫报》网站当年阅读量最高的文章。Cadwalladr的报道很扎实，但她才刚刚开始触及一个更加阴暗故事的表面。5月17日，Robert Mueller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负责监督对俄罗斯和特朗普竞选团队的调查。开始变得明显的是，民主党甚至一些共和党人都有意愿彻底查明为什么特朗普如此激烈地解雇了FBI局长James Comey，此前他曾告诉Comey放弃对他的前国家安全顾问Michael T. Flynn的调查——结果发现，Flynn与Cambridge Analytica有咨询协议。完整的故事远超过脱欧——它关乎Bannon、特朗普、俄罗斯和硅谷。它关乎谁控制你的身份，以及那些贩卖你数据的公司。

但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我要帮助披露这些信息并说服Cambridge Analytica的其他人站出来，我不能在加拿大做这件事。我向Justin Trudeau团队的一些人透露了情况。他们立即理解了事态的严重性，鼓励我站出来并前往英国与《卫报》合作。所以我照做了。

...

我没有计划，甚至还没有找好公寓，所以我飞到了Alistair Carmichael在设得兰群岛的选区，这是英国最北端的岛屿，曾是古代北欧王国的一部分，后来被苏格兰吞并。在机场，当我从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上下来，带着装在一个包里的全部家当时，Carmichael正在等候，准备带我去宾馆——但不是不绕道观光一番。作为当地国会议员和极其自豪的苏格兰人，他热衷于首先带我游览这座岛屿，不管下雨和刺骨的寒风。当我们被陡峭的悬崖、设得兰矮马和附近漫游的羊群包围时，他问我打算做什么。

“我还没有计划，”我回答。“我下周要见Carole...你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吗，Alistair？”

“不——这太疯狂了！”他回击道，几乎是在喊叫。然后他沉默了。“但这很重要，Chris。我只能说我会尽力帮助你。”很少有政治家值得我在苏格兰寒冷的北部穿过数英里的冰冷湿草地。但Alistair一直是我可以依靠的人。他已经成为我的知己、导师和朋友。

几周后，Cadwalladr和我终于在伦敦牛津街附近的Riding House Café见面——这是一个宽敞的现代空间，窗边有深红色沙发，吧台配有明亮的绿松石色凳子。Cadwalladr在里面等我，看起来像个骑手女孩，蓬乱的金发、墨镜、豹纹上衣和破旧的皮夹克。从街对面，我可以看到她坐在餐厅的大窗户里。不确定这个女人是否真的是我在电话中交谈了几个月的《卫报》记者，我在手机上搜索了更多Cadwalladr的照片，举起照片与坐在里面的女人对比。当她看到我时，她跳起来叫道：“天哪！真的是你！你比我想象的要高！”她起身拥抱了我。她告诉我《卫报》希望下一个故事是关于Cambridge Analytica如何收集Facebook数据，并问我是否愿意公开记录。

这不会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如果我公开，我会面临美国总统、他的另类右翼耳语者Steve Bannon、唐宁街、激进脱欧派和反社会的Alexander Nix的愤怒。如果我说出Cambridge Analytica背后的全部真相，我会冒着激怒俄罗斯人、黑客、WikiLeaks以及一大批在非洲、加勒比海、欧洲和其他地区毫不犹豫违法的其他人的风险。我见过人们面临严重的安全威胁；我的几个前同事在我离开后警告我要格外小心。在加入SCL之前，我的前任Dan Mureşan最终死在了他在肯尼亚的酒店房间里。这是一个我不能轻易做出的决定。

我告诉Cadwalladr我会考虑一下，并继续向她提供信息。但当这家报纸未能支持自己的报道时，我对卫报的任何信任都被摧毁了。Cadwalladr在5月7日的文章开头讲述了Google首席执行官Eric Schmidt的女儿Sophie Schmidt如何将Nix介绍给Palantir的故事，从而引发了一连串事件，导致SCL进军数据战争领域。我知道这个故事，尽管我不是消息来源；是别人告诉Carole的。这篇文章是真实的。事实上，我有关于Sophie Schmidt参与SCL的邮件。这个故事远非诽谤，但Schmidt向卫报派出了一队律师，威胁要进行耗时且代价高昂的法律战。报纸没有对抗这起明显虚假的诉讼，而是同意在发表几周后删除Schmidt的名字。

然后Cambridge Analytica威胁要就同一篇文章提起诉讼。尽管卫报拥有证实我告诉他们一切的文件、邮件和档案，他们再次退缩了。编辑们同意将某些段落标记为“有争议”，以安抚Cambridge Analytica并减轻报纸的责任。他们拿走了Cadwalladr有据可查的故事并将其稀释了。

此时，我的心沉了下去。我想，*好吧，我刚搬回伦敦，没有工作，却被要求为一家甚至不为自己的新闻报道辩护的报纸冒险。*另一个复杂因素是那份严格的保密协议(super NDA)，禁止我透露在Cambridge Analytica工作的细节。Cambridge Analytica让我签署它的全部意图就是严重增加我的法律责任，我毫不怀疑，如果我违反协议，我的前雇主会试图将我告到破产。我的律师说我很强的辩护理由——向卫报提供这些信息是在揭露非法行为。但良好的辩护并不能阻止诉讼首先被提起，在法庭上与Cambridge Analytica作战意味着数十万英镑的法律费用——这笔钱我没有。

尽管如此，我仍然决心让完整的故事曝光。我很快发现，我最好的行动方案要经过Donald Trump的家乡。Carole把我介绍给了Gavin Millar QC，他是伦敦Matrix Chambers的知名大律师，曾为卫报处理Edward Snowden案件，他建议我把故事给一家美国报纸。他说，第一修正案为美国报纸提供了对抗诽谤指控的更强辩护。*纽约时报*远不如卫报那样容易退缩，它永远不会在事后删除文章的部分内容。这是一个绝妙的建议。它还确保了这个故事在美国和英国都能得到同样多的关注。

我告诉卫报我计划与*纽约时报*分享这个故事。他们不高兴，争辩说如果我们再等下去，对这个故事的兴趣就会枯竭，或者其他人会在我们之前发表。但选择权在我，不在他们，我坚持立场。我会向两家报纸的记者提供相同的信息，条件是他们在同一天发表——而且只有在我同意后。风险太大了，卫报在Schmidt案件中的行为让我对英国极其有利于原告的诽谤法律风险感到警惕。我向报纸编辑重申，在与*纽约时报*达成协议之前，我不会合作或交出文件。Cadwalladr实际上完全支持让*时报*参与进来，而卫报在这件事上没有太多选择，只能默许。编辑们对与竞争对手分享的想法感到畏缩，但值得称赞的是，他们咽下了自尊心，在曼哈顿与*时报*编辑安排了一次会议，开始讨论这一切将如何展开。两家报纸在2017年9月达成了初步协议，不久之后我见到了*纽约时报*指派报道这个故事的记者。

...

在我预定与这位美国记者见面的那天，我走进Shoreditch区Hoxton酒店熙熙攘攘的大堂酒吧，看到了Cadwalladr，她向我挥手示意我到她的桌子旁。她坐在*时报*的Matt Rosenberg对面。完全秃顶，略显结实，显然离过婚，他相当迷人。

“所以你就是那个人？”Rosenberg站起来和我握手时说。“我想，”他说，“我们需要收起手机？”

我们都拿出了法拉第保护套(Faraday cases)，它可以防止手机接收或发送电子信号。我与记者的所有会面都以这个仪式开始。然后我们将保护套装入我带来的隔音袋中，以防有预装的监听恶意软件可以在没有远程激活的情况下自行开启。由于我以前的Cambridge Analytica同事现在在Trump政府工作，考虑到Cambridge Analytica与黑客和WikiLeaks的历史，我们必须极其小心。

在谈论我在Cambridge Analytica的经历超过两个小时后，Rosenberg说他有足够的材料回去向编辑汇报。他为桌子点了一些酒，然后分享了他在阿富汗时期的战争故事。他看起来像个直率正派的家伙，我感到希望，也许这会成功。在会议结束前，他给了我他的名片：“Matthew Rosenberg, 国家安全记者. 纽约时报。”他在背面潦草地写了一个号码。“那是我的临时手机。用Signal联系我。能用几周。”

随着《纽约时报》的参与，我开始联系记者与其他前剑桥分析公司员工，记者们发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每个人都认为如果他们能直接与尼克斯对话，他就控制不住自己——他会开始吹嘘剑桥分析公司的运营来进一步满足自己已经过度膨胀的自尊心。尽管这无疑是真的，但向他透露计划中的曝光似乎是个坏主意。

“也许我应该试着采访他，”卡德瓦拉德某天下午对我说。然后她想出了一个更好的主意：当场抓住他。如果我们让尼克斯处于试图赢得潜在客户的情况下，他肯定会为了给客户留下深刻印象而大谈他的阴暗手段。我至少见过他这样做十几次。如果我们能录下他这样做的过程，那就能向世界证明我的指控是真实的。所以现在，除了《卫报》和《纽约时报》，我们决定联系第四频道新闻。作为公共电视服务机构，第四频道有法定义务代表比BBC更多样化、创新和独立的节目，而BBC在突发新闻方面往往极度规避风险。

九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卡德瓦拉德和我在克拉肯威尔一家空酒馆的后部见了第四频道的调查编辑乔布·拉布金和他的团队，那里距离他们的演播室几个街区。卡德瓦拉德介绍了我们，拉布金开始描述他团队在卧底工作方面的经验。当我开始告诉他剑桥分析公司在非洲的项目时，拉布金的眼睛睁大了。他插话说：“这听起来太扭曲、太殖民主义了。”拉布金是第一个对我使用“殖民主义”这个词的记者。大多数我告诉剑桥分析公司事情的人都对特朗普、脱欧或Facebook着迷，但每当我谈到非洲话题时，通常得到的都是耸肩回应。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毕竟是非洲。但拉布金理解了。剑桥分析公司在肯尼亚、加纳、尼日利亚所做之事——这是殖民主义的新时代，强大的欧洲人为了获取资源而剥削非洲人。虽然矿物和石油仍然是等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有一种新资源正在被开采：数据。

拉布金承诺第四频道调查部门的全力支持，并补充说他的团队愿意承担卧底进入剑桥分析公司的风险。我开始与他们合作这项行动，我确信这真正会揭露尼克斯腐败手段的内幕。但这将是一项极其复杂和微妙的工作，如果尼克斯以某种方式发现我们在做什么，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由于涉及如此多的环节，举报成了一项全职工作。如果有任何不当行为，我也会为自己招来法律麻烦的风暴，所以我给夏天帮助过我的律师发了短信。他们的回答是我最不想听到的。这对于无偿支持来说太多了；我需要要么找到现金，要么找新律师。我很沮丧。我失业了，深陷一个极其复杂的困境，冒着严重的法律危险——而且没有律师。但就像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有时你会很幸运，坏消息会把你带到令人惊奇的地方。这就是其中一个时刻，因为它把我带到了塔姆辛·艾伦身边。

加文·米勒听说了发生的事情，在2017年秋天把我介绍给了艾伦，她是宾德曼律师事务所的顶级英国媒体律师，是诽谤和隐私方面的专家。她的客户名单包括前军情五处间谍和在臭名昭著的新闻集团案件中被黑客攻击手机的名人。她似乎完全符合我困境的需要，当我见到她时，我们立即产生了共鸣。在成长过程中，艾伦曾因为裸体游泳被学校开除，就在1980年代朋克音乐兴起时，她搬到了伦敦，在哈克尼与蹲居者一起生活。“我有太多完全不能讲的故事，”她在我们准备证据的某个深夜回忆道。艾伦本身就是个叛逆者，一个粉发鼻环的家伙讲述间谍、黑客和数据操纵的离奇故事丝毫没有让她感到困扰。在我成为举报者的历程中，艾伦成了我的头号盟友。

艾伦意识到我的利益与第四频道、《卫报》和《纽约时报》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记者们关注的是年度，也许是十年来的独家新闻，而我需要讲述这个至关重要的故事，同时避免法律危险。她建议我保持对剑桥分析公司故事公共利益方面的专注，特别是因为超级保密协议的存在，因为英国法律允许在需要揭露违法行为或明显符合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为违反保密义务进行辩护。我们就什么是“公共利益”以及如何坚持这条线进行了很多讨论，避免透露任何过于八卦的内容或可能危及英国或美国政府合法国家安全利益的内容，但艾伦警告说，即使我们坚持严格的法律标准，剑桥分析公司仍然可能起诉我。她告诉我Facebook也可能提起诉讼，他们的资源几乎是无限的。她说Facebook或剑桥分析公司可能会申请禁令阻止发表。这种禁令在美国几乎闻所未闻，但在英国并不罕见。对抗禁令会很耗时，即使我们最终获胜，英国记者们也可能会胆怯并退出——艾伦告诉我她见过很多次这种情况。

但这些仅仅是法律层面的情况。这个故事涉及许多有过违法经历的人物，艾伦开始担心我的人身安全。在我们早期的一次会面中，她询问我是否在伦敦有家人，以及我采取了什么安全预防措施。“遇到紧急情况你会打电话给谁？”她问我。我们必须制定一个计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彼此越来越关心，我决定如果事情出现意外，艾伦就是我会联系的人。

法律问题解决了，我开始与桑尼就BeLeave和Vote Leave之间发生的事情进行对话。他非常坦率。虽然没有完全理解他所描述内容的深层含义——串通和作弊——他概述了一个安排，其中Vote Leave通过BeLeave向AIQ账户转账数十万英镑。在我帮助他看清潜在违法行为后，桑尼终于明白自己被利用了。他不知道AIQ是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一部分，当我告诉他AIQ在尼日利亚选举期间为CA处理视频的事情时，他显然感到恶心。

几天后，他向我展示了一个共享驱动器，其中包含BeLeave、Vote Leave和AIQ的策略文件。根据英国法律，这是非法协调的证据。在活动日志中，有人使用管理员账户从驱动器中删除Vote Leave主要官员的姓名。桑尼告诉我，这些删除操作是在选举委员会(Electoral Commission)启动对该竞选活动调查的同一周进行的。Vote Leave后来声称这是数据清理，但在我看来，Vote Leave似乎在试图删除超支证据，并且可能犯了另一项罪行：销毁证据。这开始看起来像是企图掩盖，当他向我展示驱动器上还有谁时，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共享驱动器上的两个账户属于两名高级顾问，他们现在正坐在首相办公室里，为脱欧谈判过程提供建议。我向桑尼强调，他可能掌握着犯罪证据——实际上是几项犯罪——他需要极其小心，以免自己陷入严重麻烦。他已经知道我与《卫报》和《纽约时报》的合作。随着他意识到自己发现的事情的严重性，桑尼同意与卡德瓦拉德见面，告诉她他所知道的一切。我还让他与塔姆辛·艾伦联系，寻求独立的法律建议。

起初，艾伦是无偿工作的。但随着情况复杂性的增长，她无法在没有某种形式报酬的情况下继续给我所需的时间。她还担心如果剑桥分析公司发现我要公开后会起诉我会发生什么。艾伦拒绝因为钱而放弃我，但我们必须发挥创造力。我们决定接触她的一些人脉广泛的联系人，因为艾伦知道建立支持网络很重要。第一个是休·格兰特——是的，就是那个休·格兰特，《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和《布里吉特·琼斯的日记》的明星。在晚餐时，艾伦解释了我的困境。桑尼加入我们，详述了Vote Leave发生的事情。格兰特温暖关心，看起来就像他扮演的许多角色一样。格兰特也有被盗数据的个人经历——鲁珀特·默多克旗下的《世界新闻报》曾经窃听过他的电话信息。他对剑桥分析公司活动的规模感到震惊，并说他会帮助考虑谁能协助我们。

关键的支持来自几周后我们被介绍给斯特拉斯堡勋爵，他是一名自由民主党成员，在上议院任职，也是隐私活动组织Big Brother Watch的创始人。然后，他让我联系了一位非常富有的个人，这个人来到伦敦见我。我问他为什么要帮助，他告诉我这是因为他了解欧洲的历史。他说他知道当每个人都被编目时会发生什么。隐私对于保护我们免受法西斯主义日益严重威胁至关重要，所以他说他会帮助我。几天后，他承诺提供资金帮助我，给了我所需要的支持。

这只是让我能够完整地度过举报艰难的援助的一部分。当我准备对政治和企业巨头发声时，我是一个现在得到坚定律师和记者、法律辩护基金以及大量道德支持的大卫。很多时候，举报人被描述为独自站出来对抗巨人做正确事情的孤独活动家。但就我而言，我从未独自一人，并且在几个场合非常幸运。没有这种帮助，我永远无法站出来。



2017年10月

艾伦和我与第四频道新闻制片人乔布·拉布金及其编辑本·德·皮尔会面。我描述了尼克斯，并告诉他们他经常从事的那些非法活动。他们对在录音带上抓住他的想法很感兴趣，但当我们讨论这样的诱捕如何运作的细节时，他们怀疑这是否会过于复杂而无法成功。许可必须来自频道的顶级法律团队，如果失败，他们很容易认为这项工作在法律和声誉方面风险太大。

我们开始与他们的律师合作，准备一份详尽的法律预备文件。英国有法律保护这类诱捕行动，但记者必须证明他们的提议符合公共利益，他们不会陷害任何人，而且诱捕行动将揭露可能的犯罪行为。提前准备这份文件将在尼克斯起诉的情况下保护第四频道。

诱捕行动需要极其细致的注意力。我打电话给马克·盖特尔森，他毫不犹豫地同意帮忙。尼克斯必须相信与他会面的人是客户，他被要求承担的项目是真实的，而且他进行的对话是完全私密的。扮演“客户”的人必须接受关于尼克斯如何操作的广泛简报。他必须确切知道要求什么，还必须精通我们选择设定“项目”所在国家的政治局势。

我们决定将场景设定在斯里兰卡，有几个原因。第一：SCL曾在印度工作并在那里设有办事处，所以邻国对尼克斯来说会感觉足够熟悉。第二：斯里兰卡政治和历史的迷宫般特性使得创建一个松散基于现实的虚假政治场景变得更容易。无论我们创建什么项目，都必须涉及足够多的真实参与者，这样当剑桥分析的助手在会议前进行一些谷歌搜索时，它仍然看起来合法，并最终通过他们的尽职调查程序。

在第四频道雇用一名斯里兰卡调查员扮演客户“兰詹”之后，盖特尔森和我指导第四频道团队了解尼克斯的习惯和特点，向他们展示剑桥分析如何审查潜在客户，并向他们展示尼克斯的电子邮件，以帮助他们确定他和公司如何运作。总共会有四次会议——三次与其他剑桥分析高管的初步会议，然后与尼克斯达成交易的最后一次会议。兰詹必须让尼克斯自己想出非法想法，这样就不可能有诱捕的建议。

兰詹要扮演一个代理人，代表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斯里兰卡人，他曾到西方旅行，赚了很多钱，现在想回家竞选政治职务。但由于家族竞争，政府中的一位特定部长冻结了他家族的资产。他会使用一个真实部长的名字，并加入足够多关于斯里兰卡政治的事实细节，让尼克斯和其他高管相信整个场景。第四频道必须做大量详细的前期研究，因为任何失误都可能破坏整个诱捕行动。对剑桥分析的胡萝卜是，如果他们成功释放（想象中的）资金，可以获得该男子资产价值的5%。我们知道亚历山大无法抗拒。

在前两次会议中，兰詹在威斯敏斯特附近一家酒店的私人房间里会见了首席数据官亚历山大·泰勒和董事总经理马克·特恩布尔。高管们推销了剑桥分析的数据分析工作并建议情报收集服务，但会议没有产生任何具体结果。他们似乎很谨慎，在谈论剑桥分析真正做什么时有所保留。第四频道很沮丧，但我们有一个解决办法。

我们意识到，每当这样的人进入私人酒店房间时，他们都会假设房间被窃听了，所以第四频道必须想办法在公共场所举行这些会议。第四频道的高管们反对，说后勤工作不可能。如果我们试图在餐厅或酒吧录制会议，噪音可能会淹没音频。此外，我们在哪里放置摄像头，以确保我们能获得高管们的视频录音？我们不能只是引导他们到特定的桌子——那太可疑了。

值得赞扬的是，第四频道团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们租下了餐厅的很大一部分，让雇来的人在那里吃午餐并安静地交谈，并将数十个隐藏摄像头对准所有可用的桌子。尼克斯和其他高管可以选择他们喜欢的任何桌子，这将有助于让他们感觉不那么戒备。然而，他们周围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摄像头——甚至一些餐具、手提包和坐在他们周围的“客人”都在录制对话。

两次会议在这家餐厅举行。在第一次会议中，特恩布尔为剑桥分析提供的一些更可疑的服务奠定了基础。他告诉兰詹，剑桥分析可以对斯里兰卡部长进行一些调查，说他们会“安静、谨慎地找到他壁橱里的所有骷髅，并给你一份报告”。但他在最后退缩了，说“我们不会派一个漂亮女孩去勾引政治家，然后在他们的卧室里拍摄他们，然后发布影片。有公司这样做，但对我来说，那越过了界限。”当然，仅仅通过描述剑桥分析据说不会做什么，他成功地将这个想法放在了兰詹的盘子里。

最后，在诱捕行动开始几周后，尼克斯登场了。对于第四次会议，第四频道格外小心，确保一切都完美安排。所有桌子都被窃听，房间周围都设置了摄像头。隔壁桌吃午餐的几个女人的手提包里都有隐藏摄像头。一切都准备就绪，我们屏住呼吸，希望亚历山大不会取消或推迟。

他没有。他自掘坟墓。兰詹完美地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并在最合适的时机表现出兴趣。而亚历山大，老天保佑，直接走了进去，张开了他的大嘴。

两个月后，第四频道才准备向我们展示餐厅的录像带。十一月初的一个早晨，我与艾伦(Allen)有个约会，我决定步行前往，因为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秋高气爽的早晨。当我在接待大厅等她时，我注意到收到了几条来自陌生号码的新消息。我打开消息后，不禁脱口而出：“搞什么鬼！”接待员站起来问我是否没事，我说不太好。那些消息是我当天早上走路时的照片。有人跟踪了我到律师事务所，他们想让我知道这件事。

我们怀疑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可能发现我已经搬回伦敦，并雇佣了一家公司来调查我在做什么。从那时起，艾伦说我们需要改变我的日常习惯——我去哪里以及如何与律师会面。几天后，Leave.EU在推特上发布了电影《飞机！》的一个视频片段，描绘了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被反复殴打，并将卡德瓦拉德(Cadwalladr)的脸部合成进去。背景播放着俄罗斯国歌。她告诉我她发现他们可能正在使用一家私人情报公司调查她，并警告我如果他们一直在跟踪她，他们可能也看到了我并把线索联系起来。艾伦警告我，如果剑桥分析发现我在做什么，公司可能会上法庭申请禁令，阻止我向《卫报》或《纽约时报》移交更多文件。随着每一个转折，我越来越担心将要发生的事情。几天后，11月17日，就在卡德瓦拉德在《卫报》发表一篇关于她收到威胁的文章的同一天，我在伦敦街头癫痫发作，昏倒了，被送往医院。医生说病因不明。

出院后不久，我问艾伦是否有什么办法可以保护我掌握的信息，防止任何阻止公众获得这些信息的努力。在英国有什么万无一失的方法来防范禁令吗？她说没有，但随后停顿了一下，指出唯一的例外是在国会大厦内，那里古老的议会豁免法律保护议员免受法庭禁令或诽谤索赔。关于可以追溯到1600年代的法律原则的讨论起初似乎很学术，但艾伦告诉我的话让我有了一个想法，去接受阿利斯泰尔·卡迈克尔(Alistair Carmichael)的帮助提议。在国会的办公室与卡迈克尔会面时，我告诉他我可能正受到监视，我需要他锁好一些硬盘，以便在我无法发布信息的情况下保护证据。卡迈克尔同意了，并告诉我，如果真的到了那种地步，他会做任何必要的事情来公布这些信息，即使这意味着要使用他的议会豁免权。我交给他几个硬盘，在故事爆发之前的剩余时间里，我们将关键证据保存在他的保险箱里。

我还帮助他获得了一些非凡的录音。艾玛·布里昂特(Emma Briant)博士是一位英国教授和信息战专家，她在研究剑桥分析为北约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几位剑桥分析的高管。即使作为一个在军事宣传圈子里混迹的人，她也被与该公司的对话震惊了，并开始录音。卡德瓦拉德介绍我们认识，因为布里昂特需要帮助获得与我通过国会的卡迈克尔能够获得的同样保护。我坐在阿利斯泰尔的办公室里，布里昂特播放了一段奈杰尔·奥克斯(Nigel Oakes)的录音，他是SCL集团——剑桥分析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希特勒攻击犹太人，因为他对犹太人根本没有意见，但人民不喜欢犹太人，”奥克斯说。“所以他只是利用了一个人为的敌人。好吧，这正是特朗普所做的。他利用了穆斯林。”奥克斯的公司正在帮助特朗普做希特勒做过的事，但他似乎觉得整件事很有趣。在布里昂特和威格莫尔(Wigmore)讨论的另一个片段中，Leave.EU传播总监似乎也对审视纳粹传播活动的战略性质感兴趣。在录音中，威格莫尔被录下解释说：“比如纳粹的宣传机器——如果你去掉所有可怕的恐怖和那种东西，他们管理做到他们所做事情的方式是非常聪明的。从纯粹的营销意义上看，你可以看到他们所说的逻辑，为什么他们这样说，以及他们如何呈现事物和图

像……现在回顾这一点，在经历了这场[2016年欧盟公投]活动的尖锐一面后，你会想，天哪，这并不新鲜，这只是——这是在使用你当时拥有的工具。”当我们播放录音时，卡迈克尔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

最后，在2018年2月，Allen和我被邀请到ITN大楼的放映室，巧合的是那里就在Tamsin位于Gray's Inn Road办公室的街对面。我看着Nix在我们伪装的餐厅里坐立不安，试图迎合客人的心血来潮和欲望。我看着每一句话被说出，每一个错误被犯下。这太疯狂了。我在这里看着Nix的完整表现，承认Cambridge Analytica所做的一些令人作呕的事情以及他们愿意做的事情。Nix讨论了他在2016年竞选期间“多次”见过Trump。Turnbull进一步透露Cambridge Analytica是如何构建“邪恶的Hillary”叙事的。“我们只是把信息投入互联网的血流中，然后看着它增长，”他说。“所以这些东西渗透到在线社区，但没有品牌标识，所以无法归属，无法追踪。”看着这些，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我的经历终于通过Nix自己的话得到了验证。

这些镜头是完美的。Nix和Turnbull被当场抓获，随意提出寻找kompromat并勒索斯里兰卡部长。Nix，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吸饮着饮料，说道：

深度挖掘很有趣。但你知道，同样有效的可能只是去与在职者交谈，向他们提供一个好得不真实的交易，并确保录像。你知道，这些策略非常有效。立即获得腐败的视频证据。把它放到互联网上，这些东西……

我们会让一个富有的开发商进来——某个冒充富有开发商的人……他们会向候选人提供大笔资金，比如以土地换取资助他的竞选活动。我们会用摄像机录下整个过程。我们会遮住我们那个人的脸，然后把它发布到互联网上。

是的，Nix实际上提议进行诱捕行动，就在我们的诱捕行动中间。我坐在那里和Allen以及Channel 4团队一起观看，体会着这一切的绝对讽刺。然后Nix继续提出：

派一些女孩到候选人家里。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历史……我们可以带一些乌克兰人和我们一起度假，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她们非常美丽。我发现这很有效……我只是给你举例说明可以做什么和已经做过什么……我的意思是，听起来这是件可怕的事情，但这些事情不一定需要是真的，只要人们相信就行。

经过数月的工作和无休止的争执，我们终于将所有要素都准备就绪。这个Channel 4的镜头将作为故事的致命一击，在那一刻我终于感到有信心我们真的要阻止Cambridge Analytica了。

终于

经过商定，印刷报道和相应的广播调查将在2018年3月的最后两周发布。出版前几周，我在现代玻璃建筑Portcullis House的办公室会见了议会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委员会(DCMS)主席Damian Collins，该建筑位于议会区。Collins已经对社交媒体虚假信息开启了官方调查，我交谈过的几位议员和委员会主席都建议我与他会面。Collins极其礼貌和优雅，说话带着某种特定英国保守党人似乎具有的预科魅力。从一开始我就对他印象深刻。与我见过的任何其他议员相比，他对Cambridge Analytica的了解要多得多，实际上他几个月前就已经传唤Nix作证。Nix在委员会面前——有记录地——否认Cambridge Analytica使用任何Facebook数据。我告诉Collins这是假的，Nix可能误导了委员会——这是相当严重的，因为这可能构成蔑视议会。我从Carmichael保险柜中取出一个驱动器插入我的笔记本电脑，并将屏幕转向Collins。屏幕上是一份完全执行的Facebook数据合同，上面有Nix和Kogan用鲜蓝色墨水签署的签名。我们花了几个小时查看CA的内部文件，这些文件证实该公司使用了Facebook数据并与俄罗斯公司有关系，并展示了他们传播的一些极其可怕的宣传，显示人们被谋杀。在Collins和委员会工作人员确定他们需要的文件后，我复制了一份并将驱动器交给了他。我们同意，在预定发布日期两周后，他的调查将传唤我公开作证。那一天，他将通过委员会开始倾倒我给他的文件。

与此同时，我一直在向信息专员办公室——负责调查数据犯罪的政府机构——汇报我们收集到的关于Cambridge Analytica非法活动的证据。在看到第四频道的录像后，我告诉专员Elizabeth Denham，CA仍在继续其活动，提议代表潜在客户犯罪。ICO要求我们暂缓发布这些报道，因为他们想在一切公开之前进行突击搜查。他们不想让CA有机会删除证据。我向他们提供了所有掌握的证据，包括CA高管文件副本、项目文档和内部邮件，他们随后将这些材料转交给了国家犯罪署——英国相当于FBI的机构。我必须整理这些证据，因为它们都相当复杂，以便ICO能够执行适当的搜查令。Tamsin和我还在准备证人陈述和完整的书面意见，将提交给选举委员会，涉及脱欧阵营所犯的罪行。我们几乎没有睡眠——忙于法律文件工作、为执法部门提供建议、管理记者们。那是一段令人精疲力竭的时光。但是，最终一切都在逐步落实。

在发布前大约一周，《卫报》向报道中提及的个人和公司发出了答复权信函。这些信函是英国新闻业的惯例做法，旨在让相关人员有机会在文章发表前对指控作出回应。3月14日，我收到了Facebook律师的一封信，要求我交出所有设备供其检查，引用《计算机欺诈与滥用法》和《加利福尼亚刑法典》，试图以刑事责任威胁我。3月17日，也就是发布前一天，Facebook威胁要起诉《卫报》，如果后者继续推进这些文章，坚称没有发生数据泄露。当公司意识到发布不可避免时，为了抢在报道前面并转移焦点，它宣布禁止我、Kogan和Cambridge Analytica使用该平台。《卫报》和《纽约时报》对Facebook利用善意给予的额外通知时间来试图通过其公告破坏报道感到愤怒。

3月17日晚上，《卫报》和《泰晤士报》整夜工作，匆忙完成了报道的发布。《泰晤士报》的标题是：“特朗普顾问如何利用数百万人的Facebook数据”。《卫报》编辑选择了更具戏剧性的标题：“‘我制造了史蒂夫·班农的心理战工具’：认识数据战争告发者”。这些报道立即走红，当晚第四频道开始播放其系列节目，包括揭露Nix的毁灭性诱捕行动。该频道还发布了对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败选者希拉里·克林顿的采访，她将关于Cambridge Analytica的指控描述为“非常令人不安”。在采访中，克林顿说：“当你有一个大规模的宣传活动阻止人们清晰思考，因为他们被虚假信息淹没，而且...他们访问的每个搜索引擎、每个网站，都在重复这些捏造的内容，那么是的，这影响了选民的思维过程。”Cadwalladr的报道在那之后爆红。另外两名《卫报》记者Emma Graham-Harrison和Sarah Donaldson撰写了文章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关联的。他们出色的叙事显然与普通非技术人员产生了共鸣，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巨大轰动（除了Facebook，它反而在其热门新闻版块推广自己的新闻稿）。《泰晤士报》的报道聚焦于Facebook数据泄露，将其认定为“该社交网络历史上最大的数据泄露之一”。记者Matthew Rosenberg和Nicholas Confessore与Cadwalladr联名署名，也连接了班农、Mercer和Cambridge Analytica之间的关系，并详细解释了他们如何利用Facebook数据推动特朗普获胜。

在伦敦，英国当局已经对剑桥分析公司和Facebook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因为在新闻爆出之前我就已经向他们提供了证据。但是，当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正在英国法院申请搜查令以搜查剑桥分析公司办公室并扣押证据时，Facebook已经雇佣了一家“数字取证公司”来检查剑桥分析公司的服务器，抢在当局之前进入了CA的总部。虽然ICO需要搜查令才能进入，但Facebook不需要，因为它已经获得了CA的准许。当Facebook发现新闻即将爆出时，它联系了剑桥分析公司，后者同意在ICO仍在申请搜查令的过程中向Facebook提供其服务器和计算机的访问权限。但当ICO得知Facebook已经进入CA总部时，他们非常愤怒。他们从未见过一家公司采取如此厚颜无耻的步骤来处理即将成为司法搜查令对象的证据。更糟糕的是，Facebook在这件事中并非仅仅是旁观者——Facebook的数据也是调查的对象，而该公司正在潜在的犯罪现场处理可能影响其自身法律责任的证据。ICO派遣特工到现场，由警方护送。深夜，ICO特工、英国警方和Facebook的“取证审计师”之间发生了一场戏剧性的对峙。Facebook的审计师被命令放下一切并立即离开剑桥分析公司办公室，他们同意撤退。英国信息专员伊丽莎白·德纳姆对Facebook的行为如此愤怒，以至于她第二天罕见地出现在英国新闻中，发表声明称Facebook的行为“可能损害监管调查”。

大西洋两岸的反应是瞬间而爆炸性的。我被召集到议会“假新闻和虚假信息”调查面前。这将是许多公开和秘密听证会中的第一个，涵盖从剑桥分析公司使用黑客和贿赂到Facebook数据泄露再到俄罗斯情报行动的一切内容。报道听证会的BBC议会记者马克·达西说：“我认为[DCMS委员会]与克里斯·怀利的听证会是我在议会见过的最令人震惊的事情，远超其他。”

在华盛顿，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启动了调查，而美国和英国的立法者开始要求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宣誓作证。新闻爆出几周后，司法部和FBI飞到英国，在皇家海军基地与我会面。NCA从皇家海军借用了这座建筑。

随着Facebook股价下滑，扎克伯格仍然不见踪影。他终于在3月21日现身，发了一篇Facebook帖子，说他正在“努力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并说科根、剑桥分析公司和Facebook之间存在“信任违约”。#DeleteFacebook标签开始在Twitter上流行，埃隆·马斯克通过推特说他删除了SpaceX和特斯拉的Facebook页面，为这场风暴火上浇油。当我为公开证词做准备时，我听着卡迪·B的音乐，这位美国说唱歌手在新闻爆出仅几周后就发布了她的首张专辑。这张专辑的标题（纯属巧合）隐私入侵很快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的表情包传播，人们将马克·扎克伯格的脸贴到这张现已白金销量专辑封面的编辑版本上。看起来这个故事正在渗透到时代精神中，那些已经对Facebook运营方式感到不安的人们现在以最公开的方式确认了他们的担忧。在这场公关噩梦中，扎克伯格在主要报纸上购买广告版面发表道歉信，而仅仅几周前Facebook还威胁要起诉《卫报》试图封杀这个故事，但这封信几乎没有平息愤怒。仅仅两周后，他面对美国国会领导人长达两天的严厉质询。

在英国，还有更多内容需要报道。这次是关于英国脱欧的。当这些故事在美国爆发时，新一批回复权信函被发送给那些参与脱欧投票的人员。多姆·卡明斯(Dom Cummings)和斯蒂芬·帕金森(Stephen Parkinson)是收件人之一。只有当萨尼在收到前脱欧投票工作人员的大量电话后那天晚上到达我们律师办公室时，我们才意识到帕金森做了什么回应。帕金森以最残酷的个人方式回应。当时，帕金森担任首相特蕾莎·梅的高级顾问，在《卫报》发表这个故事的前一天，唐宁街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官方声明，我们只是在《纽约时报》要求我们评论时才发现这一点。在声明中，帕金森透露了他与萨尼的关系，并将指控斥为分手后的怨恨。萨尼是巴基斯坦穆斯林，他还没有向家人出柜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因为这会让他在巴基斯坦的亲属面临人身危险，这一点帕金森非常清楚。尽管如此，他选择向世界媒体曝光萨尼，让他的前实习生承担后果。这是至少在近代历史上，首相新闻办公室首次公开曝光某人性取向作为报复行为。当萨尼听到这个声明时，他严肃地看着每个人的眼睛，靠在椅子上。艾伦和卡德瓦拉德最终说服卡明斯删除了他就此事写的博客文章，但伤害已经造成。帕金森做到了他想要达到的目的。

脱欧投票的爆料不得不与《每日邮报》星期日版的封面竞争：“首相顾问因脱欧现金阴谋陷入有毒性丑闻。”英国右翼媒体继续诋毁LGBTQ群体，将萨尼和他提供的英国历史上最大竞选资金违法案件的证据贬低为不过是“有毒的性行为”。此时，萨尼在卡拉奇的家人不得不在家中采取安全措施，因为LGBTQ人群及其家属在巴基斯坦面临暴力威胁。他的生活和他所爱的人的生活都被颠覆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午夜十二点半透过窗户看到萨尼独自坐在艾伦的

办公室里，拨打母亲的电话告诉她，是的，他是同性恋。在那一刻，他决定作为举报人出柜的勇气和后果是不可分割的。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萨尼面临的暴力只会更加严重，他被带着隐藏摄像头的人跟踪，他和我在同性恋酒吧里的照片后来被发布在英国极右翼网站上，配有极其恐同的评论。在议会中，首相特蕾莎·梅本人为帕金森的行为辩护。看到这一切令人心碎，但这让我为称萨尼为朋友而感到自豪。

...

...

3月20日晚上的首次公开亮相

3月20日晚上，在剑桥分析公司故事爆发三天后，我与艾伦和萨尼一起去了伦敦的前线俱乐部(Frontline Club)进行我的首次公开露面。当我走进去时，被摄影师包围，会场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记者们占据了他们能找到的最近的座位。后排到处都是来自二十多个新闻频道的摄像机，由于挤进了这么多人，现场变得很热。记者兼隐私活动家彼得·朱克斯(Peter Jukes)在观众面前采访了我，然后我回答了问题。当我无法再承受更多关注时，我通过一个隐秘的逃生路线离开。为了不制造场面，计划是让艾伦几分钟后离开。在外面，我向右转，正沿着诺福克广场(Norfolk Place)走，这时一个男人走近我。他举着一个发光的手机对着我的脸。我后退一步，感到困惑和有点惊慌。我问他想要什么，他告诉我只要看他的手机。

我的眼睛适应了光线，我能看出那是剑桥分析公司给UKIP开具发票的截图。然后他滑动到看起来像是脱欧派通讯总监安迪·威格莫尔(Andy Wigmore)发给某个俄国名字的人的电子邮件。我没有太长时间看它，但这条消息似乎是关于黄金的。“他们与俄国人合作，”那个男人告诉我。这时，艾伦和其他人出来了。当他们看到这个男人时，他们担心我的安全，跑上来试图抓住他。那个男人甩开他们逃走了。我对这一切感到茫然。那天早些时候，我连续参加了现场电视采访，被摄影师追赶。这是令人不知所措的一天。在回艾伦办公室拿包的车上，我告诉她我不太确定那是什么，但那些消息看起来足够真实：我认出了银行账户详细信息。那周晚些时候，艾伦收到了一条神秘消息，打电话说她认为在街上拦住我的那个男人正试图联系我。

我原以为作为举报人的大部分工作已经结束了，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接触到了如此敏感的信息，以至于我在2018年6月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会议必须在美国国会大厦地下的机密信息设施(SCIF)中进行。在那次秘密听证会前的两个月里，我在伦敦各处的随机地点与那个人见了几次面，很明显他能接触到属于Leave.EU联合创始人阿伦·班克斯(Arron Banks)和传播总监安迪·威格莫尔(Andy Wigmore)的文件。这些文件记录了Leave.EU（一个主要的另类右翼支持脱欧的竞选活动）与俄罗斯驻伦敦大使馆在脱欧竞选期间的大量通信。一旦我们确认了这些文件的真实性，艾伦和我就联系了军情五处和国家犯罪调查局。

4月，艾伦代表我在伦敦一个主要火车站内国家犯罪调查局的一个无标识办公室与一名调查官员会面，向他们通报最新情况，因为我们无法确定我是否被跟踪。我们都很担心，因为我们得知那个人携带着这些文件在乌克兰和东欧各地旅行，这些文件可能包含俄罗斯情报行动的证据。国家犯罪调查局通知了英国驻基辅大使馆这一情况。然后我们失去了他的踪迹，他的电话也断了。我们都非常担心他的安全。

几周后，那个人重新出现并想再次见面。艾伦和我决定我要秘密录制与那个人的会面。我们将录音副本和文件截图交给了英国当局。我们也通知了美国人，因为我们看到证据表明俄罗斯人在客户与特朗普竞选团队会面前后立即与Cambridge Analytica的客户交谈。最终我们在国会大厦南希·佩洛西的办公室与当时担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排名成员的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亚当·希夫(Adam Schiff)会面。我和艾伦告诉希夫众议员这些文件的存在。我同意带着这些文件返回华盛顿特区，这些文件安全地保存在卡迈克尔在议会的保险柜中。

这次华盛顿特区会议后不久，Fusion GPS联系了我，这是编制克里斯托弗·斯蒂尔(Christopher Steele)撰写的特朗普-俄罗斯档案的私人情报公司。斯蒂尔的公司通过英国消息源了解到我拥有的文件和录音，Fusion GPS告诉我们，他们自己也有文件和信息，这些材料阐明了同一组关联——俄罗斯人、脱欧和特朗普竞选团队之间的联系。我们都同意在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委员会主席达米安·柯林斯(Damian Collins)的办公室会面。就像拼图一样，柯林斯、Fusion GPS和我各自获得了关于相同事件的不同文件集，我们开始把一切拼凑在一起。艾伦再次联系了国家犯罪调查局，但他们拒绝采取行动，所以我们转而将所有材料交给了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他们同意将其转交给相应的美

国情报渠道。如果英国当局不愿意自己处理我们掌握的关于脱欧和俄罗斯大使馆的证据，我们希望当美国机构获得这些文件时，他们会对英国同事施压，促使其采取行动。

.....

.....

文件揭示了一个非凡的故事

2015年，在我离开Cambridge Analytica不久后，英国独立党支持的Leave.EU竞选活动雇用了该公司，正如Leave.EU在其竞选启动时所述，“绘制英国选民图谱及其信仰，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与选民互动。”CA-UKIP的关系是由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培育的。一旦班克斯和威格莫尔开始与班农谈论Cambridge Analytica，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就将他们介绍给了他的朋友罗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默瑟热衷于帮助他们萌芽的另类右翼运动，但这位美国亿万富翁像所有外国人一样，法律上被禁止捐款或实质性干预英国政治竞选。因此这位亿万富翁告诉脱欧派，Cambridge Analytica的数据和服务可能有用，班农提出帮助。法拉奇、班克斯等人接受了班农的提议，用数据库和算法完成了新兴的英美另类右翼联盟。

正是这种关系成为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关注的焦点，因为这种关系似乎被俄罗斯大使馆利用作为进入特朗普竞选团队的隐蔽渠道。2015年11月，Leave.EU公开启动了其公投竞选活动，布列塔尼·凯泽(Brittany Kaiser)除了在Cambridge Analytica工作外，还被任命为Leave.EU的新运营总监。在竞选中，凯泽将特别专注于部署CA的微定向算法。

就在与Cambridge Analytica公开合作前不久，UKIP和Leave.EU的主要捐助者——阿伦·班克斯(Arron Banks)和安迪·威格摩尔(Andy Wigmore)——开始与俄罗斯政府调情。这一切始于2015年在唐卡斯特举行的UKIP大会，两人与俄罗斯外交官亚历山大·乌多德(Alexander Udod)会面，乌多德邀请他们在俄罗斯大使馆会见俄罗斯大使。几周后，在与伦敦俄罗斯大使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雅科文科(Alexander Vladimirovich Yakovenko)进行了通信中描述的“醉酒六小时午餐”后，班克斯和威格摩尔第二次会见了大使，并获得了一个诱人的提议。班克斯随后将这个提议转达给了包括著名投资者和脱欧支持者吉姆·梅隆(Jim Mellon)在内的几位合伙人。俄罗斯大使馆有意为一些潜在盈利交易提供介绍，投资班克斯在邮件中称为“俄罗斯黄金游戏”的项目。大使通过介绍俄罗斯商人西曼·波瓦连金(Siman Povarenkin)向这些男士进行推介。波瓦连金建议说，几个俄罗斯金矿和钻石矿即将合并并部分私有化。大使馆明确表示，这笔交易将得到受美国和欧盟制裁的俄罗斯国有银行联邦储蓄银行(Sberbank)的支持。UKIP捐助者被告知，与大使馆和联邦储蓄银行合作的优势在于“可以获得其他人无法获得的某些机会”。

在宣布Cambridge Analytica将为Leave.EU竞选活动工作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与俄罗斯大使馆的接触仍在继续。在回复俄罗斯官员会议邀请的邮件中，班克斯写信给大使馆说：“谢谢，安迪和我很高兴参加11月6日的午餐，向大使简报情况。美国对这次公投也有巨大兴趣，我们很快就会访问华盛顿，向关键人物简报竞选情况。”2015年11月16日，即宣布的第二天，班克斯和威格摩尔被邀请回到大使馆参加更多会议。我们不确切知道那天在大使馆发生了什么，但我们知道脱欧派随后飞往美国会见他们的共和党对手，俄罗斯大使馆也知道这些行程。我们还知道班克斯和威格摩尔热衷于让雅科文科大使保持了解，在2016年1月给大使的一条短信中说：“安迪和我很想来向您汇报竞选情况。一切都在发生。致以最好的祝愿，阿伦。”

为什么班克斯会向俄罗斯大使介绍他的美国政治联系人或脱欧公投竞选情况，如果他严格来说只是在与俄罗斯人做生意的话，这一点并不清楚，但这些会议确实对脱欧派产生了影响。在一连串通信中，其中一人讨论了帮助在乌克兰创建脱欧式运动，目标是对抗亲欧盟叙述，而乌克兰是俄罗斯长期试图保持在其影响范围内的国家。他们后来决定不进军乌克兰，在一封邮件中甚至讨论了新闻稿草案中的一句话是否可能被视为“过于明显的亲俄派”，但威格摩尔仍然建议“向大使发送支持信”。

班克斯和威格摩尔与俄罗斯大使馆保持联系；威格摩尔写信邀请俄罗斯外交官参加Leave.EU活动——包括他们在2016年6月的脱欧胜利派对。尽管据报道班克斯就俄罗斯金矿和钻石矿投资提议咨询了专家，但他告诉记者最终拒绝了所有提议。威格摩尔也决定“不再进一步推进”投资。但在脱欧竞选结束后不久，据报道与UKIP主要捐助者之一吉姆·梅隆相关的投资基金对部分私有化的俄罗斯国有钻石公司埃罗莎(Alrosa)进行了投资。然而，该公司代表表示，投

资的具体细节是在梅隆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的，该基金在2013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就已对埃罗莎进行了早期投资。2016年7月下旬，即脱欧获胜一个月后，就在俄罗斯情报部门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文件和邮件的黑客攻击被泄露几周后，亚历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去看马球比赛，被拍到与雅科文科大使分享一瓶俄罗斯伏特加。巧合的是，这也正值尼克斯试图为特朗普竞选团队获取维基解密信息的时候。

脱欧获胜后，法拉奇(Farage)和班克斯将目光转向美国，当时美国正深陷2016年竞选之中。在2016年期间，这些英国人为特朗普积极竞选，法拉奇参加了共和党候选人的无数公共活动。当时对普通观察者来说，时任候选人特朗普自称“脱欧先生”，邀请UKIP主要人物参加他的集会似乎很正常。但许多美国人不理解的是另类右翼(alt-right)的联系有多紧密。这是一个协调的全球运动。它在2016年成为了巨大的安全风险。

2016年8月20日，俄罗斯大使馆三等秘书谢尔盖·费迪奇金收到了安迪·威格摩尔发来的一封邮件，主题为“转发：科特雷尔文件—机密”。邮件包含几个附件和一条神秘的简短信息：“好好享受这个。”附件包含与乔治·科特雷尔被美国联邦特工逮捕相关的法律文件。当时，科特雷尔是奈杰尔·法拉奇的幕僚长，也是英国独立党(UKIP)的筹款主管。法拉奇后来表示他对科特雷尔的非法活动一无所知。在飞往美国庆祝他们最近的脱欧胜利并参加2016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大型特朗普集会后，科特雷尔和法拉奇在芝加哥奥黑尔机场准备返回英格兰。起飞前，几名特工登机逮捕了科特雷尔，指控他犯有多项洗钱和电信诈骗阴谋罪。他还与摩尔多瓦银行(Moldindconbank)有关联，该银行被指控是“俄罗斯洗衣店”洗钱计划的关键参与者。根据我从联系人那里获得的邮件记录，威格摩尔向俄罗斯外交官发送了美国司法部对科特雷尔指控的副本。根据认罪协议，科特雷尔对电信诈骗罪名表示认罪。

俄罗斯大使馆清楚地知道脱欧运动的关键人物与特朗普竞选团队联系有多么紧密，大使馆一直在培养与他们的关系，以至于他们从威格摩尔那里收到了关于其UKIP同事被FBI逮捕的文件。美国人为什么要关心俄罗斯在英国的行为？因为这些脱欧派分享着同一家数据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以及同一个顾问——史蒂夫·班农，他们显然在每一步都让俄罗斯人知情。而这些脱欧派正是特朗普意外胜利后最早被邀请到特朗普大厦的人群之一。美国当选总统会见了定期向俄罗斯政府汇报情况的英国公民。

当记者们庆祝成功曝光剑桥分析并重创顽固的Facebook股价时，我并没有感到喜悦。我麻木了。这感觉像是看着一个时日无多的人死去。这是我经历过的最艰难和痛苦的事情。直到几个月后，肾上腺素消退后，我才开始处理发生的一切。我意识到自己承受了多少创伤，我允许自己感受这种经历的痛苦，而我在这场灾难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加剧了这种痛苦。当我看到特朗普上台，看到他禁止穆斯林国家公民进入美国并为白人至上主义运动提供辩护时，我不禁感觉自己为这一切的发生埋下了种子。我玩火自焚，现在我看着世界在燃烧。前往国会时，我不仅仅是去作证。我是在参加自己的忏悔。

第12章

启示录

我不会告诉你我具体住在哪里。就在伦敦东区的肖尔迪奇和达尔斯顿之间的某个地方。我是住在顶楼的粉色头发家伙，但我并不怎么引人注目。这个社区根植于工人阶级，这里的许多建筑在伦敦工业时代曾经是工厂。烟熏砖墙上褪色的油漆为一个世纪前早已消失的产品做着广告。在上一波英联邦移民浪潮中迁移到这里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加勒比海社区，与被生活成本推出伦敦中心的新一波艺术家、同性恋者、学生和肮脏怪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缓解。这里有装饰艺术风格的电影院、屋顶花园，以及醉酒俱乐部常客每个周末直到凌晨4点都在喝红带啤酒的不安喧嚣。人们经常能看到完全蒙面的穆斯林妇女与满身纹身、发型不对称的俱乐部小子在同一家销售酒类的蔬菜水果店购物。这仍然是一个我可以相对匿名地外出行走的地方。

我的建筑很古老，建于互联网甚至无法想象的时代，当时室内管道仍是新奇事物。地板是木制的，很结实，但偶尔你踏步时会发出吱吱声。门上有额外的螺栓，是在我公开身份后的那一周，一群男人不断来敲门后安装的。我的邻居开始抱怨，直到他们意识到我是谁。现在每当他们看到有人在附近游荡时，都会让我知道。

我住的地方缺少很多东西。在我的客厅里，远角有一个支架，那里曾经放着一台电视。电线仍然从墙上垂下来。那是一台智能电视，连接着我的Netflix和社交媒体账户，它有麦克风和摄像头。在我的房间里，有一个床头柜，抽屉里铺着特殊的金属织物，防止抽屉里的任何设备发送或接收电子信号。作为睡前仪式的一部分，我把设备放在那里。房间对面的衣柜里是我以前生活中的旧电子产品。一个未插电的亚马逊Alexa独自坐着，埋在一堆其他电子垃圾中——平板电脑、手机、智能手表——我还没有妥善处理掉。另一个盒子里放着硬盘的残骸，在将其中的证据移交给当局后，这些硬盘已经被消磁、砸毁或酸性漂白。数据永远消失了，我不如把它们扔掉，但我对它们有着奇怪的感情。

在客厅里，我有一张来自老工厂的古董木桌，桌上放着一台从未连接过互联网的物理隔离笔记本电脑。我用它来处理移交给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证据。抽屉里是我旅行时使用的空白笔记本电脑，以防在边境被搜查。我的个人电脑放在客厅里，经过加密并用物理U2F密钥锁定。摄像头被胶带封住，尽管对内置麦克风无能为力。地板上有一台连接到墙上的私人VPN服务器，然后再连接到其他服务器。

我所在建筑的入口处有一个安全摄像头，将数据传输给安保公司。我不知道其中是否有任何加密，所以谁知道谁在监视。当我离开家时，我会带一个便携式紧急按钮，但还没有需要使用它。NCA将我列入与我的一部手机相关的监视名单。如果我打电话，他们会优先响应，即使我对接线员什么都不说。我的背包里总是装着一个便携式硬件VPN路由器，以防需要连接不安全的Wi-Fi，还有几个法拉第袋，我选了粉色的因为很可爱。我经常戴帽子，但人们仍然会认出我，即使一年后也是如此。几乎每天，我都会被问到“你是...那个举报者吗？”

我现在的的生活看起来像一个偏执狂，但在街上被袭击、收到流氓私人安保公司的威胁、深夜睡觉时酒店房间被闯入，以及在过去十二个月里经历两次电子邮件黑客攻击后，谨慎行事是明智的。当我让人检查公寓的安全风险时，电视被认为是一个风险，因为它可能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用来监视或监听我。当我们拆卸它时，我对这台监视你的电视的讽刺意味微笑。

在报道发布前的几天里，当Facebook开始向我发送法律威胁，并将我的案件上报给其副总法律顾问和副总裁时，我的律师意识到该公司将我的举报视为对其业务的重大威胁。凭借在其他黑客案件上的经验，我的律师知道被逼入绝境

的公司愿意做什么。但Facebook不同。他们不需要黑我；他们可以简单地通过我手机上的应用程序跟踪我的一切行踪——我在哪里，我的联系人是谁，我在见谁。

我处理掉了我的手机，我的律师买了从未接触过Facebook、Instagram或WhatsApp的全新干净手机。Facebook移动应用的条款和条件要求麦克风和摄像头访问权限。尽管该公司极力否认定向广告提取用户音频数据，但我们的手机上确实存在一个允许访问音频功能的技术权限。而我不是普通用户：当时我是该公司最大的声誉威胁。至少在理论上，音频可以被激活，我的律师担心该公司可能会监听我与他们或警方的谈话。Facebook已经可以访问我的照片和摄像头，这使他们不仅能听到我说话，还能看到我在哪里。即使我独自在浴室洗澡，我也并非真正独自一人。如果我的手机在那里，Facebook也在那里。无处可逃。

但仅仅丢掉我的手机是不够的。我的妈妈、爸爸和姐妹们都必须出于同样的原因从他们的手机中删除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但Facebook也知道我所有朋友是谁，他们知道我们喜欢去哪里玩，我们在消息中写什么，他们知道我们都住在哪里。即使和朋友出去玩也成了风险，因为Facebook可以访问他们的手机。如果朋友拍了照片，Facebook可以访问它，其面部识别算法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在其他人手机上的照片中检测到我的脸，即使他们对我来说是陌生人。

当我处理掉旧电子设备时，我的朋友们开玩笑说，这就像我在驱除机器内部的恶魔，一个朋友甚至带来了一些鼠尾草来燃烧以防万一。当然这是一个有趣的举动，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是一次驱魔。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世界里，有由代码和数据组成的无形幽灵，它们有能力监视我们、监听我们、思考我们。我希望这些幽灵从我的生活中消失。

...

2018年3月16日

2018年3月16日，在《卫报》和《纽约时报》发布我的故事的前一天，Facebook宣布不仅禁止我使用Facebook，还禁止我使用Instagram。Facebook拒绝禁止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仇恨军团，但它选择禁止我。该公司要求我交出我的手机和个人电脑，并说让我恢复的唯一方法实际上是给他们我正在向当局提供的同样信息。Facebook的行为就像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一家公司。该公司似乎不明白我不是调查的对象——*他们才是*。我的律师建议我拒绝他们的要求，以免干扰合法的警方和监管调查。后来，当我与当局合作时，这个禁令使得移交我Facebook账户中的证据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对英国脱欧公投期间发生的事情的调查受到了影响。

数字身份的消失与社会媒体的影响

人们常说只有失去了才会珍惜，只有当我被Facebook抹除时，我才真正意识到我的生活多么频繁地触及他们的平台。我手机上的几个应用程序停止工作了——一个约会应用、一个出租车应用、一个消息应用——因为它们使用Facebook身份验证。我在网站上的订阅和账户因为同样的原因失效了。人们经常谈论一种二元论：网络世界和我们的“现实生活”。但在我的大部分数字身份被没收后，我可以告诉你它们并不是分离的。当你被社交媒体抹除时，你就失去了与人们的联系。我不再被邀请参加聚会——不是故意的，而是因为这些邀请总是在Facebook上发生或者发布在Instagram上。没有我新电话号码的朋友发现几乎不可能联系到我，除了试图给我的律师发电子邮件。当我度过举报的艰难时期后，只有在俱乐部或酒吧的偶然相遇中，我才会与几个月没见的人取得联系。

现在，当约会应用上的男人要求查看我的Instagram档案时，这就开始了一个尴尬的解释，关于我如何被禁止——而且我不是在网络欺骗，我保证。就好像我的身份被没收了，人们不再相信我就是我所说的我。有时我被认出是那个家伙，人们担心如果他们决定见我，可能会有人开始监视他们。我总是告诉他们不用担心，因为这些公司已经在24/7追踪他们了。这个禁令只不过是Facebook的一个恶意指控，感觉像是被恐惧的霸凌者的恶意指弄。对我来说，它最多造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个人麻烦，并不像其他举报者经历的那种报复那样对我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更不用说这个平台已经协助和教唆对现代社会造成的损害程度。）但它向我显示了我的在线身份对我生活的许多方面是多么不可或缺——而且我的身份没有得到正当程序权利或公正的裁决。在我被禁四天后，在议会的紧急辩论中，英国文化国务秘书说Facebook单方面禁止举报者的能力是“令人震惊的”，因为它提出了关于一家公司是否应该能够行使这种不受制约权力的严重问题。

数以亿计的美国人进入Facebook的无形架构，认为这是一个分享照片和关注他们最喜欢的名人的无害场所。他们被与朋友联系的便利性以及用游戏和应用程序抵御无聊的能力所吸引。用户被Facebook告知这个企业是关于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但Facebook的“社区”正在为看起来像他们的人建立单独的社区。当平台观察他们、阅读他们的帖子、研究他们如何与朋友互动时，它的算法随后会做出决定，如何将用户分类到他们这类人的数字社区中——Facebook称之为他们的“Lookalikes”。这样做的原因，当然是允许广告商用仅针对他们这类人的单独叙述来定向这些同质的Lookalikes。大多数用户不会知道他们的分类，因为那些看起来不像他们的人的其他社区将保持不可见。Lookalikes的分割，毫不奇怪，将同胞公民推得越来越远。它创造了我们现在都生活在其中的氛围。

作为社交媒体的发源地，美国被缓慢引入了新闻源、关注者、点赞和分享的新数字公地。而且，就像气候变化对我们的海岸线、森林和野生动物的渐进影响一样，很难完全描绘出包围我们的事物变化的规模。但有一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到社交媒体的严峻影响，这些案例中它突然全力冲击一个国家。在2010年代中期，Facebook进入缅甸并迅速发展，在一个5300万人口的国家中迅速达到2000万用户。Facebook的应用程序预装在该国销售的许多智能手机上，市场研究确定该网站是缅甸公民新闻的主要来源之一。

2017年8月，针对罗兴亚人的仇恨言论在Facebook上激增，罗兴亚人是缅甸的一个主要穆斯林少数群体，关于“无穆斯林”缅甸的叙述和呼吁对该地区进行种族清洗的内容传播开来。其中大部分是由进行信息作战的军事人员创建和传播的宣传。在罗兴亚武装分子对警察发动协调攻击后，缅甸军方利用了他们在网上收到的支持激增，继续系统地杀害、强奸和致残数万名罗兴亚人。其他群体加入了屠杀，呼吁行动杀害罗兴亚人的信息继续在Facebook上传播。罗兴亚村庄被烧毁，超过70万罗兴亚难民被迫越过边境进入孟加拉国。Facebook被国际和当地组织反复警告缅甸的情况。该公司从平台上禁止了一个罗兴亚抵抗组织，但让军方和亲政府团体留在网站上，这使他们能够继续传播仇恨宣传。这是在联合国官员称之为“种族清洗的教科书式例子”的情况下发生的。

2018年3月，联合国得出结论，Facebook在罗兴亚人种族清洗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Facebook无摩擦的架构推动了暴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人群中传播仇恨言论。Facebook冷漠的回应完全是奥威尔式的。“Facebook上没有仇恨

言论或煽动暴力内容的位置，我们努力将其排除在我们的平台之外，” Facebook关于其在四万人种族清洗中推波助澜作用的声明如是说。在全世界看来，如果你想维持一个压迫性政权，Facebook将是一个绝佳的合作伙伴。

互联网本应如此出色的地方在于，人们突然能够打破所有这些障碍，与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交谈。但实际发生的是，对占据一个国家物理空间的相同趋势的放大。人们在社交媒体上花费数小时，关注像他们一样的人，阅读由算法为他们“策划”的新闻文章，这些算法的唯一道德标准是点击率——这些文章除了强化单一维度的观点并将用户推向极端以保持他们的点击之外什么都不做。我们看到的是认知隔离，人们存在于自己的信息贫民窟中。我们正在见证我们现实的隔离。如果Facebook是一个“社区”，那它就是一个封闭的社区。

共同经验是现代多元主义民主中公民团结的根本基础，民权运动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能够共同分享空间的故事：在电影院的同一部分或使用同一个饮水机或浴室。美国的种族隔离总是以阴险平凡的方式表现出来——通过分离的公交座位、饮水机、学校、电影票和公园长椅。也许现在还有社交媒体。对于Rosa Parks来说，被命令让出她的公交座位只是白人美国系统性确保她的黑皮肤被分离和不被看见的无数方式之一——确保她仍然是他者，不是他们美国的一部分。虽然我们不再允许建筑物根据客人的种族隔离入口，但隔离仍然存在于互联网架构的核心。

社会孤立产生了阴谋论和民粹主义的原材料：不信任。Cambridge Analytica是这个巴尔干化网络空间的必然产物。该公司能够让其目标沉迷于愤怒，只是因为没有任何东西阻止它这样做——因此，在不受阻碍的情况下，该公司将他们淹没在虚假信息的漩涡中，结果可预见地是灾难性的。但简单地阻止CA是不够的。美国新发现的感知危机只会继续恶化，直到我们解决让我们走到这一步的潜在架构。不采取行动的后果将是可怕的。相互经验的破坏是他者化的重要第一步，是否认另一种关于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意味着什么的观点。

Steve Bannon认识到互联网的“虚拟”世界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要真实得多。美国人平均每天查看手机52次。许多人现在睡觉时手机就在身边充电——他们与手机睡觉的时间比与人睡觉的时间更多。他们醒着时看到的第一样和最后一样东西都是屏幕。人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内容可以激励他们实施仇恨行为，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实施极端暴力行为。不再有“只是在线”这种说法，在线信息——或虚假信息——如果能吸引其目标，就可能导致可怕的悲剧。作为回应，Facebook像NRA一样，通过援引同样的“枪不杀人”论证来逃避其道德责任。他们举起双手声称无法控制用户如何滥用他们的产品，即使导致大规模谋杀。如果种族清洗都不足以让他们采取行动，那什么才能？当Facebook再次进行道歉之旅，大声宣称“我们会更加努力”时，其空洞的修辞不过是一家满足于从不行动的现状中获利的科技公司的 *thoughts and prayers*。对于Facebook来说，受害者的生命已经成为他们继续追求快速行动，打破常规的外部性。

当我作为举报人站出来时，另类右翼的数字愤怒机器将矛头对准了我。在伦敦，愤怒的脱欧支持者将我推向迎面而来的交通。我被另类右翼跟踪者跟踪，我和朋友在俱乐部的照片被发布在另类右翼网站上，并附有在哪里能找到我的信息。当需要在欧洲议会作证时，关于Facebook批评者的阴谋论开始在另类右翼论坛中渗透。当我作证时，后面有人在高喊“Soros, Soros, Soros”。当我离开欧洲议会时，一个男人在街上走向我，喊着“犹太人的钱！”当时，这些叙述似乎凭空出现。后来，据透露，Facebook在对其公关危机感到恐慌时，雇佣了秘密传播公司Definers Public Affairs，该公司随后泄露了充满反犹太主义比喻的虚假叙述，声称其批评者是George Soros资助的阴谋的一部分。谣言在互联网上播种，正如我亲身发现的那样，其目标将其视为亲自解决问题的暗示。

...

信息战的新领域

2013年2月，一位名为瓦列里·格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的俄罗斯军事将领写了一篇文章，挑战当时盛行的战争观念。格拉西莫夫是俄罗斯总参谋长（大致相当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在《军工信使》上发表了题为“科学的价值在于预见”的文章——这些思想后来被一些人称为格拉西莫夫主义。格拉西莫夫写道，“‘战争规则’已经改变”，“非军事手段在实现政治和战略目标中的作用已经增强”。他谈到了人工智能和信息在战争中的用途：“信息空间为削弱敌人的战斗潜力开辟了广阔的非对称可能性。”本质上，格拉西莫夫吸取了由社交媒体信息分享推动的阿拉伯之春起义的经验教训，并敦促军事战略家加以采用。“最容易说的就是‘阿拉伯之春’事件不是战争，因此我们——军人——没有什么教训可学。但也许相反的情况才是真实的——正是这些事件是二十一世纪战争的典型特征。”

格拉西莫夫的文章之后，又出现了另一篇俄罗斯军事战略论文，这次是由S. G. 切基诺夫上校和S. A. 博格丹诺夫中将撰写的。他们的论文将格拉西莫夫的想法推进得更远：作者写道，可以通过“从Facebook和Twitter公共网络服务器获取信息进行宣传”来攻击对手，并且通过这些“强大的信息技术，侵略者将努力让其打算攻击的国家的所有公共机构参与进来，主要是大众媒体和宗教组织、文化机构、非政府组织、由国外资助的公共运动，以及从事外国资助研究的学者。”“在当时，这是一个激进的新想法。今天读来，这正是俄罗斯干预2016年选举的精确蓝图。

战争史就是新发明和新战略的历史，其中许多都是出于必要而诞生的。从大多数指标来看，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明显弱于美国。美国军事预算为7160亿美元，是俄罗斯的十倍多。美国拥有128万现役军事人员，而俄罗斯有100万；美国拥有超过13000架飞机，而俄罗斯有4000架；美国有20艘航空母舰，而俄罗斯只有一艘。按照所有现有的传统衡量标准，莫斯科在“大国”战争方面永远不会再与美国竞争，弗拉基米尔·普京对此心知肚明。因此，俄罗斯人必须设计另一种重新获得优势的方法——一种与物理战场空间无关的方法。

当军事战略家专注于手头的战斗时，很难设想新的战斗形式。在飞行出现之前，军事指挥官只关心如何在陆地或海上进行战斗。直到1915年，法国飞行员罗兰·加罗斯驾驶一架临时装配了机枪的飞机，军事战略家才意识到战争实际上可以从天空中进行。然后，一旦飞机开始参与攻击，地面的陆军部队也开始转变，制造了紧凑的、速射的防空炮。战争的演变就这样继续着。

信息战以类似的方式演变。起初，没有人能想象Facebook或Twitter可以成为战场工具；战争是在地面、空中、海上以及可能在太空中进行的。但第五个领域——网络空间——已经证明对那些有想象力和远见来设想将社交媒体用于信息战的人来说是一个富有成效的战场。你可以从格拉西莫夫、切基诺夫和博格丹诺夫奠定的基础，直接划一条线到剑桥分析公司的行动，再到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竞选的胜利。在短短五年左右的时间里，俄罗斯军方和国家成功开发了二十一世纪第一个毁灭性有效的新武器。

他们知道这会奏效，因为像Facebook这样的公司永远不会采取“非美国式”的步骤来约束他们的用户。所以俄罗斯不必传播宣传。他们可以让美国人通过点击、点赞和分享来自自己做这件事。Facebook上的美国人为俄罗斯人做了工作，通过第一修正案洗白了他们的宣传。

但这种规模化虚假信息的新时代并不仅限于政治领域。星巴克、耐克和其他时尚品牌等公司发现自己成为了俄罗斯资助的虚假信息行动的目标。当品牌发表涉及现有社会或种族紧张关系的声明时，已经确认了几起俄罗斯资助的虚假新闻网站、僵尸网络和社交媒体操作激活这些叙述并挑起社会冲突的案例。2016年8月，足球运动员科林·卡佩尼克拒绝为美国国歌起立，以抗议美国对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和警察暴行。时尚品牌耐克作为卡佩尼克的赞助商支持这位运动员，随后围绕耐克的回应产生了争议。但当时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俄罗斯关联的社交媒体账户在丑闻爆发数小时内就开始传播和放大现有的促进抵制耐克的标签。一些俄罗斯放大的内容最终进入

了主流新闻，这有助于将抵制耐克的叙述合法化为纯粹的本土抗议。网络安全公司还识别出来自另类右翼团体的虚假耐克优惠券，这些优惠券针对非裔美国社交媒体用户，提供诸如“有色人种所有鞋款75%折扣”等优惠。这些优惠券旨在创造这样的情景：不知情的非裔美国顾客会试图在耐克商店使用这些优惠券，但会被拒绝。在病毒视频时代，这种情景反过来可能创造“真实”的镜头，展示一个要求在商店免费获得东西的“愤怒黑人”的种族主义刻板印象。那么为什么这些虚假信息行动要针对一家时尚公司并试图武器化其品牌呢？因为这种敌对宣传的目标不仅仅是干扰我们的政治，甚至不是损害我们的公司。目标是撕裂我们的社会结构。他们希望我们彼此仇恨。当这些叙述污染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关心的事物——我们穿的衣服、观看的体育比赛、听的音乐，甚至喝的咖啡时，这种分裂会产生更大的冲击。

我们都容易受到操纵。我们基于可获得的信息做出判断，但当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被中介化时，我们都容易受到操纵。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偏见可能在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被放大。我们许多人忘记了，我们在新闻推送和搜索引擎中看到的内容已经被算法调节，这些算法的唯一动机是选择能够吸引我们而不是通知我们的内容。随着大多数有信誉的新闻来源现在都设置了付费墙，我们已经看到信息逐渐成为奢侈品，而在这个市场中，虚假新闻总是免费的。

在上一次经济革命中，工业资本主义试图开发我们周围的自然世界。只有随着气候变化的出现，我们现在才开始承认其生态外部性。但在资本主义的下一代迭代中，原材料不再是石油或矿物，而是商品化的注意力和行为。在这种新的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经济中，*我们就是原材料*。这意味着有一种新的经济激励来在平台和用户之间创造实质性的信息不对称。为了能够将用户行为转化为利润，平台需要了解用户行为的一切，而用户对平台的行为一无所知。正如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发现的那样，这成为孵化宣传的完美环境。

随着亚马逊Alexa和谷歌Home等家庭自动化中心的出现，我们看到了网络空间与我们时间物理现实最终整合的第一步。第五代(5G)移动通信和下一代Wi-Fi已经在推出，为“物联网”(IoT)成为新常态奠定基础，在这种新常态下，无论大小的家用电器都将连接到高速且无处不在的互联网网络。这些平凡的设备，无论是冰箱、牙刷还是镜子，都设想使用传感器开始跟踪用户在家中的行为，将数据传回服务提供商。亚马逊、谷歌和Facebook已经申请专利来创建“网络化家庭”，将家庭物联网传感器与在线市场、广告网络和社交档案整合。在这个未来，亚马逊将知道你何时服用阿司匹林，Facebook将观看你的孩子在客厅玩耍。

与智能信息网络完全整合，这种新环境将能够观察我们、思考我们、判断我们，并通过调节我们获取信息的途径来寻求影响我们——在这里“它”可以看到我们，但我们看不到“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将让自己沉浸在由我们创造的这些硅精灵影响的*有动机空间*中。我们的环境将不再是被动或良性的；它将有意图、观点和议程。我们的家将不再是远离外部世界的避风港，因为一种环境存在将持续存在于每个连接的房间中。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我们的家会思考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汽车和办公室会判断我们的地方。门将成为门卫的地方。我们创造了未来的恶魔和天使的地方。

这是硅谷为我们所有人描绘的梦想——在每一分钟、每一个地方包围我们。在Cambridge Analytica追求信息统治的过程中，它永远不会满足于仅仅拥有社交数据集，并且已经开始与卫星和数字电视提供商建立关系。在接入联网电视之后，Cambridge Analytica计划找到一种方法与人们家中的传感器和智能设备集成。想象一个未来，像Cambridge Analytica这样的公司可以编辑你的电视，与你的孩子交谈，并在你睡觉时对你耳语。

...

...

我们法律体系的基础依赖于这样一个概念：我们的环境是被动和无生命的。围绕我们的世界可能会被动地影响我们的决定，但这种影响是**无动机的**。自然界或天空不会选择影响我们。几个世纪以来，法律已经发展出关于人性的几个基本假设。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类能动性(human agency)的概念，这是法律中不可反驳的假设——人类有能力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理性和独立的选择。由此可见，世界不会为人类做决定，而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中做决定。

人类能动性的概念是刑事责任的哲学基础，我们惩罚违法者是基于他们做出了应受谴责的选择。燃烧的建筑物确实可能伤害人们，但法律不会惩罚那栋建筑物，因为它没有能动性。因此，人类法律规范人类行为，而不是其周围环境的动机或行为。与此相应的是我们拥有的基本权利。在启蒙运动期间，人们的基本权利被阐述为保护人类能动性行使的核心权利。生命权、自由权、结社权、言论权、投票权和良心权都以**能动性假设**为基础，因为它们是从这种能动性的产出。但能动性本身并没有被明确表述为一项权利，因为它一直被假设为仅仅因为我们的人格而存在。因此，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能动性权利**，这个权利是*contra mundum*的——也就是说，一个可以**对抗环境本身行使的能动性权利**。我们没有对抗天空或有动机的思考空间不当影响来调节我们能动性行使的权利。在美国建国时，我们的能动性可能被有动机的思考环境操纵的情况从未被考虑为一种可能性。对于开国元勋来说，这将是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力量。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竞争以最大化我们注意力的算法不仅有能力改变文化，还能重新定义存在的体验。算法强化的“参与度”(engagement)是我们愤怒政治、抨击文化、自拍引发的虚荣、技术成瘾和心理健康侵蚀的核心。目标用户被内容浸泡以保持他们的点击。我们喜欢认为自己不受影响或认知偏见的影响，因为我们想感觉自己在控制之中，但酒精、烟草、快餐和游戏等行业都知道我们是受认知和情感脆弱性影响的生物。技术行业已经通过对“用户体验”、“游戏化”(gamification)、“增长黑客”(growth hacking)和“参与度”的研究掌握了这一点，通过激活ludic循环和强化时间表，就像老虎机一样。到目前为止，这种游戏化一直局限于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但当我们进一步将我们的生活与旨在利用我们认知中进化缺陷的网络信息架构集成时会发生什么？我们真的想生活在一个“游戏化”的环境中，这个环境设计我们的痴迷并玩弄我们的生活，就好像我们在它的游戏中一样？

社交媒体内部的潜在意识形态不是增强选择或能动性，而是缩小、过滤和减少选择以惠及创作者和广告商。社交媒体将公民聚集到受监控的空间中，架构师可以在那里跟踪和分类他们，并利用这种理解来影响他们的行为。如果民主和资本主义基于可获得的信息和自由选择，那么我们正在目睹的是它们从内部的颠覆。

我们有创造一个痴迷于记忆的社会风险，我们可能忽视了遗忘、继续前进或保持未知的价值。人类成长需要私人圣所和自由空间，在那里我们可以实验、玩耍、涉猎、保守秘密、违反禁忌、违背承诺、思考我们未来的自己，而不会对我们的公共生活产生后果，直到我们决定在公共场合改变。历史告诉我们，个人和社会解放始于私人空间。如果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隐私和个人发展，我们就无法摆脱我们的童年、过去的关系、错误、旧观点、旧身体或以前的偏见。如果我们的选择被监控和为我们过滤，我们就不能自由选择。如果我们被束缚于我们曾经是谁或我们认为我们是谁或我们曾经如何展示自己，我们就无法成长和改变。如果我们存在于一个总是观察、记忆和标记我们的环境中，根据我们无法控制或意识到的条件或价值观，那么我们的数据自我可能会将我们束缚于我们宁愿继续前进的历史中。隐私是我们决定我们想成为谁以及如何成为的力量的本质。隐私不是关于隐藏——隐私是关于人类成长和能动性。

但这不仅仅是关于隐私或同意的问题。这关乎谁能够影响我们的真相以及我们周围人的真相。这关乎我们正在社会周围构建的操控架构。这正是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给我们的教训。要理解社交媒体的危害，我们首先必须理解它是什么。Facebook可能向用户自称为“社区”，或向监管者自称为“平台”，但它不是一项服务，就像建筑物不是一项服务一样。即使你不完全理解网络空间是如何运作的，重要的是要理解它现在包围着你。每一个联网设备和计算机都是相互连接的信息架构的一部分——并塑造着你对世界的体验。大多数硅谷公司最常见的职位名称是工程师和架构师，而不是**服务经理或客户关系**。但与其他行业的工程不同，科技公司在发布产品之前不必进行安全测试以符合任何建筑规范。相反，平台被允许采用**暗模式设计**，故意误导用户持续使用并放弃更多数据。科技工程师有

意在他们的平台上设计令人困惑的迷宫，让人们越来越深入这些架构，没有任何明确的出口。当人们继续点击穿过他们的迷宫时，这些架构师为“参与度”的增加而欣喜。

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平台不是服务；它们是架构和基础设施。通过将他们的架构标记为“服务”，他们试图通过消费者的“同意”让责任落在消费者身上。但在其他任何行业，我们都不会以这种方式给消费者施加负担。航空乘客不被要求“接受”飞机的工程设计，酒店客人不被要求“接受”建筑物内出口的数量，人们也不被要求“接受”他们饮用水的纯度水平。作为一个前俱乐部玩家，我可以告诉你，当酒吧或音乐会超载并挤满狂欢者时，如果条件变得明显不安全，消防检查员会命令那些同意的顾客离开建筑物。

Facebook可能会说：如果你不喜欢，就不要使用。但在互联网上没有与主导玩家相当的替代品，就像没有电力、电信或水务公司的替代品一样。拒绝使用像Google、Facebook、LinkedIn和Amazon这样的平台，就等于将自己从现代社会中移除。你将如何找到工作？你将如何获取信息？你将如何与人社交？这些公司喜欢谈论消费者选择，而他们知道自己已经竭尽全力成为大多数人生活中的必需部分。让用户在向它们展示小说篇幅的密集法律条文（Facebook的情况下几乎有12000个单词）后点击“接受”，只不过是同意清洗。这些平台的目的是将用户同意放入搅拌机中运行。没有人选择退出这些平台，因为用户除了接受之外别无选择。

当Facebook封禁我时，他们不只是停用了我的账户；他们抹去了我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的整个存在。当我的朋友试图查找我发送过的旧消息时，什么都没有出现：我的名字、我的话语——一切——都消失了。我成了一个影子。放逐是一种古老的惩罚，用来清除社会中危及国家或教会权力的罪犯、异端分子和政治激进分子。在古雅典，人们可以因任何原因被社会放逐十年，没有上诉机会。在苏联的斯大林时期，国家敌人不仅会消失；他们存在的所有痕迹——照片、信件、新闻引用——都会被清除并从官方历史记录中净化。纵观历史，有权势的人利用社会记忆和集体遗忘作为强大武器来粉碎异议并修正他们偏好的历史来塑造现在的现实。如果我们想理解为什么这些科技公司会这样行事，我们应该倾听那些建立它们的人的话。Peter Thiel，Facebook、Palantir和PayPal背后的风险投资家，详细阐述了他如何不再相信“自由和民主是兼容的”。在详述他对科技公司的观点时，他阐释了CEO如何成为技术封建治理体系中的新君主。我们只是不在公开场合称它们为君主制，他说，因为“任何不是民主的东西都会让人感到不舒服”。

威权主义的哲学基础在于在社会内创造绝对确定性。确定性政治重新定位了自由的概念，其中免于什么的自由取代了做什么的自由。严格的规则和法律被强制执行，以管理和塑造民众的行为、思想和行动。威权政权的第一个工具总是信息控制——既包括通过监视收集公众信息，也包括通过自有媒体过滤向公众提供的信息。在其早期，互联网似乎对威权政权构成挑战，但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我们正在见证满足每个威权政权需求的架构建设：监视和信息控制。威权主义运动只有在普通公众习惯于——并被麻痹于——新常态时才可能实现。

...

...

互联网挫败了这些关于法律及其管辖政体的传统假设。互联网既无处不在又无处存在——它在物理上依赖于服务器和电缆，但却没有固定的主要居住地。这意味着单一的数字行为可能同时在无数个物理位置部分发生，或者一个地方的行为可能在另一个地方产生影响。这是因为互联网是一种超级对象——就像我们的气候和生物圈一样，互联网环绕着我们，我们生活在其中。科技界经常称他们的平台为“数字生态系统”，隐晦地承认其构造是一个数字容器或领域，我们生活的至少一部分存在于其中。我们无法看到或触摸它，但我们通过其影响知道它存在于我们周围。

我经常遇到不熟悉数据犯罪的警方调查员，他们使用关于寻找“凶器”、“尸体位置”和线性“因果链”的错误类比。但数据犯罪通常不会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数据犯罪的行为往往像污染一样——普遍存在，但没有具体位置。数据是完全可替代和无形的，因为它仅仅是信息的表现形式。它可以同时存储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式服务器中；即使它在某个地方，也从未完全在那个地方。位于A国处理B国数据主体的服务器可能被C国的人访问，并在D国的平台上部署，在接收到来自E国公司的指令后，该公司的资金来自F国。这就是Cambridge Analytica复杂设置的本质。即使明显造成了严重伤害，如黑客攻击、数据盗窃、威胁恐吓或欺骗，也不清楚谁应该承担责任，我们已知的评估罪责的系统完全无法胜任这项工作。

我们喜欢将政府想象为船长，但当海洋本身发生变化时，我们的船长可能会发现自己毫无准备且无法导航。2018年7月，英国选举委员会发现Vote Leave竞选活动违法，与BeLeave非法协调。2019年3月30日——Brexit泄密事件爆发一年后——Vote Leave竞选活动正式放弃对选举委员会调查结果和罚款的上诉，本质上承认了他们的所作所为。有些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关心区区70万英镑？让我们在这点上明确：Vote Leave的计划是英国历史上已知的最大的竞选资金法律违规行为。但即使不是这样，选举就像奥运会的100米短跑一样，是零和游戏，赢家通吃。无论谁先到，即使只是领先几票或几毫秒，都会赢得整场比赛：他们可以坐在公职上。他们获得金牌。他们可以任命你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可以带领你的国家退出欧盟。

当然，唯一的区别是，如果你在奥运会上被发现作弊，你会被取消资格并失去奖牌。没有关于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无论如何都会获胜”的讨论——体育的完整性要求一场干净的比赛。但在政治中，我们不将完整性视为民主的必要前提。对于在体育比赛中作弊的运动员的惩罚比对在选举中作弊的竞选活动的惩罚更严厉。尽管他们仅以3.78%的优势获胜，Brexit支持者却声称整个“人民的意志”都属于他们——甚至当Trump以2.1%的劣势败北民众投票时，他也声称胜利。尽管存在经过证实的作弊行为，Vote Leave并没有被夺走Brexit奖牌。没有人被取消参加未来竞选活动的资格，Vote Leave的两位领导人Boris Johnson和Michael Gove都被允许竞选首相。针对我们民主制度的犯罪行为不被政治阶层视为“真正的犯罪”。许多人将这些违法行为等同于停车罚单，尽管当我们的公民机构可以如此轻易地被犯罪分子和敌对外国势力破坏时，我们面临着非常真实的伤害，这些势力试图对我们的社会发动选举恐怖主义。当然，英国和美国最有权势的人士坚持认为这些犯罪甚至没有发生——相反，它们是“骗局”，是他们已经击败的痛苦对手的发明。这是在面对曾经被称为“事实”和“现实”的情况下。

你会认为，在策划了一场阴谋来黑客攻击世界领导人的私人电子邮件和医疗记录、贿赂部长、勒索目标，并向选民播放可怕谋杀和威胁的恐吓视频之后，应该会有某种法律后果。但是参与Cambridge Analytica非洲项目的任何人都没有受到任何后果。确定管辖权太困难了——即是否“足够多”的犯罪发生在英国以保证在英国法院起诉。他们的服务器遍布世界各地，会议在不同国家举行，黑客位于另一个国家，Cambridge Analytica只是在伦敦接收了被黑客攻击的材料，但没有在英国请求被黑客攻击的材料。尽管有几个目击者证明了所发生的事情，Cambridge Analytica还是逃脱了惩罚。事实上，尼日利亚项目的一名经理最终转而在英国内阁办公室的高级职位工作，负责外交事务项目，位于英国政府的最高层。

在美国，剑桥分析公司也没有受到任何后果。该公司明知故犯地违反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它开展了压制非裔美国选民的行动。它欺诈了Facebook用户并用令人厌恶的内容威胁他们。它将数亿美国公民的私人记录暴露给敌对的外国。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因为剑桥分析公司建立起来就是为了司法管辖权套利。逃税经常涉及在世界各地的热带岛屿上建立空壳公司，试图通过足够复杂的国家和公司链条来洗钱，每个国家和公司都有自己独特的规则，以至于当局失去了对资金去向的跟踪。这是可能的，因为金钱就像数据一样，是一种完全可替代的资产，可以通过全球金融系统瞬间转移。剑桥分析公司所做的是利用跨司法管辖区的复杂公司架构，不仅洗钱，还洗一种正变得同样有价值的东西：你的数据。

在英国，AIQ也没有受到任何后果。在桑尼和我揭露了脱欧派通过AIQ非法超支并将其作为剑桥分析公司定向投放能力的隐藏代理的证据后，这成为了脱欧辩论中的房间里的大象。英国已经正式提交了退出欧盟的通知。脱欧结果微

弱的差距可能受到系统性作弊、数据泄露和外国干预影响的概念被故意忽视，因为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同样的事件发生在肯尼亚或尼日利亚，英国观察员会迅速呼吁举行新的投票。

其他英国机构也失败了。BBC高管在《卫报》发布故事前几周就被简报了该故事并获得了全部证据，却决定在故事公开前几天放弃这个故事——这会太有争议性。相反，BBC在第四频道曝光播出前采访了亚历山大·尼克斯，并没有包括任何来自举报人的评论。当我后来出现在BBC的旗舰晚间新闻节目《夜间新闻》上时，主持人费尽心思地不断插话说脱欧派的违法行为——涉及使用非法资金进行数十亿次定向Facebook广告——仅仅是我的另一个“指控”。这是尽管选举委员会已经确定了这一事实。沮丧和困惑中，我随后就“事实”的含义以及即使有英国法律当局发布的裁决，BBC仍然不让我说脱欧派违法或Facebook监管下发生了非法活动这一点有多么奇怪进行了争论。

NCA突然停止了对俄罗斯干预的调查，甚至在收到俄罗斯大使馆与脱欧党(Leave.EU)往来的证据后。后来，首相拒绝否认她曾停止了对脱欧的调查。没有对脱欧公投期间发生的作弊行为启动议会调查，我最终在美国国会的证词中回答有关脱欧问题的时间比在英国议会中的时间还要多。尽管英国缺乏调查，加拿大议会开启了自己对AIQ在脱欧中作用的调查，以帮助英国当局在该公司通过留在加拿大成功避开其管辖权后强制AIQ做出回答。

事实证明，作弊是一个相当好的获胜策略，因为几乎没有什么后果。选举委员会后来承认，即使投票是在非法数据或非法资助的帮助下获胜的，结果仍然有效。Facebook拒绝交出在脱欧期间其平台上发生事情的完整细节，或被非法竞选活动分析和定向的选民数量或类型。马克·扎克伯格无视三次在英国议会作证的要求，当代表六大洲近十亿公民的十五个国家议会联合起来要求采访扎克伯格，哪怕是通过电话，他仍然拒绝了他们——两次。似乎扎克伯格的时间比代表近七分之一人类的立法机构的时间更有价值。Facebook了解到，尽管媒体风暴的愤怒，简单地忽视世界各国议会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后果——该公司了解到它可以像一个主权国家一样行事，免受他们的监督。Facebook最终派其首席技术官迈克·施罗普费尔到英国议会调查，但根据委员会的后续声明，他未能完全回答四十个问题。但也许最能说明这次表现的是该公司缺乏悔意。当施罗普费尔被问及Facebook向记者发送法律威胁的第一反应是否是霸凌行为时，这位Facebook首席技术官回答说“我的理解是这在英国是常见做法”。在被难以置信的议员们施压后，施罗普费尔让步并最终道歉，表示他“对记者感到我们试图阻止真相浮出水面而感到抱歉”。

在这个事件中所有可能面临正式惩罚的个人中，最令我感到悲哀的是，唯一真正面临制裁的人之一竟然是达伦·格莱姆斯(Darren Grimes)，这位二十二岁的Vote Leave实习生。尽管他的处境令人沮丧，但过时的立法意味着他个人要为选举违法行为承担责任。委员会对他个人征收了2万英镑的罚款，并将他的案件移交给了警方。他随后成功对该裁决提起了上诉，尽管选举委员会(Electoral Commission)可能还会提起进一步上诉。该竞选团体Vote Leave被罚款6.1万英镑，部分反映了他们拒绝与监管机构合作。Vote Leave放弃了上诉，至少这项制裁得以维持。

看到格莱姆斯(Grimes)的遭遇是极其痛苦的，他的生活因为他人策划的阴谋而被撕裂。我们曾希望他能与萨尼(Sanni)、格特尔森(Gettleson)和我一起站出来，但格莱姆斯直到最后都在为这个阴谋辩护。每当萨尼提起这个话题时，他都会恐慌和崩溃，不愿接受他被信任的人利用了的事实。格莱姆斯被设置成为他们的替罪羊，Vote Leave找不到更好的候选人了。尽管他为旧老板的行为辩护，格莱姆斯其实是他们的受害者。他们将他从一个有才华、自由主义、艺术气质的学生转变为他们极右翼事业的公开代言人，以换取法律费用的帮助。

故事公开几周后，沙米尔·萨尼(Shahmir Sanni)在保守党顾问的压力下被智库纳税人联盟(TaxPayers' Alliance)解雇。该联盟后来向他的律师承认，他们因萨尼所谓的“对英国民主神圣性的哲学信念”而非法报复性地解雇了他。尽管帕金森(Parkinson)在唐宁街10号的工作问题在议会中被多次提起，但帕金森保住了工作，并且没有因为利用首相新闻办公室来曝光他前实习生的同性恋身份而面临任何后果。而马克·格特尔森(Mark Gettleson)，这位向大西洋两岸当局提供证据的人，由于对其举报行为的声誉担忧而被迫离开了他在一家移动应用公司的新工作。

2018年3月，就在Cambridge Analytica的员工得知他们公司即将倒闭之前，亚历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据称从公司账户中抽走了600万英镑，阻止了向前员工发放遣散费。他后来在议会否认了这一点，称提取的资金是“用于交换未

记录的服务”，并且他打算偿还其中的一部分。尼克斯被帕尔马尔(Pall Mall)私人俱乐部的许多前商业伙伴和同行排斥，但作为一个极其富有的人，他可以继续靠继承的财产在伦敦荷兰公园(Holland Park)的豪宅中生活。除了在议会参加一些令人尴尬的公开听证会并指责“全球自由主义媒体”导致他公司倒闭之外，他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在我就Cambridge Analytica事件站出来后，布列塔尼·凯泽(Brittany Kaiser)将自己重新包装为举报人，并聘请了公关经理开始安排采访。她参加了一次议会听证会，承认参与了尼日利亚项目，表示Cambridge Analytica可能保留了Facebook数据，并概述了她与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的关系。（后来证实她曾在伦敦的厄瓜多尔大使馆拜访过阿桑奇。）凯泽的证词刚结束，尼克斯就给她发短信：“干得好布里特(Britt)，看起来很艰难，但你做得不错。;-)”第二天，她飞到纽约举行新闻发布会，宣传她的新数据项目，推出了一个叫做价值互联网全账本(Internet of Value Omniledger)的东西，显然旨在释放我们的“数据自由”。

像凯泽一样，Cambridge Analytica的其他几位前高管也继续创立了自己的数据公司。CA前产品主管马特·奥兹科夫斯基(Matt Oczkowski)创立了一家名为Data Propria（拉丁语意为“个人数据”）的公司，并带走了CA的首席数据科学家大卫·威尔金森(David Wilkinson)。该公司表示将专注于定位“动机行为触发器”，并已开始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工作。Cambridge Analytica前总经理马克·特恩布尔(Mark Turnbull)与该公司的前合作伙伴艾哈迈德·阿尔-哈提卜(Ahmad Al-Khatib)合作成立了Auspex International，他们将其描述为“基于伦理”的“精品地缘政治咨询公司”。

我最大的遗憾是杰夫·西尔维斯特(Jeff Silvester)。我甚至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坐在那里知道他和AIQ所做的事情是多么令人愤怒和沮丧。他是我青少年时期的导师，也是最初帮助我进入政界的人。他支持我，鼓励我，培养我的才能让我成长。我仍然无法理解他怎么能让自已继续为如此错误、如此殖民主义、如此非法、如此邪恶的事情工作。我试图与他交谈，我告诉他要对《卫报》坦诚，但我失败了。他本可以坦白一切。他本可以配合调查。他知道AIQ所做的是错误的。他知道他的工作对整个国家的未来和数百万人的权利产生了深远的后果。必须在深厚的友谊和举报犯罪之间做出选择是一种折磨，因为无论你选择什么，你都会感到深深的遗憾。但我别无选择，只能背叛他。在《卫报》向所有被指控方发出答辩信的那一天，我整天都在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痛苦，等待着任何消息。当他收到信件时，西尔维斯特终于了解了我做出的选择，他开始意识到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给我的最后一条短信只是简单的“哇”。

走进我的第一次议会听证会，伴随着快速点击的相机声和大声的提问，我感到出乎意料的轻松。艾伦坐在我身后，偶尔递给我法律建议的纸条。我们准备了几个小时，审查证据，我还有议会特权的特殊保护——这意味着我说的任何话都不能在民事或刑事诉讼中使用。听证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立法关注的浪潮，数字文化媒体体育委员会主席达米安·柯林斯(Damian Collins)开始组织十五个国家议会之间的国际联合听证会。下议院进行了辩论，跨党派支持监管社交媒体。有几个月时间，英国似乎在挑战硅谷权力方面起到了领导作用。

但随后，在2018年10月，剑桥分析丑闻震撼Facebook七个月后，该公司宣布了一项重大招聘：一位新的向世界各国政府道歉的负责人。Facebook的新全球公关负责人将是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前自由民主党领袖和英国副首相——就是我在自由民主党总部工作时期为之工作过的那个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克莱格曾经发誓，他宁愿坐牢也不会试在国民身份数据库中注册。但他也是那个在担任副首相期间，在联合政府中违背了一系列关键承诺后，实际上进行了五年道歉之旅的人。我越想越觉得这种搭配简直是天作之合。扎克伯格和克莱格都是通过妥协自己的原则建立职业生涯的，都在忽视对用户或选民的承诺后遭受了公众信心的灾难性打击，都在2010年后不再酷了。当第四频道在克莱格任命宣布后要求我在镜头前发表评论时，我只能想到说“这太扯了”。他们播出了这个评论，尽管有噪音。

2019年5月24日，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宣布辞职意向，引发了保守党内部的领导层竞选。在英国，如果首相在任期中途辞职，惯例是女王陛下任命执政党的新领袖为新首相，无需大选。这意味着党内幕后操作者、捐助者和党的付费成员可以绕过选举，在他们中间选择谁来领导英国。7月23日，保守党成员决定新首相将是鲍里斯·约翰逊

(Boris Johnson)，前外交大臣和在没有任何谈判退出协议的情况下脱离欧盟的主要倡导者（通常被称为“硬脱欧”）。在组建新政府时，约翰逊任命了他在脱欧派的前同事多姆·卡明斯(Dom Cummings)成为唐宁街10号的新高级顾问之一。卡明斯曾是一个在约翰逊现在用作以几乎任何代价脱离欧盟的“民主”基础的公投中作弊的竞选活动的主管，这似乎并不重要。在他被任命前仅几个月，卡明斯因无视出席议会回答有关欧盟公投中作弊和传播假新闻问题的命令而被认定藐视议会。尽管卡明斯是少数几个被下议院一致投票正式谴责的人之一，但议会权威的限制受到了考验，看起来卡明斯几乎没有承担什么后果。预定加入卡明斯在新约翰逊政府中担任女王陛下财政部新特别顾问的是马修·埃利奥特(Matthew Elliott)，脱欧派前首席执行官和纳税人联盟的联合创始人，这个游说组织因萨尼的举报而解雇了他作为报复。这看起来像是脱欧派对英国政府的接管。在下议院的第一次首相问答会议期间，约翰逊被反对党成员问及2016年12月他作为英国外交大臣与剑桥分析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会面时讨论了什么。他的回应简单地是“我不知道”。

在剑桥分析公司内部，我近距离见证了贪婪、权力、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真实面貌。我看到了亿万富翁们想要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时的行为方式。我看到了我们社会中最奇异、最黑暗的角落。作为举报人，我看到了大公司为了保护自己的利润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我看到了人们为了维护一个方便的叙事而掩盖他人所犯罪行时会走多远。我看到了挥舞旗帜的“爱国者们”对一代人最重要的宪法问题上法治的践踏视而不见。但我也看到了所有关心并与失败体制抗争的人们。我看到了《卫报》、《纽约时报》和第四频道的记者们都在努力见证剑桥分析公司所犯下的罪行以及Facebook的无能。我看到了我出色的律师们巧妙应对向我抛来的每一个威胁。我看到了那些前来支持我、不求任何回报的人们的善意。我看到了位于英格兰威尔姆斯洛这个教区小镇的小小信息专员办公室，运用其所能拥有的权力与美国科技巨头抗争——最终对Facebook的数据泄露开出了法律允许的最高罚款。

我还看到了关心并渴望了解我们现在身处的美丽新世界的国会议员们。当我离开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与我的律师和萨尼一起走出敏感区隔离设施时，我与委员会成员握手，并由众议员亚当·希夫和他的助手们护送到安全入口。他们很有风度，感谢我飞到美国帮助他们不仅了解剑桥分析公司，还了解社交媒体平台对美国选举构成的新兴风险。这将是我在美国的最后一次证词，但一切都远未解决。

2019年7月24日，联邦贸易委员会对Facebook处以创纪录的50亿美元民事罚款，同一天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出了额外1亿美元罚款的通知。监管机构发现，Facebook不仅未能保护用户隐私，该公司还通过发布虚假声明误导公众和记者，声称没有看到任何不当行为的证据，而实际上却有。这项罚款是美国政府对任何违法行为实施的最大处罚之一。事实上，这是美国政府对一家美国公司违反消费者隐私权行为开出的史上最大罚单，比全球范围内此前最大的隐私或数据安全处罚高出二十倍。然而，投资者却将此视为好消息。这一消息实际上使Facebook的股价上涨了3.6%，市场默认即使法律也无法阻止这些科技巨头的增长。

我必须承认，如果说我现在比开始这段旅程之前更加愤世嫉俗，那我就是在撒谎。但这并没有让我更加听天由命。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让我变得更加激进了。我曾经相信我们拥有的体系基本上是有效的。我曾经认为有人在等待着，准备好计划来解决像剑桥分析公司这样的问题。我错了。我们的体系已经崩坏，我们的法律不起作用，我们的监管机构软弱无力，我们的政府不明白正在发生什么，而我们的技术正在篡夺我们的民主。

所以我必须学会找到自己的声音，为我所看到的正在发生的事情发声。我充满希望，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当我们找到自己的声音时会发生什么。当《卫报》承接这个故事时，许多记者将其视为一系列阴谋论。硅谷的科技兄弟们嘲笑他们应该接受任何审查的想法。华盛顿特区和威斯敏斯特的政客们称这个故事很小众。这需要《卫报》艺术与文化版块和其周日报纸《观察家报》的一个女性团队的坚持，重磅故事就出现在那里。这需要信息专员办公室和选举委员会领导调查的女性们的关注。这需要两个由坚定的女律师支持的移民酷儿举报人。这个故事需要敬业的女性、移民和酷儿们的领导，才能唤起公众对硅谷及其创造的包围我们的数字技术的隐秘殖民力量的觉醒。我们所有人都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直到世界终于能够看到我们所看到的。

作为酷儿长大，你很早就在生活中学会了你的存在超出了常规。我们把自己孵化在一个壁橱里，保持未知，隐藏我们的真相，直到它变得无法忍受。生活在壁橱里是痛苦的。这是我们对自己施加的情感暴力行为，以免让周围的人感到不适。酷儿们深深理解权力体系，而出柜是我们说出真相的变革性行为。在出柜时，我们意识到向那些可能不想听到的人说出我们真相的力量。我们拒绝他们的舒适，让他们倾听。为什么这么多同性恋者在骄傲游行时吹口哨？为了引起你的注意。为了宣布我们将不再隐藏自己。为了反抗强权者的霸权。而且，就像在我之前的许多酷儿一样，我必须接受自己的真相，并接受我永远无法成为社会观念中完美男人的必然失败。

我是一个酷儿告密者，这是我的第二次出柜。由于受到保密协议的约束，我被迫进入了一个新的衣柜，与我令人不安的知识和令人不快的真相一起隐藏生活。两年来，我过着被权势公司强加的个人化不问，不说政策的生活。如果我希望避免任何后果，我被禁止向他人暴露自己，我成了他们的小秘密。但就像其他出柜的酷儿一样，我是一个说真话的人，我选择对那些令人不安的真相不加掩饰，停止隐藏，停止做他们的秘密，面对摆在我面前的后果，向世界大声说出我所知道的。

衣柜不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空间；它是我们作为酷儿内化并遵从的社会结构。衣柜是一个容器，其边界由想要控制你如何行为和表现自己的他人强加。衣柜是看不见的，它默认加诸于你身上，绝非出于选择，让他人创造一个更可口的你的版本——为了他们的利益，而非你的。在衣柜中成长意味着逐渐学会如何在社会中过关——哪些动作、语调、表情、观点或说出的欲望违背了那些加诸于你的社会边界规范。酷儿孩子一点一点地学会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直到这几乎成为第二天性，直到他们过关。这些变化如此渐进，有时你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行为改变了多少，直到有一天，你决定离开那个衣柜。出柜的一部分是接受你在那个衣柜里有多少是为你构造的，意识到曾经的你有多少是在你不知情或未同意的情况下强加给你的，这可能是痛苦的。衣柜是一个为了过关而向社会妥协的地方，但它也是一个愤怒积聚的地方，因为那些边界和定义慢慢窒息着你，直到你无法忍受继续留在那个监狱里。

出柜是我们对他人强加给我们的定义的拒绝。定义我们身份的能力极其强大，无论对这种权力的威胁是以社会衣柜还是算法衣柜的形式出现，我们都必须抵制任何试图获得定义或分类我们是谁的权力的人或事物，为了他们的利益。硅谷通过为每个人构建这些个性化空间，有可能创造出身份的新霸权。这些空间不过是定义我们身份、表达和行为的新衣柜。在收集和处理你的数据自我时，算法决定如何定义你，如何分类你，你应该注意什么，以及谁应该注意你。但在算法定义你以代表你真正是谁和算法定义你以创造它认为你应该成为谁的自我实现预言之间，存在一条细微的界线。

人们已经在改变自己以适应机器对他们应该是谁的想法。我们中的一些人在社交媒体上策划自己以增加粉丝参与度，以至于我们真正是谁和我们在网上的表现变得混淆和混为一谈。当那些粉丝看到足够多的这些策划身份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憎恨自己是谁或自己的外表，他们饥饿自己的身体以符合现在围绕他们的新标准。其他人点击算法推荐给他们的链接，与那个内容互动，被越来越深地拉入个性化的兔子洞，直到他们的世界观在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改变。我们在网上购买的东西现在是根据我们的档案策划的，由其他东西定义。我们作为工作、保险、信贷或抵押贷款申请人的价值现在基于我们的档案，由其他东西定义。我们观看的节目和发现的音乐现在是根据我们的档案预选的，由其他东西定义。随着我们走向物理和数字世界不可避免的融合，我们生活的越来越多方面将开始不是由我们定义，而是由其他东西定义。因此，如果我们要抵制我们未来的生活被其他东西定义，我们可能都需要在某人或某物将我们锁在里面之前走出我们的衣柜。

...

...

2019年5月23日，我在早上6点醒来，对我来说异常早。我的房间明亮而温暖，阳光透过窗帘偷偷溜进来。我讨厌早起，所以我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然后瞥了一眼窗外，看到街上生活的涌现。一个我一直在约会的家伙过夜了，所以我必须小心地溜出床来，不发出声音。这是英国的投票日，在可能是最后一次欧洲议会选举中。我的投票卡说投票将在早上7点开始，所以我想偷偷溜出去跑到当地的社区中心，我所在选区的投票在那里进行。

我稍微夸张地迈步，无声地滑向我的梳妆台，抓起我的牛仔裤和T恤，堆在地板上。这件衬衫是英国设计师凯瑟琳·哈姆内特(Katharine Hamnett)的礼物。柔软的黑色棉质，配有粗体白色字母，简单地写着，现在就要第二次公投！如果我今天要穿什么的话，应该是这件T恤，我想。我伸手到抽屉里拿出我的手机，一旦它重新获得信号，就开始嗡嗡作响地收到消息。

哦该死，我想。我转身看到我把他吵醒了。他对着枕头呻吟，问我为什么这么早起，我只是说因为我想去投票。他坐起来嘲笑，翻了个白眼，问今天对我这样的人来是不是像圣诞节一样。我告诉他不是，我想早点去，在政党投票监督员出现并开始统计谁在投票之前。我不想再和UKIP或脱欧派发生争执。我曾被称为叛徒并被推到街上，但我不想被阻止投票。

这感觉不像圣诞节，一点也不令人兴奋。这是悲伤的一天，因为我心里知道我不会参加一场真正的选举——这都是英国计划离开欧盟前最后表演的一部分。尽管选举委员会对Vote Leave作出了不利裁决，国家犯罪机构正在进行调查，在议会有证词，《卫报》连续数周揭露唐宁街内部的掩盖行为，但政府仍然决心通过欺骗和欺诈赢得的授权退出欧盟。

我的邮箱里塞满了传单和宣传资料。我有点期待收到Arron Banks或Leave.EU的疯狂东西，比如卷成俄罗斯伏特加酒瓶的脱欧传单，因为他们很喜欢trolling我和《卫报》记者Carole Cadwalladr。但没有，只是普通的传单。绿党。自由民主党。UKIP。不知为什么没有保守党或工党的。我打开自由民主党的传单，想着他们现在使用什么数据，是否用特定信息针对我。看起来不像。只是另一张糟糕的传单。

我抬头看着大厅里监视我的安全摄像头，然后离开了。我出发了，穿过社区的几条街道。古老的乔治亚式联排房屋中间穿插着偶尔出现的公寓楼。天空极其明亮和阳光灿烂。晨空清新振奋。我转向一条主要街道，那里的商店还没有开门，除了一家当地咖啡店。我走进去点了一杯加少许豆浆的咖啡。等待时，我看着咖啡馆里的每个人，他们站着看手机，都在滚动、关注和参与内容。我站在他们旁边，但他们都沉浸在自己的数字世界里。说实话，在被禁止之前我也常常这样做。但没有社media，除了一个我很少使用的Twitter账户，我发现自己滚动得更少，发帖更少，拍照也更少了。我不再花费数小时通过屏幕与其他人独自在一起。我可能生活在这些数字世界之外，但至少我在这个世界中变得更加present。拿了咖啡后，我离开，沿着绿树成荫的街道走，然后到达社区中心。系在树上的是黑字白色大标牌，上面写着投票站。我保持距离观察，但还没有任何政党的人在外面徘徊。所以我走进去，沿着标志穿过走廊，进入一个简单朴素的房间，里面散放着纸板投票间和没有橡皮擦的小铅笔。

投票站工作人员看着我，询问我的姓名。她翻阅纸质名单，用铅笔划掉。就是这样——没有身份证，没有电子设备。她递给我一张似乎有一米长的选票，用于选举伦敦的欧洲议会代表团成员。纸张只比报纸稍厚一点，但当我拿着它时，我想到投票行为看起来多么物理化，然而网上如此多的复杂活动都导致了在一张薄纸上画X这个简单行为。我把选票投进投票箱，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

尾声

关于监管：给立法者的说明

如果我们要防止另一个Cambridge Analytica攻击我们的民事机构，我们必须寻求解决其孵化的有缺陷环境。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的国会和议会都陷入了一种错误观点，即“法律无法跟上技术”。技术部门喜欢重复这个观点，因为它倾向于让立法者感到太愚蠢或脱节而无法挑战他们的权力。但法律可以跟上技术，就像它跟上药物、土木工程、食品标准、能源和无数其他高技术领域一样。立法者不需要了解新癌症药物中分子异构体的化学原理来创建有效的药物审查流程，也不需要了解高压电线中铜的导电性来创建有效的绝缘安全标准。我们不期望我们的立法者在任何其他部门拥有专业技术知识，因为我们将技术监督责任委托给监管机构。监管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我们信任比我们更了解的人作为公共安全的守护者来调查行业和创新。“监管”可能是最不性感的词汇之一，让人联想到珍视其清单的无名官僚形象，我们总是会争论他们不完美规则的细节，但尽管如此，安全监管通常是有效的。当你在杂货店买食物或看医生或踏上飞机在数千英尺高空疾驰时，你感到安全吗？大多数人会说是的。你是否觉得需要考虑其中的化学或工程原理？可能不会。

科技公司不应该被允许“快速发展，敢于试错”。道路设置限速是有原因的：为了人们的安全而减缓车速。制药实验室或航空航天公司在将新创新推向市场之前，必须首先通过安全性和有效性标准，那么为什么数字系统可以在没有任何审查的情况下发布？为什么我们应该允许大型科技公司进行大规模的人体实验，只是为了发现它们变成了太大而无法管理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激进化、大规模枪击事件、种族清洗、饮食失调、睡眠模式改变以及对我们民主制度的大规模攻击，所有这些都直接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这些可能是无形的生态系统，但对受害者来说，伤害并非无形。

规模是房间里的大象。当硅谷高管为自己开脱并说他们平台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很难阻止大规模枪击事件的直播或种族清洗在他们平台上被煽动时，这不是借口——他们含蓄地承认他们所创造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太大了，无法独自管理。然而，他们也含蓄地相信，他们从这些系统中获利的权利超过了其他人承担的社会成本。因此，当像Facebook这样的公司说“我们听到了反馈，我们必须做得更多”时，正如他们在平台被用于直播新西兰大规模枪击事件时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问他们一个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对你们来说太大了，无法即时解决，为什么在你们理解其对社会的潜在后果之前，就应该被允许发布未经测试的产品？

我们需要新的规则来帮助在互联网上创造健康的摩擦，比如减速带，以确保新技术和新生态系统的安全。我不是监管方面的专家，也不自称知道所有答案，所以不要把这些话当作金科玉律。这应该是更广泛的社区参与的对话。但我想提供一些想法供考虑——至少是为了引发思考。这些想法中的一些可能有效，另一些可能无效，但我们必须开始思考这个困难的问题。技术是强大的，它有潜力在许多方面提升人类。但这种力量需要专注于建设性的努力。因此，这里有一些想法来帮助你考虑如何前进：

1. 互联网建筑规范

建筑规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64年，当时尼禄在一场毁灭性的大火肆虐罗马九天后，限制了房屋高度、街道宽度和公共供水。虽然1631年的一场火灾促使波士顿禁止木制烟囱和茅草屋顶，但第一部现代建筑规范是在1666年伦敦大火的毁灭性浩劫之后出现的。与波士顿一样，伦敦的房屋密集地用木材和茅草建造，这使得火势在四天内迅速蔓延。它摧毁了13,200座房屋、84座教堂和几乎所有的城市政府建筑。之后，查理二世国王宣布，任何人都不得“建造任何房屋或建筑，无论大小，除非用砖或石头”。他的宣言还拓宽了道路，以阻止未来的火灾从街道的一边蔓延到另一边。在19世纪其他历史性火灾之后，许多城市纷纷效仿，最终公共测量员被赋予检查任务，确保私人财产的建设对居民和广大公众都是安全的。新规则出现了，最终“公共安全”的概念成为一个总体原则，可以推翻不安全或未经证实的建筑设计，无论业主的意愿或甚至居民的同意如何。像Facebook这样的平台多年来一直在燃烧着自己的灾难——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俄罗斯干预、缅甸的种族清洗、新西兰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正如伦敦大火后的改革一样，我们必须开始超越政策，看向威胁我们社会和谐和公民福祉的潜在架构问题。

互联网包含无数种人们每天甚至每小时都在互动的架构类型。随着我们将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融合，这些数字架构将越来越多地影响我们的生活。隐私是一项基本人权，应该得到相应的重视。然而，隐私往往通过点击“接受”一套难以理解的条款和条件的表面表现而被摧毁。这种“同意洗涤”(consent-washing)持续允许大型科技平台通过“消费者选择”的虚假语言为其操纵行为辩护。这将我们的思考框架从这些有缺陷架构的设计——以及设计师——转移，转向对不理解或无法控制系统设计的用户活动的无益关注。我们不让人们“选择加入”有故障布线或缺乏火灾出口的建筑。那将是不安全的——贴在门上的任何条款和条件都不会让任何建筑师逃脱建造危险空间的责任。为什么软件和在线平台的工程师和架构师应该有所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同意不应该成为平台运营涉及用户基本权利功能的唯一基础。遵循加拿大和欧洲将隐私视为工程和设计问题的方法——一个称为“隐私设计”的框架——我们应该扩展这一原则，创建一套完整的工程规范：互联网的**建筑规范**。这将包括隐私之外的新原则，包括尊重终端用户的能动性和完整性。这样的规范将创建一个新原则——**能动性设计**——要求平台使用**增强选择**的设计。这一原则还将禁止暗黑模式设计，这些是故意混淆、欺骗或操纵用户同意某个功能或以某种方式行为的常见设计模式。能动性设计还将要求**效果的相称性**，即技术对用户的影响与目的和对用户的益处成正比。换句话说，在平台设计中将**禁止不正当影响**，即存在持久和不成比例的影响，如成瘾性设计或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与传统建筑规范一样，**伤害避免原则**将是这种数字建筑规范的核心特征。这将要求平台和应用程序在发布或扩展产品或功能之前进行**滥用性审计**和安全测试。技术公司将承担证明其产品适合公众规模化使用的安全责任。因此，在公众中进行未经测试的新功能的大规模实验将被禁止，公民不能再被用作实验对象。这将有助于防止像缅甸这样的案例，在那里Facebook事先没有考虑功能如何在种族冲突地区引发暴力。

软件工程师道德规范

如果你的孩子走失了需要帮助，你希望他们向谁求助？也许是医生？或者老师？那么加密货币交易员或游戏应用开发者呢？我们的社会将某些职业视为值得信赖的——医生、律师、护士、教师、建筑师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要求遵循道德规范和管理安全的法律。这些职业在我们社会中的特殊地位意味着我们要求更高的职业操守标准和注意义务。因此，许多国家的法定机构规范和执行这些职业的道德操守。为了社会的正常运转，我们必须能够信任我们的医生或律师始终为我们的利益行事，我们每天使用的桥梁和建筑物都是按照规范和专业能力建造的。在这些受监管的职业中，不道德的行为会给那些违反职业界限的人带来严重后果——从罚款和公开羞辱到临时停职，甚至对更严重的违法者实施永久禁令。

软件、AI和数字生态系统现在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然而那些制作我们每天使用的设备和程序的人并没有受到任何联邦法规或可执行规范的约束，要求他们适当考虑对用户或整个社会的道德影响。作为一个职业，软件工程存在需要解决的严重道德问题。技术公司不会凭空神奇地创造出有问题或危险的平台——这些公司内部有人在构建这些技术。但有一个明显的问题：软件工程师和数据科学家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如果工程师的雇主指示他或她创建操纵性的、道德上可疑的或鲁莽实施的系统，而不考虑用户安全，没有要求拒绝的义务。目前，这种拒绝不道德行为的行为会给受雇工程师带来报复或解雇的风险。即使不道德的设计后来被发现违反了法规，公司也可以承担责任并支付罚款，而构建技术的工程师不会承担任何职业后果，就像医生或律师严重违反职业道德时会面临的情况一样。这是一种在其他职业中不存在的扭曲激励。如果雇主主要求律师或护士做不道德的事情，他们有义务拒绝，否则将面临失去职业执照的风险。换句话说，他们有利害关系来挑战雇主。

如果我们作为软件工程师和数据科学家要称自己为值得我们所获得的声誉和高薪的专业人士，就必须有相应的道德行为义务。如果我们不从在这些公司内部的人员身上开始建立利害关系，那么对技术公司的监管就不会像应有的那样有效。我们需要将责任放在工程师身上，让他们开始关心自己构建的东西。一个下午的员工研讨会或一个学期的道德课程对于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新兴技术问题是完全不够的解决方案。我们不能继续走我们现在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技术家长主义和硅谷孤立的兄弟文化创造出一种危险的主人品种，他们不考虑自己的工作可能造成的伤害。

我们需要一个由法定机构支持的专业准则，就像许多司法管辖区的土木工程师和建筑师那样，对于那些利用自身才能和专业知识的构建危险、操纵性或其他不道德技术的软件工程师或数据科学家，会面临实际后果。这个准则不应该使用松散的期望性语言；相反，什么是可接受的，什么是不可接受的，应该以清晰、具体和明确的方式表达。应该要求尊重用户的自主权，识别和记录风险，并将代码置于审查和评议之下。这样的准则还应该包括要求考虑其工作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包括对不同种族、性别、能力、性取向或其他受保护群体用户的任何不成比例影响。如果在适当考虑后，工程师认为雇主构建某项功能的要求是不道德的，应该有拒绝的义务和报告的义务，不这样做将导致严重的专业后果。那些拒绝和报告的人也必须受到法律保护，免受雇主的报复。

在所有可能的监管类型中，软件工程师的法定准则可能是最能防止伤害的，因为它将迫使构建者自己在任何东西发布给公众之前考虑他们的工作，而不是简单地服从命令来推卸道德责任。技术往往反映了我们价值观的体现，因此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社会要越来越依赖软件工程师的创造，培养道德文化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得到适当的问责，软件工程师可能成为我们防范未来技术滥用的最佳防线。而且，作为软件工程师，我们都应该致力于在构建社会新架构时赢得公众对我们工作的信任。

3. 互联网公用事业和公共利益

公用事业传统上是被称为“受公共利益影响”的物理网络。它们在市场中的存在是独特的，因为它们的基础设施对商业和社会的运作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允许它们以不同于典型公司的方式运营。公用事业往往必然是一种自然垄断的形式。在市场中，平衡的竞争通常会带来创新、更好的质量和为消费者降低价格。但在某些部门，如能源、水或道路，建设竞争性的电力线、管道或地铁到同样的地方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会导致大量冗余和消费者承担的成本增加。单一服务供应商带来的效率提升也伴随着不当影响和权力的风险——无法切换到新电力线、管道或地铁的消费者可能被不道德的公司劫持。

在互联网上，显然存在极其主导性的市场参与者。谷歌占有所有搜索流量的90%以上，在社交媒体上活跃的成年人中几乎70%使用Facebook。但这并不使它们本身成为通用基础设施。当技术平台遭遇故障时，我们能够生存和应对的时间更长（尽管不是无限期的），相比同样情况发生在电力上。在谷歌搜索引擎少数几次失败的场合，用户通过转向其他较不知名的搜索引擎来应对，直到谷歌修补了问题。大型互联网参与者还存在流行周期，这在物理基础设施中是找不到的。MySpace曾经是卓越的社交媒体平台，后来被Facebook击败，而我们很少或从未在水电公司中遇到市场周期。

也就是说，互联网的主导参与者确实与物理公用事业有共同之处。像物理公用事业一样，这些架构往往充当商业和社会事实上的支柱，它们的存在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既定条件。例如，企业已经被被动地依赖谷歌搜索引擎为其员工提供服务。这并不是坏事。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受益于网络效应，使用服务的人越多，服务就变得越有用。与物理公用事业一样，规模可以为消费者创造巨大利益，我们不想阻碍这种公共利益。然而，与其他自然垄断一样，同样类型的风险威胁着消费者。正是这些潜在危害，我们必须在新规则中加以考虑。

因此，在充分认识到互联网与物理基础设施之间存在本质差异的情况下，我将使用“互联网公用事业”作为便利术语，意思是类似但不同于传统公用事业的东西：一个“互联网公用事业”是一种服务、应用程序或平台，其在互联网上的存在已经变得如此主导，以至于它由于自身规模的本质而受到公共利益影响。对互联网公用事业的监管应该认识到它们在社会和商业中的特殊地位，并对用户施加更高的照顾标准。这些监管应该采取法定义务的形式，以年利润为基准制定处罚，作为阻止当前情况的方式，目前监管违规被协商并作为经营成本加以核算。

就像我们不会因为电力公司的规模而惩罚它们一样，在存在真正社会效益的网络效应的情况下，互联网公用事业的规模也不应该被惩罚。换句话说，这不是要拆分大型科技公司；这是要让它们承担责任。然而，作为维持其规模的交换条件，互联网公用事业应该被要求主动充当负责任的管理者，管理最终演变为我们的数字公共资源。必须让它们明白，规模唤起了固有的公共利益，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公共利益必然会超越它们赚取利润的私人利益。与其他公用事业一样，这必须包括遵守专门针对软件应用程序的更高用户安全标准和新的数字消费者权利准则。这些新的数字消费者权利应该作为通用条款和条件的基础，确保在科技公司持续失败的领域中，互联网用户的利益得到适当考虑。

数字公共资源的公共管理

这些互联网公用事业对我们的公共话语、社会凝聚力和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的不受限制的权力，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由于无能和疏忽，都必须受到公共问责。应该建立一个新的数字监管机构，以具有法定制裁权力来执行这一新的数字监管框架。特别是，这些机构应该包含技术能力强的监察员，授权其代表公众对平台进行主动技术审计的权利。我们也应该使用基于市场的强化机制，比如要求互联网公用事业为数据滥用造成的损害购买保险。通过要求为数据泄露购买保险，并与该数据的市场价值挂钩，我们可以创造纠正性的财务压力来促进改进。

我们已经看到个人数据的价值为社交媒体公司创造了全新的商业模式和巨额利润。Facebook等平台强烈争辩说它们是“免费”服务，如果消费者不必为服务付费，平台就不能成为反竞争行为的共犯。然而，这种论点要求人们接受用个人数据换取平台使用权不是价值交换，而这显然是价值交换。有整个市场在评估、销售和许可个人数据。当前针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垄断方法的缺陷在于，监管机构没有适当考虑消费者数据的价值。

如果我们真正考虑消费者向平台提供的个人数据价值的上升，我们会得出结论：消费者一直被这些公司欺骗，因为这些公司没有按比例增加其平台对消费者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通过其数据向这些主导平台提供了更多价值，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在美国当前的反垄断法律中，可能有理由认为在此基础上，数据交换让消费者付出了更多成本。然而，即使情况如此，这也是对消费者公平和正确待遇的过于狭隘的测试。相反，如果我们创建互联网公用事业的新分类，我们可以对这些公司的运营、增长和并购活动使用更广泛的公共利益测试。

然而，与物理公用事业不同，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并不像那么重要以至于不可替代，因此监管也应该考虑行业演进的健康效益。我们希望避免那些以牺牲更新更好的产品为代价来巩固当前主导的互联网公用事业地位的监管。但我们也需要拒绝任何对规模化巨头的监管都会以某种方式阻碍新挑战者的观念。遵循这种逻辑意味着石油行业的安全和环境监管会阻碍未来可再生能源的出现，这毫无意义。如果我们担心对市场演进的抑制，那么我们可以要求互联网公用事业与更小的竞争挑战者分享其主导基础设施，以改善消费者选择，就像主导的电信公司与较小的参与者分享通信基础设施一样。现有大型参与者的安全和行为标准与技术演进的继续并不相互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创建基于原则而非基于技术的监管，这样我们就会小心不要将旧技术或过时的商业模式嵌入监管准则中。

谢谢。祝你好运。

致我的父母凯文和琼，他们教会我勇敢、为自己挺身而出，并做正确的事。

致谢

通常举报者被定位为孤独的大卫，肩负着单枪匹马对抗歌利亚的使命。但在我的情况下，我从未孤单。有如此多的人，没有他们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从律师到记者，从姐妹到出租车司机——许多人为这个故事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对他们的建议、韧性、耐心和坚韧不拔深感感激。我特别要感谢在这个旅程中支持我的所有女性。是女性让这个故事成为可能。

律师们

为你在任何困难面前为我辩护，并成为任何人能拥有的最酷的律师，我要首先感谢我杰出的首席律师塔姆辛·艾伦。塔姆辛，在任何人知道我是谁或剑桥分析做了什么之前，你就帮助了我。你让我能够与世界上一些最有权势的人和公司对抗。当我必须前往华盛顿特区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时，我了解到关于你的三件事。首先，你害怕飞行。其次，除此之外，似乎没有什么能让你感到困扰。第三，即使在跨大西洋飞行、时差反应，以及与我一起参加超过五小时紧张的国会听证会之后，你仍然能够在当晚的《时代》100强晚会上舞得比詹妮弗·洛佩兹还要好。

在幕后不知疲倦地工作以保护我并帮助让这个成为可能的杰出律师们实在太多了。亚当·考夫曼、埃里克·刘易斯、塔拉·普洛乔茨基，以及我在Lewis Baach Kaufmann Middlemiss PLLC的整个美国法律团队——感谢你们如此坚定地接受我的案子，轻松处理其多管辖区的复杂性，并帮助我在这个过程中毫发无损地度过。你们的建议对我在如此混乱的时期保持冷静和镇定至关重要。在英国，我还得到了塔姆辛在Bindmans LLP的杰出同事们的支持，包括迈克·施瓦茨和萨利玛·布达尼，以及来自Matrix Chambers的一小队大律师，包括加文·米勒QC、克莱尔·蒙哥马利QC、海伦·芒特菲尔德QC，以及本·西尔弗斯通和杰西卡·西莫尔QC。来自Simons Muirhead & Burton LLP的马丁·索姆斯和埃里卡·亨希伍德在我还与《卫报》匿名合作时给了我很大帮助，他们的早期建议为后续故事奠定了基础。你们都是了不起的律师，我今天能够安全无恙地站在这里，全因为你们的工作。

举报人

马克·格特森和沙米尔·桑尼，感谢你们俩做出的深度个人牺牲，以及与我分享这段疯狂的旅程。你们都经历了极不公平的报复，但仍然选择了吹哨。马克，从多年前我见到你的那一刻起，很少有男人能与你的口才、幽默、同理心和智慧相匹敌。沙米尔，感谢你从我们一起开始举报之旅以来一直站在我身边，向权力说出真相。我们一起经历了地狱般的磨难，我为能称呼你们为朋友而感到无比自豪。还有其他几位希望保持匿名的举报人，感谢你们的帮助。即使世界不知道你们的贡献，你们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记者们

卡罗尔·卡德瓦拉德，感谢你相信我——以及相信我这个人。从我见到你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你是少数几个能够以让人们注意的方式向世界讲述这个故事的人之一。你唤醒了世界，撼动了巨人。我可能有粉红色的头发，但你才是挥舞笔杆的人。尽管面临来自另类右翼、私人情报公司和硅谷科技兄弟的无情辱骂和威胁，你仍然坚持下去。你接纳我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出于对更大利益的真诚奉献，你的杰出新闻工作配得上每一份赞誉。

莎拉·唐纳森和艾玛·格雷厄姆-哈里森，感谢你们在向世界讲述这个故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你们与卡罗尔的合作很大程度上是我能如此自信地声称，如果没有参与其中的女性，我不会有今天的成就的原因。《卫报》和《观察家报》很幸运拥有你们俩。当然，还要感谢保罗·韦伯斯特、约翰·穆赫兰和吉莉安·菲利普斯，在面对亿万富翁、科技巨头、愤怒的白宫官员、情报机构和几乎每天都有的各种法律威胁时，坚定不移地为这个故事辩护。马修·罗森伯格、尼古拉斯·康费索雷、加布里埃尔·丹斯、丹尼·哈基姆、大卫·柯克帕特里克和《纽约时报》，感谢你们以无人能及的方式将这个故事带到美国，并在追究Facebook和其他硅谷巨头责任方面发挥巨大影响。乔布·拉布金、本·德·皮尔和第四频道新闻，感谢你们冒着巨大风险敢于进行卧底报道，并向电视观众披露这个故事，当其他人不愿意时。你们的镜头用剑桥分析公司自己令人毛骨悚然的话语向世界展示了该公司邪恶操作的真实深度。

议员们

阿利斯泰尔·卡迈克尔议员，感谢你多年来始终不渝的支持和建议，感谢在你办公室里的深夜谈话，以及在紧张时期培养我对苏格兰威士忌的品味。在这个故事公开之前你的帮助是无价的。你无私地承担风险，运用你对议会的详细了解来帮助保护我和其他几位举报人。这使得具有重大公共利益的证据得以保存和发布。达米安·柯林斯议员和英国议会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委员会全体成员，感谢你们成为追究硅谷责任最响亮的声音之一。你们在虚假信息和“假新闻”调查中的跨党派合作将公共利益放在首位，你们都为政治应该如何运作树立了光辉榜样。通过共同努力，你们的委员会挑战了硅谷巨头，并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对立法行动的支持。达米安，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左派，我从未想过我会说这样的话，但你让我看到——也许——一些保守党人真的可以很酷。

无名英雄

感谢我的父母Kevin和Joan，感谢你们无条件的爱、鼓励和智慧，感谢我的两个姐妹Jaimie和Lauren，在事情变得混乱时放下一切来帮助我，让我宣泄压力，并让我的冰箱里始终储备着食物。同时感谢所有其他帮助揭露和讲述这个故事的人。特别地，我想感谢Strasburger勋爵（感谢您在幕后谨慎但不可估量的协助）；Peter Jukes（感谢您的所有鼓励和为这个故事提供的精彩开端）；Marc Silver（感谢您令人惊叹的电影和数小时启发人心的对话）；Jess Search（感谢您的明智建议和我性取向的理解）；Kyle Taylor（感谢您的激情运动）；Elizabeth Denham、Michael McEvoy以及整个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感谢你们将数据权利提上议程）；众议员Adam Schiff和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感谢你们所做的所有幕后工作）；Glenn Simpson和Fusion GPS（感谢你们出色的调查工作）；Ken Strasma（感谢您激发了我对数据的兴趣）；Keith Martin PC博士（感谢您培养了我的独立精神）；Jeff Silvester（感谢您指导年轻的我，尽管后来发生了一切）；Tom Brookes（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David Carroll和Paul-Olivier Dehay（感谢你们在捍卫我们数据权利方面的坚持）；Emma Briant博士（感谢您发现关键证据）；Harry Davies、Ann Marlowe和Wendy Siegelman（感谢你们早期的调查工作）；我以前的学术导师Carolyn Mair博士（感谢您审阅本书并教会我关于心理学、数据和文化的如此多知识）；以及Shoshana Zuboff教授（她关于监控资本主义的工作帮助我完善了许多想法）。也许最重要的是，我想认可成千上万分享这个故事、给代表打电话、参加抗议游行、举着标语牌并给我发送鼓励信息的人们——有许多我甚至从未见过的人在这个旅程中热情地支持着我。

本书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两位杰出的图书合作者Lisa Dickey和Gareth Cook；我在兰登书屋的编辑Mark Warren；我在威廉·莫里斯努力公司的文学经纪人Jay Mandel和Jennifer Rudolph Walsh；为本书进行事实核查的Kelsey Kudak；以及我的娱乐律师Jared Bloch。你们所有人都指导我完成了我的第一本书的写作，推动我动笔写作，帮助我提炼这个故事的精髓，编辑掉我的废话，并抑制了我更加离题的倾向。

关于作者

克里斯托弗·怀利被称为“千禧一代的第一个伟大告密者”和“一个从未来派来的粉红头发、鼻环先知”。他因在建立——然后推翻——剑桥分析公司中的作用而闻名。他揭露数据滥用的爆料震撼了硅谷，并导致了一些史上最大规模的跨国数据犯罪调查。他出生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法律，之后转向文化数据科学和时尚趋势预测。他居住在英国伦敦。

Twitter: @chrisinsilico

Facebook: 被禁

Instagram: 被禁



Penguin
Random
House

Penguin Random House Next Reads标志

您阅读清单上的下一本书是什么？

发现您的下一本精彩读物！

获取个性化图书推荐和关于该作者的最新消息。

立即注册。